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元帅徐向前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引子

1990年11月1日，上午10时。

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银灰色的专机，在众人肃穆哀悼下，飞向蓝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元帅最后一次远行。飞机上的子女、孙子和秘书，捧着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陪同这最后的远行。笔者在这最后的告别时刻，回想着这位伟人的一生：他战功赫赫，历经坎坷，无私无畏，百折不挠，永往直前；他临终前的遗言，催人泪下。

1990年6月29日，病重在医院的徐向前元帅，预感到他人生的旅途接近了终点，他对前来探视的老战友李先念说：

“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8月5日，徐向前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都围在病床前。他见家人都到齐了，又吃力地重复了向李先念说过的三条遗言，并对子女们说：“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8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从西藏视察回北京不久，赶来医院探望徐帅。重病中的徐向前看江泽民来了，脸上露出笑容。他说：“以你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办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我是坚决拥护的。”

我身体好一些时，常听广播，看到现在社会风气和经济情况有好转，我很高兴。”他还表示了对军队工作的关心，对医护人员的感谢。江泽民走出病房之后对工作人员说：

“徐帅是老布尔什维克，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病逝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讣告，高度评价徐向前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赞誉他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称誉他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他“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向前的丧事，按照他最后的遗言，让他回归他一生中苦恋着的高山密林；让他和长眠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中的战友作伴。

他——这位大山的儿子，就这样最后奔向那一座座革命的山林。

11月2日上午，载着徐向前骨灰的飞机，飞临大别山上空，骨灰撒放在鄂豫皖边区：红安、七里坪、麻城、大悟、六安、金寨、苏家埠、商城、光山、新县等山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徐向前奉党中央的指示，由上海来到这里。他以非凡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才能，率领弱小的红军部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使革命队伍由几百人，发展到几万人。著名的苏家埠战役，歼敌3万多人，开创了工农红军一个战役歼敌的最高记录。徐向前还一直关心着这片老区的建设，惦记着老区的父老乡亲，怀念着一起战斗牺牲的红军烈士。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泥土更护花。

11月4日下午，载着徐向前骨灰的飞机，飞到大巴山区。

千里巴山，脉脉相连。这片山区曾留下过徐向前元帅光辉的足迹。他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后，千里转战越过大巴山，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曾在敌人围追堵截中损失很大的红四方面军，又重振雄风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兵最多、枪最多的一支队伍。兵多将广，发展到8万多人。追寻着徐帅战斗的足迹，追寻着大巴山对这位伟人的永恒记忆，将他的骨灰和朵朵鲜花撒向巴中、通江、万源和南江等地的上空，飘向大巴山的丛林峻岭。徐帅的思想、风范、功勋和品格将永存在万壑群出之中。

11月6日，飞机平稳地飞向河西走廊上空。舷窗外，千里祁连山白雪皑皑，肃立含悲；万株长青松斗霜傲雪，昂首注目。

他们像当年阵亡的西路军将士在迎接自己的总指挥。徐帅骨灰伴着黄、白两色鲜花、飘落到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的大地上。他又回到了当年战斗过的沙场，回到西路军烈士们中间。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率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与敌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而西路军将士近两万人伤亡，谱写了我军历史上极其悲壮的诗篇。

11月9日上午，飞机载着徐向前元帅的骨灰，飞临太行山区。飞机盘旋在徐帅战斗过的太原、太谷、祁县、临汾、长治、涉县、武乡、左权等地县上空，在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徐向前在这里造“人山”、摆战场，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徐向前元帅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11月10日上午，当飞机最后载着骨灰盒飞临五台县上空时，马达轰鸣，银燕低旋；滹沱河呜咽，五台山默哀。元帅像落叶一样归根了。在飞机上，在田野里，人们好像听见了一个婴儿在啼哭，离人们是那么久远，那么久远。

1

元帅不是天才。出生在“穷秀才”之家。滹沱河畔一凡童

对伟大的人物，人们习惯刨根问底。他出生在什么地方？

住过什么学校？读什么书？似乎伟人从小就是不平凡的。其实徐向前的童年，和旧中国乡村的穷孩子一样，含着泪水生，滚着泥土长。

“世界上没有神童，我也不是神童。生于一个穷秀才家。从小笨，读书也不是高才生。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这是徐向前对家世和青少年时期自我的点画。

密布中国大地的江河川流之中，有一条河叫滹沱河。比起长江、黄河来，它是条川，但在山西人眼里，它是条大河。全长540多公里，源头在五台山东北的泰戏山，湍急下流，穿割太行山区，流入河北平原，汇进子牙河。就在这条滹沱河流经的五台县境内，紧靠河北岸有个大村庄，叫永安村。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在这里出生。

据五台县志记载，这永安村原称“薄家村”。早在魏晋时代，官府利用滹沱河的水上交通，在这里设有仓城，屯积粮米。

随着滹沱河水移道和改朝换代，“薄家村”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改为永安村了。

据说，由于滹沱河作乱，薄家村一带常受山洪袭击。老百姓们在村南修起堤，又改了村名，以为这样就会永远平安了。其实，河水照样泛滥，永安村不得平安。只是年久日长，河边慢慢积起黄泥沙，河水又渐渐变小，河面变宽，永安村才“安”稳了。

徐向前出生时是农历辛丑年，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垮的年代。1900年秋天，英、美、日、俄、法、德、奥、意等八国的联军10万余人，进攻北京驻扎天津。北京城惨遭浩劫，颐和园大批文物古宝被抢走，慈禧太后率领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逃出北京德胜门，路经大同、太原。八国军队一直打到五台县龙泉关。

1901年7月，就是徐向前出生前的四个月，清政府与侵略中国的十一个大小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赔款加利息、白银总数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只准外国驻兵，不准中国设防；中国人民不准反抗帝国主义；中国政府要向侵略中国的国家“谢罪”等等。刚步入人世间的徐向前，不会知道这些，但他在一生中，却常常把自己辛丑年出生与《辛丑条约》说在一起。他给儿女们说家史，一说就是先说“辛丑年”中国的丑史。

徐门又添了男丁，全家人都高兴。特别是奶奶喜得合不上嘴。这老人看孙女是“多超余”，看孙子是金银福贵。徐向前的母亲一辈子生下七个子女。头一胎是女孩子，奶奶虽不喜欢，给取名先月，意思是先得月亮；第二个是男孩子，奶奶乐得喘不出气来，取名为“银仓”，意思是他会为徐家带来银钱满仓；

第三胎又是女孩，奶奶对她的到来，不冷不热，因为正是春暖花开季节，奶奶说就叫“春月”吧；第四胎刚生下不久，就夭亡了，因为是女孩，既没留下名，也没给全家人带来多少欢乐与悲伤。做妈妈的有些伤心，她是娘身上的肉啊！奶奶说：“来日是讨债鬼，去就去了吧，明年再生小子。”奶奶的话真灵了，第二年冬天，徐家第五个孩子又出世了，而且果然是男孩子。奶奶遂赠名为“银福”，意思不必说，是银钱福贵占全了。徐向前诞生徐家，是第六个孩子了，奶奶当然开心，取名为“银存”，意思明白：他的前程不光发财，而且银钱会多多积存起来。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

应该是叫起来好听、顺口、文雅有深深的含义。他给这第六个出生的孩子起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字子敬。徐秀才当时都没想到，“象谦”这两个字的谐音，与“向前”那么近似。儿子参加革命后，根据这谐音，改成了“向前”。这一改，意思就更深奥了。

乡下人盼富贵，总先从名儿上图吉利。仓里有余粮，手头有银钱，几十亩地几头牛，那是梦求的好日子。可是，徐门家的“银仓”、“银福”和“银存”这些“男子汉”，赤条条来，每天要吃穿，给徐家带来的只是越来越贫穷。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载着：“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

维持温饱。”他所说的温饱，只是糠菜之类的饱腹，有房住、有衣穿。swy2

每一家庭，都有一部发展、灭亡史。徐向前从小听说，祖宗辈是从洪洞县迁居五台山下的。迁居多伴随着贫困的，农家人不是讨饭，就是跑小买卖。他们家族在五台县滹沱河边落脚之后，一代代繁衍，一代代奋斗。到第十代，有人发财做了官，有人贫困如洗。据徐门的家谱记载，清王朝顺治初年前后至光绪末年，徐族中在二百五十年间，做过七品官以上的人 50 多；

得诰封、诰授的 15 人之上。其中最高的官，算是徐向前祖上的徐松龛，官至钦差，头品顶戴。清道光年间钦点朝元，翰林院编修，做过巡抚，署理过两广总督，编著有《瀛寰志略》，是研究世界地理的书。此人多才，却不知为什么犯了王法，被罢官治罪。

他死后，还得服刑，棺材上锁着铁链子。这桩事距离徐向前出生，是前十八代的事。

徐象谦懂事时，祖辈留下的，只有一个小院，当中是间破旧的房屋，一座二层的“小楼”北屋，一个代表“书香门第”的门楼，门楣上刻着三个大字“礼门也”。邻居家都称呼徐向前家“楼院徐家”。永安村四分之三的徐姓，唯一有二层“楼”的就是这家；同时还有一个含义：这家曾经是富家。

穷人家生孩子，赖地长苔子。徐象谦出生的第三个年头，母亲赵金銮又生了一女。

她正愁家里人口多，一大窝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岁，像一窝翅膀不全的小燕子，只知张嘴等吃，不会飞出去采食。再加上这是女娃，奶奶和家里人，都不欢迎最后的来者。

多余的人儿，总也得有个名呀，奶奶说叫她“占月”吧。意思是她又“占”了个吃饭的位置。

劳动力的增长，是家庭兴旺发达的来源，徐向前兄弟姐妹六个，算得上整劳力的，只有母亲。她已年近 40 岁，一双小脚，眼神又不好，不要说种田地，就是忙着全家七八张嘴吃饭，也是整年赶早贪黑。徐象谦的父亲“五经”、“四书”读得熟，只是不会种地，找了个教书的馆离家去了。

徐象谦刚刚记事，每天跟在母亲的身边做些小孩子可做的事。他最愿意做的事是照看妹妹小占月。论说，家庭中有奶奶、两个姐姐，照看最小的孩子，本不应该落在一个男孩头上，可是他却整天和小妹妹占月一块玩。占月最亲近的，也是这位“二哥”。

母亲怀占月已是第七胎了，这年她已过 35 岁。乡下人说，年轻的女人才生出胖孩子。

赵金銮从小荤腥少沾，嫁到徐门家完全吃斋，连葱蒜都不入口。这样的年纪生出的孩子，体质比起前几胎更差了，小占月从生下来就没多少奶水喝，多半靠米汤养着。两岁上出了天花，满头满脸身上都是水泡泡。家里人本不喜欢这“多超余”，见她出花，都觉得没治了，奶奶说，就是治下来，也是一脸麻子，姑娘家麻脸，嫁给谁去！小占月躺在一个大筐里，被放在西屋和猫狗在一起。正是炎热的夏季，苍蝇围着病孩子飞，不断嘬着小占月脸上的水泡、浓血。妈妈不忍心可怜的小生命受苍蝇叮，就让孩子们轮换看护着气息奄奄的占月。女儿先月要帮助做家务；三女儿春月贪玩坐不住；两个哥哥银仓、银福像野马，在小妹妹跟前站一会儿就跑了。徐象谦从小不那么野，他在小妹妹“床”边一坐就是许久。他手里摇动着一个小树枝。驱赶着占月脸上的苍蝇，他还不懂生死，相信妹妹会像姐姐一样长大。

占月的命大，她活了下来，慢慢长大。只是满脸麻坑，成了村里难见人的女孩。笔者见到这位幼年不幸女子时，她已 60 多岁。她说起家乡，谈起小的时候。充满着对永安村那片土地的爱。她说起徐向前，一口一声：“我二哥”。奇怪：徐向前在兄妹中排行第六，为什么叫他“二哥”呢？她解释说，旧社会女孩和男孩是分开排的，按徐家男孩排，徐向前应为“老三”，因为“老二”银福早年死了，家里姐妹都把徐向前称为“二哥”了。

随着年龄增长，小象谦幼小的心灵，蒙发着同情弱者的心态。他懂得女孩家脸蛋不好看会“没人要”时，向读书的父亲说：“一定得让占月念书，她那样只要读书有学问，丑模样也会找到好婆家。”

父亲后来正是这么办了，在家教占月读书认字，外出教书，还带上她。占月自知满脸是麻子，眼睛又不好，她读书特别用功。她从私塾到学堂，不管别人怎么讥笑她脸难看，她硬是考到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太原第二女子高小谋得个教师职位。她教书认真，对同学们耐心、细心，孩子们渐渐对这位看不惯的“麻脸老师”亲切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失守前同学们纷纷逃难，占月听说哥哥徐向前在八路军 129 师当副师长，跑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说是要找哥哥去当八路军。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动员占月去延安。于是，占月搭乘一辆去延安的汽车，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她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而后又进妇女党训班；再后出任延安女子大学干部科副科长。……

占月成长的人生。应了徐向前小时候的话：“只要读书有学问，丑模样也会找到好的婆家。”占月后来的名字叫徐达，她说起幼年的不幸的个人成长的道路时说：“路是自己走呀，我‘二哥’从小那份淘样，谁会想到他会成元帅。”

元帅小时候为何淘气，他自己记不清，别人不愿意说，也说不出。有些事情，徐向前的姐妹们还记得：永安村的男孩子，夏天常在滹沱河滩上玩，打沙仗、捞小鱼。最后是闹得你哭他叫。小象谦从小就不爱抹眼泪，他胆子大，心挺硬气。家里人怕孩子在河边玩掉在深水里，常吓唬说：“河边不是好玩的地方，河里有水鬼，会爬上来专抓小孩呀！”小象谦硬是不怕，还跑到河滩上，向河水叫唤：“水鬼，水鬼快出来！”他还学着爬树，爬家门前的大槐树，爬家庙院里的弯枝松树。不知什么人家，把一条小蛇打死扔到家庙门口，他提起蛇尾巴跑回了家。

妈妈眼神不好使，见他提着白花花的像小绳头，向他说：“从哪里拣的条绳头，怪脏的，丢了。”小象谦说：“是蛇，一条死蛇！”

妈妈不信，小小的孩子怎么敢提条蛇，走近一看真的是蛇，吓得妈妈连忙向后退，骂儿子是“傻大胆”。

家庭生活虽不宽裕，婆婆和媳妇之间是和睦的；兄弟姐妹七个人虽然没有长成大人，都还是听话的，彼此很少吵闹争什么高低。这也是奶奶和徐秀才立下的好门风。小银存刚过六岁生日不久，全家人正准备迎“财神”、贴春联、办年货，一桩使全家人悲伤的事临头了：12 岁的银仓不知患了什么病，一天夜里死了。家里老人为了不让小孩们看到死人的事，一大早打发银福抱上弟弟，春月抱上妹妹，躲出门去。刚刚懂事的小象谦晚上回到家时哥哥银仓已埋葬，奶奶和妈妈在哭泣，一个欢乐的家，陷入悲伤之中。

他头一次经历亲人死亡，幼小的心灵，刻下深深的伤痕。从此，他再

看不见大哥哥了，只在记忆中，留下银仓这名字。

父母悲痛欲绝，奶奶卧床不起。孩子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老人。第二年春天，小象谦听姐姐说，母亲托人为死去的哥哥“说媒”，找到一家刚死的十多岁的女孩，和哥哥银仓“成了婚”。这种“阴婚”、“鬼夫妻”，在乡间是常听说的事，是为了安慰活人，让丧子和丧女的父母，精神上得到个补偿：孩子“成亲了”。小象谦却似信非信，他不知道人死到底怎么回事，直到渐渐长大，懂事多了，对死去哥哥“结婚”的事才解开谜。一天晚上他问父亲：

“大哥他真娶了鬼妻？”

父亲说：“那是给你奶奶、妈妈宽心的。”

小象谦又问：“人死了，真会变成鬼？”

父亲不说了。这位徐门的秀才，书读得不少，只是些孔孟之道、诗经、周易，他说不出有没有鬼魂。为了不使儿女心灵中有鬼神，他说：“哪有什么鬼哟！谁见过鬼！人死如灯灭嘛！”说着一口吹灭跟前的小油灯，屋子顿时一片漆黑。

父亲徐懋淮，在徐家子女心目中威严、神圣、慈爱；在永安村以及邻乡百姓中，都有些名望。他从小在外祖母家就读私塾。13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穷，全靠外祖母供上学。20岁上他成为秀才。以他的才气和刻苦精神本可以继续攻读参加乡试，中个“举人”，只因家境不好，再加上清朝末年的科举制度已渐消声，徐懋淮成了终身的生员。在徐门中有一名举人，三名秀才，他是最后的一名生员——即秀才。因为家境贫寒，人们都称他“穷秀才”。

“穷秀才”学字“次江”，外号“遇丰年”。据说这外号是小名，父母当年所以给他起这名，因为正遇到丰收的年头，乡亲们喜欢称呼他这外号，也是觉得吉利、好听。

村里人谁家有什么难事、解不开的问题，就说：“找找遇丰年去！”谁家分门立户，要个公证人，就说：“请遇丰年来！”有的打架斗殴，要找个“评理的”，也常找“遇丰年”。至于逢年、办喜事、写写春联门对的事，乡亲们更乐于找“遇丰年”。这位“穷秀才”，书读得多，但不摆文人的架子，家境虽穷，但不媚富欺贫。他的品格和创立的家风，给了子女们深深的影响。

小象谦，呼吸着从五台山传来的清凉的空气，喝着滹沱河的流水，在严父、慈母教诲中，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步步迈着。

2

五台情深，难理解那个“极乐世界”

巍巍的五台山，是徐向前故土上的一颗明珠，是五台县人的骄傲。五台人走出县境，来到省城，住宿、吃饭，若问客人从哪来，都会自豪地说：“五台的哟！”历史上，从皇帝到平民百姓，都把登上五台山，看作进入佛国中的“极乐世界”那样荣幸。

五台山又叫清凉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风景优美，名扬四海。方圆

五百多里，高山峻岭，奇峰参天。有五座高峰，隐在云雾里，每座山头都有一个平台。东台是望月峰，南台是锦秀峰，西台是挂月峰，北台是叶斗峰，中台是翠岩峰。据说，很久以前，这儿是一片荒山。雨天滴水成冰，春秋飞沙走石，夏天热死飞鸟。东台下有个险山口，“秋天雁难飞，寒冬虎难行，要想从此过，除非活神仙”。文殊菩萨为改变这儿的气候，跑到东海龙宫借来了一块歇龙石，放在中台南边一条山谷里。从此，这一带绿山清水，成了清凉山，东海龙王派出五条蛟龙飞来，硬要把歇龙石搬去，文殊菩萨不让搬走，五条蛟龙尾巴一扫，把五个山头扫成了平台，龙也都变成了石头，被关进朝龙洞里。

五台山还有个传说，在望月峰下，有一座铜殿，是一位叫妙峰的和尚，跑遍了十三个省，化缘来的钱，用十万斤生铜铸造成的。龙泉寺的白玉坊上，雕刻着八十九条蛟龙，说是一名石匠雕了十年。

五台山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徐向前从小信，又不信。

小小的年纪，总幻想着去五台山看看，赶个庙会，可是，路远又没钱，他和五台县许多穷孩子一样，只能远远想着五台山，却看不见山的影子。

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经。来到徐家，请人从五台山买来一尊菩萨，供奉在屋里。她常讲给儿女听的，多是听来的有关五台山的神话故事。妈妈信佛入了迷，她每天烧香，打坐，吃“清口斋”。鸡、鱼、肉、蛋和葱、蒜、韭菜一类的邪味，概不入口。

家中有什么难处，她求佛，儿女生了病，她又求佛。小象谦很爱妈妈，却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求佛。一次妈妈打坐，他又凑上去问妈妈：

“佛是什么？”

“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是佛。”

“它怎么不说话？”

妈妈被问得说不清楚，挥手撵他出去。小象谦好奇心强，总想知道佛和人是啥关系。

可是，妈妈说不明白。他问过爸爸，爸爸不信佛，也懒得多说。直到徐向前参加革命以后，才弄明白了，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人心里造出来的。

打从小象谦的哥哥银仓死去以后，妈妈伤心，几乎每天都给佛插几柱香。夜晚在佛像前盘坐、念经，这是她唯一的安慰。

有时，妈妈忽然自言自语地说：“我梦见大银儿了，梦见大银儿了，他在西方极乐世界里！”

开头，小象谦不知妈妈祷告的什么“鸡乐”，听多了，才知道妈妈说的“极乐世界”。

“妈，你说的那世界在哪儿？”小象谦一天问妈妈。

妈妈向天上指指，说：“西方，西方。”

“我怎么看不见呀！那儿都有什么？”

“什么都有，有家、有院、有土地、有你大哥银仓、还有你爷爷……”

妈妈说着说着，又伤心地落下泪，她心爱的儿子银仓夭折，不知流了多少泪了。她相信佛经上说的，天上有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强盗、没有贫穷和饥饿。好人死去，都会进入天国，生活在那“极乐世界”中。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一种幻梦，是人类在痛苦的生活中

的一种渴望。

小象谦问妈：“那里人吃什么呀？”

妈妈说：“他们不吃东西，变成佛了。”

“我不吃东西，怎么饿呢？”

“你和他们不一样。”

“怎么才能和他们一样？”

“做好事，行善事……”

“什么是善事？是不打架吗？”

妈妈被问急了，手挥挥撵儿子去玩他的。

母亲赵金奎没读过书，却知情达理。她娘家在不远几里的槐阴村，家中也有读书人。

她不是徐懋准的原配夫人。在她之前，徐懋准曾娶一妻，两年多就病死了，没留下儿女。

赵金奎并没因为是“填房”，又比丈夫小几岁，而在徐家不好相处。她爱丈夫，敬婆婆。

她聪明、贤惠、嫁给徐门以后，秀才徐懋准教她背诵唐诗，教她识字。她不但学得了一些字，会背多首唐诗，而且能说出诗的每一句意思。她善于说故事，特别是五台山神话，她会讲出好多故事。冬天，晚上没事做，儿女们围在奶奶和妈妈身边，要她们说故事。

妈妈说，奶奶也跟着一块说，讲的多是听来的五台山里的传说。

听奶奶说，五台山里生长着很好吃的蘑菇，一种叫做娃娃蘑，一种叫做银盘蘑，它好吃又好看，说它像花也好，说它像娃娃脸也行，说它像小小银盘更近似。奶奶说这又香又美的蘑菇，是位叫香姑娘下的香雨变成的。说是很久以前，在五台山南台的锦绣峰下，住着位模样好、心灵手巧的香姑。她是采蘑菇的巧手。一天，香姑正采蘑菇，被一群坏人包围了，要抢她和她的蘑菇。她飞跑到锦绣峰顶，化成毛毛细雨升空了。随后五台山的森林和草丛中，长出了星星点点小银盘似的蘑菇。人们采来，闻闻是香的，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从此就流传着：五台山的蘑菇，是香姑娘下的香雨浇成的……

这美丽的传说，徐向前儿时相信，长成大人以后也觉得有意思。香姑娘这人，可能是人们传说的童话，可是五台山产香菇，全国驰名那是真实的。笔者在五台山吃过这种“台蘑”，看到各庙门前和台怀镇上，到处都卖台蘑。

奶奶和妈妈，还向孩子们讲过大铜锅的故事。说是，五台山的菩萨顶后院有一口大铜锅，那锅看上去不算大，烧起饭来够几百人吃。有一年“腊八”到了，和尚们准备煮一顿腊八粥，铜锅好久不用，需得好好清洗一番。菩萨顶上滴水成冰，谁都不愿意去刷大铜锅。一个小和尚不知刷大锅的苦，自告奋勇跳进锅底刷起来。他把锅底刷完，怎么都爬不上来了。他呼叫救他，老和尚站在锅台上，丢一条绳子下去，要小和尚抓住绳子往上爬，谁想那锅里结了冰，小和尚脚底是冰，锅四围全结了冰，滑得他怎么也登不上来。老和尚只好找来架上房顶的梯子，放下大铜锅去，小和尚这才顺着梯子，从锅底爬出来……

小象谦和姐妹们，听着这大铜锅的故事，好笑又好玩，他们只知道自家那口铁锅大，做半锅粥，全家八九口人吃不完，却不知五台山里还有那么大的锅。

五台山，庙宇有 360 多座，黄庙住的是和尚，青庙住的是喇嘛。五台

山到底有多少和尚和喇嘛，谁都说不清。每座庙都有故事，每座庙都有说不完的神话。小象谦越听，越想跑去五台山玩玩。可是，那山太远啊！

全家大小九口人，唯有父亲徐懋淮上过五台山，赶过五台山的庙会，登上过五台怀抱中的大（dài）螺顶。他也曾给儿女们说过五台山，不过他讲的那山，既没神话，又少孩子们愿意听的故事。母亲说过“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孩子们不知那杨五郎是什么人；父亲讲过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巡幸五台山的事，孩子们不知乾隆是哪朝哪代的，不知康熙又是什么皇帝。孩子心中的皇帝不是人，是神，是奶奶说的“真龙天子”。

小象谦直到读书学了历史，他才知道皇帝是人，不是神；才知道清朝的乾隆皇帝爱游山玩水，曾经五次上过五台山；康熙皇帝爱饮“五台圣水”，在京城里，还派人用车去五台山拉水。

父亲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儿女们记忆中颇深。这是关于乾隆皇帝游大（dài）螺顶的故事。

说是，乾隆四十八年春，乾隆皇帝又来到五台山下。他四次来五台山了，每次不是下雨刮大风，就是台顶降雪，他想登台顶进香拜菩萨，总是不能如愿。皇帝把一名叫青云的和尚从中台顶演教寺召来山下行宫，问他：“你在五台山多少年了？”

青云说：“二十多年了。”乾隆皇帝说：“我来好几次，怎么登不上一个台顶！”青云和尚说，这五台山的五个台顶山势高峻，一年十二个月，有八个月降雪，二百五十多天的积冰期，每年有二百多天刮大风，劝皇帝万万不要登顶。乾隆皇帝听了不高兴地说：“我就是想登台顶，朝拜五方文殊菩萨。三年过后我再来，不登台顶也要拜见五个台顶的菩萨。”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他的话不能更改。青云和尚为此事难坏了。

他回到庙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着三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来，怎么让他不登台顶，又能朝拜五方文殊菩萨呢？正在这时，庙里一个叫拴柱的小和尚偷吃供品，犯了戒。按庙规小和尚拴柱要受到重罚。青云老和尚向拴柱说：“先不罚你，限你三天之内，想出个办法：不登台顶还能朝拜五个台上的文殊菩萨。你若想不出办法来，加重罚你！”小和尚拴柱聪明过人，脑筋一转，第三天就告诉老和尚说：“办法有了。”青云和尚问：“怎么办？”拴柱和尚指指五台之中的一座小山大螺顶说：“在那里修个正殿，将东台顶的聪明文殊、西台顶的狮子吼文殊、南台顶的智慧文殊、北台顶的无垢文殊、中台顶的孺童文殊，合塑于大螺顶上，这样只要登上不高的大螺顶，就能朝拜到五方的文殊菩萨了。”

青云和尚听了，连叫：“妙哉，妙哉！”三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来五台山，登上五台怀抱中的小山——大螺顶，朝拜罢五方的文殊菩萨，高兴地留下诗文。从此以后，凡是到五台山参拜的僧侣和游客，不登五个台顶，都可以参拜五方文殊了……

父亲徐懋淮讲的这个故事，女孩子们都不那么爱听，徐向前却记在心。当他作了父亲后，也曾向孩子说过这故事，他的用意在于教育孩子：不要小看小人物，卑贱者最聪明。

五台山，养育着僧侣，招引着游客。五台山散发出的一种发扬善良美德的精神，又直接影响着五台人。徐向前的母亲一生中没上过五台山，这山散出的那种精神，每天都在她心中。

她积德好善，连只蚂蚁都怕踩死，她孝敬婆婆、体贴丈夫，教养儿女，

再苦再累，从不发句怨言。她怜贫惜老，广积善事。冬天，门外来了乞讨的人，特别是那些讨饭的盲人，她不但拿出饭菜，还把讨饭人引进屋里，让他们吃了再走。她的家庭本不宽余，节衣缩食省下的钱和粮，总是慷慨施舍给僧侣，每逢五台山的尼姑或僧人化缘到门前，她都如同道师长相待，净手素斋，不吝布施。

母亲积德好善、贤惠、助邻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小象谦。

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深奥的事理，他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和睦相处。

母亲又是儿女的第一位教师。孩子从生下来学会模仿，他的第一眼就看见母亲怎么做。小象谦从小爱劳动，是母亲的影响和教育的；他知道爱护人、怜悯受苦人，也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有一件事，在兄弟姐妹中记忆很深。

一年的冬天下大雪，小象谦跑出去和孩子们一块玩，打雪仗、堆雪人。正玩得开心，只见一个讨饭的老人被狗咬住，撕烂了衣服，摔倒在雪地里。小象谦和小伙伴吓退了狗，把老人领进家门，向妈妈说了亲眼看见的实情，要求妈妈给老人饭吃，给老人补补衣服。

母亲一面盛上热汤，一面找针线替讨饭的老人缝衣服。那老人千谢万谢，不知该说什么好，喝了热汤，没让给他缝衣服，走出门去，含着泪水称小象谦“小兄弟”。这件事，姐姐和哥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弟弟把讨饭人引进家是对的，有的说不应该。哥哥说：“讨饭的人那么多，不该往家领。”小象谦不服气，说：“狗咬了人家，该赔礼！”哥哥说：“狗咬要饭的该，该！”妈妈是公正的，她说：“你们别吵吵了，银存这样做是应该的。”妈妈还摸着小象谦的头，慈爱地夸了一句：

“俺银存懂事了！”

徐家五个儿女，父亲最喜欢的是银福（学名受谦），他比象谦大三岁，聪明伶俐，嘴巴巧，学写字、背古诗，都比弟弟强出一格，父亲当面不讲，背后说，将来能做学问的是受谦，能成大事的，也看受谦。母亲却更多地喜欢象谦，认为他虽比不上哥哥伶俐，可是心地和善，爱好劳动。特别是他同情、爱护满脸麻坑瘦弱的妹妹，每天陪着妹妹占月玩，使妈妈感到欣慰。受谦时常吼妹妹占月，还叫她“小麻子”，使妈妈心恼。她不许自己家的孩子叫占月小麻脸，她不愿意看到幼小的心灵受伤害。妈妈从不打骂儿女，孩子们就是犯了错误，她也只是数落着说一顿。只是有一次，小象谦受到妈妈一次重重处罚，让他跪在菩萨像前，不给饭吃。事情是这样的：

象谦七岁这年。夏天妈妈到滹沱河边洗衣服去了，姐姐们去挖野菜，家中只有象谦和妹妹占月。他和妹妹正玩着，读私塾的哥哥受谦放学回家来。他不知怎么想到要学妈妈念经，便叫弟弟爬上楼去，把妈妈的念珠挂上脖子，还穿上妈妈的衣服，在佛堂前乱跳乱叫了一阵。哥哥玩够了，象谦学着哥哥样，挂上妈妈的念珠，穿上妈妈的衣服，也大喊大叫起来。他们俩跳了一阵，肚子饿了，把佛像前的供果也分吃了。忽然，妈妈在楼下叫了。哥哥腿快，咚咚跑下楼来，溜出了大门。这时小象谦正在楼上吃供果，妈妈走上楼来。看见满地乱七八糟，念珠、衣服都丢在地上，供果也少了。孩子触犯了佛，妈妈几乎气晕了。

“你这不成器的小东西，作乱作到佛堂里来了。”妈妈摸过笤帚，要打象谦。却只把笤帚举着，没往下落，斥责着：“谁叫你这样的？”

“我……我……饿！”小象谦说不出话了。

“谁叫你偷吃供果的？”

“我……饿……”象谦不说哥哥领他干的，只说自己饿了。

“作孽啊！”妈妈不是为着那几块供果，是怕得罪了神啊！

她丢掉手上的笤帚，向孩子说：“我不打你，不骂你，你今天给我跪在佛前，不许吃饭。”

小象谦从没见妈妈这么生气，他怕极了，老老实实跪在地上。哥哥受谦却逃之夭夭，妈妈蒙在鼓里，并不知小儿子是受大儿子引诱作乱的。

妈妈疼爱孩子，不是捧吃捧喝，娇养花儿似的。往往疼爱最深的，是要求最严的。

小象谦不满八岁，妈妈就立下个规矩，要他每天起早跟哥哥一块去拾粪。大箩头他背不动，妈妈特给他找个小的。妈妈还说：拣不满箩头，不要回家吃饭。

走出家门不远，是条东西大道。大道上不断车马来往，拾粪的人不少。庄户人家都说：“庄稼是一枝花，全靠粪养它”。象谦人小，不懂这道理。每天要早起，那粪又臭，很不情愿，可是妈妈不让步，天不亮就喊他和哥哥起床。春夏天还好，一入冬清早大人还恋暖被窝，小小年纪，怎么愿意起床啊！妈妈仍是天不亮起床，一起来就喊：“银福、银存，快快起床吧！”

冬天，滹沱河上的风，起劲地吹。凉风吹到脸上，小刀割似的难忍。小象谦忍受着寒冷，每天早早起床，背起箩头奔大道。

五台山里，每年六月是骡马大会，会前个把月，四面八方的牲口贩子就奔五台，那里草肥水好，牲口“寄坡”长膘，大会一开锣，能卖好价钱。所以在五台山骡马大会前后，拾粪的孩子只要早起不贪玩，沿着大道，不多会的功夫，保准能拣满箩头粪。

可是，过了骡马大会，特别是入冬以后，拾粪就难了。难，妈妈还是一大早唤孩子起床，背上箩头出门去。

徐象谦，从小盼着五台山骡马大会，可是他不知道那会在哪里。他真希望快快长大去赶一次骡马大会！

拾粪这种事，想不到也会使他快乐。象谦开头不情愿，慢慢地不仅习惯了早起，看见一堆马粪心里像得到“宝”似地赶快拣进箩头。有时为着一堆粪和哥哥争着跑着抢起来。每天拾满箩头，背进家门，还喊着妈妈，让妈妈看看，他的成绩多大啊！

男孩拾粪，女孩挖野菜，只能对家庭生活略有补助，不会改变徐门清贫的状况。忠厚老实的“穷秀才”徐懋淮，既做不上官，又不会经商，守着七八亩地，难得养活一家人。他只好教私塾为生，挣几块钱来填补家中的饥荒。开始在村上教书，后来听说“口外”能多赚些钱，就远离家乡，独自一个人跑到内蒙古那边去教书了。他常年在外面，每逢年节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得回家来。每到腊月快过春节了，象谦和哥哥、姐姐，总是数着指头算日子，盼着在“口外”教书的爸爸回家来。带来年货，带来些钱，让全家人欢欢乐乐过好年。

春节又快到了，象谦跟着姐姐每天在村头张望，眼巴巴地望大路，盼爸爸回来。冷风吹得透骨凉，雪片洒到头上，他们还是等啊，盼啊。一连盼了几天，爸爸终于出现了，孩子们心里高兴，奔跑，呼叫着迎上去。可是，爸爸的脸像冰霜一样，身上穿的长袍没了，两手空空，跌跌冲冲走回家。全

家人都惊呆了。

“出了什么事？”妈妈着急地问：“这么冷的天气，袍子呢？”

“唉！”爸爸叹口气说：“路上遇着了劫道的，把钱劫去，袍子给扒走了。若不是看我是个穷教书的，命也搭上哩！”

“老秀才”在古蒙古和山西省交界的地区教书。那边识字的人少，教书先生一年能得一个元宝（合 50 两白银）薪水。除去吃饭穿衣和零花，剩下的钱足够一家人过个好年的。可是，从五台山到教书的地方，路经六七个县，走路多则七八天，路上如不歇，雇上头毛驴骑骑五天就到家了。这一年父亲徐懋淮想多省几个钱，一路步行，连毛驴都没雇。他白天走，晚上走，脚都磨起了泡。一天，在半路上突然遇着一个持刀人拦住路大喊一声：“快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

徐懋淮吃了一惊，碰上劫道的了，怎么办呢？他向那持刀人拱手说：“兄弟，我也是穷人，是个穷教书的。你可听说过，‘家有一年粮，不当孩子王’，我……”

劫道人说：“你别哭穷，实话给你说，我跟你一路几天，看见你身上有银子，快拿出来，不然要你的命。”

徐懋淮说：“兄弟，我身上是有几两银子，那是教书一年赚的。我家有五个孩子，上有老母，求你放了我吧！”

“不行！”劫道人举着明晃晃的刀，恶鬼似地奔过来。

“老秀才”是读书人，读书人爱讲个理，他没想强盗哪会听他说理。俗话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这强盗比兵还凶。保住性命要紧。徐懋淮只得把身上的全部银钱掏出，放在地上，祈求劫道人放他一条生路。那劫道人见秀才穿的袍子，说道：“看你是教书的，今天放了你。快把袍子脱下来！”

徐懋淮自知反抗无用，那强盗身强力壮，他自己是近 50 岁的老人，从来不会打架，手无寸铁，只好把袍子脱下，在寒风中奔跑取暖，一路挨冻受饿，好不容易赶回家。

妻子、老母和孩子们听了，大人心惊，小孩却像听故事。他们盼望的新年、新衣、鞭炮和女孩头上戴的花，都成了泡影。

“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着：“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到‘口外’去，大概是现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在‘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场。”

父亲徐懋淮遭劫，母亲又烧香又拜佛。她感谢佛的保佑，使丈夫平安回到家来。刚刚懂事的象谦，在一旁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问妈妈：

“劫道是什么呀？”

“劫道，是黑心的人，拦路要钱要衣裳，你不给他，他拿刀杀你。”

“他们为什么要劫道？”

“唉，还不是穷逼的！”

小象谦心里恨透了黑心人。他不愿意爸爸再走。可是，春节过完，爸爸又走了，还是要出去教书。

按理说，爸爸是秀才，又是教书先生，儿子总该优先得到读书的机会。可是，象谦长到八岁了，仍是拾粪，挖野菜。穷爸爸只能远在他乡，教人家的子弟识字，却顾不上自己的儿女。

只是放假回家来，才能教孩子们背几首唐诗，学学描写红模子。

小象谦羡慕哥哥受谦做学生，他也想读书、进学堂。

3

私塾“洋学”两重天，坎坷的学生时代

书香门第的“楼院徐家”，平日少有人来往。老秀才徐懋淮一从外地回到家，串门的就多起来。放着文房四宝的东屋，是徐象谦父母住的，也是客厅。每当客人坐下，象谦就跑进去，问声好，端给客人水烟袋。这是家规。

一位自称“愚兄”的老头，是徐懋淮的好友。不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长袍或大褂，一眼就看出是读书人。象谦五岁上，那位“愚兄”每次来，接过水烟袋就说：“快该念书了！”他还摇头晃脑，高声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什么叫黄金屋？”象谦问。他从小爱对不明白的事问个明白。

“黄金屋嘛，就是多多的元宝！”

“什么叫颜如玉？”

“颜如玉嘛，你长大就知道了……”

父亲和那位“愚兄”哈哈大笑，都不肯说出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事。清高的徐懋淮，对子女常常教训：要不贪财，要好学上进。至于男女之间的婚事，在孩子们面前从不提。

在“口外”教书的父亲，从前每年回家两趟，一是夏天麦收后，二是冬天过年前。

自从那年冬天半路遭了劫道的，回家少了而且再不走夜路。老秀才一回到家，全家人喜气洋洋，村上人都高兴。求他写春联的，求他写书信的，求他看黄历选黄道吉日办喜事的人，往往是来往不断。徐懋淮只要年前进家，从早忙到晚，和儿女们说话的时间都不多。不过，他很关心孩子读书识字，晚上再累，也要教已经入私塾的儿子受谦温书，教还没上学的象谦念念书，描描红仿。至于女儿，老秀才不多劳了，他认为那是妻子的事。

老秀才在孩子面前，像在学校那样威严，少说少笑。他教书桌上放着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板的工具，在家里，他的方桌上，也放着戒尺。虽然孩子们没挨过打手板，那戒尺却让儿女害怕。他们听说，父亲打学生手板，把小手打得肿肿的，吃饭都抓不住筷子。

象谦七岁生日过后，新年又到了，哥哥受谦七岁不满就入私塾去念书了，象谦问妈妈他为什么不上学，妈妈说等爸爸回来再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大事都由他定。新年前几天，父亲从“口外”回来了，办了年货，买了写春

联的纸。全家人高高兴兴。象谦想：过了新年，一定会让他去读书，可是父亲不开口。

晚上，象谦听父母在里屋说话。

“明年开春，该送银存念书了。”妈妈说。

“唉！两个学生要多少银钱？”爸爸说：“今年年景不济，来年不晚。”

妈妈说：“银存过年八岁了。”

爸爸说：“晚上一两年不要紧，明年年景好些再说吧……”

年景好坏，孩童是不关心的。他不知道念书要交学费，要买书本、纸笔，衣服还要穿得好些，这一笔笔开支，全凭父亲教书赚钱买。象谦既羡慕哥哥当学生，穿新衣、不去拾粪，又觉得上学不如在家自在。他等待着来年。

一年过去了，春节又临近了，父亲从“口外”回来，仍是不提让象谦入学读书的事，只教他背唐诗、写大仿。象谦已经会背好多首唐诗了，五言的、七言的，他都会背十几首。他不高兴再多背，死记硬背，挺伤脑筋的。父亲见他厌倦，说道：字，是学问的门面，你写得一手好字，人家一看字，就说你学问深啊！背诗词，是学会作诗的根本，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是诗人’哩！

一年过去，春节又来了。不知为什么，父亲没回家。孩子们盼，大人们念叨，谁也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是病了？是半路上又被劫了？不见人影，不见信。象谦见妈妈每天烧三次香：

早一次，午一次，晚一次。上香，妈妈总跪在菩萨像前，闭着眼睛，默默念叨着什么话。全家人正心急火燎，父亲回来了。原来他病了一场，推迟了回家的行程。尽管年货不丰厚，全家又欢欢乐乐过了新年。

新年过后，父亲又走了。九岁的象谦，仍然在家里读着他的“书”——拾粪、挖野菜、看母亲念经拜佛。

五台山的庙会又过一届。秋去冬来，村边那条滹沱河还没结冰，徐懋淮就从“口外”回家了。这一次，他连行李卷都背回了家。内蒙古那片沙漠世界，五十三岁不算太老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决定回到永安村，找个馆教书，更现实的设想是：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1911年春天，十岁的象谦入了私塾。他梦想了三年多的学生生活，终于开始了。这所私塾设在徐姓家庙里。村上姓徐的是大户，大部是学生，是徐门子弟，教书的老师姓徐，不过他不是徐懋淮。这老秀才怕夺了本家的饭碗，硬是推卸了家庙的这堂私塾先生职位，自己跑去外村教书了。使象谦和受谦高兴的是，他们的父亲再不去“口外”了。

担心的是，他们多了个比老师还严厉的老师。

家庙里的私塾，是学校又像圈进一群小和尚。三间土房，左右支着两个炕，炕上既是课桌，又是坐位。十几个穷孩子，挤在炕上读书，写字。

读书，学习是孩童认识世界的开端。十岁的徐向前，沿着这个阶梯，一步步往上登。

私塾开篇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只能学着背书歌，什么大事都不懂。清朝皇帝被推翻，他不懂，辛亥革命爆发，他不知道。孙中山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更不了解。他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头上还留着条小辫子。

父亲在邻近村庄教书，白天回家吃饭，晚上回家住。前几年，父亲不在家，孩子们心上空荡荡，好像比别人少了什么。他们想念父亲。可是，父

亲每晚回家，孩子们又不自在了。不读书的女孩家，偎在母亲身旁学针线活；象谦和哥哥受谦，却有背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大字。受谦从小聪明会来事，小嘴甜甜的，很讨父母喜欢，读书上心，更让父亲高兴。象谦嘴不如哥哥巧，开始入私塾读的书，多是父亲在家教读过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象谦从五岁就会背，如今十岁多了，还是背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象谦刚学话就说它，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支儿歌，如今十岁多了，父亲、老师还让背诵它。

一天晚上象谦向父亲说：“大大，俺老是背那些书，早背熟烂了！”

父亲一笑说：“这就叫‘学而时习之’，学了要温故，怎么不好！我不是给你说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嘛！”

严厉的慈父，责备象谦读书不刻苦，给他讲“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讲“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学。他还讲自己为什么没中“举人”，就是读书不上心。

老秀才一生中最大的抱屈，是没中举人。他给儿子讲过不少类似童话又非童话的故事。

父亲讲的故事之一：“头悬梁锥刺股”。

说是从前有个读书人，读书时，怕瞌睡，他开始放一盆冷水在身旁，读书读到累得头昏眼花了，就沾冷水往头上拍拍。

这办法慢慢不灵了，读着读着还是打盹，他就把自己的辫子用一条绳带吊在房梁上，这样一打瞌睡，头一低头上小辫就像有人从高空一拉，惊醒起来。可是，他日夜苦读，还是困啊！于是，他又找来一把锥子，放在身边，实在困极了睁不开眼，就摸过锥子，在自己大腿上猛扎一下。经过十年寒窗苦读，他终于金榜题名，考中举人，又考中状元……

父亲讲的故事之二：“凿壁偷光”。

说是从前有个读书人，家中贫寒，晚上连灯都点不起。他想夜读，捉来一些萤火虫，白天放在南瓜花里养着，晚上一只只放出来，让它们在书上爬着照亮，借它的光看书。

但小小萤火虫不但光亮太弱，也不听使唤。读书人一天晚上忽然发现，屋子墙壁破了个洞，从墙洞里闪出一丝亮光。原来邻居那边的灯光，透过墙上的小洞，射了过来。读书人心喜，轻轻把墙洞挖大，邻家的灯光射过来更亮了。他就借着那一丝的亮光，偷偷苦读诗书……

父亲还讲过好多、好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象谦心田里，深深埋下刻苦奋斗的种子。

十岁的象谦，进入私塾，开始是欢喜快活，新鲜劲很快过去了。私塾读的《三字经》，在家读过；私塾写的字，在家父亲教过。没有新鲜内容的书，像啃着块干巴地瓜，不甜不淡，没味道。他渴望着读更多的书。私塾不分班次，一本本书往下读。

天资好的学生，一年可以跳好几步，读完《三字经》，进入读《论语》，念完《论语》，再学《孟子》……“四书”“五经”是私塾中的基本教材。“四书”说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说的是：《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和《春秋》。徐象谦出自秀才之家，没入学校门就把《论语》背了半部，《孟子》背了半部。他正式进入家庙私塾，不必多用功，两年多的功夫，“四书”读完，刚开始读经书，兴办“洋学”的风，吃到了五台县。

春暖花开，农家男人习惯端着大碗，走出家门，蹲在树下吃午饭！大伙边吃边说闲话，远会说到皇帝，近会说到种地上粪。象谦 12 岁了，虽不是大人，吃饭时也端个碗，走到大人堆里听热闹。许多新鲜的事，在家里从父母嘴里听不到，在私塾更像是蹲在鸟笼里，时时都在叽叽喳喳背书，外边滹沱河发了大水，都不准出门看看。这天，他端着饭碗，扎在成人旁，听到声声议论：

“听说，官家要办‘洋学堂’了……”

“嘿，那‘洋学’上不得，孩子进去学野了，太原那边净是‘洋学’，学生都不兴留辫子哩……”

“嘿嘿，说是女人都要放脚，变大脚呀……”

象谦把听到的闲言碎语，回家说给母亲。母亲只当笑料，说女人要是不缠脚，嫁给谁呀！晚上父亲回家，象谦把听到的话学给父亲听，老秀才听着，只当没听见似的，嗯嗯几声过去了。其实，乡下人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老秀才天天出门，这样的话当然听了不少。他不反感女人放脚，也不反对男人剪去辫子。他眼见两个女儿常哭哭啼啼，不愿意缠脚，在内蒙古草原上，曾看见放牧的女子赤着双大脚丫跑路、骑马，觉得比小脚能干，女人为什么一定要缠足呢。老秀才从心底反对的是“洋学堂”。不完全是担心自己教书失业，认为“洋学堂”读白话文，不成中国体统。他听人说，太原的“洋学堂”男女混杂，更认为有失大雅。

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的终结。12 岁的徐象谦当然不知道，听说几句，他也不懂，像耳旁风轻轻吹过一样。父亲徐懋淮却知道历史在变化，他既不为帝制灭亡难过，也不为民国诞生高兴。老秀才明白，就是皇帝不被推翻，就是恢复科举制度，他这个被历史颠簸碎的生员，也永远不会成为举人、状元。他眼下最关心的是，多赚几块大洋，供两个儿子读书，为两个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办嫁妆。

他对妻子哀叹：“唉，养儿累折腰，何年何月是个头啊！”

儿女们却不懂得父母的心。象谦的哥哥贪玩、贪吃零嘴，每到东冶镇逢集和附近有庙会，他不到天亮就偷偷跑去了。象谦也盼着有机会去赶个集，逛个庙会，可是他才 12 岁，妈妈不放心他跑出去，听说东冶镇常来官兵，妈妈更不准象谦去赶集，他却越发想去看看热闹。

春天来了，东冶镇办起了庙会。这儿没有大庙，只是一座小小文昌菩萨庙，说是五台山和尚修大庙施舍的钱修的。菩萨只有一尊。这庙唯一的召唤力，是每年春天的庙会。

象谦知道妈妈信佛，想拜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路远难去，东冶镇庙会这天，就央求妈妈和他一块儿去赶庙会。妈妈不答应。她小脚，眼睛近视，从永安村到东冶镇虽然不过七八里路，她却很少去一趟。见儿子一门心思想去赶庙会，给了他几枚钱，让他随同邻居的老人去了。

那天，庙会上真热闹。买的卖的，人山人海。突然会“炸”了，人们四处奔跑。卖菜的扔了菜筐，卖吃喝的小摊，翻了案子，打碎了锅碗。男人们捂着脑袋上的辫子，拼命逃跑。人群中大叫着：

“快跑啊，剪辫子队来了！”

“剪辫子队来了！”

穿着黑军服的官兵，个个像凶煞神，拿着剪刀，在人群里，追赶头上

有辫子的男人。

剪辫子的官兵，抓住一个男人，咔嚓一剪刀，把粗黑的辫子剪掉。一个留辫子的男人，看见剪辫子的兵追来，双手捂着脑袋哭叫。剪辫子的官兵，咔嚓一剪刀，把那人辫子剪掉，连他的指头都剪破，血顺着头，流到脖子上，流满全身徐象谦从庙会上跑回家。把看到的新鲜事，说给妈妈听。妈妈只是奇怪，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讲给小朋友听，小朋友一个个瞪起小眼睛，以为他在说谎，有的小孩啧啧嘴，摸着自己头上的小辫，心里怕极了。晚上教书的父亲从外村回来，他从父亲口里听说，改换了朝代，把皇帝推翻了。

农民心目中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孩子心中的皇帝，是个“神”。象谦不管皇帝的事，他问父亲：

“为啥要剪辫子？”

“民国，不兴辫子了。”

“什么是民国？”

“民国嘛，就是……”是什么，读书识文的穷秀才也讲不大清楚。

徐象谦似乎懂了：民国就是不兴男人留辫子。他哪里知道，腐败的清朝皇帝，被从北京金銮殿上赶下了台，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大革命开始了。每当父辈们一块谈论，他便挤到人堆里，听听热闹。听多了，渐渐懂了：世道真变了。

会怎么变，孩子们不去管，大人们说说就过去了。象谦还是和从前一样；读私塾、写大仿，放学回家，背着筐头去挖野菜。爸爸还是和从前一样，当教书匠；妈妈也还是那样：操持家务事，吃斋、念佛、打坐。村上唯一的变化，男人剪去了辫子。男孩子头上的小辫，有的变成了一个“黑头盖”，有的变成“和尚头”。像姐姐一样的长辫子，象谦没了。开始变成“小和尚头”，他还不习惯，几天过去，摸摸剃光的小脑袋，倒觉得比长着小辫舒服呢。这也许可以说，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革命”。

老秀才徐懋淮不理解辛亥革命，小象谦更不懂。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着：

“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有一个什么结局。”

辛亥革命，被袁世凯篡夺了，扼杀了，他做了八十天的皇帝，小象谦不知道。在袁世凯死后，一个自称“辫帅”的张勋领导两万多“辫子军”，梦想着复辟封建王朝被打败了，小象谦也不知道。他读的书，都是几千年前的事，而且都是古文。他的经历中却有一件大事：从私塾跳到“洋学堂”去了。

辛亥革命，给乡村带来看得见的变化是：男人剪除辫子，女人禁止裹足，读书的孩子不再兴读“四书”“五经”。东冶镇上，兴办了一所“洋学堂”——沱阳高等小学。

象谦的哥哥头一年先入了那“洋学”，第二年象谦也去报了名。这时正巧父亲又跑“口外”教书去了，妈妈也不懂读书的事，她见象谦每天吵着去上“洋学”，就应下了。

象谦进了沱阳小学，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同学中不光是男孩，还有女子；读书不像在私塾，一坐一天背书、写字，而是一天上几节课，下了课，学生自由自在玩玩；课本不再是难懂的古文，多是白话文；课程中还有历史、地理、算术、格致（理化）、修身和英语。“洋学”和私塾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象谦开心极了。

他天资虽不是特别聪明，却也不笨。几年私塾底子，加上他刻苦好学，开始读三年级，很快又跳入四年级。每门功课都好，只是算术越来越吃力。一般的加减乘除还能应付，因为他在私塾里学过珠算，能熟练背诵“九九歌”，做算术题不发愁，一进入复杂的“四则题”，大括号小括号就糊涂不清了。他陷入1、2、3、4、5……苦恼的阿拉伯数字。

象谦的性格从小有点古怪。不懂的事爱钻，不会的东西爱问。妈妈说他“犟”，父亲说他“牛”，认准个理，一头牛也拉不动。算术几次不及格，老师说他跳级太快，还是降回三年级慢慢来吧。

“老师，我不能再回三年级！”象谦向算术老师苦苦央求。

“我能行……”

“算术课不像别的课，”老师说，“一定要从头来，就像盖房一样，从地上一块块砖往上起。”

“老师，我能行……”

“我看不行，”老师说。

“我能行，能跟上去……”

老师明白了：这学生是怕丢人。学生中跳级的都高兴，留级会难为情。象谦也正是这么想的，他读书本来就晚了二三年，个子这么高了，在四年级里都是数得上的“大学生”，要是再回去读三年级，那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了。他苦苦要求老师让他继续留在四年级。

老师喜欢这个学生，最后答应了，并说帮他补课。

从永安村到东冶镇，不过五华里多路，小象谦腿长跑得又快，半个多时辰，就能从家跑到学校，他却向母亲提出住校去。

妈妈说：

“你又生花花点子，有家不住，住什么学校。”

象谦说：“我就是住校。有不少同学住校。”

妈妈说：“他们是离家远。你跑跑路，还怕把脚跑大了。”

象谦说：“我明天就要住校，不回来了。”

妈妈叹口气。这犟脾气的儿子，真让她没办法。妈妈不愿意儿子住校，想的是：孩子年纪小，穿衣不知冷热，睡着了蹬被窝，吃饭不知饥饱，离开妈妈他哪会照顾自己。

再说，住校要多交钱，又多一份开支，钱从哪儿来？象谦和妈妈想的不一樣，他没想钱的事，只想算术不及格，住校里补课方便。再说，他喜欢集体生活，同学们白天一块儿读书，晚上一块儿住宿，一日三餐在一块儿，比围在奶奶和妈妈身边开心。他虽然刚过13岁生日，心中把自己当大人了。在《历史的回顾》中，他记述着：

“住在学校要交伙食费。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得带菜、带饭。菜也没有什么可带的，无非是芥菜疙瘩、芥菜缨子、咸萝卜什么的。主食带小米和窝窝头，一个月一升小米，熬粥喝。特别是冬天，光吃凉窝窝头受不了，有碗热粥就好得多了。”

他学习十分用功，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正课之外，他还看了不少新书。

有三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回家时时来学校，教他们唱歌、爬杆、耍木枪。对于国家的事听说也多了，孙中山，辛亥革命，民主共和，讨袁斗争，许多新人，新事听说不少。

新课程、新生活，使徐象谦像只飞出鸟笼的小鸟，在蓝天白云下飞翔。他白天在课堂上认真读书完成作业，下了课堂，捧个窝窝头边吃边和同学们说说笑笑。为着解开那些可恶的算术题，他白天下苦功，晚上作习题。他记着孔子的一句话，“不耻下问”。

同学都是他的老师，不会作的题，随时随地求教同学。晚上，同学们都上炕入睡了，他悄悄溜出集体宿舍，蹲在墙角角里，心中暗暗作算术题。心里想好了，挤进看校门的工友小屋，借助小油灯，把心里想的落到纸上。瞌睡了，他扭扭耳朵，拉拉眼皮，若不是头上小辫剪了，他真要把自己吊起来，学那“头悬梁锥刺股”的古人。

刻苦勤学，弥补了他算术的“先天不足”，慢慢地跟上了班，及格了。算术老师惊奇，怀疑他抄了别人的作业，要他当场演算，他沉着应考，把题目作出来，老师这才相信。不禁称赞说：“好小子，有出息！”

徐象谦突破了最伤脑筋的算术课，像下溲沱游泳，从一口气“狗吠”到学会呼吸换气，在学海中他成了自由人。

沱阳学校，是他开始接触新世界的起点，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笔者 80 年代访问过这所学校，在和教员交谈时，他们十分兴奋，都为沱阳学校历史上出了位元帅，感到骄傲，把徐向前元帅给学校写的信、题的字、赠的书都当作最珍贵的校史文物。一位年轻的教师说：“我们沱阳学校，在五台是一所最最有名的学校，它历史悠久，学生中出了位徐元帅！”

徐向前从 1924 年离家以后，只回过两次家。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回到五台，第一个探访的是沱阳学校。他拜会当时的新老师长，在这里发表动员人民抗战演说；在这里，和许多乡亲谈话。以后几十年，每会到五台家乡的人，每当有人去五台回来见他，他都会问问沱阳学校。在他 80 岁高龄以后，仍念念不忘他的母校，曾自己出资买了许多书，派人送给这所学校。

在《历史的回顾》中，他深情地说：“我很喜欢这个学校”！

然而，他在沱阳学校仅仅两年！寒冬来临，溲沱河开始结冰。沱阳学校开始放假了。

徐象谦背着书包走回家。

全家人天天盼，夜夜盼，在外教书的老秀才回家来。他会带回些银钱，办年货，准备过年。象谦和他哥哥，每天不敢偷懒，写大字，复习功课。他们知道，父亲进家头一宗事是要问他们学业怎么样，会查看写的大字，会考他们作文。父亲比学校老师都可怕。

象谦自觉得这两年在沱阳学校进步挺快，作文受老师称赞，算术、地理、历史等等，都不在别人之下。他既怕父亲考，又不怕。

老秀才回来了。果然，进门头一桩事，是考两个儿子学业如何。老秀才习惯了教书先生对学生的架式，坐在书桌旁，严肃地考了受谦，又考象谦。老秀才熟读“四书”“五经”，却不通“洋学堂”的课程。要考儿子的功课，一是考写毛笔字，二是考作文。

象谦和他哥哥，每人写了一篇大仿，交给父亲。老秀才认真地一字一

字看过，说他们都有长进。接着出了题，要儿子每人写篇作文。哥哥比弟弟早读几年书，又爱好作文。

《古文观止》、《尺牍大全》一类的书，背诵了许多，对文章的起、承、转、合，比象谦懂得多了，他又深知父亲喜欢的文体，于是写了篇文言文。象谦和哥哥相反，写了篇白话文。老秀才看罢大儿子的文章，没讲什么；看罢二儿子象谦的文章，眉头紧皱，说话了：

“你为啥全篇白话，古文忘了？”

象谦说：“现在不兴古文了，学校讲白话文。我们念的书本，交的作文，都是这样。”

老秀才不高兴了，“白话，白话，文章就是文章，不是说话。”

象谦说：“老师讲了，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要……”

“不要说了，”老秀才动怒了，“洋学堂误人子弟，你的文章从前还好，越来越不行了！我看你不如进私塾好！”

象谦从小怕严厉的父亲。他敢和母亲吵吵不敢跟父亲顶一句嘴。心里想父亲太守旧了，也不看看现今什么世道了，还守着他的老理不放。他以为父亲是吓唬他的，没想真的作出决定：要象谦转回本村的私塾。

父命难违。家庭供两个学生在镇上读书，学费和饭钱支付不起，父亲要集中财力，培养“有出息”的受谦。

徐象谦满心委屈，从沱阳小学抱回铺盖，连要好的同学都没讲，他为什么退学。他不愿意说，家里穷供不起兄弟俩，更难开口说是父亲嫌他作文不好。他不想让人知道父亲的决定。

他又回到家庙的私塾，哥哥却仍在东冶镇读父亲称为“洋书”的书，象谦本不爱说笑，两年多的“洋学堂”，使他变得欢乐了，一回到私塾，像一只放飞被捉回鸟笼的小鸟，有翅难展，有脚难跑，蹲在私塾，从早到晚哼唧唧唧读着孔孟的古训。他不知道读的是哪个年级，读了“四书”，又读“诗经”。

辛亥革命，像一阵风吹过去了。乡村中大多数的人还没闹清楚什么是革命，那革命的风潮就过去了。男人们又开始蓄辫子，女人们又时兴缠足。家庙里停办的私塾，又招学生。徐象谦不管母亲和奶奶怎么唠叨，硬是不再留辫子。见妈妈要给小女儿缠足，他拉起妹妹向外跑。妈妈气得大叫：“反了，反了，这都是东冶镇那洋学堂教坏了！”

父亲不在家，哥哥不在家，徐象谦是家庭中的大男子。他除了入私塾读经书，就是帮助母亲管这个家，他开始懂了，这个家只是缸里有些粮，连买油盐菜的钱都少有。这时他才悟到，父亲一定要他从沱阳小学退回来，不完全为的是那篇作文。

关进私塾，外边的新鲜事听不到，新书看不到，他最爱见的那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见不到面了。私塾的先生见象谦读书不上心，写字懒用功，提醒他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徐象谦看不见黄金，看不见颜如玉，他的眼前，是一本本古板的“四书”、“五经”。

他盼着父亲回家来，求求父亲，还是让他回到沱阳学校去。可是，父亲总不回家。他很想多读些新书，家里只有“四书”、“五经”，私塾里也是这些老本本。

这天，一位同学告诉他，东冶镇来了卖书的，有好多好多新书。徐象谦见母亲不在家，就到房里找钱，他只想找着钱去买了书，再告诉母亲。他知道家里没多少钱，若是公开向母亲要钱买书，那是不会给的。可是，他东翻西找，没有钱，打开母亲的一个小木匣，只见一副银手镯和一对耳环。这东西母亲多年没戴了，一直存放着。象谦灵机一闪：听人说东冶镇有当铺，专收女人戴的首饰，“当”给他们还能赎回来。小小年纪，不懂“当”是怎么回事，想去试试。于是，他把手镯和耳环揣进兜里，跑出了家门。

东冶镇一家新开的当铺，高高的柜台，使不满 14 岁的小象谦翘起脚，才把一副手镯和两只耳环递给掌柜的。

“这东西，是你的吗？”柜台里问。

“嗯。”

“要当多少钱？”

“多少都行。”

“你是永安村‘楼院徐家’的二小子吧，”掌柜的探出头，认出了徐象谦，说道：“这东西我们不收，你快拿回家去吧。”

小象谦只好把东西收进口袋，跑到书摊上远远地望了几眼，悻悻走回家。玉镯和耳环，悄悄放回母亲那只小木匣里。

书没买到手，小象谦心里不痛快，只好又去私塾，读那些他不愿意读的书。走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生气的样子，冲着他说：

“你好大的本事，人没长成，会跑当铺当东西了！谁让你这么做的？说，快说。”

“我……我……”小象谦说什么呀，结巴了。

“小小的年纪，偷了家里东西去当，你反了！”母亲越说气越大，声音越高。

“我想买书，书……”

“书，书，家里多少书不看，我叫你买书……”母亲说着摸起笤帚。

象谦见势不妙，跑开了。

这件不光彩的事，徐向前记了一辈子。在他 80 岁高龄写的《历史的回顾》中，还记述着：“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

母亲很生气。

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令徐象谦苦恼的事，不只是没新书读。在他重返私塾的第三个年头，一个严重的打击，像把刀刺到心窝上——父母决定要他休学。

河北省阜县冒出个“山西小伙计”，谁都没想到他会成为中国的元帅

这一年，徐懋淮的私塾团馆了。家境不好徐家难供两个孩子读书了。老秀才认定象谦不如他哥哥有出息，决定要他休学，省下些钱供受谦一人读书。

徐象谦从小不那么爱说爱笑，几年的“洋学堂”，使他的说笑多了起来，一转入私塾，接着又休学，一下像掉进一口枯井里，抬头看看天，天只有碗口那样大了。他没有了笑声，更没了歌声。他虽然几年前就剪掉了头上的小辫子，如今生活又突然倒后去了许多年，每天闷闷不乐。

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十五岁的他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动。天天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春天播种、挖野菜；

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粱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他非常羡慕私塾的学生，更向往哥哥的沱阳学校“洋学堂”。他每次到东冶镇，经过沱阳学校门口，心窝里那把无形的刀子都在绞动。他恨这世道，为什么别人家有钱读书，他却被拒之校外。他恼父母偏爱哥哥，为什么只认定哥哥“有出息”，不想他会“出息”！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争口气。

路又在哪里呢？他想快快长大，奔太原去，当兵、进大工厂做工。听人说，滹沱河对岸河边村阎锡山，如今成了山西的都督，回家来跟着许多护兵、马弁，他是从日本“洋学”回来的；又听本村那个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人说：要想考取军官学校，得是“洋学堂”毕业的。失学的徐象谦，想到这些心凉了。在他的面前是黑茫茫一片，没有路，看不到希望。

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也都为儿子的前程忧心。老秀才原先最理想的，儿子读书上进，写笔好字，出手文章好，即使如今废除了科举制度，中不了“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有了学问也可以教书去。母亲的愿望，儿子读书不成，去学个木匠。她看见做木匠的，“一把斧头吃四乡”。只是担心这孩子身体不壮实，瘦刮刮的，学木匠要抡斧头、拉大锯，妈妈舍不得孩子吃大苦，又怕他不愿意。

一天晚上，母亲烧好香，打完坐，试探地向儿子说：

“送你学门手艺好不好？”

象谦问：“学什么？”

母亲说：“东冶镇上有个木匠，跟他学徒倒不错。”

象谦从没想过这条路，他只想读书，向母亲说：“我想去东冶镇上学。”

母亲轻轻叹口气。她虽然不识几个字，却知道读书是人生成才之路。可是，如今家境不济，老的老，小的小，女的多，男的少，没人种地，没人经商，供一个学生读书都难了，哪能供得起两个学生！她说不出安慰儿子的话，只是默默不语。老秀才徐懋准走进屋来，他听见象谦又提出上学的要求，说道：“进不进学堂，都能念书，你在家多用功写写作文、背背唐诗，不是和进学校一样吗？”

象谦不同意父亲的话，知道这番话是自我解脱，也不和老人争辩，说了一句：“我还是想去东冶镇上学！”

父亲说：“等来年再说吧。”

一年 365 天，这一天天熬着，对老人说来是很快的，可是对还是孩子的象谦来说，真是难熬啊！他每天早起去拾粪，吃罢早饭干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留下的那些旧书，翻来翻去，书皮都碎了。他不愿意每天白白度过，从河边割回来一捆小树条，先是把坏了的筐头修补一番，后来索性自己动手，编织新筐头。编织头一个不怎么好看，又重新编织第二个、第三个。父亲对儿子此举不以为然，淡淡一笑，他认为读书人不该干这些；母亲却惊喜得很，拿起象谦编的条条筐，左看右看，笑着说：“和买的一样！”姐妹妹妹看见象

谦编成的筐，这个夸他手巧，那个说可以拿到东冶镇上卖呢。哥哥受谦从学校回家，听说弟弟会编筐，看都不看一眼，他认为书香门第的孩子，学做这些粗人才做的活，是没出息。象谦不管哥哥怎么说，他每天还是去河边割小树条，编筐头。谁也记不清，他编了多少个，一个春天，院里大大小小的筐头，都换成了新的。

80年代，笔者在北京访问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志明（又名松枝），她所奶奶讲过父亲小时候失学在家编筐的故事。她说：“奶奶很看中那些筐筐，父亲离家以后，奶奶想他，经常一手摸着一个筐流泪。”

编筐、拾粪、挖野菜，不能为家庭增添多大财富，徐家越来越穷困。象谦的大姐、二姐先后出嫁，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都作了陪嫁费，父母年老，奶奶多病，哥哥读书，妹妹年幼，十五岁的象谦，顶起了全家最繁重的劳务事，挑水、割草、到地里刨高粱茬谷茬，去窑上背炭。从春到冬，从早到晚，他没有得闲的时候。特别是去窑上背炭，来往20多里路，一路汗流浹背，脚底板磨出了血泡，他咬紧牙关，一次次去背炭。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

“背炭要到窑上去，离家很远。背少了不上算，每次尽量多背，虽然很累，但我都挺住了。”

少年承受着超能力的劳动，是痛苦的；看不到人生的美好希望，精神上的折磨，往往比肉体的痛苦更难忍。徐象谦进不了学校，要读书没书读，像一个盲人在行路，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这人生的路有多远，何年何月是尽头！他夜晚躺在炕上，常常是思虑难眠。也许是他成熟过早，或者是看的书多，人不满15岁，想问题却像成年人。他不甘心就这样下去，想着应该出去闯大事，远走高飞，不怕路远，不怕孤单。他在沱阳学校读书时，听人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大上海，他想去大上海；又听人说，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大海、有长江、有黄河，他想下海、游江河；又听人说，五台山上的和尚，披着袈裟，能游遍全中国，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夜晚想得很多、很远、很美好，天亮起来，一切都如梦一场。他照例要背上筐去拾粪，放下筐去挑水。大门不远便是溱沱河，河水汹涌，长流不息，可是河里漂着杂草，还经常漂着死狗死猫，村里人不吃河水。徐象谦从12岁就开始挑水，那口井离家二里多路，他每天要挑三担水。

一天，他在挑水的路上，碰见了本村一个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人。那人穿身崭新的军服，打着发亮的皮绑腿，十分神气。村里的人都向他打招呼，他俨然像个军官，说话连五台人的音都改了。徐象谦看到那人，又起了当兵的念头。他虽然不懂兵怎么生活，兵又是做什么的，又常听老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他想先当个兵再说。

可是，到哪儿去当兵呀！不过是一场梦。

父母为儿女操心，不光是他的前途，还有婚姻。在徐象谦读书无门，走投无路的当儿，一天有个媒婆走进家，给他谈亲来了。象谦从懂事后就讨厌媒婆。她们嘴巴流油油，把穷家说成富户，把丑女说成美人。象谦曾听媒婆给大姐说亲，当时把大姐夫家讲得不知多好，谁知大姐嫁过去，每次回来都向母亲哭哭啼啼。准是受了媒婆的骗。如今媒婆又来给徐象谦说媳妇，他也不知说的那家什么人，媒婆一走，他就冲着母亲说：

“我不要媒人说的媳妇，她的话不能信！”

“你不小了，”母亲说，“我看她提的人家不错，姓朱……”

“不听，不要！”象谦捂着耳朵。

母亲说：“这由不得你，成家立业，人人都一样，除非五台山的和尚没家……”

“不要！”象谦和母亲吵吵着。“我过两年去当兵！”

一句气话，把妈妈吓了一跳。她一生信佛，吃斋好善，最怕当兵。听人家说，兵是拿枪打仗的，打死人不偿命。她可不能让儿子去当兵。俗话说：饥不择食，穷不择妻，不管怎么样，先给儿子找个媳妇。

徐象谦在苦闷中度日，在繁重的劳动中生存。他几乎没听懂是谁家的女儿，忽然变成了他未来的妻子。她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模样，一无所知。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桩要永远拴住他的婚姻，就那么定下了。

茫茫人生路，他不知往哪里走！

年似流水，不见头。徐象谦像村前边滹沱河上漂泊的一棵小草，顺着河水流。他不知道流到哪个湾里停下。

爸爸看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为他另谋一条道路。这天父亲叫他到跟前，说：“银存啊，我托人替你找了个学徒的地方，愿意去不？”

徐象谦问：“去什么地方？”

父亲说：“阜平县有个亲戚，要招个学徒的，离家有二百多里呢！”

二百多里和二十多里，在徐象谦心目中好像没有多少差别。只要能学个手艺，远近他都不多想。他已经懂事了：不能靠父母过一辈子，人生的路子要自己去闯。他答应了。

十六岁的孩子要远行，妈妈心里难舍难分。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走这条路了。晚上，妈妈又求神拜佛。佛是木头的，坐在佛台上，有眼看不见，有嘴不会说话，它不能说出徐象谦此行的吉凶。

阜平既不在本乡，又不在本县，是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了一个铺子。徐象谦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走向阜平县城。头一次远行，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独立生活迈出的第一步。他望着高高的五台山，在冷风中走着，走啊走，一路上，几乎很少想事，只盼着快快到目的地。

阜平县城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这儿有句俗话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南关，石头铺的街道上，长着几棵古槐树，古槐和古老的城门，才能说明这儿确实是个县城。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这个小店，开始卖的是书和一些杂货。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外还有个伙计，是店老板娘的弟弟。小学徒工徐象谦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一切杂事都叫他干。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文书：徒弟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学满出师，要谢师一年。徐象谦从小劳动惯了，学徒工的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

开头只是想家，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为了出师和有个饭碗，他忍耐着，默默苦熬。

男老板，是徐象谦大姐夫的表兄弟。俗话说，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象谦说来，更不算亲了。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他从

小爱看书，因为没钱买，那一次把妈妈的一对耳环和手镯偷偷拿去当，气得妈妈要打他的事记忆犹新。如今看书，不要钱买，再不会发生那种丢人的事了。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就是没了事，也要站在柜台前，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徐象谦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他从小就有些犟，自己愿意干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干下去。有了空他还是读书，只是尽量设法躲开女老板的眼。男老板是个读书人，对徐象谦看书，倒是眼睁睁闭，最多说一声：“不要把书弄脏，书脏就卖不出去了。”徐象谦应着。小心翼翼翻书。看完了，又放原处。他从心里高兴，父亲为他找了这么个地方。女主人却不高兴新来的小伙计看书。她一见他捧起书本，不是派他活，就是冷着脸说几句。徐象谦怕女主人的冷脸，书白天少看，晚上多看。女主人晚上关了店门，没事不要点灯。徐象谦不管她，该看书还是看。想写字还是写。

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女当家的嘴，一会儿甜，一会儿尖，拿人家碗，属人家管。徐象谦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

一会儿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

一会儿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

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象谦大，个头儿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动手。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戚，也板起脸，支派徐象谦做杂事。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

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书店一天天冷落，几天难得卖出一本书。“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老板看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兼做起面坊来。买进小麦，支上磨盘，用两头骡子轮换磨面。徐象谦和另一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六斗小麦。磨了筛，筛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象谦一个人身上。

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支撑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两头骡子还能倒替着休息，一头在拉磨，一头吃草，小徒工没有休息的时候，他的生活像那盘石头磨，不停地转，不住地磨。从早到晚，一圈圈转，没有尽头。徐象谦刚入店那股高兴劲，消失了。石头磨还有停转的时候，他这个小徒工，要转到哪一年，哪一月呢？说是学徒，难道就学这些！

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起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

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

这时候唯一安慰他的，是店里的一些书。《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个夜晚。书中的故事，常常使他入迷。

他喜欢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喜看孙悟空闹天空，却对《荡寇志》中写的梁山泊下场，感到丧气。

他对苦和累不打怵，最怕的是派他去讨帐。年关一到，老板就叫他出门去，揣着帐本，走东串西。欠债的人，不是躲着不见，就是苦苦央求宽限。每当空手回店，老板总要发火。好像他这学徒工欠了店里的钱似的。老板大声斥责他：“不行，不行，明天再去！”

徐象谦说：“年景不好，眼下都有难处！”

老板吼起来：“讨债，讨债，就是要讨，讨！”

小学徒工和店老板的关系，越来越生疏。他躲在磨坊里，再不肯外出。气得老板和老板娘没有办法。老板只好自己拿着帐本，走街串巷去了。

在困惑中，一天徐象谦接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徐象谦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叉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心中高兴起来：这会是真的？他白天看信，夜晚油灯底下还是看信，白纸黑字，硬是那么写的。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学校？

两年徒工生活，他早已厌倦。每天早起晚睡，晚睡早起，生活就像那两头拉磨的骡子捂着眼，没头没脑地围着磨道转。繁重的劳动，店家的冷眼，还要出门讨债。他早就想离开了，只怕没个地方。他像黑夜里看到光亮，苦海中望见了岸边。

他毅然决定了：走到太原考学校去！

可是，他心里又害怕起来。怕话说出去，店家不放他走。来时说下的学徒三年期满呀！他怕到了太原，万一考不取，怎么办？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向老板请假，说要回家去探父母。

从此在那石头铺地的小街上，人们看不到“广兴隆”的小伙计了。80年代笔者访问阜平，“广兴隆”旧址附近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那个从山西来的小伙计跑了后，小街上老槐树下，说闲话的人，传出这样话：“山西的小伙计投奔太原了，得了个什么官呢！”

传说的话添油加醋，有一点是真的：徐象谦是跑了，是准备去考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了。

徐象谦先回到家乡。父亲已不教书，正病恹恹在家。儿子突然回家来，说是要到太原考国民师范，老秀才精神头好了。

他懂，师范出来的学生，可以去教书，赞许地说：“好啊，能再念几年书，比学徒有出息。”可是，老秀才又嘀咕：这孩子失学几年，学底本不深，能考上师范吗？他饱经过考场的苦，“考场好比刑场”啊！

母亲不懂什么是国民师范，却知念书是件好事。她担心儿子考不取，又丢了学徒的事，悄悄问儿子：“你把学徒的事辞掉了？”

“没有，”徐象谦安慰母亲，“考不上，再回阜平去。”

“也好。”母亲放心地说。

全家人听说徐象谦要去太原考学校，都为他欢喜。上路前，母亲为儿子做了他爱吃的莜面窝窝，像送亲人进京赶考一样高兴地忙着。其实，家里人大都不懂，国民师范是怎么回事。

学校到底要考些什么呢？徐象谦都没法想。他把从前读过的书找出来，乱翻翻看；又把从前写的作文、做过的算术题翻腾出来，日夜加劲复习。好在，这几年失学以后，他从没断过看书、写字，只是算术之类的课，丢了不少。

他在家温习了几天功课，打起个行李卷，带上几本书，又离开了永安

村，奔向太原。

太原国民师范设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来到太原，先去找哥哥。

哥哥徐受谦，自小比弟弟聪明，拾粪、出力的活却不如弟弟。他写信叫弟弟来太原考学校，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弟弟辞了学徒，真奔他来了。哥哥心里倒不安了。

他知道弟弟学底不厚，功课又丢了四年，认定他难考上。

徐象谦问哥哥：“都考什么呀？”

哥哥说：“还不是算术、国语那一套。”

徐象谦读书的年头，不算少了，从私塾算起，按年头说，他比六年级生读的书还多。

只是书读的半半拉拉，很难说到了高小毕业。他却不示弱，向哥哥说：“我想能考上！”

第二天，他跑去报了名。

考试，不靠碰运气，要真才实学哩。虽说临场复习已经来不及了，他还是把随身带的书，从头看，从头读。从前常听父亲说“书到用时方恨少”，那几本书，真的太少了。

好在失学这些年，他从没丢开过书本，特别是学徒这两年，看了不少的书，这使他心里觉得不是那么空空的。

考试的日期很快到了。他像一个新兵上战场，满怀着恐惧和新奇，整整拼搏了一天。

从考场出来，忽然感到浑身轻松。一道道考试的题，终于都被他征服了。他虽不敢说每道题都答得好，可是没交白卷！

谁知道，考试过后，比考试前还紧张。夜晚，他翻来转去，不能入睡。不知命运又会怎样对待他？想想这道题答的不全，又想想作文写得不好。他想的更多的是，考不上怎么办？想来想去，好像只有一条路：再回到阜平小店去，磨面、挑水、喂牲口……

他天天盼着学校发榜。

等啊，盼啊，过了几天，国民师范学校门前，贴出了红榜。

徐象谦——这个失学四年的小徒工，考取了。他高兴万分，当天就写信回家，把喜讯告诉父母，又写信给阜平那个小店，正式向老板辞去了学徒。兴许从这时起，阜平县那条石头铺路的小街上，才传出了这样的话：“那个山西的小伙计，投奔太原，得了个什么官……”

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人们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学生都发了军装。

在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徐象谦和同学们，都脱掉旧长袍，换上一身新。黄色的制服、新鞋、新袜，看上去完全像个“官”。

开课前，他回了一次家，步行经过东冶镇，回到了永安村。

乡亲们看他身穿制服，有人在悄悄议论：“咦，这孩子不是去学徒吗，怎么像个小兵？”有人懂，有人不解，妈妈信佛，最怕兵。

看见儿子的一身打扮，小声问：

“银存，你真的考上学了？”

“是考上了。”

“不会是当兵吧？”

“不当兵，穿的是兵衣，不要钱哩。”

老秀才父亲，知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也怕儿子当了兵。他听了儿子的解释半信半疑地说：“哦，不是当兵就好。”

徐象谦说：“毕业了，去教书！”

父亲说：“那好，那好！”

小时的同学，一块儿在滹沱河玩过水的好友，听说徐象谦考上国民师范，都为他高兴。大伙围住他，问太原城的新鲜事。

徐象谦的话语也多了……

5

从“准士兵”到革命军人。在黄埔军校，蒋介石发现了许多人才。却 没识破一位帅才

在 50 年代中期，笔者作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中一个刊物的记者，访问徐向前元帅，交谈中，记者问：“徐帅，你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穿军装的吧？”徐帅微笑点头，忽然眼睛一亮，又补充说：“应该说入黄埔之前，我就穿过军装，那还是一名‘准士兵’。听说过吗？‘准士兵’还不能说是正式的士兵，就和‘准尉’、‘准将’一样，是处在准备之中嘛！”于是，他就说到太原城，说到辛亥革命，说到阎锡山和山西国民师范学校。

太原是座历史名城。远在战国时期为郡，从唐代以后改为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改成民国后，这儿变成了军阀阎锡山统治的地盘。阎锡山是徐向前一河之隔的老乡，五台县河边村人。他生于 1883 年，比徐向前大 18 岁。阎家开始是小地主，尔后在五台经营“吉庆昌”钱铺。阎锡山幼读私塾，16 岁弃学经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清兵在五台山一带设防，阎锡山因钱庄倒闭，为躲避债务，跑去投军，在清军中当了一名伙计，不久，又从军队中逃出，进入了山西武备学堂读书。难得的机遇，使这名经商失败，从军不成的人，成了日本留学生。1904 年夏天，清政府指派山西武备学堂选派 20 名出国留学，阎锡山当选了。他在日本专修军事的振武学校，结识了正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阎锡山和留学日本“宏文”师范学校的同乡赵戴文等人，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09 年 3 月，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在太原陆军小学任教官，后参加北京朝考，得了个“武官举人”头衔。

随即升任为监督官和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第八十六标统（相当于团长）。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阎锡山以在山西太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铁血丈夫团成员资格，召集秘密会，响应武昌起义，并领兵占领了太原抚署。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孙中山十分器重这位“山西都督”。民国元年 9 月 19 日孙中山来到太原，一次讲话说：“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经孙中山与袁世凯讨价争执，阎锡山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山西都督。孙中山曾对阎锡山说：“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还给阎锡山亲笔题写“博爱”两字，并与阎锡山等山西名流合影留念。

阎锡山不负孙中山的厚望，雄心勃勃，他要以为一位革命新人的形象，

立业在山西。

他发布军政权的施政纲领，提出“民德、民智、民财”的三项政策。他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以“推广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等等，实现所谓“民智”；以“改良农业、提倡工业，以利民生”实现所谓“民财”。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他在《手谕人民十四条》中说：最为可恨的有两件事：男子吃鸦片，女子缠足。他的“十四条”中强调：“补习国民教育，是教人学习，教人学本领。他在山西大力加强教育事业，在太原办了私立进山中学，在河边村办起私立“川至”中学，以他的字号命名。他更下本钱的是，在太原创立了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它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为创办这所学校耗资二十五万多元。它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二十个班为“速成班”，学生有一千二百零六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四个班，学生二百多名。

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穿军服，打绑腿，扎皮带，过着“半军事”生活。除了上军事课，还得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营以上军官。

国民师范的学生都穿上军装。在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

太原城里，从此也流传着：“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有人说：它是一座“穷人的学校”，又像个军营。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徐向前从小喜欢爬树上房、舞棍，如今俨然像个小兵，开心极了。国民师范学文化，学政治，又学军事。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军队中的一些大官，常来讲课。有些学生，暗暗担心：“这不是当了兵啦！”徐向前却不担心，他要读书，要寻求一条生活的道路。他想就算当兵，也不怕。

国民师范在阎锡山治理下，过的是严格的军事生活。徐向前每天早起来，跑完步，洗罢脸，就拿起书本，高声朗读。他开始学习英语，从字母、单词开始，啧啧哇哇地练发音。在沱阳高小读书，他学过英文字母，早已都忘了。

“中国人为啥学外国人说话？”他问一个比他年龄大几岁的同学。那同学也每天啧啧哇哇学英语。

“学英语好，”同学神秘地说，“学会外国话，出国留洋去！”

“留洋是什么？外国啥样？”从乡村来的徐向前不懂。

“留洋啊，坐上轮船，漂洋过海，到外国逛逛。”

那位同学，不知是听人说，还是从书报上看的，把外国说得天花乱坠，讲得“留洋”比孙悟空去西天取经还热闹。徐向前从小拾粪、挖野菜，活动的天地就是永安村。离五台山那么近都没去过，没看见过海，只在村边滹沱河里学过“狗爬”。他不相信那些话，也从没想过会出国留洋。学徒的时候，只想能到太原玩玩，只想有机会再读书。现在，读书的愿望实现了，像个饥饿的孩子，忽然来到摆满丰盛饭菜的餐桌前，大口大口地吞食起来。听说，速成班两年毕业，能分配到乡村当小学教员，他更觉得幸运。

学校是新的，课程也是新的。开学这一年，正碰巧赶上“五四运动”，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正像一团火在全国各地燃烧。

“五四运动”的烈火，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一颗颗受苦的心。徐向前从图书馆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看到了列宁（当时翻译是“里宁”）的名字，看到了全国各地学生、工人罢课罢工的消息。他感到这个世道变了。可是，革命是怎么回事，反帝、反封建又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懂。

读书、看报，使他懂的事越来越多。学校课本上没有的事，他从杂志上看到了；老师没讲过的事，他从同学中听说了。兴许是因为从小受苦多，他从心里向往俄国那样的革命，敬仰那个“里宁”。

“俄国有多远？”一天徐向前又问那个读英语上劲的同学。

“远呢！”

“劳农政府是什么？”

“……”那同学说不清。

答案最好自己寻求。徐向前课外和晚上，常跑到图书馆，从书报里，找他想知道的事。学校课程里并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课，他从书报中，从一些同学口中渐渐知道了。“无产者革命”，像是一星火花，点燃着他的心。虽然，这火忽明忽暗，他还没想到自己就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却在不自觉中一天天觉醒着。

太原这古城，有许多古老的传说和历史遗迹，离学校不远，就是双塔寺；出城往西几十里，有出名的晋祠。那里有古老的隋槐、周柏，唐太宗的亲笔石碑，还有许多奇妙的传说。这一切，都不能吸引徐向前的心，他读书，贪婪地读书。《三侠》、《五义》之类的故事，不再使他着迷，他最爱看的，是有关新生活和革命的书。

第二年春天过后，“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学生们开纪念会，上街演讲、贴标语。

徐向前作为觉醒中的一个学生，走上了街头，热情地参加活动。督办阎锡山害怕学生闹事，在督军署门前，设下三层兵，第一层皮带队，每个兵手提皮带；第二层是矛子队，每个兵手拿长矛；第三层是手枪队，每个兵握着手枪。

徐向前从人们议论中知道了，阎锡山只准学生按他的规矩行事，不准闹事越轨。阎督办是什么人呢，在他心中画着一个问号？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译音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太原国民师范，不仅使徐向前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使他从此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不久被学校辞退了。之后，他又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小找到一个任教的位置，可是不到二年，又失了业。这一次，是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故事，被叫去训导，他认为学校无礼，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学校又将他辞退了。

教书每年能挣二十块大洋，两次被辞退，使徐向前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他原以为阎锡山是提倡“新思想”的，在以他的字命名的“川至”中学里，却只能照本宣科，不准说句别的话，这难道就是“民智”！徐向前这时刚与东冶镇宋门女子朱香婵*结婚，妻子和母亲劝他，向学校去赔个礼，请求复教。徐向前生成的犟脾气，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赔什么礼？磕头作揖求个书教，我才不哩！”

这一年，徐向前已经是二十二岁了。失业在家，家景又不好，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他奔到太原，想找个事做。

寒冬的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徐向前在太原城转了几天，工厂进不去，学校入不了门。每天在街头巷尾徘徊。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无处容下这个倔强的青年。

一天，徐向前听到军队中做事的哥哥徐受谦说，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正在上海招生，有位姓郭的军官，愿意暗中保举些人去投考。徐向前虽然不了解那个军校，听说是孙中山办的，约了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了上海。

军校招生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应考的条件和手续，规定了许多条。

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是颇严的。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毕业”，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病、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规定既要笔试，又要口试，笔试要考作文、考政治、考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适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等。

徐向前从小听老人说，江南有个大上海，路灯、马路、高楼大厦，热闹透了。人们常说：一生一世，若能到大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徐向前来到上海眼花缭乱，路不会走，商店门不敢进。洋人和阔女人，洋得出奇，阔得身上冒香气，坐汽车的，坐人力车的，东奔西走，不知都是什么人。黄埔江岸上，轮渡码头上，乞丐成群；拉黄包车的人，赤着脚流着汗水在马路上奔跑。

真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徐向前没有熟人，没有亲戚。

幸得一位同学认识个姓赵的老乡，这人在上海任教，同情青年人考军校，帮助他们报了名，又指导他们复习功课。

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一号参加了初试。没想到，过不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每人还发了五块钱。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徐向前和一块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

同学们一块儿说，一块儿笑，可又一块儿愁，怕复试题目大难，落了榜。有人说：“听说广州有‘卖猪仔’，复试不上，我们‘卖猪仔’去！”“卖猪仔”是指到外国当劳工。上海不少青年人，没法生活，“卖”去了外国。还有“卖猪女”的，一些女子卖去当妓女和干苦差。徐向前不愿意把自己当“猪仔”卖，他希望复试有个好成绩，希望考取军校。

复试的考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徐向前居然顺利地通过了复试。5月初，他们踏上了广州以东40里的黄埔岛，成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的。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国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出一个代表马林到了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孙中山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每个革命家，走上革命的路，都有自己的起点。徐向前考入黄埔军官学校。迈上了革命征程的第一步。他脱去长袍，换上了苏式黄军装，脚穿草鞋，腰扎皮带，头顶大盖帽，手握一支步枪，比起两年前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机那个“准军人”，今天成了真正的革命军人。他站在校门口大门前，举目远望，那海水浪涛汹涌，无边无岸，心潮澎湃，更使他兴奋的是，军校开学大典的那天。

6月1日，天刚亮，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活动。四百七十多名学生，武装整齐，列队在黄埔岛码头，迎接他们的总理孙中山大元帅。在军乐队雄壮、威武的吹打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着“江固号”军舰，从广州城沿珠江来到黄埔岛；党代表廖仲恺、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外交总长伍朝枢、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西路讨贼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吴铁城等党政军委员，个个衣冠楚楚，军服整齐，如参加国事大典一样，都来参加军校开学典礼。

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武装整齐，一副标准的军人姿态，出现在人前。

在军校大礼堂里，孙中山向学生们作了演说。孙中山说：

“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了结果，只有国民之年号，没有国民之事实……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从今天起，把革命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将可以成功，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要失败。”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有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孙中山振臂大声向黄埔同学说：“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徐向前在队伍中听讲，他虽然还不太理解孙中山这番话的深刻含义，但他很兴奋。

孙中山有个外号叫“孙大炮”，他经常演讲。徐向前来广州城后，在一

个学校听过他演说。孙中山的话北方人听着吃力，广东人和一些南方人听了却津津有味。他的演讲空洞话少，事例和历史事实多。会场里时时响起热烈掌声。他讲了一个半小时，刚结束，场上就高呼：“总理万岁！”“国民党万岁！”徐向前和许多同学，第一次呼喊这样的口号，心里好奇。接着全体学员集合到操场，行分列式。先向党旗、校旗和总理行三鞠躬礼，然后立正列队听胡汉民、汪精卫宣读总理训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贺词。总理训词是：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解，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阅兵后，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乘舰离去。其他一些党政要人，继续在黄埔岛上活动。

晚七时，在操场上举行野宴。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广州市党部公宴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全体学生；公宴酒席并不丰盛，学生们皆席地入坐，但政治气氛极浓。汪精卫祝酒致词，学生代表致答词，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科致词。校长蒋介石最后讲话。他说：“我等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款待，不自今始。”他向学生说：“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切勿忘记”！他重复汪精卫的话说：“无兵即无党，无党即无国”，要求黄埔学生“必须以此身为本党作临阵之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讲话中还领头高呼“国民党万岁！”

徐向前入过私塾，进过“洋学堂”，在官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习过，但他从没经历过这么隆重的开学大典，也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大人物。他感到这个军官学校实在不一般。

第二天，第一次上课，每位学生发给一张表格，要求填写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与志愿。

大家你看我，我看他，都不知怎么填写法。政治教官在讲台上，一句句教大家填写。尽管许多人不懂国民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入它，表格填好交上去，一出教室，全体学生都是国民党党员了。好多年以后，徐向前谈起此事，总是当笑话一样，说：真没想到，加入国民党那么简单，一堂课下来，大家都青一色成了国民党的党员哩。

军校住地，东临大海，南到虎门。抬头是葱葱的山，低头是望不到尽头的江。虽然校舍不够，临时搭了些芦席棚，睡的全是吱吱响的竹子床，但军校课程和生活，却使人耳目一新。学员们每天天不亮起床跑步，紧靠着珠江岸边的操场被潮水淹没了，还在泥水中出操。军校训练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报。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徐向前更是十分有兴趣。《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学生兵不准吸烟，每月只发 10 个毫子的零用钱。徐向前在阜平县当学徒工时，夜里磨面磕睡难忍，他从此叼起了小烟袋。后来烟瘾越来越大，来到黄埔军校，虽然上边规定学生不准抽烟，他想戒烟又戒不掉了，学校发的那几个零用钱，除了偷偷买包烟抽，省下钱都买了书报。

军校生活，越来越紧张，要求一天比一天严格。三分钟起床穿好衣服、打好绑腿；五分钟上完厕所；十分钟吃完饭。一些城镇长大的富家子弟，面

对这样紧张的军事生活，受不了，有人哭起来，有人想退学了。徐向前从小吃的苦多，生活磨难使他的性情一天天刚强起来。他还是那样：从早到晚少言语，只是默默听教官上课，从认真真练武。黄埔岛上小咬特别多，比一般的蚊虫小又飞得快，人在屋里屋外稍一静下，它就咬上了你，让你浑身难受。徐向前来到广东，一是话不懂，二是这个小咬难忍。为了克服这两大困难，他每天抽了空向当地人学广东话，到江边用潮水洗脸和擦臂，不知怎的，小咬咬过后的痛痒就消失了。

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官。他住在要塞司令部里，又在黄埔军校设了办公室，每天上下午都到军校来。他身披一件拿破仑式的黑斗篷，进军校来前边有副官开道，身后跟着四个护兵，威风凛凛，比大元帅孙中山不差几分。学生和军校教官路上遇到他，如果不立定敬礼，轻则会受到训斥，重则要追究甚至给予处分。从5月5日军校新生入校到6月15日正式开学，蒋介石给新生训话就达10次之多。他讲办军校的意义，讲他个人历史，讲革命与做人，讲军队的纪律。他特别强调军规、军纪，把下级官兵给上级敬礼，当成军规中的大事。他曾经声色俱厉地说：“军人不敬礼，就是违犯军规！”他不吸烟，不准学生吸烟；他不喝酒，除了宴席，不准军校官兵饮酒，他还亲自旁听教官上课。早晨起床号刚响，他就从距军校一里多的长洲要塞司令部走来，闯进教官或学生宿舍巡视，如碰上睡懒觉的人，必严加责问。他若在军校吃饭，定亲自去餐厅与教官同桌。

教官们必等他动筷子，才端起碗不声不响快快进食。

军校学员，有从外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有大学毕业、中学毕业，也有保送入校文化并不高的党团骨干。还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徐向前是普通一兵，既不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更不是共产党员，开学时刚集体加入国民党，还没弄清这国民党是干什么的。因此，尽管他学习努力、参战勇敢，可是并没引起上级多少注意。蒋介石每月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一次蒋介石和徐向前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一个个进去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的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一问一答，机械没趣。蒋介石睁大眼睛瞅瞅面前这个瘦弱的学生；学生规规矩矩立正站着。他们好像从不认识似的。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半句话。

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蒋介石留下个好印象。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作为孙中山大元帅卫队队员，徐向前亲眼看到元帅没兵不行。“军权如命啊！”

在中国的十大元帅中，有几位曾经和孙中山相处过？笔者翻阅史料，访问老人，发现：徐向前是伴随孙中山时间最多的一位。他在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第一期，荣幸地参加过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1981年7月，笔者随徐向前元帅在大连棒槌岛采访，一天在沙滩上，谈起孙中山先生。徐帅满怀深情地说：“他是中华民族的伟人。我们黄埔学生，都从心里敬重他。”

历史翻回到1924年。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军阀会师武汉，进军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

一天，黄埔军校第一队正在野外训练，突然被召回军营，背起行装，紧急集合，从黄埔岛码头乘船，开往广州城。徐向前和同学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敢问，谁都不敢说。军纪严明：凡军事行动，上级没说不准打听。汽船在珠江上飞速行驶，两岸绿荫诱人，大家无心观赏说笑，都在猜想此行为什么。黄埔学生新入伍三、四个月，憋不住，有的人不由得悄声问队长：

“我们这是开往哪里？”

“不准说话。”队长在低头纳闷，好象他和普通学员一样也不知执行什么任务。

“会不会打仗？”有人又悄悄说。“你没听说，军阀开战哩。”

“不准说话。”队长又发出话：“军人天职是服从命令。”

徐向前坐在汽船里，只是抱着一本书读。他不爱多语，也不管去什么地方。心里想的是这样：上级不说，乱猜有什么用，不如读读书增些知识，消磨时光。入学三个多月，他已经读了七八本书，好多书从前没见到也没听说过。

汽船沿江而上，不到一小时，停靠在广州城小码头。接着，队长发口令整队步行往火车站。路旁行人看到学生军来了，停住脚步，有人呼叫，有人指指点点。市民们都很喜爱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年青、漂亮、威武、纪律严明。黄埔学生军一路行进唱起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

徐向前在队列中走着，随声唱着校歌。他十分喜欢这歌词，深深地印在心中。大家越走越带劲，只顾走好队形，步伐整齐，似乎都忘记了这是走向什么方向。

傍晚，黄埔军校生第一队，登上了一列特别火车。在车厢里，一位军官这才郑重宣布：这是元帅的专列，孙中山大元帅就在这列车上，第一队从今天起，作为大元帅的卫队，随同北上。

“唔啊！”车厢里几乎齐声欢叫起来。青年军人们脸上个个带着自豪的笑意，谁都认为坐上孙大元帅专列，是一生中的荣幸。徐向前和同学们一样，做了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感到无尚的光荣。列车里又响起军校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歌声一遍又一遍，学生兵有的尽管还没完全学会这首歌的歌谱，词却已背熟，拉着嗓门大叫大唱。

徐向前元帅 80 岁高龄后，向笔者讲到当年第一次随孙中山北上的情景，心情仍是激动的，他远望着棒槌岛上的小山、渔船，沉思良久，说：孙中山虽然是大元帅，但在广州只有个大本营，没有多少部队。那时陈炯明在东江，已经准备倒孙中山的台，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均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靠不住，当时我们山西有一支部队，也叫国民革命军，更不成样子。我们说笑话，它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又多于子弹。

孙中山当时认为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9 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老婆孩子。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喝水很成问题，水又不干净，蚊子很多，几乎没有不生病的。

“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部队英勇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

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孙中山当时号称大元帅，手下并没有听他指挥的军队，这是孙中山最大的苦恼。所以他只得紧紧地抓住黄埔军校这群学生兵。辛亥革命后，他搞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同盟会，发展成国民党，孙中山建党有颇大成效，只是没抓到军队实权。有一个故事，是徐向前后来听说的。说是孙中山刚到广东，有个大军事骗子，投到孙中山名下。他知道孙中山抓军队，就向孙中山说他有两个团的兵力。孙中山一听十分高兴，要去检阅他们部队。那骗子就派副官四出借兵，而且借来的兵都是兵强武器好，摆开阅兵阵式，请孙中山检阅。孙中山看到这么好的一支军队排队从面前走过，十分满意。随即答应拨一笔钱给那军事骗子。哪知孙中山一走，那个军事大骗子只剩几名副官和护兵，每天躺在床上抽大烟、玩女人。许久以后，孙中山才识破那个军事骗子，但是，孙中山总是抓不住军队，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表面上都听大元帅的，实际上是各有各的靠山。孙中山这次到韶关，准备北伐，决心亲自抓着黄埔军校的第一队和警卫团。

黄埔军校学生兵，跟随孙中山来到韶关，几乎日夜不离大元帅的行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特别信任和钟爱黄埔学生兵。一天，孙中山听说军校学生当中不少人病倒了，偕夫人亲自到军营中察看。他们爬上山头，钻进士兵们住的帐篷，和一个个躺倒的士兵谈话、握手、问候。还送给士兵们水果。这天徐向前虽然也病着，因为站岗的同志少了，他接连站了半天。

孙中山和徐向前说了好几句话，因为紧张、新奇、兴奋，徐向前只记着：“好好注意身体。”宋庆龄那温文大方亲切的问候，更使徐向前和学生们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在北京中南海徐向前和宋庆龄等会面，徐向前无意中说到，在黄埔军校时，他就见过孙夫人，说那时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宋庆龄连忙拱手，说：“谢谢，谢谢，那时我们不认识呀！”徐向前笑着说：“我们都认识孙夫人。我那时是普通一

兵哩。”宋庆龄再次拱拱手，脸上浮现着笑容。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面对着共和国的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真是感慨万分！

历史的发展，竟像大海波涛，一浪推着一浪，日新月异；在革命的征程中，多少战友分别、相会又走到一起来了；又有多少当年的朋友、同志，最后竟成了势不两立的敌手！

1924年秋，是孙中山在广东最后一个秋天。这时他已经患上了癌症，只是他和他的随身医官都还不知道这潜伏的死敌。孙中山在韶关行营，日夜筹划着，决心调兵出师北伐。可是，他统帅下的国民革命军，不是这一路说武器弹药等补充，就是那一路借口军粮筹办困难。孙中山每天愁得打转转。他对苏联援助武器装备，抱着极大的希望。苏联顾问鲍罗廷也盼着正在海上行驶的苏联援助中国的船只到达中国。10月7日，苏联援助的一船军械，终于抵达广州，船上有山炮、野炮、轻机枪、重机枪和许多弹药。孙中山高兴万分，立即从韶关发电报给蒋介石，命令把这船上的武器和军火，停卸在黄埔岛，先武装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学生军。作为普通一兵的徐向前，当时不知道上层的内幕，他每天在孙中山行营门前放哨，看到孙中山出进、散步时，情绪极好，兴许是因为得到苏联武器的原因。

北伐，北伐，是孙中山的希望。10月10日，一个电报打破了这位大元帅的梦幻。广州城内群众集会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时，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开枪向游行的人群射击，打死打伤几十人。他们筑起炮台，封锁市区，四处张贴“打倒孙政府”、“驱逐孙文”的标语。孙中山正一心想北伐成功，却没料到后院起火。广州的形势十分严峻。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镇压商团叛乱，提出“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令，以决最后之死战”。周恩来在广州群众示威大会上讲话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做先驱。”广州工人代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誓为政府之后盾”。特别是黄埔军校学生，决心以实际行动，与商团决一死战。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此时虽在韶关保卫着孙中山，战士们已摩拳擦掌，准备投入战斗了。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支持下，孙中山下达了平叛商团的命令。他亲任镇压团“革命委员会”会长，急调参加北伐的警卫军全部、湘军、粤军各一部昼夜从韶关回师广州。与此同时，命令留守广州警备军、黄埔军校学生军以及广州陆军讲武堂学校学生军、滇军干部学校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铁甲车队、兵工厂卫队等，统归蒋介石指挥。

10月15日凌晨，各军同时开动，向商团叛军发起反击。

商团的头目陈廉伯系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大买办，他原以商民自卫的名义，组成了4000人的反革命武装，曾向香港南利洋行购买了长短枪9840支，子弹337万多发；由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商船“哈佛号”偷运到广州，8月10日已被广州革命政府查获，连船带武器，都扣留在黄埔军校。此时，黄埔军校以商团的武器，全部武装起来。各路平叛部队，仅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把广州商团的叛乱平息下去。

参加平叛的学生军，大都是初上战场。徐向前生平头一次荷枪实弹作战。他生性有股子猛劲，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等回味过来流血牺牲的情景，敌人溃不成军，战斗很快结束了。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写道：“广州商团军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支买办武装，与东江军阀陈炯明相勾

结，趁孙中山和黄埔大部力量东出韶关之际，公开发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府，胁迫孙中山下台。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师生又回广州，参加平叛。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生首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受到了锻炼，树立了军威。”

黄埔军校在革命风雨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平定商团以后，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学生军，又全部返回黄埔岛上。这时已进入秋冬，学生军该换冬装了，不但冬装没着落，甚至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张治中在《五百师生的艰苦创校》一文中记述着：“……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第一期学生五百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即廖仲凯）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费就没有了，今天就得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着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到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廖先生，然后我们这五百个热血的革命青年，才不至于断炊……”

军阀的手中有军队，不愁没钱。他们每天灯红酒绿，孙中山和他的门徒们，却在忍饥受冻中闹革命。黄埔岛上，每天歌声、口号声不断。徐向前经历过一段随孙中山做卫队，又经受过平叛战斗，头脑中增加了许多问题，要思考，要解答，他更如饥似渴地读书。他结识了同队的蒋先云同学，经常和他一起交谈，向他求教。

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第一队中出类拔萃的学生。文才、口才都是一流，提笔成章，登台演说滔滔不绝。他是湖南新田人，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五四”运动中就是学生中的先锋分子。做过湖南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21年10月毛泽东到衡阳考察时，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蒋先云有一段记述：“我们经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人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北伐战斗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

风雨飘摇，时局更加动荡。国民革命急需带兵的人，孙中山决定黄埔军校第一期于1924年11月9日提前毕业。孙中山11月13日从广州乘永丰舰北上，经过黄埔港时，又特地到黄埔军校，观看学生的战术演习，并参加了为他送别的宴会。

傍晚才登舰离去，军校师生列队在码头上，欢呼致敬。谁都不会想到，这天是与他们敬爱总理的最后诀别。这也是徐向前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徐向前从到广东考入黄埔军校以来，多次听到过孙中山的演讲，又荣幸地参加卫队，多少日日夜夜，都伴随着他。

虽然是一兵一帅的关系，没有特别的友情，可是由于革命的理想目标

一致，兵与帅的心是紧紧相贴的。

广州的局势，突然吃紧了。盘据在惠州的军阀陈炯明得知孙中山北上到了北京，认为时机已到，便于1925年1月7日下达了反攻广州的命令。他还在东江地区收复了许多土匪，号称拥兵10万。1月27日，叛军首先向虎门要塞发起进攻。2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开始。徐向前这时已被任命为入伍生队副排长，第一次领兵，踏上了征战的路程。

东征大军兵分三路：右路军有粤军许崇智所部1万人，黄埔军校教导一、二团和学生总队3000人；中路军为刘震寰所部桂军，约6000余人；右路为杨希闵所部滇军，约3万余人。

徐向前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当时不了解全局兵力部署与行动的情况。他带的学生军编在粤军第二师，开始的主要任务是做战勤和宣传工作。有一点徐向前是感受很深的，那就是周恩来领导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使政治工作十分活跃。东征开始在誓师大会上，徐向前就听到了周恩来的政治动员讲话，以后，一路到东江地区，多次见到周恩来，听到他的演讲。他声音响亮，鼓动性强，立志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压迫的讲话精神，深深印在大家头脑中。军校政治部颁发的《敬告士兵同志们》，徐向前揣了一张，多次读给同志们听；军校政治部要求人人高唱《国民革命歌》、《爱民歌》、《军校校歌》，一路上成了征战人的进军号角，成了唤起民众的武器。徐向前一生都记着《爱民歌》中的歌词：“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军校政治部在《告百粤父老兄弟姊妹》书中宣布：“有违反我们所宣传的行为者，请不必客气，具实向我们官长报告，定必依法惩办”。徐向前身为小军官，每离一村，按照告人民书的精神，细心查看军人住过的房屋，征求老乡的意见。这时，他虽然学会些广东方言，但对东江一带的群众言语，听起来吃力，说起来更不行。有时动纸笔与群众“交谈”，或者请学生中的广东人当翻译。

东征作战，从广州出发，历时两个多月，打遍了东江，直捣汕头。作战中，徐向前所在的学生军在右翼作战中，人人奋勇，大显军威，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黄埔的学生不少人英勇献身。征途中，徐向前由于带兵好，行军作战中以身作则，升为排长。

以黄埔军校为骨干的东征右路军，连战皆捷，攻淡水、下平山，直到潮州、汕头。

右路军和中路军的刘震寰、杨希闵部队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3月27日在东征军取得胜利的关头，噩耗传到前线最高指挥部：孙中山大元帅在北京逝世。

关于孙中山北上和病死北京，黄埔军校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在东征军出发前后，孙中山正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的活动。此时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希望同北洋军阀妥协。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抱着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大会的愿望，从广州坐船经上海，又绕道日本到天津，最后到达北京的。在北京的段祺瑞与国民军表面上热烈欢迎孙中山，实际上把他当成摆设。军阀们另有打算，把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束之高阁了。孙中山本来就有相当严重的肝脏病，到北京后连累加生闷气，陷于进退两难，病情加重，于1925年

1月26日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3月12日病逝在北京。

这位革命的伟人，黄埔军校奠基者，在军校师生中影响之大，威望之高，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当时，军校学生军正在前线，校部对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一直保密到3月底。

徐向前第一次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是从一张蓝色纸印刷的号外上看到的。消息传开，黄埔生无不悲痛落泪，第一队做过孙中山的卫队感情更深，许多人失声痛哭。3月30日，徐向前参加了在兴宁县北门外屋坝举行追悼孙中山及东征阵亡将士大会。大会由何应钦唱礼，蒋介石宣读了誓词和孙中山的遗嘱，周恩来宣读了祭文。最后全体宣誓：“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这一天一夜，黄埔学生军浸透在泪水与悲伤中。有见识的军官都感到，孙中山死了，革命必定受挫。徐向前也正是这么认识的。形势到底会怎么发展，他说不出，想不清楚。

很快消息传来，自称是孙中山忠诚学生的滇军司令杨希闵、桂军司令刘震寰，突然在广州反叛；5月20日滇、桂军占领了广州市的狗头山、观宿山和电报局、火车站。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被逼到永丰舰上。广州革命政府危在旦夕！

面对这瞬息万变的局势，徐向前又随军速返广州，平叛刘、杨，挽救广东革命政府。

东征五个月来，每天行军、打仗，打仗、行军。脚走疼了，腿走肿了，浑身浸泡在汗水里，湿了擦干，干了又浸湿。如果说上次平叛广州商团是一次实战演习，这次东征是苦战、恶战了。东征几个月，徐向前职务上从副排长晋升到排长，认识上却大大跳跃了好几个阶梯。

他开始思索：什么是军权？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

他开始理解：孙中山为什么那么重视办黄埔！

6月，革命的党军第一旅——这是以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团为基础编成的，首先开进广州城，与叛军展开激战。在工人罢工、农民助战有力配合、支援下，革命军最后把叛军撵出广州。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黄埔岛，开始了新的课程。

东征作战，对他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课。

疾风过去，骤雨暂停。第一次东征胜利了，广州平叛胜利了！然而，摆在徐向前和革命军人面前的，只是征程的第一步。

他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不做跨党分子”，毅然选定了终身奋斗的道路

别了黄埔岛，别了军校，别了战友和同学。1925年8月，广州正是炎热的夏季，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几位老乡，登上了广州北上的列车。

一年以前，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刚到广州，一切都陌生。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还有一年四季的小蚊子咬人，几乎把他们这些北方佬吓跑。黄埔

岛的新生活，征战中的枪炮声，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总是希望走向北方。但今天要离开了，他们却又依依不舍。

广州是革命军的发源地，是他们走向革命的起点。

徐向前和几位老乡，要求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临走前一天，校长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们。在校长办公室，他照例先问被召见者的姓名、年龄、哪里人，问他们去国民二军工作怎么想的。徐向前还是那脾气，话不多；白龙亭倒是滔滔不绝，对答如流，使蒋介石笑口常开。蒋介石说：“你们生命都属黄埔，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舍不得你们走的。你们既然愿意去那儿，那也很好。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多为黄埔军校送来好学生……”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其实，蒋介石从孙中山逝世以后，已把自己封为“大元帅”了，正想插手冯玉祥的部队。徐向前等人要求去国民二军工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这是徐向前后来才觉悟到的。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蒋介石视军如命，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改造’冯玉祥部……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心里是高兴的。”

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后，与胡景翼、孙岳定等，将他们手下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一、二、三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一军军长；

胡景翼任副司令兼二军军长，不久病死，军长由岳维峻接任；

孙岳任副司令兼三军军长。当时，国民二军正驻在河南安阳。

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来到国民二军，因是从黄埔军校来的，备受欢迎。徐向前当即被分配到第六混成旅教导营任教官，其他同学也分配下去。从此几个老乡就分手了。

特别要写一笔的是，徐向前到混成旅第三天，军长岳维峻视察来了。这位新从二师师长提升的军座，官气十足，护兵八名。小人物都不得接近。徐向前远远向他敬个礼，他还礼手都没举过肩。嗯嗯哈哈只和旅长讲话，似乎没把这位来自黄埔的小教官放在记忆里。谁料六年以后，这位岳军长，成了徐向前手下的一名战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一踏进国民二军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这个军营和黄埔岛上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黄埔岛歌声嘹亮，同志友爱，这儿死气沉沉，随时都听到叫骂声；黄埔岛不准抽烟、不喝酒，这儿军官和士兵，整天埋在烟雾中，醉在饭桌旁、宿舍里。夜晚，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嘻嘻笑笑钻进军官们的住房。

徐向前的职务是教官，教导营却没有他的训练课目。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营连自己筹钱，军官吃空名子，小兵抢老百姓的东西。表面上这支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第六混成旅旅长弓福魁，是个山西人，很讲义气，对徐向前这位黄埔出来的老乡，倒也有几分尊敬。不久，徐向前被调为旅部参谋；之后，又升任为第二团团副。徐向前开始挺高兴，谁想团副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没有指挥权，不参不谋，等于吃闲饭的。徐向前深感不安。

闲得无事，一天徐向前跑到安阳中学，和教员罗任一相识了。这位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交结上徐向前这位来自黄浦的人，甚是高兴。徐向前也觉得和他一见如故。先是在学校交谈，尔后请徐向前去他家里。他们还一块去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说。徐向前

还到六河沟煤矿工人中活动。他没忘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交给的任务，熟悉了工人，认识了有志青年，就向他们宣传黄埔军校，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道理。三个多月内，先后动员和介绍了十几名青年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军阀争雄，此起彼伏。1925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向冯玉祥进攻。

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并和冯玉祥约定：

徐州以南由孙部攻打；徐州以北由冯玉祥攻打。这样，冯玉祥的国民二军就开始了北上。徐向前跟随着队伍，从河南到鲁西，到济宁、泰安。二军军长岳维峻野心勃勃，又兵分两路，一路征战、烧杀北进山东和山西。不到半年的光景，国民二军彻底失败了。

部队失去指挥，四散溃逃。在河北平原，徐向前和几位山西老乡，趁机转向了五台县。

他宁肯回家种地、教书，再不愿意做军阀混战的工具了。

寒冷的冬夜，五台县境内的溥论河已结了冰，永安村的人家都正入睡。徐向前一身便装，潜进村口，摸到家门。他从考黄埔军校离家至今，已快两年。两年中他只给父母写过两封信，也不知为什么只收到过一次回信。那信上说父母都还好，只是妻子朱香蝉病死，留下一岁多的小女儿松枝，靠爷爷奶奶抚养。徐向前小心翼翼拍开门，老母亲一见儿子，突然放声哭泣说：“我的儿子，你可回来了！”

“大大（父亲）呢？”徐向前问母亲。

“又出门教书去了。”母亲边哭边说，“去年欠收，几口人要吃要喝，全靠你大大呀！”说罢连忙净手，烧香拜佛，口念“阿弥陀佛”。

徐向前走到东屋小女儿床边，摸摸那小脸、小手。这小生命从降生至今没见过爸爸，妈妈病死时，他不满周岁，是在奶奶苦心哺育下活着的呀。徐向前不禁一阵心酸。

往后的路怎么走呢？徐向前躲在家中七八天。每天不敢出村，天黑才跑出去找一位一块儿跑回家乡的老乡。那位老乡原在国民二军当军需官，随军一路征战失败，死里逃生，已吓得大病不起，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徐向前又跑到附近村庄找另外几个逃回来的老乡，不是见不到面，就是有的死也不愿意再出去从军了。徐向前决心离去，回广东。

“我就一个人走了。”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晚上下船，码头、街道到处是黑洞洞的，什么景也看不清，他在汉口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起身外出看看，顿时，感到像步入一个新世界。到处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万岁”的标语；一队军人出操回来，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听到这歌声，徐向前心花怒放。从一年多前离开广州，离开黄埔军校，再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歌声了。他精神振奋，早饭都没吃，又步行奔武昌。听说，那里有北伐军司

令部。

一路走，一路看，过了汉江进入武昌，更是一派革命的景象。标语满目，群众游行，歌声震天，像两年前第一次进广州那样让人兴奋。经过半天的奔走，询问，他终于找到了学兵团，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黄埔同学，其中有蒋先云。

在这里，他做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汉三镇名声很响，几乎人人皆知。

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教育长张治中，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男生九百八十六人，女生一百九十五人。一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恽代英、陈毅、施存统等人先后来到这所军校。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女英雄赵一曼，就是女生队中的“一杰”；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是女生队的入伍生。校址就设在武昌长街著名的西湖书院。

1927年2月22日正式开学。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教员。

经过在国民二军近一年的风风雨雨，徐向前从军阀习气浓厚的军中滚爬出来，回到革命军校，又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

他走过曲折的道路，又走上康庄大道，从苦闷、忧虑忡忡的生活中，回到革命的大家庭。

心情愉快，话语也多了。一些山西的老乡，黄埔的好友，经常找上门来。共产党员李楚白，是徐向前队里的司务长，大家凑在一块，该开饭了，他就去办几个菜，提一小壶酒。

徐向前觉得这样不妥，提出下饭馆。正好，他当队长薪水比别人多些，大家就齐声叫着：“队长请客！”

徐向前从军几年，仍保持俭朴的作风，不大手大脚随便乱花钱，和老熟人相聚，心里高兴，慷慨地说：“好嘛，好嘛，我请客！”一次两次请下来，似乎成了习惯，凑到一块就抓徐向前这大头。其实，大伙也不是诚心要敲徐向前解馋，每聚在一块，总是借吃饭，讨论些革命的大事。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的革命、军阀混战，都是谈论最多的话题。青年人好强，有时说着说着争论起来，借着酒性发难。面红耳赤过去之后，又笑声四起。

徐向前开始多是听他们争论，很少支持哪一种观点。一天，有位同事把话题转向他问：

“现在许多人加入了CP（即共产党），你呢？”

徐向前说：“我们是军人嘛，不要参加那些政治派别。”

“想躲开吗？不成！我们入黄埔第一堂课就入党了！”有人笑着说。“别那么清高了，还是加入CP吧！”

“我还没想好。”徐向前说。“我不愿意做跨党分子。既然已经填过表了，那就应该为三民主义奋斗终生。”

他这番话，立即引起热烈争论。有的说，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列

举出许多道理和现实；有的反驳，徐向前是激烈反对的一个人。这顿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过不几天，他们这伙年青人、老乡、老朋友，又聚会了。还是徐队长请客，还是海阔天空谈论。

在此之前的好多年，徐向前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朦胧不清。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这次来到武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他爱读书，白天工作忙，坐不下来，夜晚就抽空读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书，他一一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文章，也都找来放在床头上。

武汉军校军事生活、训练课目还没走上正轨。学生多是新入伍的，故以政治教育为主。徐向前觉得，军人的养成，必须从严、从难训练。他经过东征，又目睹国民二军在河北的失败，认定军队的战斗力与严明的军纪、耐劳吃苦的精神分不开。军人平时作风松松垮垮，战时定会散沙一盘；军人平时怕苦怕累，更难以忍受艰苦的战争环境。他按照黄埔第一期的教练，要求学生不抽烟、不饮酒、不贪睡，起床洗脸集合十分钟，吃饭五分钟。天气炎热，地面上火烫，他还率领学生走正步。有人晕倒，他挥挥手让人抬出操场，继续领着操练。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农村来的青年和工人出身的人，都还可以忍受，一些从小生长在城市、出了学校门进军校门的青年人，实在难以支持。

有人闹病，有人讲怪话。骂徐向前是“玩命的山西佬”。

他听不见心不烦，听见了只当没那回事。一次出操刚发出口令“解散”，一个四川兵汗流满面骂骂咧咧：“球！山西佬玩命！玩命的山西佬！”

“集合！”徐向前火了，立刻整队，并把那个骂骂咧咧的四川兵叫出列，又命令人拿来军棍。大家一看毛了，这山西队长很少发火，还没见他动过军棍。徐向前不知是心慈手软了，还是故作恣恣，他没动军棍，大声问那四川兵：

“你说说，流血难受还是流汗难受？”

“流……流血……难受！”四川兵结结巴巴说。

“再说，军人为什么要流着汗出操？”

“为的是……是战场少流……流血！”

四川兵几句回答，使徐队长息了怒。他要说的，也是这道理。于是他又对四川兵训斥了一番，讲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军棍收起，宣布解散。从此，军纪大振，再没人公开骂山西佬玩命了。

蒋介石虽是“挂名校长”，他懂得“治军先治校”、“军校是建军之本”，因此他开始对军校抓得挺紧。过新年，1月9日，他从南昌来到武汉。这位靠黄埔起家的北伐军总司令，参加过国民政府组织的群众欢迎大会，就到西湖书院视察军校。学校师生很高兴，特别是徐向前这样的“老黄埔”，对老校长都怀着敬意与怀念。可是，蒋介石向大家讲话中，除了摆自己北伐战争的功劳，就是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他说他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并说：“本人对你们是慈母一样的心情啊！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有些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也有些人不是那样。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蒋介石，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相信。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队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武汉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传统，训练、教学、生活紧张活跃。主要课程分军事、政治。军事课有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政治课设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许多课徐向前在黄埔学过，因此，课外辅导学员是不费力的。操心的是学员外差勤务多，常要出去参加集会、宣传活动。从早到晚，做队长的不得休闲。只有到星期五、六晚上，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自开会去了，徐向前才得清闲一些。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是徐向前这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他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他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常在一起聚谈。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使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在广东黄埔军校，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武昌，是座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英雄城，辛亥革命发源地。许多革命者的足迹，踏上过这片土地。孙中山、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董必武等等领袖们，都在这里发动和领导过革命的武装起义和革命运动。徐向前在这里决定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被屠杀。

武汉三镇为之震动。就在这时，徐向前听说国民党的首脑人物汪精卫到了武汉。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孙中山讲过的“三杰”。1925年徐向前在参加东征中，听说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身亡，当时他和黄埔同学，无不悲痛流泪。如今这“三杰”之中剩下的“一杰”会怎么样呢？徐向前心中当然无数。一天，他忽然看见《中央副刊》上登出了汪精卫的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三年前，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徐向前见过汪精卫。那时台下人都把目光投在孙中山大元帅身上，对汪精卫并没留下多深印象，如果说有一点印象，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汪精卫是风流男子，颇像个白面书生。

没想到，蒋介石叛变，这个“书生”、“风流男子”会是这么英雄！倒使徐向前和一些人刮目相看了。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武汉政府为“迁都南昌”的问题，和蒋介石已经闹了一场，往后又会怎么样呢？

武汉的汪精卫和在南京的蒋介石，终于公开决裂了。一天，武汉各界在武昌的阅马厂，举行了讨蒋大会，政界要人、军中头目坐满会场。徐向前率武汉军校部分学生，参加大会，维持会场。全场掌声热烈，发出呼叫。许多人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不负众望”，他登台讲话，慷慨激昂，把蒋介石大骂一顿。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是“独裁”，是“拥兵自重”，是“把黄埔学生当私人工具”的校长。

声声讨逆，人心大快。徐向前惊呆了。他分不清汪精卫的话是真心，是虚情假意；他搞不清楚，国民党这些头面人物，到底怎么回事，昨天还是亲如兄弟，声声“同志”，今天却这么翻脸不认人了！难道说这就是高等人的政治？

武汉军校宣布改组。撤销了蒋介石校长的职位，改为校委员会制度。由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向全校宣布：“蒋介石在南京背叛了革命，破坏了团结，个人英雄，专制独裁，所以把他的职务撤了！”邓演达还讲了这样的话：“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的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这些话，深深印在徐向前和广大学生心底。

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蒋介石在上海各地继续发动反共、“清党”高潮；原武汉国民政府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反叛后，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政府，惩罚叛军，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紧急编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星夜从武汉出师了。

徐向前率领学生军又踏上了征战的道路。这是他生平中第四次参加征战。他手下的学生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只是班排长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战士们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也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徐向前本人，已经是身经多战的指挥官了，他对行军、宿营、侦察都有了一套经验。

他按黄埔军东征的作法，路上领着队伍不断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不踏禾苗，不坏田产；每到宿营地，不扰民、不拉夫，买东西给钱，借东西送还。黄埔军校东征时周恩来倡导的政治工作，徐向前进一步地发扬。白天行军，他给大家讲革命理想，讲战术动作。学员们像野外演习一样，欢快地走了一程，又走一程。

5月16日，徐向前所率的学生军参战，在桃花镇将川军一部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又在紫阳、汀泗桥、通海口一线和川军第九师接上火。杨森的这支队伍，打仗稀松，跑起来挺快，外号“川老鼠”。徐向前队中一名四川学生，在川军第九师当过兵，颇了解那支队伍的底细和战术，徐向前就让那位四川学生跟在身旁作“参谋”，抓住战机，穷追猛打。“川老鼠”像见了猫似的，逃得飞快。徐向前手下的学生军，首次参战，连战皆捷。

战报传来，叶挺的二十四师在郎坊一带，把叛军夏斗寅部队打垮。武汉政府又提出愿与叛军议和，保卫武汉的战事遂告结束。

军校学生又回到武昌。这里一切一切都不平静。传说多，议论多。有人说，汪精卫武汉政府将“讨蒋”东征；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好；

还有人说，共产党内发生了改组……

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他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的目光审视着全场。在施存统讲话后，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改任军事部长）。徐向前这次和周恩来相见，虽是在众多人的集会上，又是一个台上和一个台下，但他们心是相近的，使徐向前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写着：

“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队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8

接到一个纸条，写着“找毛泽东”，他四外奔波，寻找，寻找……

人生的旅途，不是笔直的一条道。往往走着，走着，不是眼前突然出个叉路口，就是迎来狂风暴雨。1927年，对徐向前说来，是极不平凡的。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许克祥、何键在长沙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国民党右派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

武汉三镇，处在风声鹤唳之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分子，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消沉观望着，有的逃走了。

“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积极‘限共’，为下一步反共制造舆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右派势力，使我党在敌人进攻面前束手无策，步步退让，解除了武装。”“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

的勾结愈来愈露骨、愈紧密。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在此之前，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等待分配。等了近一个月，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我俩不认识，谁也不知谁的身份）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我任上尉参谋。临行前，党的地下‘交通’给了我张纸条，上面写着‘找毛泽东’……”

事情就是这么突然，这么令人不解。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不认识。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开始，他虽是普通一兵，却很快就知道了两位共产党人，一个是萧楚女，正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个是毛泽东，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徐向前和同学们开头对萧楚女印象深刻，因为他是政治教官，又有一个特别令年青人好奇的名字。

后来，通过读书看报，谈论革命，徐向前对毛泽东的印象越来越深。1926年春天，徐向前听人说，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山西的学生。他想会会老乡，便跑到那里去找，老乡没找到，却听说大名鼎鼎的毛泽东在那里办学讲课。当然，他不会认识，不会去见他。

没想到，一年以后要他去找毛泽东呢。

徐向前揣着“交通”给的那纸条，不时拿出，正看反看只那四个字，就是没有地址，更没有电话号码。这叫徐向前作了难，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来不及说明白毛泽东的地址，使徐向前揣摩了几个白天和夜晚。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在九江。听说，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一向与共产党人交好，兴许到了九江，会知道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从武汉乘船，顺流而下，到了九江二方面军司令部。张发奎果然不反共，任命徐向前为司令部参谋。徐向前找到黄埔的几位老同学，从旁暗暗打听毛泽东这个人。

老同学当然都晓得毛泽东的大名，可是，谁也说不出来毛泽东的下落。

徐向前摸不清张发奎到底政治态度如何，又是他手下的一名小参谋人员，不敢贸然向这位司令官打听毛泽东。他每天细心读报，想从报纸上看国民党、共产党的活动，找出毛泽东的踪影。

参谋随司令部长官转，徐向前新到职，不知是对他不信任，还是没人过问他的工作，他每天吃饱饭屋里屋外走走，不参不谋。司令部好像没有他的事。他从报纸上、从长官们谈话中，得到一些消息：

——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到了郑州，与冯玉祥谈判……

——蒋介石在徐州与冯玉祥会谈……

——冯、蒋会谈的结果：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军费二百万元给冯玉祥……

——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并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驻武汉的第35军军长何键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

——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分裂……

徐向前作为一个低层军官，他对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合斗争，并不放在心上。

对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感到吃惊。前几个月，当蒋介石公开“清党”反共时，汪精卫说得多么漂亮啊！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曾发电骂他：“丧心病狂，自绝于党”。汪精卫这个孙中山的“忠实学生”和秘书，这个孙中山称赞的“三

杰”之一，和蒋介石一类！他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徐向前第一次认识到，孙中山的“忠实门徒”们，一个个竟是这样的嘴脸啊！

山雨欲来风满楼。炎热的九江，闷得人坐卧不安。二方面军总司令部里，却和往常一样平静。7月29日一早，总司令张发奎从九江坐上轿子，上了庐山。司令部的军官们私下猜测，张老总准不是上山避暑去的，因为他的太太没去。徐向前当时只知张发奎上山去了，并不知道内情。许多年以后，才从史书中看到，就在这天，汪精卫和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别墅密谋，要坚决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共产党人和倾向共产党的军官和士兵。

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二方面军司令部，一片惊恐和混乱。徐向前心里却半信半疑，又喜又忧。喜的是，这些天来不论从报上和人们的谈论中，很少看到共产党的活动，南昌突发兵变，又是周恩来为首，说明共产党有了动作；忧的是，这样一来，二方面军中的其他部队会怎么样行动呢？张发奎会站在哪一边？徐向前知道，原属二方面军驻南昌和九江一线的部队，都是不久以前为“东征讨蒋”移过来的。当蒋介石反共开始，张发奎和汪精卫一样，都是声讨“蒋逆”。如今事态发生突变，又会怎么样呢？

总司令部门前加了岗，出入的人盘查加紧。徐向前本是新来的，卫兵们都还不认识他这位上尉参谋。他没事可做，又不得随便进出作战值班室，白天外边转转，晚上回到军官宿舍。

一个人闷闷抽烟。他的烟瘾随着这几年奔走加大，一支接一支抽，嘴都吸苦了。

夜晚仍像白天一样闷热。徐向前正忧心忡忡，不知所措，突然传来紧急集合的命令。

军官们在会议厅等了许久，谁都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张发奎带着四名护兵进来了。他没落坐，目光扫向全场，声音不高也不低：“南昌发生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了。本人今晚只宣布一件事：“CP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说罢走出会议厅。

会议厅很安静。军官们表面上没有多少反映，大家纷纷走出。实际上，许多人心中不平静。二方面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倾向革命的左派分子也多，此时一些没暴露政治面目的人，都在暗中盘算。徐向前回到宿舍，一声不响，又是一支接一支烟抽。现在他完全明白了张发奎的态度。这个几天前还讲“保证不反共”的“革命将领”，向共产党人下最后通牒了。

虽然张发奎不知道他军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但他知道会有。他采取这种下“逐客令”的办法，既可请客人自己离去不伤体面，又可达到“清党”的目的。

同屋的一位胖胖的上尉军官，可能看出徐向前不安，说道：

“老兄想什么事？抽那么多烟！睡吧，睡吧！”

“老弟，眼下这局势，你还睡得着？”徐向前说。“你不愁呀？”

“愁？我愁个屁！”那上尉说，“什么CP不CP，管它呢。吃粮当兵，不上火线活人一个，上了火线，说不定死活！睡觉，睡觉。我看你也不会是CP分子。”

徐向前不语。他不知这位说的是不是真话，从来到这里以后，他们彼

此没交谈过党派的事。谁都不知谁的身份。

“如今的官场，谁也猜不透谁哟，”那上尉叹口气，躺倒说：

“今天红，明天白，今天叫同志，明天是逆贼！”

第二天一早，徐向前离开了九江。他化装成一个小买卖人，身着一件白衬衫、蓝布裤，手提藤条箱，一顶草帽盖头，坐在九江开往武汉的船上。他至今保存着党的“交通”给的那张纸条，决心去武汉找毛泽东，找那个“交通”。船顺江而上，四等舱里乱哄哄，找不到座席，找不到安身处的一些人，挤来蹭去。

徐向前怕被熟人认出，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头上顶着大草帽。

舱里闷热难忍，臭酸气刺鼻。他忽然感到，他这个军官变成逃犯！逃到哪里去呢？

一路倒平安没遇上麻烦事。徐向前登上了汉口码头。然后乘渡船，上岸后一路步行奔两湖书院方向。那里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就是在那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党章，他接受考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然而，一登上码头，他心里就凉了。武汉，不再是从前一派革命的样子，江汉关边的革命标语刷掉了，龟山上曾经竖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铁标语塔已看不见。大街上，再看不见革命军人的行迹和雄纠纠的工人纠察队。

徐向前在武昌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他不敢贸然去两湖书院，更不敢去梁道街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的地方。先试探着向客栈老板娘打听些情况。那女人，一问三不知，只知开店赚钱。

第二天，徐向前找到原先接头的“交通站”。那是一家卖货的铺子，远远看去，门关着。许久不见有人出入，也不见接头的联络信号。显然，这儿人已经转移。他在这门前转了两天，仍不见有人出入。

路经两湖书院附近。徐向前远远窥视，这座清光绪十六年由湖广总督建起的书院，曾经为军校男女学生吵得生气勃勃，如今大门紧闭，不见有人出入。他想，即便里边有人，也决非同志。不能多停留，又离去。

他记起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又漫步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行人，他希望碰到一个熟人，但又怕碰上。他这时才觉得此行武汉是欠考虑，是一时的冲动。局势已经到这一步，毛泽东怎么还会在武昌？就是找到那个“交通”，他又给自己多少帮助呢？他想着，想着，决定不去找毛泽东办农讲所的地方。

这样盲目跑来走去，说不定反会被盯了梢，那样更麻烦了。

晚上，徐向前又换了个客栈。军人的警觉性，使他懂得了如何应付事变，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他又改了装，这两天总算平安无事。夜深人静，他又从香烟盒里一支掏空的纸烟中，找出那张纸条。“找毛泽东”四个字，跃入眼中。他一个新入共产党的党员，真搞不明白党内的规矩，叫他去找毛泽东，却又不给地址，这不是闹着玩嘛！武汉地区党的高层人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让他去找这个毛泽东呢！现在，这个毛泽东又在哪儿呀？

许多年以后，徐向前从党史资料中才看到，1927年8月上旬，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后，已经奉命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暴动去了。就在那次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徐向前戎马一生，可以说半生都为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奋斗。笔者1983年一次和徐向前元帅谈到他找毛泽东的那段经历，曾向他提问：

“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武汉，既不是共产党的负责人，又不是军界的人；‘交通’为什么交给你‘找毛泽东’的纸条呢？”

“我始终也没搞明白，”徐向前元帅笑道，“我想不是哪个糊涂虫搞的，定有原因呢！”

原因是什么？徐帅没说。笔者分析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的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笔者把自己的分析讲给徐帅听，他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笔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帅一笑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又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

徐向前像失去母亲的幼儿。他决心去上海。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这次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店家是北方人，只知开客栈赚钱，从不管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事。徐向前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十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一天，他突然在街上碰到了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讲了这几个月的经历，又问李楚白：

“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

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

“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儿，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

是党没有掌握武装。中国的革命，到了彻底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

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咬叮得人心都发麻。

可是，这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行动，徐向前热衷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他像入党宣誓似地、郑重地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那位同志握住徐向前的手，使劲一摇。

9

重返“羊城”。赤卫队长“纸上谈兵”。凭着两支手枪，率队参加广州起义

旧中国普通的农民，多是一生一世苦守着祖上传的那个家，那片故土，这就是他唯一的故乡。而徐向前这一代的革命家，从走出农舍，就“四海为家”了。他一生中把山西五台县作为第一故乡，把广东看成第二故乡。

1927年9月底，一个夜晚，徐向前和一位姓张的同伴，走进了广州市。他们从上海乘火车，一路转车多次，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本来从上海出发说是乘火轮船的，等了几天都难买到票。行程急，改坐火车，谁知这一路那么难，车上找不到座位，喝不上水，囚犯似地，好几天好几夜不得睡；饥一天饱一餐，下了火车，那位张同志像喝醉似的，已分不出东南西北。徐向前身体虽然瘦弱，却经得起折磨。他领着路，按接头地点、暗号，顺利地找到中共广东省委设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头，被安排住进一个小客栈。

和在上海一样，也叫“泰安客栈”。

第三天，那位姓张的同志被分配走了。“交通”一再嘱咐徐向前，不要外出，听候安排。白色恐怖下，稍有差错会发生意外，每个处在“地下”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一点。徐向前经过大革命失败后这几个月，已经学会了許多。他不喜欢广东这地方。小客栈阴暗潮湿，夜晚蚊虫飞舞，白天小咬叮脸和脖子、耳朵。当地人语言生硬，说话像吵架，对外乡人更是冷眼相看。吃的东西多是半生不熟，鸡块带着血上桌。只有一个美妙的神话传说，让徐向前记在心上。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广州是块饥荒地，种下五谷皆不长。

五位神仙骑着羊儿路过广州上空，看着地下许多人因饥饿死去实在可怜，神仙遂指使五头羊去天宫采来谷穗，把神仙种的谷子撒到广州这片土地上。从此，广州大地长出了肥大的谷穗，人们从饥饿中得救。可是，那五只羊却触犯了天规，被逐出天宫，飘落在广州观音山下，化成五具石头羊。从那以后，广州才有“五羊城”的美称。徐向前喜欢这个传说。

五羊城，成了徐向前的第二故乡。他从这里走上革命的征程，如今又重返了故土。

旧地重游，唤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三年前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曾经来到过广州。

那时，他满腔热血，头脑单纯，只担心复试落榜。那时，广州的一切，都使他新奇。这儿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民党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广州城大街小巷、珠江岸边、黄埔岛上，到处是革命的军人、工人纠察队，日夜响彻着革命的歌声。孙中山和一些党政名人，经常在学校、工厂演说。徐向前复试通过被黄埔军校录取后，踏上黄埔岛，穿上军衣，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为家”的军歌。

现今他重游“羊城”，街道、车站、商店虽然是老模样，政治气氛却完全不同当年。

国民党和共产党从“同志”变为仇敌，三年前，徐向前威武地走在街上，那身黄军装吸引着行人；如今他一副商人打扮，不敢外出，躲在小客栈中阴暗的小屋里。他在客栈住宿登记册上，留下的是“余立仁”名字。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是“危险分子”，随时都可能被捕，投入监狱。

他生性话语不多，却爱活动。特别是这两三年以来，几乎都在滚滚洪流里。他闷在小客栈，每天吃饭、看报、睡觉，着实憋得慌。一天吃过午饭，便信步走出客栈，漫步来到珠江岸边。

这儿行人不多，偶尔才碰上几个人匆匆走过。他看到江水奔流，又不由得想到，顺江东去就会到黄埔码头。想着，走着，不知走了多远，才想到不该乱走。于是转回身走了一段路，不知不觉竟走到一条大街上了。他怕碰到意外，急急忙忙转弯，却忘了来路。

好在他记住了客栈的方位，估摸着方向寻找珠江。

猛然听到一声呼唤，回头一看，不由得惊了一下，原来是一位熟人——黄埔三期的一个学生。他身穿军官制服，却没精打彩。

“好久不见啊？”那军官高兴地和徐向前握手。

“你现在……”徐向前想说“干什么”，没开口。

“啊，唔……”那人含含糊糊不知说了句什么。

徐向前从前只和这人见过几回，他叫什么名，哪里人都记不住了。如今这人什么底细，更难摸清。他镇静地略略微笑，装出一副平淡无奇的神色，说自己现在经商做生意了，官场上的一字不提。那人哼哼哈哈，看来也不想和徐向前深谈，又说了几句无关疼痒的话，二人便分手了。

回到泰安小客栈，徐向前心慌意乱。悔不该外出，万一暴露出去，怎么好呢？从此他格外小心，再不出房门。一本看破了皮的书和几张报纸，伴随着他熬过白天、黑夜。

又过了几天，夜晚来了位“交通”，把徐向前带走了。说是省委的指示，叫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

军人有了用武之地，徐向前高兴极了。他这些年舞刀弄枪，爱上了领兵打仗这一行。

他从自己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中国革命，空喊不行，游行示威不成，写文章讲道理也不成，最好的办法，是武装起来。蒋介石所以敢那么凶，就是他有军队。听说让他去训练工人赤卫队，想想赤卫队定是不少。但不知集结在何处？

他摸着黑，一路行走，好不容易，才找到珠江边一户人家。

低矮的小房，使身材高瘦的徐向前进门都得躬身低头。这哪有什么工人赤卫队，迎接他的是位抱着娃儿的老太太。她说的是纯而又纯的广东方言，徐向前这个在广州生活过二年多的人，几乎听不懂几句。他借着暗淡的灯光，看见这小屋里满是秤杆，明白了，这家是做秤的手工业工人。

“广州的工人阶级经受过省港大罢工和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锻炼，觉悟高，基础好。”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着，“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在支援两次东征、广州平叛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济琛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职工会和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先是自立名称，分散活动，后来统一改称工人赤卫队。工人赤卫队是我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准备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将全市的赤卫队按地区编为联队，分区进行军事训练。”

徐向前来到这家做秤的工人小屋里，开始了对第六联队的军事训练。说起来让这位从上海来的指挥官闷气，他的联队，名义上是下设几个大队，大队下又有中队，中队下又有许多小队，大约三百多人，其实一个都看不见。他们分散在大大小小的工厂和作坊中，有的是五金厂工人，有的当海员，有的当店员、印刷工、面粉工、火柴工、铁路工，还有拉洋车的、制蒲团的、做秤的、缝衣的。最先来和徐向前接头的人，是位叫阿陈的同志。他自我介绍，是第六联队的党代表。

“听说你来广州好多天了，”阿陈高兴地向徐向前笑着，“我们正盼着你哩。你来就有办法哩。”

徐向前说：“我是外乡人，人生地不熟，话不懂呀！”

阿陈说：“莫客气，听说你是黄埔呀！”说着翘起拇指，对黄埔军校出身的人，表现出诚挚的敬意。看来这位党代表对徐向前的到来，十分欢迎。他说一口中听的普通话，自我介绍了一番，接下去就说起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组织状况、人员情况。最后，两个人一块商定了一个军事训练计划。

白天，徐向前在屋里看看书报，自己起伙做做饭吃。他从小虽然跟母亲学过家务事，可是从没做过饭，他只会熬稀饭、吃咸菜。房东老太太瞧见这“北方佬”饭不是饭，菜不是菜，向他比比划划说什么。徐向前似懂非懂，意思听得出，老太太嫌他饭菜单调，要帮助他做饭菜，或者请他过去一块儿吃饭。徐向前摆摆手，意思是他这伙食挺好。

晚上，党代表阿陈和赤卫队的骨干分子，三三两两来参加军事训练了。十几个人，挤在一堆，听徐向前讲军事课。他讲的内容，从一般的军人常识到轻武装性能。没有教科书、没有黑板，没有一件武器，唯一能帮助他讲解的，是一支铅笔和一张白纸。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扔手榴弹，怎么冲锋……”

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

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

当翻译……”

徐向前每夜训练的，多是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工人们开始不大接近这个“外乡佬”。

由于他热情又耐心，很快工人同他亲近起来。老工人叫他“阿弟”，年轻人称“阿哥”，他成了工人兄弟知心的朋友。他买菜做饭，工人来帮忙；工人有什么难处，也向他倾诉。

他们赤手空拳“纸上谈兵”，每晚都在上课。

武装起义什么时候发动，徐向前不了解；工人赤卫队到哪里搞武器，没人说。军事训练会有什么成绩，不射击，不演习，很难看出来。徐向前逐渐意识到，不应光“纸上谈兵”，要着重训练人的思想，而不是军事技术。他在每天的课目中，加上些社会发展史的内容，讲些爱国英雄人物的故事。他讲林则徐禁大烟的故事；讲戚继光率兵收复台湾、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工人赤卫队员的情绪，越来越活路。深夜，大家情不自禁地轻轻唱起了《国际歌》。

已经快入冬了，中国的北方冰雪封门，广州却仍是温暖如春。树是绿的，山是青的，人们还穿着单衣，脚拖木屐。徐向前来广州城已经两个多月，整天整夜闷在屋里，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想想前几年，不是在军校操练，就是出征行军打仗，生活多么新鲜有趣！现在不军不民，不男不女，蹲在屋里还自己做饭。他真想跑出去，看看观音山，看看黄埔岛，会会朋友！可是，党组织规定的纪律不能违犯，他无权外出。

再说，昔日黄埔的战友、同事，眼下不是反共就是反蒋，已经各走各的道路了。他绝对不能外出。

夜晚，训练又开始了。工人赤卫队员们提出，听说有的联队有武器了，问徐向前会不会发枪。徐向前说：“不会，不会。”

“打仗，哪有空着手的道理！”有人埋怨说。

“打狗，还要棍棍呀！”有人笑着说。

“不要急嘛！”徐向前耐性解释着，“到那一天，枪会有的，弹会有的，飞机、大炮也会有的！”

他的鼓动和劝说，使渴求武器的工人赤卫队员笑起来。他心里明白，说大话不解决眼前的问题，就向大家说：“没武器，每人先预备根棍棒、铁尺、菜刀也行哩！”

大伙听了，有的发笑，有的摇头，都认为这“山西佬”开玩笑。徐向前却认真地说：“每个人是要先备件武器，赤手空拳怎么上战场！我们工人阶级有两只手，自己解放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要拿木棍、菜刀、铁尺去夺敌人的枪！”

一番实实在在、又富有鼓动性的话，把大伙儿劲头鼓得足足的。可是，等大伙儿散去，徐向前又暗暗发愁：武装起义不是儿戏，棍棒怎能和持有洋枪、洋炮的军队拚命呢？他这个指挥官，也要有件武器呀！哪里去找呀？他的两眼在屋子四处搜寻，除了秤杆，就是秤砣，连根木头棒都没有。他随手摸起一个铁秤砣，掂量几下，笑了。

广州起义的准备，在暗中策划进行着。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潜入广州城，秘密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动员和组织工作。12月7日，在工农兵代表参加的会上，张太雷说：“苏联十月革命，首先有列宁格勒的两团士兵同情工人，后来影响了帝俄在前方作战的部队，终于取得革命

成功。

今天我们起义，也有两个团的士兵同情我们，如果打响之后，能够影响军阀们在梧州混战的部队，我们也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他要求各区的工人赤卫队要听从指令，加紧准备，一声令下，全线出动。在这次会上，决定了起义的时间：12月12日。徐向前听了会议传达，加紧了对工人的训练。

正在这个关头，一个秘密的武器转运站被暗探侦破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头目，正被南昌暴动、秋收暴动搞得惊魂未定，得知广州又要闹事，即调兵遣将，准备扑灭这团烈火。

南京方面连发三个电报给广州的陈公博和公安局长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严查工人赤卫队总部的行迹。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特地从上海到广东，面向张发奎传达镇压共产党暴动的指令。

生死搏斗，你死我活。广东省委领导下的行动委员会临时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举行。

“我当时是个一般党员干部，”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不了解全面情况，也不知道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谁。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我们的训练一直紧张地进行着，至起义前夕，共训练了40多名骨干……”

起义提前，徐向前和他率领的工人赤卫队，仓促集合编队。第六联队说是有500人，好不容易集合起来不满300人。

10日深夜，在那个造秤的小工厂里，徐向前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决定，传达了武装起义的计划：

- 一、起义发动的时间在11日凌晨3时半；
- 二、夜间普通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为“夺取政权”；
- 三、参加起义的军人、工人赤卫队员，一律在颈上系红布条；
- 四、先除掉军队中的反动军官，收缴的枪支首先武装工人赤卫队。

这时，徐向前才听说：起义总负责人为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军事行动总指挥为叶挺；总参谋长徐光英；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为周文雍。

传达完命令，徐向前和党代表阿陈，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像发证书似的，一一分发给队员们。此时，徐向前最盼望的是发给他们几支枪。

利用进入战斗前的分分秒秒，徐向前还向大家作战斗动员，讲解巷战中应特别注意的事项。忽然，从门外走进一位青年妇女。她挎着个买菜的篮子，包着头，只露出两只机灵灵的大眼睛。没说话，徐向前便认了出来，是女“交通”。

她放下篮子，掀掉盖在上边的青菜瓜果，露出两支手枪，七八个手榴弹。

“哟，武器！”徐向前高兴地先叫出声。

“还有吗？”党代表阿陈数着手榴弹，似乎嫌少。

“没呀！”女“交通”摇摇头说，“发给你们的就这些。等打开敌人的仓库，枪和手榴弹多的是。”

一个联队近300人，这几件武器实在太少了。徐向前后来才知道，工人赤卫队在小北一家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公安局侦破了，原定起义前给工人发武器的计划落空了。

“交通”送来的这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还是从别处匀来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事到如今，徐向前和党代表只好说：有这几件武器，总比光是棍棒、铁尺好多了。他当即决定，两支枪由他和党代表用，一是他们便于率领

冲杀，二是他俩会放枪。手榴弹，先分发给三个大队长和几个当过兵的工人。大家也没说什么，有的摸摸身上的匕首，有的拍拍别在腰带上的铁尺、菜刀之类的武器，表现出工人阶级一种无畏的英勇气概。

“好啊！我有刀！”有的得意地说。

“我有剑！”有人拔出剑，在空中挥舞一下。

“我有炮！”一个老工人，拿出个短把的装火药的小统枪。

还说，这是他祖父留下的。

笑声、热情豪爽的话语，使徐向前感动中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他这两年经历过无数次战斗，亲身体会了战争、流血，亲眼见过战友的牺牲。他看见过，许多士兵上战场前，满脸笑容，可是枪声一响，有人倒下，那脸就变了。他想，这些从来没经过枪炮的工人，战斗打响以后，会是怎样啊！

徐向前一生身经百战，但对率部参加广州起义，只有两支手枪和七八个手榴弹，却终生不忘。在他 83 岁高龄著作的《历史的回顾》中写着：

“……敌军大部队驻在城外，城内兵力空虚，对起义有利。

起义的主力军是张发奎部叶剑英同志当过团长的教导团，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底子，共一千三百多人，武器装备较好，有一定战斗力。他们是不久前随张发奎部南下进驻广州的。另有警卫团、炮团和黄埔警卫营一部，也有武器。只有工人赤卫队是赤手空拳。原说起义前要给各联队送武器来的。

我们左等右等，等了半夜，不见人影。大家心急火燎，议论纷纷。这时，有位提着菜篮子的年轻女同志走了进来，从篮子里拿出两支手枪、几枚手榴弹。这点东西，加上些铁尺、木棒、菜刀，便是我们联队起义的武器。”

深夜的广州，像火山爆发前那样平静。徐向前和他的弟兄们，等待着出击的命令。

震惊中国的广州武装起义，就要爆发了。

兵败五羊城。花县城下徐党代表施展“打狗的战术”。将计就计，巧取紫金城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城内响起了枪声。沉睡的羊城，开始了新的一天。从此，中国革命的史书中，增添了光辉悲壮的一章。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创立的开端。徐向前没有机会参加南昌起义，四处奔走找不见毛泽东，因此也没赶上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他赶上了，却率领着一群赤手空拳的工人。他和党代表阿陈，挥着全联队仅有的两支手枪，冲向警察局。敌人一个班还在睡梦中，被他们缴了械。徐向前的队伍有了十多支枪，他们又奔向另一个预定的目标——军火仓库。

边前进，边缴获武器装备自己，到东方发亮，第六联队全部武装起来。

队员们喜气洋洋，每人都有了条枪，徐向前心中感到安慰和高兴。至于各路的行动情况，他当时不了解，后来才清楚，整个战斗是兵分三路：东

路是教导团第二营由叶挺亲自指挥，乘坐汽车扑向沙河镇、燕塘，解决了步兵团、炮兵团的团部后，迅速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十二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的第三营，攻占观音山和省公署。中路，由徐光英指挥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一个联队，攻击东校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起义军警卫团首先逮捕处决了反共分子、参谋长唐继元和两名极端反动的连长，然后攻打第四军司令部和军械仓库。参加起义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在内部处决了反动军官后，从黄埔港乘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

各路工人赤卫队，和徐向前所在的第六联队一样，先是夺取军械库的武器装备自己，而后配合起义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进行战斗。

起义军攻占观音山下的公安局后，军事委员会开始在这里办公、发布号令。广州城内的工人赤卫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海陆丰农民军为工农红军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编为第三军。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正式成立。周文雍亲书“广州苏维埃”五个大字横幅，悬挂在政府办公楼前。大街小巷，贴出了苏维埃政府宣言、布告。镰刀、斧头、红旗，在起义军和工人赤卫队占领地区随风飘扬。广州城，一夜之间换了人间；五羊城，一夜之内，变成了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的天下。

徐向前和他的第六联队，浸透在欢庆的气氛中。党代表阿陈和徐向前差不多年龄的人，他变得像孩子似的欢乐。他五音不全，唱歌像哭叫，却仍在不停地唱着《国际歌》。

一些工人赤卫队员，用广东方言、手势，向徐向前比划着啊啊说叫。徐向前听不大懂他们说些什么，从情绪上看得出是高兴，是欢笑。有个赤卫队员，走到徐向前近前，轻声地用普通话问：“队长啊，反动猪仔统统消灭了？”

“嗯，嗯。”徐向前正在清点武器，随便应着。

“反动猪仔再也不来了？”

这么一问，使徐向前积压心中的问号，越来越放火。他不了解全局，只看着局部。

眼前就这么些队伍，有些人刚得到枪还不会用，万一敌人反扑上来，枪对枪激战，这支队伍肯定是难以指挥的。他这个人，向来是说话不多，可是考虑问题爱往深处去。为使这支工人武装真正成为军队，他和党代表阿陈商量着，选了20多名当过兵的、胆大机智的队员，成立了一个特务排；又把一些年纪稍大、身体不大好的人，编成运输队，准备照护伤病员和担任运输任务。其余的人按班排的编制，整编起来。

12月12日中午，第六联队正吃饭，从指挥部传来命令，要他们跑步去观音山，配合起义军第三军作战。任务来得这么急，徐向前没料到。他只想到可能会有战斗，却不知道一场恶战临头了。

原来，蒋介石得知广州发生暴乱，火急发电报给广东各派军阀，要他们“捐弃前嫌扫平共乱”。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勾结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势力，共同来扑灭革命力量。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反动军阀，纠集第五军、新编第二师等部向广州城反扑。“江大号”、“宝璧号”军舰炮轰长堤。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和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陆战队准备登岸广州；日本海军陆战队以救援医院中的日侨为借口，首先从西堤强行登岸。帝国主义国家驻广州的领事团紧急举行会议决定，英军调水兵

2000人，法军调水兵400人，日军调水兵300人，共守沙面。

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战，在广州城展开。

起义军各部队和工人赤卫队，全部投入了战斗。观音山一带，是交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从江门驰援到广州后，在军舰的掩护下，向观音山发动攻击。徐向前率领的工人赤卫队，开始是运输弹药，把弹药箱扛上阵地，参加了守卫战。

观音山这美丽的游览区，被炮火、浓烟吞没。手持步枪、手榴弹的起义军，与反革命军的机枪、大炮对抗。中午，徐向前正教一名不会放枪的战士射击、压子弹，听见有人呼喊：“党代表负伤！……”

徐向前飞跑过去。只见几名赤卫队员围在墙根下，有人手忙脚乱，给党代表阿陈包扎伤口：有人蹲在地上伤心落泪。生命微弱的阿陈，看见徐向前跑来，抓住他的手，喃喃地说：

“我……不……行了……”

“不要紧，不要紧！”徐向前攥住阿陈的手，安慰着，“你会好的，会……”

“……你们……继续战斗……守住……阵地……”阿陈看了看大家，闭上眼睛。呼吸急促。

只见他头部胸口都是鲜血。包扎的人急得乱转转找不着伤口。徐向前叫人把伤者衣扣解开，看看伤在何处。衣扣没解开，阿陈便停止了呼吸。

许多年后，徐向前和笔者谈广州起义，还一往深情地说：

阿陈是他的第一位党代表，也算是政委。他那种工人阶级特有的品德、英勇的气概、坚强的意志，使他终生难忘！

敌人进攻加紧，战斗越来越激烈。党代表牺牲后，队伍中一些人更加发慌。徐向前继续指挥苦战，他稳住特务排在身边，不时鼓动大家说：“我们的援兵马上就来了！”这话只是随口说说，他也不知道援军在那里。他更搞不清敌人兵力多少，总怀着胜利的希望。

枪声、炮声不绝。敌人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昨天还是不会放枪的工人，今天在阵地上和敌人的正规军作战，而且打退他们多次进攻。徐向前认为，这简直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他对这种奇妙的战斗力，感到不解，却深深觉得工人的可敬可爱。

天快黑了，四处枪声稀疏，远远传来炮声。全城战况如何，徐向前不清楚，只接到过一个命令：“不准退，坚决守住阵地！”

身旁有人负伤在呻吟，伤员却不知往哪里送。有的战士叫唤起来，说是肚子饿，要吃饭；有人叽叽哇哇骂，广东话骂些什么，徐向前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

一个小队长跑近说：“队长，人都快没了，下命令撤退吧！”

徐向前说：“不行！”他声音严厉又坚定。

“子弹快打光哩！”有人大叫。

“坚持住！”徐向前回答。

徐向前经过黄埔军校严格训练，又在战场上滚过，懂得军令如山。他指挥着这支队伍守卫着观音山的阵地。

广州起义由于敌人强大，英国帝国主义的军舰参战，起义军寡不敌众，总指挥张太雷牺牲后，部队遂失去指挥。徐向前所在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有的牺牲，有人说去找饭吃，一去不返。他几次派人去指挥部联络，也不见消息。

天黑，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指挥部，这里已空空无人。等了一会儿，跑来一个同志，听说他等命令，就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撤退了，快到黄花岗去集合。”

徐向前这才算接到“命令”，跑回观音山阵地，叫上最后几名战友，一路呼喊着“到黄花岗集合”，在密集的枪声中，向黄花岗方向奔跑。

广州起义失败了。一部分起义军撤到广州城北花县。这里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12月16日，起义部队一些领导骨干在县立第一小学举行了紧急会议，徐向前作为赤卫队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会上首先讨论了队伍整编问题，提出将从广州撤出的一千四百多人改编为一个师。

编为一个师，大家都同意。称几师呢？没有上级来任命，而且没去一个上级机关和高一层领导者。会场上就像给一个新出生的孩子起名一样，议论纷纷：

“一师的番号有了，在北江，”有人说，“是朱德从南昌下来的。我们叫二师怎么样？”

“二师的番号也有了，”有人接上说，“听说在海陆丰嘛！”

“我们叫三师也不行，”有人说，“听说琼崖游击队编成三师了！”

大家数来数去，四师的番号就变成自己的了。于是，经过民主推选，叶镛为师长，袁裕（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师党委书记，王侃如为政治部主任。全师下属三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

徐向前被推任为红四师第十团党代表。

向哪里走呢？大家又议论起来。一致认为，花县距离广州很近，不是久留之地。新师长提议，最好去北江找红一师会合。

大家同意，只是不知红一师具体方位，便派出人去侦察。部队暂时在此休整几日，再决定下一步走向哪里。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闹得红军战士日夜不安。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儿又转回来。部队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徐向前向叶镛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叶镛知道徐向前有实战经验，命令说：“你带部队去打。”徐向前带领一个连，出了花县城。

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

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是山西解县人，和徐向前算是老乡，1922年考入太原山西国民师范，是晚徐向前三年的校友；1926年底考入武汉分校，编在第二大队第八队，后随分校编入军官教导团来到广州，参加了武装起义。在武汉军校，徐向前和程子华虽有一面之识，事过两年，已认不出来了。程子华却记得这位队长。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

大家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打狗”的通俗比喻，把程子华和战士们说开了窍。

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

了。两天之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传颂着徐向前的“打狗战术”。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城大搜捕，大屠杀。反动派像患了“恐红症”，搜到哪家有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就抓人；穿红衣裳的新娘子，也被怀疑为共产党，五天之内就杀捕了七千多人。显然花县不好继续呆下去，经过师团干部会议决定，红四师奔向东江。

新生的红四师，从失败的战场走下来。年轻的师长叶镛才 20 岁。他虽然住过黄埔军校第三期，在中央独立师和第四军教导团任过连长、营长，可是一下子指挥三个团，实在吃力。每天吃不好，睡不好。经和党代表等同志商量，行军路上决定了一项人选：调徐向前为师参谋长。

徐向前到任后，嘴上说他难负重任，干上几天，他的组织才能，参谋的一系列工作成绩，便杰出地显露出来。叶镛从心里高兴，这位参谋长选对了。

红四师走走停停，经过十多个日夜，来到了紫金县境。

紫金县，是罗浮山脉东侧的一个小县。人口不多，城市不大，骑上马一鞭子就跑遍全城。可是小城却出名。当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周恩来到过紫金城；彭湃在东江发动农民闹革命，到过紫金县。1923 年春天，紫金县就开始办农会。1927 年“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在紫金领导了著名的“4·26”暴动，攻下紫金城，活捉了伪县长。从那以后，国民党广东的军政界，都把紫金县城看成一个不可轻视的地区。因此，现任的县长邱国忠，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位少将。

徐向前出任师参谋长后，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就是不放一枪，便把少将县长邱国忠活捉。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徐向前随先头部队进入紫金县城附近黄花村，正考虑攻打紫金城，侦察排黄排长跑来报告说，从紫金城里出来个侦探，把我们当成从广州来的“援兵”了。徐向前一听好高兴，忙叫黄排长把侦探放回城去，就说我们是援军，明早入城，请邱县长在城西门外与官长见面。黄排长按照徐向前参谋长讲的话，转告了侦探，最后还神气十足地说：“告诉你们县长，我们师长脾气大，在黄埔军校时任过蒋校长的秘书，他要发起火来，那就……”说半句留半句，侦探明白了，连连点头，飞奔回城去了。

夜晚，徐向前和师长叶镛研究了两个方案：“第一，真是城里敌人误认为我们是“援军”，必出城迎接，我们将计就计，把迎接的人活捉，作为人质与守城敌军谈判，要他们交出武器，打开城门；第二，敌人不出城迎接，突然攻城，武力解决。

兵临城下，却不发起战斗，红军的干部，战士心中不解。侦察排黄排长虽然按徐参谋长的吩咐办了，城里敌人会不会上勾呢？他和侦察排，作好了突击登城的准备。一路从花县走来，黄排长随着参谋长活动，亲眼看见他足智多谋，善于应付突发情况，心里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第二天天刚亮，红四师先头部队出动了。徐向前参谋长紧紧跟随着尖兵连前进。他也担心敌人不会上当，一夜未曾睡好，快到城西门，侦察排回来报告：城门大开，一些人列队在城外迎接，看样子是些官儿。徐向前一面飞快往前走，一面告诉侦察员，按第一方案执行。没等命令传下去，黄排长当机立断，一声令下，把列队迎接的大小官员，全部活捉了。其中有伪县长

邱国忠和县政府的各部要人。这个从前的少将，屠杀了许多革命者的刽子手，当了俘虏，方知不是“援军”，而是红军到了。

红四师不放一枪，占领了紫金城。城里少数守敌正在睡梦中，被缴了械。徐向前进城后，亲自和邱国忠谈话，要他命令城南龙窝镇驻扎的自卫队投降。邱国忠死硬不答应。

徐向前当即命令侦察排，把邱国忠反绑双手，给他披上件黑大氅，架在马上，红军侦察排随后，走向龙窝镇。

驻在龙窝镇上的自卫队，正惶惶不安，远远看见县太爷骑着马带兵来了，一些官兵出来迎接。邱国忠反动透顶，老远放声呼叫：“不要上当，共产党军来了！”顿时，龙窝镇枪声大作，红军侦察排冲杀进去，一部分敌人被消灭，一部分敌人逃跑了。

紫金县解放了。邱国忠被公审枪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员的发动下，纷纷组织慰问红军。徐向前住到紫金东部的炮仔圩。只见家家户户炒米花、煮擂茶、打糍粑、舂米糕真像过新年似的热闹。妇女们还组成洗衣小组，帮红军战士洗衣服。徐向前头一次见到这亲切、热烈的劳军场景，他感到军队像这样得到人民群众真情支持，那才是如鱼得水啊！

部队从花县走来，已经疲惫不堪。这里群众条件又这样好，师部决定在此休整几天。

笔者 1983 年 5 月走访紫金县炮仔圩时，见到了几位老人和乡政府干部，他们叙述了红军当年到此的情景。在一片麦田地上，竖着块小小的石碑，正面刻着三个大字“红军坪”。

说是徐向前和红四师的领导人，在此集合红军讲过话。

红军坪，永远记载着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的足迹，铭记着他们在紫金县的光荣业绩。

转战海陆丰，与“彭菩萨”结下深情。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红四师在紫金县境休整数日，奉东江特委的命令，于 1928 年元旦过后，开抵海丰县城。

海丰，是广东省东南沿海的一个县。它南临南海，北依莲花山。县城不大，名声大；人口不多，英雄事迹多。远在南宋末年反元斗争中，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率兵在海丰征战过。后人在城郊五坡岭立起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表忠祠”。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海丰的农民领袖黄镜恭发动农民起来呼应，并一举攻占海丰城。

辛亥革命后，海丰又成了彭湃新农民领袖的革命圣地。

这里，是农民称为“彭菩萨”——彭湃的故乡，彭湃领导创建了红色政权，开创了名震中国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里，又是徐向前征战过的地方。1925 年春，徐向前参加东征，随黄浦军校到海丰，参加过海丰农民 3 月 3 日举行的三万多人的欢迎大会。在“农旗蔽野、欢声雷动”的大会上，周恩

来、彭湃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那时，徐向前没想到，三年之后，他会领兵再返海丰城，会成为彭湃的部下和战友。

新年伊始，海丰人本不过“阳历年”的，这一年例外。元月5日天不亮，四乡的农民举着红旗，吹吹打打，涌进海丰城的红场。红四师的部队，武装整齐、精神焕发，高唱着军歌，步入红场。人山人海，红旗蔽日的欢乐场面，使徐向前和战士们的心情豁然开朗。广州起义失败以来，第一次使他开笑脸的县城是紫金县，这里比紫金县更火红。失败的情绪，从战士们心底消失了。

欢庆大会，一是欢迎红四师到东江，二是庆祝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满怀激情，记述了初到东江和海丰的盛会：

“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

‘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火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苏维埃主席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脚上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

他的声音宏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class="swy2">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

海丰城，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

彭湃出生在县城东郊桥东社一个商业兼地主的家庭里。他不满五岁，就被送进海丰城七圣宫读私塾，六岁进林祖祠小学读书，十三岁升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几乎都是在海丰城度过的。

1921年5月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局长，便辞去局长的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从此，农民称他“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的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他的名声，传遍东江地区。普宁县的老百姓听说彭湃到了，几千男女老少跑去迎接，农民把他当“菩萨”，又把他当“皇帝”一样称他“万岁”。一次开大会，妇女、娃娃高呼着：“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 ass="swy2"> 《彭湃传》1986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他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群众中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和他写的诗歌。他曾写过这样一首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诗歌：

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

有足不行，终日静坐，受人奉迎。

奉迎无益，不如打平，铲个干净。

人群进步，社会文明。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是前敌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和起义军一部分一直走到汕头、东江地区。大部队失败以后，他经香港又转向海陆丰，组织武装斗争。广州起义爆发后，他率领海陆丰革命武装（即广州起义后命令的工农红军第二军）正向广州进发，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于是率军又返回海丰县。

红四师来到海丰地区，彭湃那些天特别高兴。他特请师长叶镛、师党代表袁裕、参谋长徐向前、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等领导人一起吃茶，共叙友情。在海丰，徐向前还见到了彭湃原配夫人蔡素屏——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

那天中午，一群妇女慰问队，来到红四师师部。领头一位瘦小的女干部，就是蔡素屏。她落落大方，热情微笑，向徐向前等人敬擂茶。她的普通话虽然不太好，但听得出，她一再说的是：海丰人和广大妇女，从心里欢迎红军；人民解放、妇女解放要有武装。

话不多，给徐向前的印象：她是一位新女性。其实，蔡素屏是彭湃一手培养成长的女强人。她是海丰鹿境乡人，16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彭湃。她虽然长相俊秀，聪明伶俐，却不曾读过书。彭湃开始很不满意这门婚事，打算“一走了之”。但他又觉得这样会害了此女一生。最后下决心与她相爱，教她读书写字，叫她放开小脚，扔掉绣花鞋，走上革命路。

她终于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了海丰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蔡素屏1928年6月被叛徒出卖牺牲，在刑场上她向乡亲说：“只要农会万岁，我甘愿受罪。”

红四师来到海丰，每天都生活在温暖、欢乐的气氛中。徐向前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

参谋长的职务，使他大小事都要亲自过问。本来他只管军事行政事务，由于刚从10团党代表改任不久，总还习惯管一些党务、政治方面的工作。这时在几位师领导干部中，又显露出一些不团结的苗头。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党委书记唐澍和徐向前都来自黄埔军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荣经历，又都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难免闹些意见。从花县一路走来，因为行军打仗，有些矛盾暂时压下了，如今来到海丰，环境平稳，几件小事掀起风波。徐向前是新提升的，又惯于忍让，凡事不往心上去，谁和他过不去，他忍忍，笑笑就过去了；谁看不起他，他“甘拜下风”。他不说长论短，埋头实干，一心放在部队工作上。所以他没被卷进闹不团结的风波中。在彭湃参加的党员大会上，徐向前有几句发言，说得与会同志称赞。徐向前不紧不慢地说：“我们都是同志，同志就要志同道合。大家应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做不到这些，遇事也要相互忍忍。现在敌人追打我们，团结是武器，我们只有团结对敌，才能战胜敌人！”

彭湃说：“对，团结是武器，是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武器。我们共产党员，自己不团结好，怎么去团结劳苦大众革命！”

在彭湃的主持下，全师党员大会改选了师党委。徐向前当选为师党委委员。

在新党委会议上，袁裕提出要“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建议。彭湃说：“应该，现在红四师虽然有三百多名党团员，但仍需要积极发展，进一步增强党的组织建设。”

会议休息时，大家在院中散步闲谈，几个人叙起家常和这几年的经历。彭湃听说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笑着说：“五台名山，菩萨多呀！你同意不同意打菩萨？”

徐向前说：“同意打的，只是打它没用。”

彭湃说：“有用。菩萨虽然是不会说话，它压在工农心里，不准造反。该打，该打。”

两个人说起广州，说到黄埔军校，彭湃说：“你们那期时，我还带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去过呀！”

徐向前说：“我们没见过面，听说过这事。”

彭湃说：“当时人多，见着也不认识呀！”

原来 1924 年 7 月，彭湃在广州办起第一届农讲所，亲任主任。开学那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出席演说。原定学期一个月，为使农民运动骨干分子懂些军事知识，彭湃亲自领着 33 名学生，在黄埔军校进行了 10 天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彭湃又领学员到黄埔附近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调查和实习。徐向前当时正在黄埔军校紧张训练，只听说来了一帮农民学军事，却不知带队的就是这位“彭菩萨”。

不是巧合，恰是巧遇。革命人又走到一起来了！

红四师在海丰的日子里，彭湃这位革命家给了徐向前很深的印象。以致徐向前一生都十分怀念、敬仰这位“彭菩萨”。

徐向前的诚挚、稳重、党性高于一切的品德和实干精神，也牢牢留在彭湃的记忆中。

后来彭湃奉命到上海党中央工作，直到他牺牲前，还常常提到徐向前这个人。

徐向前和彭湃，在海丰相会；在东江征战中，不断加深友情。当然，他们之间也有过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是后话。

红四师到达海丰不几天，红二师在董朗的率领下，来到海丰，与红四师会合。说来也巧，董朗又是徐向前黄埔时期的同学。孙中山播下的“黄埔种子”在国共分裂后到处开花结果。

董朗是四川简阳人，和徐向前同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第二队，与徐向前在黄埔的经历一样，参加东征、平定广州商团叛乱。董朗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任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团团团长。起义军在潮山地区失败后，他率领一部分部队退到海陆丰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团，董朗任团长；

四团和海陆丰工农武装合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兼四团团团长。

红二师正孤军作战，红四师来了。

东江特委书记彭湃，现如今有了两个师的红军，决心打开一个新局面。为“迅速扩大红区”，遂命令红二师北向紫金、五华地区发展；红四师东向普宁、惠宁地区进攻。

企图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领域。

这一年春天来的早，刚过新年，东江山绿水清，正是大好的作战季节。彭湃的性格像他的名字，热情澎湃，亲自率领红四师东进。首先扫平陆丰的地主阶级反动武装“白旗会”，然后攻果陇、打甲子湾，占葵潭。彭湃发着高烧，还带病指挥红军十一团和普宁工农革命军作战。师党委书记唐澍在战

斗中牺牲后，师长叶镛生病、党代表袁裕身体不好，作战行军种种工作压在徐向前参谋长身上了。徐向前虽然身体瘦弱，却有一股抗劲。小小的头疼脑热，他从不放在心上，实际上也没有药吃，按他的话说，“抗一抗，就过去了。”

小病能抗得住，敌人大军一出动，抗就难了。这时敌人从广州派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上军舰控制沿海，从西、北、南三面围攻海丰。海丰城不攻自破，东江的红都丢了。

东江特委决定：红四师攻惠来。此时守惠来城的是从福建开来的陈铭枢的杂牌军，战斗力不强。哪知，惠来城工事坚固，攻不进去。徐向前正在前边指挥，彭湃来了。此时，海丰城丢了，他正一肚子火，决心要“一城换一城”，亲自率领队伍去攻惠来城。

徐向前说：“要不得，要不得！”

彭湃说：“怎讲要不得！我不相信攻不下惠来！”

徐向前说：“要攻，我们率领队伍攻，你不能去！”

彭湃还没被劝阻住，他的夫人许玉庆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了。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和彭湃一样火性，丢下孩子，也要去参加爬城。徐向前和红四师的干部们又急又笑，这哪里像打仗，是斗气呀。师长叶镛赶来了，党代表袁裕跑来了，他们病着，都争相去攻城。徐向前说：

“你们谁都不能去，我是第一线指挥，我去……”

当晚，部队发起攻击，一阵激烈的枪战，碰巧把城头上敌人团长打死了。这杂牌军，本不善战，头头被打死，一个团四散跑出了城。此时，敌人大军压境，红四师在惠来死守，必遭不测。于是红四师撤出惠来，转移进了普宁县山区的三坑。

在转移的途中和民团遭遇，战斗中徐向前腿部受伤，好不容易在别人帮助下，又是抬，又是架，来到三坑附近一个小村庄。徐向前已经记不清这村的名字了。1983年4月，笔者走访海陆丰老区，专程去普宁县三坑，进行现地调查。汽车经普宁县城，沿着山间小路，走了许多，东拐西转最后才找到那个实际上已经变成水库的“三坑”。山脚下稀稀落落的几个小村庄，分散在三个坑凹里。独具特色的石头墙，石板房，满目的石头，使人感觉这里是真正的山区。放眼望去，群山层叠，云雾绕着山头飞。一位80多岁的老赤卫队员，从前给红四师引过路。他指着远处一个高峰讲：那儿是“望天峰”，峰顶上有块望天石，登上望天石，南可以望见大海，西可以望到广州；向上可望到“天宫娘娘”。

平民百姓没人登上过，听说当年彭湃领的红军上去过。笔者问老人，当年他见没见过彭湃？老人骄傲地仰起头说：“见过，见过，他可不像现在的官难见，他进了山这家走，那家串，娃娃都晓得‘彭菩萨’”。

“你当年见过徐向前吗？红四师参谋长。”笔者问老人。

“你说的当今元帅徐向前吧？”老人摇摇头，“那时候兵那么多，官那么多，都穿一样衣，吃一样饭，谁分得出谁个谁呀！”

我是知道徐元帅，他在三坑这凹凹打过游击，他是了不起的武人。是红军参谋长，参谋长大呀……”

“你怎么知道徐向前参谋长的？”笔者提问。

老人笑了：“是这些年才听说的呀……”

在红四师转战普宁山区、徐向前进三坑养伤的那些日子，正是东江革命斗争开始走下坡路。年轻的红军，像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只会往前走，却不懂碰到墙上要头破血流，不懂人生的路怎么走。东江特委领导人，同样不成熟。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转战进三坑一带，东江特委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

要把部队拉出山与敌人死战。徐向前和叶镛等人，虽然政治同样幼稚，可是他们是多年的军事干部，深深懂得战场上死打硬拼，是军旅大忌。

三坑隐蔽、安静的环境，使徐向前伤口恢复很快。4月，山区春暖花开，他每天都在村边散步，锻炼自己的腿脚，准备再战。又常常望着望天峰深思：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不爱闲扯，爱独自思索，这是徐向前的品格。他认定：弱小的红军，不应攻城夺镇，不能死打硬拼，要想办法保存自己。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红四师师长、党代表，他们同意。但是，他们都说不后怎么办，要服从东江特委的决定。

4月中，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

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的气氛开始平静、友好，虽然当前处境不妙，大家仍谈笑。特别是彭湃，仍是那么乐观。全国反共浪潮似云涌，敌人大军云集，东江眼看危机，特委的几位领导人好像仍处在“世外桃源”之中。一个个高谈“反攻”，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徐向前忍不住了，他认为“反攻”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自欺欺人。海丰丢了，陆丰丢了，惠来打下站不住脚，反攻到哪去？眼下红军力量不足千人，再“反攻”下去，就要垮掉！

“反对不是时机，”徐向前口吻平静地说，“我们最好打到粤赣边去，那边……”

“向北，民团多，打不过去！”有人马上反对说。

“向北逃跑，怎么对得住东江乡亲！”有人慷慨陈词，“我们要战斗，要打回海丰，要收复一切失去的县城……”

会场，像一块石头投入水里，接着乒乒乓乓，许多石块飞下。气氛变了，人们的脸色变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争论。徐向前不言语了，一支烟接一支烟抽。师长、党代表都闷着。他们生病，身体虚弱，又当着东江地区党政军最高权威，不好多说什么。

会议不欢而散，既没充分各抒己见，也没有激烈争论，结论是一个：进攻！这是彭湃最后作出的决定。徐向前等“外乡佬”不了解情况，不便再坚持意见，只好按特委的决定办。

又过了几天，部队正准备行动，夜晚，突然来人向红四师师部报告说，彭湃自己带着几个人，冲下山去了！

“去哪里了？”叶镛着急地问。

“带多少人？”党代表袁裕问。

“不知道，”来说，“他是生气走的，是……”

事情很明显，部队行动迟缓，彭湃火了。徐向前心想，山外到处是敌

人大部队，几个人冲下去，不是往虎口里钻吗！他没多说话，扎好腰带，挎上手枪，紧紧腿部伤口上的绑带，向师长、党代表说了一句：“我带部队下去接应，保护他们……”

第二天，天蒙蒙亮，徐向前跟随彭湃，边走边说，走向山村的驻地。大家一夜没睡，见彭湃和徐向前安全回来了，这才放下心来。没有笑声，也没有埋怨。

傍晚，大部队离开山村，摸黑向西，向海丰方向疾驰。还是要进攻，进攻！

“敌人的围攻一天天紧迫，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困难。”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红二师、四师各剩五、六百人，另外有个朝阳独立团几十人枪，就那么点力量。那时地方党不晓得建设和加强主力红军。地方主义、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外来的红军是一摊，本乡本土的地方武装是一摊，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我军打一个少一个，没有补充来源。人牺牲后，枪就被拿到地方上去武装赤卫队。

红军越打越少，越打越弱，地方武装当然也发展不起来。”

东江特委的一些领导人，先后奉命转移出去：红军中的一些预导干部，也纷纷被调离，有些人要养伤、养病，先后离去。

徐向前和一直处在病中的师长叶镛，坚持游击战，战斗在敌人的四面“围剿”中。

徐向前后来总说：东江，是他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个学校。

12

死里求生，苦战在莲花山。到九龙喜读真假《牡丹亭》。他苦苦思索、思索……

跨进 1928 年 5 月，东江地区从早到黑，阴雨连绵。莲花山里分散着红四师部队。徐向前带领二百多人，游击在热水冈一带；党代表袁裕带一部分人，留在普宁县三坑一带，跟彭湃一路游击。师长叶镛病得厉害，发疟疾每天一场，没有医药治，发展到天天发冷发热，身体虚弱得不能走步，带着两个警卫员，在白木杨山村隐蔽。

自从 4 月东江特委决定“反攻”海丰城，因里应外合不得力，城里地下党在白军中接应的只有八个士兵，红军突进城后，不得不退出，转移进山。从此，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更加艰难。山外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封锁。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下雨天，战士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他裤子湿了没得换的，就穿在身上晒，让身体渐渐暖干。笔者 1982 年访问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女红军，她是彭镜秋，曾在东江红四师负责管军需工作。彭镜秋说，当时她看见徐向前没有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又是女人的衣服，他怎么能穿呢？

彭镜秋没有办法，找来一块黑布，向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

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做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当时，红四师还有六七名女同志。原先从广州一路来随行的女兵二十多人，这半年病的病倒，伤的伤了，还有的吃不了苦自动脱离了队伍。剩下这六七名女同志，有的也奄奄一息活着。徐向前和干部们多次劝说，要她们下山去找个村庄隐蔽下来，或者远离东江回广州去。她们总不愿意。有的还那么天真，等着“反攻”广州，等着“迎接革命高潮”。彭镜秋说要给徐参谋长缝条裤子，女友们你穿针，她引线，很快把一块黑布变成了裤子。她们边做针线，还边唱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欢送阿郎去打战，打了胜仗阿郎返，睚爱手枪和炸弹。

这首歌，说是彭湃依据客家姑娘唱的山歌改编成的。原歌词是：日头出来对面山，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十七十八阿郎返，玉石手铜金耳环”。彭湃一改，情歌增辉了。

徐向前从小生在五台山区，那里没听说过女人唱山歌，只听过和尚唱“阿弥陀佛”。

因此，徐向前从小就不会唱歌。困在大南山脉中的莲花山里，大家高兴起来拉个歌，拉到徐参谋长名下，他就说“不会唱”。就给大家讲个笑话，背几首诗。他从三四岁，“老秀才”父亲就教他学背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勃、孟浩然等大诗人的名句，徐向前都背诵如流。眼前红军被困深山，敌人在山外烧村，扑进山来还放火烧山，这使徐向前想起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特别是前四句，在徐向前心中成了鼓舞斗志的歌声。

敌人加紧对山区“围剿”，采取“血洗”手段，先放火烧村，再进山烧山。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出动三个团进山“追剿”，飞机也出动了，三天两头飞到山区上空侦察、丢传单，劝红军下山投降。彭湃和东江特委，多次脱险后，转战在普宁地区，并积极准备集中潮阳、惠来、普宁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

6月的一天，徐向前忽然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叶镛师长在白木杨地区被俘牺牲。这消息，使红军战士吃惊、难过，使徐向前久久发呆。他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曾在武汉军校重逢。广东起义，他们是共同战斗的战友，起义失败后，又共同负起收拾残局、转战东江的重任。徐向前性情刚强，从不落泪，沉默、抽烟，是解除烦恼和痛苦唯一的表示。他嘱咐身边的一位参谋，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与东江特委、海丰县委联络，把叶师长遇难的消息报告他们。

参谋说：“如今和外边联系太难啊！”

徐向前说：“难，也不能中断联系。你见放风筝的吗？风筝断了线，落下去会成废纸。我们不能和上边断线！”

东藏西躲，死守山头，总不是办法。徐向前亲自选了三十多名革命坚决、有军事活动经验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特别队”，他们的任务是：侦察情报，筹备粮食，处置密探和内部的叛徒。活动方式：昼伏夜动，短促突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黄埔军校，他没学过游击战，国民二军更没教他小部队活动的办法，如今敌人逼着，一切要靠自己动脑筋，随时总结经验。

东江特委转来广东省委的决定：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

这真叫“临危受命”啊！红四师组成之初近千人，半年多的光景，损兵折将减员一多半。师长叶镛牺牲、党委书记唐澍战死，一些营团干部负伤；战士逃亡、死伤……师部成了个架子，营团不成编制。别说发军饷，一日三餐饭都难保证了。

这样的部队怎么带？这样的局面怎么维持？

在困难的日子里，徐向前又想起两年前“交通”给他的那张“找毛泽东”的纸条。

那时如真能找到毛泽东，也许不会流落在这大南山了。如今毛泽东在哪里？广东省委在哪里？全党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呢？他想着过去，谋虑着当前……

毛泽东这时候，正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他们的情况虽然也在不断遭受白军“围剿”，但形势比东江好，红四军比红四师好，好在他们正着手创造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好在“朱毛”正从政治上、军事上培养着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情况，这时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过去几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明确提出：当前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总纲领……这些，徐向前不知道。

熬过炎热的夏季，度过短暂的秋天，冬季来临了。东江的冬天，虽不比北方寒冷，徐向前和他的部队困在山里，少衣缺食，连南方暖温的初冬都顶不住了。吃的东西更困难，山中的野果摘光，野菜挖净，山芋是最好的食物，白米好多天见不上，“黄狗头”中草药，有时成了主食。从山下老乡家搞点番薯咸菜，那真比山珍海味还稀罕。敌人封锁山下的路口，“交通”来不了，和东江特委机关及附近的村庄地下党组织，渐渐失去联系。

最后，徐向前手下全部干部、战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他这支精干的“特别队”，死伤损失过半，常在他身旁转的，只有七八个人了。

彭湃和袁裕去了上海。是奉中央命令去的，还是他们自己去汇报，徐向前不清楚，只知道他们走了，去中央了。上级新任了一位师党代表刘效阁，身体虚弱，说话呼呼喘，扶着棍才能走几步。红四师的担子，靠徐向前一个人担着。

一个深夜，徐向前被“特别队”的战士叫醒：

“师长，上边来人了！”

“什么人？哪儿来的？”徐向前惊喜地跳起来。已经是说不上起床、穿衣了。既没了床睡，又穿着衣服倒下，他跳起来就向洞外跑。

在山洞外一个草棚里，生着一堆篝火，火旁边坐着个农民打扮的年轻

人。“交通”向徐向前介绍，他是广东省委派来巡视的同志。

这位农民装扮的年轻人，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陈郁。个子不高，讲一口广东方言，脚上穿着草鞋。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小农民。陈郁看来年轻，却是 1925 年入党的党员。参加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任过广州海员工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和徐向前还是一块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只是他们不认识，这是头一次见面。

陈郁熟知徐向前名字，他想象中的这位师长，是威武英俊的年轻军官，眼前却是瘦高个，满脸胡碴子，眼睛深陷在额头里，一身灰不灰、黑不黑的制服，赤脚穿着草鞋。

只有腰间佩着那支短枪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使人看得出他是位军官。陈郁再看看在场的几个干部和士兵，个个衣裳破烂，蓬头污面，瘦得皮包骨头架。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陈郁说着掉下泪来。

徐向前许久不见上级来人，一见陈郁同志，脸上露出笑意，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没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说：“我找了好多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呀！只听说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一步！”

他们围坐篝火旁，谈到天亮。徐向前陪着陈郁巡视了营地，看望了一些山洞、草棚中的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冬衣，伤病员比连队战士受优待，每天给吃一顿米饭。陈巡视员越看，心情越沉重，话语很少，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安慰红军兄弟。

徐向前见到陈郁，心里顿觉轻松，他的话语多了，走路劲头大了。特别是陈郁带来一包烟，让他过了瘾，提了神。说得更准确些，还是这位巡视员带来了上级党的问候，带来了一种新说法，那就是“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广东省委来信和来人，东江特委开会，都是讲“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反攻”。徐向前从陈郁的话语中，领悟到一种新精神。

陈郁问：“往后怎么办？”

徐向前说：“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

陈郁又问：“能坚持吗？”

徐向前淡淡一笑，望着外边崇山峻岭，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群众给送点东西，不会饿死。热水洞的水，一年四季是热的，还可洗热水澡哩！”

胜不骄，败不馁，是革命家应有的品格。大革命失败、广州起义失败以及东江这近一年的斗争挫折，像磨刀石，一次次磨炼着徐向前的身心。他虽然才 28 岁，却在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他认为，要革命只能这样对待眼前的环境。撤退没出路，广州是敌人的，东江各县城镇是敌人的，红军唯有依靠山头，休养生息，死里求生，困难中求发展。他熟读过《水浒传》，那些英雄豪杰占山为王，能生存、能发展，红军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今日总比梁山好汉有出息吧！

徐向前不灰心、不气馁的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陈郁。他十分敬佩这山西佬，这黄埔生。他向徐向前传达了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革命处于低潮，保留骨干至关重要。红四师干部要分批转移出东江，保存好这部分革命力量。

从这之后，徐向前和刘效阁率领的红军，按广东省委决定，在地方党的安排下，开始分批转移。地方党的同志精心安排秘密行动，首先分批转移

伤病员、女同志，接下来转移身体虚弱的年长者和小同志。

山下敌人封锁不紧时，隔几天，送走一批人；山下风声紧了，暂时停止行动。

山中的红军，一天天减少。1928年底，在徐向前和刘效阁身边，只剩二十几人了。

多是营团干部和警卫员。俗语说：“人少好吃饭”，他们在新年那天，美美地会了一次餐——吃了顿白米煮山芋。

新年过后，1929年1月，广东省委发出指令，要徐向前和刘效阁等最后一批人撤出莲花山。转移的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交通”还给每个人带来些银元和港币。

深夜，徐向前和同志们离开莲花山热水洞，心里说不出是悲、是喜，是福还是祸。

作为红四师最后一名师长，徐向前这一去，说明这支部队不存在了，这使他伤心；想到死去的师长、党委书记和倒下去的许许多多战友，他又庆幸自己是幸存者。他将去哪里，命运又如何？一切只好听从党安排了。

沿着山间小路，走到天亮，他们在“交通”的引导下，奔到山下一个小村。在村头一户人家停下吃饭。这户人家一位老汉和一位少女，他们已经把饭做熟，碗筷摆好。徐向前他们进门后，和那老汉、少女用手势打个招呼，几乎什么话也没说，坐下就狼吞虎咽。雪白的米饭，咸菜、辣子，还有肉！大家已经是多半年没见这样饭菜了。有的人吃着碗里，眼看着锅里。徐向前怕大家撑坏了，走不了路，轻声说：“少吃点，少吃点！”

饭后，他们踏着晨露，继续上路。小路转大路，大路转公路，方向是惠州。徐向前三年多以前参加黄埔军校东征，曾经到过惠东。他知道那是个大镇，曾经是军阀陈炯明的老窝。敌军肯定防守严密。他们这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去，那不是羊群入虎口呀！想着他当即停下，和党代表刘效阁一合计：二十几人分成两路，继续西行。

“你带一路，我带一路，九龙会合。”徐向前向刘效阁说。

“好，九龙会合！”刘效阁重复着他的话，高兴地微笑着。

党代表和师长，各领十几人，分别上了路。大家走出了深山，又吃了顿饱饭，精神足了，情绪高了。只是一个个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衣服虽然改换成农民，却仍掩盖不了那副狼狈像。徐向前一路走，一路观察，心中很不踏实。他们现在已是赤手空拳，武器全部留给了地下党的同志，掩埋在山里了。军人一旦手中没枪，勇气锐减。

万一碰上白军，只有束手就擒了。走到天黑，徐向前停下来对同志们说：“越往前走，距惠州越近，为了减少目标，明天小队应再分三批走。今晚不进城，在野外过夜，明天一早就去汽车站，乘去樟木头的头班车。”

大家无话可说，一切听师长的命令。各人找个地坎，蜷缩着睡下。只是谁都不愿意离开徐师长，认为跟在他身旁安全，同时又想保卫着首长。徐向前似乎猜透了每个人的心，他心中写了个分组“名单”，不等天亮，叫醒大伙，叫着名字，让大家分组起程。

每编成一个组，他嘱咐一声：“提高警惕，照党小组会上说的办！”

还在下山路上，他们边走，边开了党小组会。会上每人都表了决心：万一路上分散，一定去九龙找党组织。万一被白军抓去，至死不能说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惠州城的白军和民团，此时绝没想到，还会有共产党的红军人员，特别是红四师的师长、团长们，会从惠州过路。他们心中的红军，已冻死、饿死在大南山了。因此，惠州防备甚松。徐向前头戴一顶绒线帽，手上扛根竹扁担，装扮成进城挑脚的挑夫，和三个同志，混过民团的耳目，走到汽车站，登上了头一班开往樟木头的汽车……

一路上，徐向前和三个同伴，靠地下党的掩护和他们自己的应变能力，来到了九龙，被一名地下“女交通”，引进一座单门独院的小楼上。徐向前这才长长喘了口气。可是他每天又挂念着党代表刘效阁，挂念着一路分散行动的战友。

今天走来几个，明天又找来几个，五六天过去了，却始终不见党代表刘效阁。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

但刘效阁那一路人，却杳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

九龙和香港，对徐向前说来，既陌生又熟悉。他在读师范、教小学时，就知道香港、九龙的历史：那是清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铁证。凡是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要员在南京江面英国的军舰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中除赔款白银二千一百万两，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等外，把原属广东省宝安县的香港，割让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除赔给英国白银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开放一些港口等等外，还把香港对岸的九龙等地域割让给英国。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谈历史说抱负，曾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收复香港、九龙。如今他流落在九龙，逃犯似地躲进英国的租界地，心中感慨万千。他庆幸广东省地下党有这块跳板，有这个避风港；又为中国人住在中国的地方算是进了“外国”而愤愤不平。

地下党安排一位老工人，每天来给他们做饭。徐向前好像得了饥饿症，总觉着吃不饱，白米饭吃一碗，又吃一碗，胃像是个没底布袋。“交通”送来的书刊从头到尾一行、一页不漏，他的精神也太饥饿了。

一天，穿花旗袍的女“交通”又来了。她着重地把一本《牡丹亭》又称《牡丹亭还魂记》放在徐向前手上说：“保存好，快看，三天内我要取走。”

徐向前没读过《牡丹亭》，却知道是明代汤显祖的名著。说的是少女杜丽娘，被父母禁居深闺，梦中与一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畔相爱。她愁病忧郁死后，游魂找到柳生，令其掘坟而再生。后两人又相会人间，终成恩爱夫妻。这个还魂的爱情故事，连乡下人都听说书的说过。徐向前奇怪：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怎么送来这么本书？他翻开书皮，第一页却是张白皮，再翻一页，一行行一段段文字，跃入眼底。哪里是《牡丹亭》啊？这是一部伪装在《牡丹亭》书皮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徐向前翻阅着。在《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中，讲到中国与世界革命、现时形势与党的总路线、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军事问题与士兵运动……使徐向前大开眼界。他反复读着有关当前形势估计、反对机会主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那些段落。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因为徐向前亲身参加过广州起义，特别细细读着这样一些话：“广州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一段段文字，一句句话，远远比杜丽娘还魂的故事更能使革命者动心。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爱读书、爱思考的徐向前，捧着那本假《牡丹亭》，反复读，认真想。他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教训。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写道：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更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

从上海亭子间走进大别山。红军打了胜仗，众人才晓得一个能人来了，他就是徐向前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

四方面军的摇篮。从 1927 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党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从大革命失败后，就把一批批将才派进大别山。除了党政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等人，军事指挥员有：

徐向前、曾中生、陈昌浩、许继慎、旷继勋、陈赓、倪志亮等等。

徐向前算得上最早走进大别山区的一个。经过是这样的：

1929 年 3 月，徐向前从九龙转入上海后，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人，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客栈的老板娘，一眼就认出徐向前。五年前，徐向前考黄埔军校时住过这里，两年前，从武汉来上海在这里落过脚。他隐隐地意识到这泰安栈似乎与地下党有关系。老板娘 30 来岁，打扮得挺俏，一脸上海女人的精明和温柔相，普通话倒也流利。她见徐向前这位“回头客”，笑得更甜，点烟倒茶。她从不问客人从哪里来到上海做什么。只是说说上海的气候，讲讲黄浦江的大潮。

徐向前奉命来上海，找党中央。他知道彭湃、袁裕正在上海，却没处打听。事实上，纪律规定，不准打听任何一个熟人，除了领导上提起某某人，才可以问几句。他不知道，党中央会安排他做什么。

过了三天，一位女“交通”带路，他们又转移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个亭子间。三层楼顶，一个小阁楼，只有一个小窗户。

自己烧饭做菜，不得外出。这安排，使徐向前感到在泰安客栈可能暴露了目标，只有进了租界地，才比较保险。外边是印度人当巡警，国民党军警、特务不得随意闯入租界地。在这“保险”地徐向前住了几天，一块从东江来的王和峰等四位同志被分配去了湘鄂西地区，他和桂步蟾每天坐等分配工作。小小亭子间闷热难熬，大小便都得坐马桶，对从战场上滚爬过来的军人，这种生活像在监狱一样难受。其他同志从早到晚走棋子，徐向前只顾看书、看报。他很想“交通”像在九龙那样，送一本《牡丹亭》来，可是白色恐怖的海，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字都不给传。

一天吃过早饭，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由“交通”引进来。说话掩不住广东口音，额头和长相都使人猜出，是广东人。他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见面之前，他已经知道了徐向前的情况与经历。

“你们最后在海丰那边好苦呀！”杨殷开口就提广东，“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我在第六联队，”徐向前说，“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

“你是黄埔几期？”杨殷问。

“第一期。”

于是他们说起黄埔军校的一些事。杨殷是 1922 年加入共产党的，一直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他是领导人之一。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党中央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一些著名的军事干部的履历，都写在他心里。虽然和徐向前没见过面，却也知道这是位军事人才。他问徐向前，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在九龙看过文件，”徐向前笑笑说，“各种决议案都有，包在《牡丹亭》书皮里。

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么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这也是自作聪明，”杨殷说，“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现在

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于是，他们又谈起六大会议精神，谈到六大决议中关于广州暴动的评价。杨殷兴奋地重复着六大决议的一些话：广州起义是伟大的举动，是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是……

徐向前惊叹他的记忆力和口才，除了略带广东音，每句话都扣人心弦。他稳重、成熟，有久经锻炼的政治敏锐，谈问题有理有据，使徐向前十分敬服。杨殷最后告诉徐向前：军委决定，派他同桂步蟾去鄂东北工作。并说，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徐向前听了，不知该说什么。他原想回北方搞兵运，也没想过留在城市，搞地下工作，他认定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他猜想中央可能派他去做军事工作，却没想到去大别山区！

他喜欢山。在他的家乡往北，层层是山，一直绵延到五台山里五个峰。他住黄埔军校，在山凹凹里；广州起义，他参加作战是在越秀山；在东江最后七八个月，每天吃在山里，睡在山里。他和山结了缘。更重要的是，他从东江游击战中领会到山地便于打游击。敌人来了，爬上一个山头，等于多了一个营连的兵力。

“我服从军委的决定。”徐向前不多思考地说，“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杨殷满意徐向前的爽快。又和桂步蟾交谈了几句，站起身，伸出手和徐向前、桂步蟾告别，深情地说：

“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明天就走！”徐向前说。他在这亭子间住腻了，恨不得立刻飞出这鸟笼似的小屋。

杨殷见徐向前急于奔赴战场的举动，十分高兴，最后连说两声：“再见！再见！”

人生交往中，都习惯了“再见”这句道别的话，可是有些人，今天说“再见”，明天、后天或几个月、几年真的再相逢了；

革命人，往往一声“再见”，却永不会见面了。

徐向前和桂步蟾，离开上海两个多月——1929年8月24日，上海地下党发生了一件被叛徒出卖的事件：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在沪西区新闻路613弄经远里12号参加会议，被叛徒白鑫出卖被捕。8月30日，杨殷、彭湃等四人，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旷地英勇就义。

使徐向前更为愤怒的是，叛徒白鑫，曾和徐向前在红四师一块共过事。广州起义失败后在花县改编时，白鑫是十团团团长，徐向前为党代表。刚到一块工作，徐向前对白鑫挺尊重，只是看不惯他的作风，很快又发觉这位团长身上带着很多银元，谈话中一提到女人和吃喝，兴趣特别高。打起仗来不是找不着他，就是他要别人带队冲锋，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共产党员。徐向前曾向师党委提议，这样的人不能当团长，也不配做共产党员。后来他从东江溜回上海，居然混进了江苏省委当军委秘书。这可耻的叛徒，那天借在他家开会的机会，告密出卖了杨殷等党内重要的负责人。

为了保卫上海党组织，惩办叛徒，1929年11月11日上海党中央特科的同志，经过周密安排，在白鑫家门口将其击毙，可耻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着永久的纪念，在徐向前征战的大别山区和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学校，特命名为“彭杨军校”，以彭湃、杨殷的革命精神，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红军干部。

1929年6月初，大别山区春色正浓，徐向前和桂步蟾，来到了黄安县的箭厂河村。他们从上海一路来，先是乘船到武汉，而后又乘车、步行。一路之上，穿过国民党军警层层哨卡，却没遇到多少麻烦。除了他们扮作商人很像，还得力于何玉琳路熟、机灵。他多次从这条路到上海党中央机关汇报，是位出色的“大交通”。一路上，何玉琳不断向徐向前介绍鄂东北历史情况、风俗人情、党政工作、红军的发展。

大别山脉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高峰耸立，雄伟多姿，山山相连，天台山、木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诸峰，拥抱着大别山主峰。历来是兵家征战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大别山与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等齐名。董必武、陈潭秋等一代革命家，是在大别山区最早播下革命火种的人。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1923年大别山下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发展为共产党支部，领导农民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安、麻城等县都有人投奔武汉成为农讲所的学生。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安、麻城地区的共产党员，最先组织农民自卫军武力反抗。1927年11月，黄安、麻城数万农民举行起义，于14日攻占黄安城，活捉伪县长和大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1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了黄安工农政府，推选曹学楷为主席；

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刘光烈为副总指挥（吴光浩兼第二路司令）。黄麻起义，震动了南京、上海、武汉，影响大别山区纵横几百里。

它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后，又一次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

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剩下一部分部队，最后走上井冈山；秋收起义打了败仗，毛泽东收拾余部，最先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尔后又发展、壮大，从井冈山走下来，发展了一支规模最大的红军——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的鄂东军，占领黄安城仅21天，在反革命军队围攻下，弃城突围。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仁志牺牲，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殉职。从黄安突围出来的革命军战士，最后只集合到72人，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戴季英等几位忠诚革命的将领，率领着这70余人，奔向了木兰山。他们虽然不足百人，雄心不灭，自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随后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

徐向前是位谦逊的人。他讲起初期中国革命历史，从来都是把自己摆在“小卒”地位。从50年代，笔者第一次接触徐向前，直至80年代，许多次相见和谈话，提到大别山区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仍总是：“我刚到鄂豫皖是新兵！”在他晚年写成的《历史的回顾》中，有这样的话：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徐向前初到大别山，部队确实很土。村庄都是破旧的草屋，人们衣不掩体。红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外表没多少差别。

没有军服，有的人也没有枪。农村比不上广东的东江，队伍比不上广州起义的红军。

徐向前又和当年刚到广东一样，语言又成了交往中的大难题。他原想，湖北人讲话会比广东话好懂，哪知一进大别山区，仍是个不会本地话的“外乡佬”。最先会见他的，是鄂东北中共特委书记徐朋仁。这位年龄26岁的黄安人，从1926年就领导农民运动，他当过教员，读书识理，讲话有条有理，算是文人呢。他首先欢迎徐向前，接着介绍情况，最后说特委决定徐向前暂任红31师副师长，对外称“副司令”，并说司令员吴光浩牺牲了，但至今没把这消息传出去。

吴光浩，是威震大别山区的赤色英雄。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不曾见过他。听徐朋仁说，他从黄埔军校出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当过连长、营长，黄麻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任鄂东军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在黄安、麻城地区只要提起吴光浩大名，连五岁的娃娃都会知道。由于他从黄麻起义、木兰山游击一直是工农革命军的首领，深受部队信赖，他牺牲的消息若传下去，军心士气会大受影响，说不定有人会马上拉出去找敌人拚命。地主、豪绅和民团，都怕吴光浩，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敌人也会乘机兴风作浪。徐向前完全理解。

这时红三十一师，号称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一个个都和当地农民一样，破旧的衣裤，脚登草鞋或打着赤脚。徐向前高兴而来，面对现实，心中不禁有些发凉。又是一次临危受命啊！一年前，在东江大山里，叶镛师长被俘牺牲，他接替师长，收拾残局，最后几乎全师覆没，被迫撤出东江地区。现在，吴光浩同志刚牺牲，对外、对下层还保守着秘密，又让他来顶替指挥。当副司令也好，副师长也罢，为革命事业，名义他不计较，可是这局面怎么坚持？

幸得师党代表戴克敏是个热心人。他只有23岁，黄安本乡本土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他住过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领导过黄麻起义，当过工农红军鄂东军和第七军的党代表，算是经过风雨的人。他对吴光浩战死极为伤心。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正牌军人一来，戴克敏高兴得孩子似的。从早到晚，陪着徐向前说话，介绍部队的情况。徐向前对他的话听懂大半，能揣摩几分。两个人说不通了，就用笔在纸上写几个字，如人名、地名、难懂的词。

开头几天，戴克敏陪着徐向前到几个大队转。只向大队的干部介绍了这位新来的副师长，向下说是中央新调来的同志，叫“余立仁”。

徐向前到红三十一师不久，6月底，赶上了“李罗会剿”。

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师两个团3000多人，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1600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只好“避强击弱”，率领着一部分红军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选准敌人弱点，连着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吴光浩师长早在一个月前就牺牲了，他们来了位新师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大别山施展军事才干的“头一把火”，烧毁了“李罗会剿”。战士高兴，群众称快，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夺麦收。徐向

前和战士们一块下地，帮助百姓割麦。

人们听说徐司令是从大地方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出身，认定他会写会算，会带兵打仗，只怕不会干庄稼活。哪知这位新长官，拿起镰刀，腰一猫，唰唰几下，一个麦秆就捆起来了。他一边挥镰割麦，一边说说笑笑，动作像老农一样熟练。党代表戴克敏更加从心里对新司令敬重起来。他在一次会上说：“革命军人要能文能武，能工能民，像我们徐司令一样！”

麦收刚过不几天，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刘峙亲自出马，组织湖北、河南两省的军队，发起了“鄂豫会剿”。这位刘将军，曾是黄埔军校的少校战术教官，徐向前该称他“老师”。他不但教徐向前等人伍生学战术，还和徐向前等一块东征打过仗。此人是纯而又纯的“黄埔系”，蒋介石的亲信。任过团长、师长、军长，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率军攻打过武昌城、南昌城。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缩编，第一军编为陆军第一师，刘峙为师长，并兼任徐（州）海（州）“剿共司令”。

这位黄埔的老教官，此时还不曾想到，他当年的学生徐象谦跑来大别山，成了他的对手。

在刘峙统一指挥下，复斗寅的十三师从鄂西奔鄂东；李克帮部和河南的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的五六师由东而西行动，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第一步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第二步分区“清乡”、“搜剿”。

历史发展往往是“学生要比先生强”，不然，历史会倒退或停止不前。徐向前面对他“老师”刘峙的部署，采取了“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率领部队在内线打转转。在白沙关、鹅公山、磨角楼几个地方，抓住战机，突然吃掉敌人一部，然后跳出外线。这时活动在豫南的红三十二师跳过鄂东北来，两支红军会合后，互相配合行动，把敌人搞得不知东南西北，摸不透红军虚实，整天疲于奔命，跟着红军转圈圈。红军和百姓如鱼在水中游，白军行动如鱼离开水。刘峙的指挥部，看到的一份报告有这样的一些话：“红旗红枪弥山皆是，人声、枪声彻夜不绝……军队每到一处，宿营无地，问路无人……”

徐向前和他那支小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中游动了两个多月，把敌人从肥拖瘦，从瘦拖病，从病的拖垮。最后刘峙只得草草收兵。所谓的“鄂豫会剿”，就此完结。这是徐向前这个学生第一次打败“老师”刘峙。

10月初，第三次“会剿”又来了。兴许刘峙认为“杀鸡”不必用“牛刀”，对付小小的红军用不着兴师动众。这次由驻河南信阳的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由驻湖北的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突飞猛进，速战速决。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徐夏会剿”。

“会剿”敌人南路来得快。侦察报告：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一合计，决定在天台山铁子岗一带竹林树丛中埋伏，打它个出奇不备。哪晓得枪一响，敌人不是四五百，而是两个团。徐向前一看要吃大亏，遂命令部队撤退转移。命令刚发出，部队“放羊”了。

初到大别山的徐向前，行军走在前，打仗在前头，退却压后阵。他的许多部下、部将，一说到他的指挥特点，第一句就是：“他，指挥靠前！哪里紧张在哪里！”这次战斗他一个人指挥着撤退，敌人反击上来，部队溃散，他失踪了。党代表戴克敏半天找不见徐向前，心急又恼火，大骂警卫员：“饭

桶！熊包！丢了师长，要杀你的头！”

司令部（师部）的人，个个心急。吴光浩师长牺牲的消息刚刚公布，大家心里窝着悲伤的怒火未息，新来的徐师长又失踪了，大家心急火焚。戴克敏正派人分路去找，急听一声大叫：

“回来了！回来了！”

只见徐向前一瘸一拐走来。浑身泥土，样子甚是狼狈。他一见大家，先问：“同志们都安全吗？”

戴克敏转怒为喜，忙说：“我的妈，你把大家吓死了！怎么回事？”

徐向前平静地说：“就是那回事，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后边没人了，跳到路边树丛一个坑里藏了起来，敌人走过去，我从树丛爬出来，才发现脚崴了，还好嘛，没大事。”他说得轻松、平淡，镇静自若的态度，使党代表和在场的人都惊奇了。

这次伏击战，使徐向前忧喜参半。忧的是，这支队伍应变能力太差，突然遇到敌人，只会跑，不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喜的是，这支队伍溃而不散，跑乱了，又能按行军前规定的集合点，三三两两找来。徐向前想起从前在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北进山东、河北，大部队一被打散，犹如一把沙子撒向河里，再捞不起来了。这就是两种军队的本质。

可是，仗到底怎么打好呢？他每天苦思冥想，找干部们交谈，兵怎么带，游击战怎么打，总得有些规程，有些新的办法。

一天，部队驻在一个村上，中午快开饭时，司令部又突然紧张慌乱起来：徐向前师长又失踪了！

党代表戴克敏跳着脚训斥警卫员。警卫员小吴委屈地哭。

师长总训他每天追着屁股转，叫他平时没事学学文化，少跟师长转。他服从了师长的命令，如今师长丢失，他警卫员是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大家四面出击，村里村外、各个大队、中队寻找徐师长。找了许久，谁都说没见师长。戴克敏真急了，他倒不是怕师长丢了，是要有急事和他商量。警卫员每家每户跑。

他知道师长喜欢串串门，找当地老乡说说话；又爱转到村边山头，看看地形。

小吴找到村边一个没人住的独立家屋，看见徐向前师长正倚着门框静坐，低着头，纳袜底，手边还放着那个总是随身带的本本。

“首长，开饭啦！”小吴找到了徐向前，欣喜地叫着。

“唔！”徐向前应了一声，不抬头，还在做针线活。

“首长呀，党代表找你呀！”小警卫员不提大家寻找师长，他知道若是说了，师长准会发火，说“大惊小怪”。这几乎是徐向前的习惯口头语。

师长找到了，警卫员连忙跑回司令部，向党代表交差。这小鬼和戴克敏从小一个村，有理也敢向他争几句，他见到党代表，装出大刺刺的样子说：“师长怎么会丢呀，他不会开小差，这里也不会有土匪绑票，他……”

“他在什么地方？”党代表一看小老乡那神情，就知道师长找见了。

徐向前走来了。一边围上桌吃饭，一边和党代表说说笑笑。他今天一个人躲在那小屋里，想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游击战和队伍整顿的事。党代表却只认为他躲起来做针线活哩。

由此，戴克敏想到徐向前向他说过，去考黄埔之前，在家结了婚，不到二年妻子死了，从那儿他再没找女人，已经六年多了，缝缝补补全学会了，

只是还没学会生孩子。

谈完工作，戴克敏突然开口：“师长，给你找个老婆吧。”

“好啊！”徐向前知道党代表爱开玩笑，叹声说，“咳！我们这些人，天天枪子下爬，谁肯跟你当寡妇哟！”

话是半玩笑，半真情。徐向前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当少校队长，有几位妙龄的军校女学员，试探着向他讨好，开始他认为自己家中妻子才病死不久，不愿考虑这个问题。

“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他和军校的女生们纷纷各奔他方。广州起义失败、东江艰难的斗争环境，军中虽有若干女同志，那时谁还顾得上个人婚姻大事。大事是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今，来鄂东北不到半年，军队刚发展，一个新来的“外乡佬”找谁去做老婆哟。

徐向前率红军日夜奔走，趁敌一个空隙，跑出包围。然后兵分三路向外出击，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支。红军声威大振，驻黄坡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红军在粉碎敌人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四个大队不足三百人扩大为五个大队七百多人。在 11 月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鄂豫边特委委员；在 12 月举行的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军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创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

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在广州、在九龙以及到鄂东北来，徐向前埋名隐姓，把“徐”字一分为三，改称“余立仁”。1929 年底，他正式恢复了徐姓，改名“向前”。

他不忘幼年老秀才父亲赠给的“象谦”，谐音与“向前”不差多少。他这一改，更深层的含义是：为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要永远向前，向前！

游击战七条原则为法宝，连战皆捷。把迫击炮当废铁筒丢掉，徐向前大叫：“炮，那是炮呀！”

怎么带兵，怎么打仗，这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一大难题。

从黄埔军校入伍五年来，他参加过许多次的作战，失败多于胜利，特别是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的结局，教训极为沉痛。

他来到大别山区之后，终日思索，经常找人交谈，注意探听各地游击战争的情况，认真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他认定游击战是弱小的红军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法宝。可是游击战术又不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呀，应该有几条原则。他经过和戴克敏、曹学楷共同研究，终于提出来了：

-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 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 1929 年底鄂豫边党代表会《军事问题决议案》。红军指战员都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章规。这时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已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可是山高路远，还没传到大别山。徐向前他们在鄂东北山沟游击环境中，能提出七条原则，确是一种创造。它是徐向前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丰碑，也是他参加广州起义以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

党代表戴克敏还提出游击队员要“八会”：会跑、会打、会集、会散、会进、会退、会知、会疑。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这些东西，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它是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的提炼、概括、总结。”“敌强我弱，形势逼人，当年坚持过武装割据的同志，都会记得那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形势，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仅那么点人，几百条枪。

四周都是敌人，凶得很，整天要消灭你，逼得紧，弱小的红军，要生存下去，得解决在强敌面前，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攻击和防御的战术原则问题。达尔文讲过，要‘适应环境’。动物这样，人也是这样。小小的蝴蝶为了免受人和其他动物的伤害，把自己打扮得像花一样，它要生存嘛！红军要生存，要发展，也得‘适应环境’。搞游击战，开始难免吃亏，打些败仗。然而‘吃一堑，长一智’，打来打去，逐渐就有了经验，摸到了点规律性的东西。”

游击战怎么打，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摸出了规律，写入了革命战争的兵法；人民军队的纪律应有哪些条，他们从实践中摸索又写成条文。开始提出：“军人要服从命令”、“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要归公”，“贪污要枪毙”。一位司务长贪了二十元，被查出来，大家气坏了，说这是“喝兵血”，要执行枪决！徐向前和党代表是一师之长，他们一挥手，把那位司务长拉出去枪决了。从这以后，再没人敢贪污一块钱了。

“今天看，贪二十元枪毙，是过份了！”徐向前一次向笔者说，“可是，那时候苦啊！二十块钱不算小数，我们派一桌饭，是给老乡一元钱，借一床被子盖，还要给人家三个铜板哩！军队，就要有严格的纪律、铁的纪律。”

在毛泽东制定的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没有从井冈山传到大别山时，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为红军规定了十条纪律和注意事项：

- 第一、不拿穷人一针一线；
- 第二、不拿穷人粮食；
- 第三、对穷人态度要和蔼；
- 第四、爱护枪不要弄坏；
- 第五、节省子弹勿乱打；
- 第六、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

- 第七、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
- 第八、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
- 第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
- 第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大别山的红军，开始办“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兵工厂只有二三十个工人，支起铁匠炉拉风箱造武器，忙了一个多月，造出支枪打不响，工人泄气了，要撤炉散伙。

徐向前赶去说：

“没关系，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工人们又继续拉风箱打铁。十几天后，终于造出一支打得响的“撒把子”短枪。

医院开办起来了，找来一名中医、一名西医、六名学看护的小姑娘。伤病员住进去，医生处方有的给点草药、土方，有的给鸡蛋一个。

被服厂开工后成效最大，红军干部、战士穿上了统一的灰色军装，戴上八角帽。住进老乡家的红军头天还是长袍、短打，一群兵不兵、民不民的模样，突然变成了服装统一的队伍。徐向前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那年就穿过军装，入黄埔军校后成了正式的军官。

从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广州、九龙、上海扮商人，穿长袍、戴礼帽；来到大别山入乡随俗，一身短打，不兵不民。

现在全师换装，他高兴得新郎似地，找来老乡的一面镜子，对着照了又照。受过正规训练，又长期穿过军服的他，一旦换新装，真是标准的军人！

1930年春天，大别山区的红军，发展到三个师。4月12日，红一军正式成立，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熊受宣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一师；红三十二师改为第二师；红三十三师改编为第三师。另外，还编成一个独立旅。

新军长许继慎，和徐向前一样，既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又是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他二人一见面，却谁都不认识谁。许继慎却从别人口中得知了徐向前的底细。问他：

“你是黄埔一期，几队的？”

“你是黄埔几期、几队？”

“啊，我们不一个队呀！”

军长和副军长一叙旧，两个同学高兴地抱成了团。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比徐向前小一岁，加入共产党却比他早三年。

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和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团长。北伐战争中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攻打武昌的著名战斗。论资历，徐向前比许继慎浅，论游击战的实践经验，许继慎又不如徐向前了。原不相识的黄埔军校同学，在大别山红军中相会，彼此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热。

许继慎性格活泼，嗓门高，爱说笑，他向徐向前说：“在上海，我就听说你来了，这里黄埔同学还有谁？”

徐向前说：“别的师不清楚，一师倪志亮是吧！”

许继慎说：“你们这一年搞得不错，打垮了敌人三次会剿，部队发展了。你老兄出了大力呀！”

徐向前谦虚地忙说：“我有什么！你应该清楚，黄埔学的那些用上的不多。这支队伍全靠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一些同志带领的。老乡们好啊！”

徐向前和许继慎，越说越近乎，越谈越投机。晚上，二人面对面支起门板，躺在铺上仍在说。他们规划着部队的发展，谈着战术原则。一说到游击战，许继慎诚实地讲，他要从头学起。

他还说：我想，再搞它二三年，根据地部队会大变样！

许继慎雄心勃勃，新官上任，一心想创造出些新的成绩，没想到一年以后，张国焘来搞“肃反”，他会成为冤死鬼！这事是后话。

1930年5月，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混战。主战场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反蒋联合阵线集中兵力约70万人，目标指向南京；蒋介石调动总兵力约60万，并亲自坐镇徐州指挥。国民党营垒中的新军阀争权厮杀，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时机。然而，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李立三，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给鄂豫皖边区的任务是：迅速发动武汉周围的地方起义，实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指令红一军切断平汉路，逼近武汉，并准备联合红二军和红六军进攻武汉。

此时，许继慎率领红一军军部和部分武装，去商南、皖西汇合红二师和红三师整编部队去了；徐向前为执行中央的命令，率领红一师奔向平汉线铁路。

“西出平汉铁路，我们去了。”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但是，要打武汉，却没想到。就那么一点力量，怎么个打法！起初想，能打到外线去，搞到一二千条枪就满不错，谁还敢想去打武汉！要不是傻瓜，是不会干那个事的。如果叫一个人背五百斤，背得动吗？背不动，他自然就不背，这是常识。”

平汉路两侧，春色正浓，红军走出山区，来到了平原。徐向前和戴克敏率领红一师，于6月中旬一个夜晚，突然奔袭杨家集车站，一举消灭了川军部汝栋部两个连。连战速决，天亮，敌人援兵出动，红军已远远离开铁路沿线，休息整编去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反复研究着敌情、地形。

他们是游击战术七条原则的创始人，又一块儿游击一年多，大家心心相映：赔本的买卖不做，要打就得打胜仗。正举棋不定，中共孝感县委下属的游击队，派人送来情报：敌人一个团从广水出动，到了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敌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车站进到小河溪。

徐向前当机立断：将主力隐蔽于杨平口以北、滢水岸的傅家湾、新寨一带山地，诱敌上钩，打它个伏击战。

“敌人不来呢？”有人提出。

“请他来嘛！”徐向前微微一笑。

“请！”

徐向前当即命令把特务大队长、政委叫来吩咐一番。深夜，特务大队和孝感县的一部分游击队，向杨平口方向奔去。

6月28日上午，进驻到南平口以南郑家店一带的白军一个团，发现红军游击队进攻，便倾巢出动紧追不舍。红军特务大队边打边退，假装向傅家湾、新寨的山区逃跑。白军不知是计，一直追进一条山谷中。突然四面枪声四起，杀声不绝。徐向前按照计划，把敌人包围、分割成三段。激战四个小时，白军第二十军第四混成旅第四团被消灭一千多人，连团长在内都作了红军的俘虏。

这是徐向前在平汉线上诱敌深入的第一仗！一个漂亮仗。

红军战士喜形于色，正准备继续进攻，打到武汉去，徐向前率领队伍，突然转头向东，向着大别山区的黄安南部开去。

原来这里的反动红枪会、绿枪会、黄枪会乘红军西出平汉线，在背后兴风作浪，烧杀抢掠。红一师来个回马枪，武力加攻心战，很快把反动帮会镇压下去。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再度扑向平汉铁路。攻占祁家湾小车站后，得悉敌钱大钧部教导师第五团驻防花园车站。

这个第五团辖步兵、机枪、炮兵三个营。徐向前知道，教导部队都是“样子兵”，战斗力差。他们的机枪、炮，使徐向前心中发痒了。

“袭击花园，怎么样？”徐向前向政委戴克敏发出倡议。

“好啊！”戴克敏娃娃似的脸，立刻露出笑容。他和徐向前共事近一年，深深觉得打仗徐向前是能手。

时值7月底，天气很热，部队长途行军，疲劳不堪。奔袭作战，是要靠体力的。这时作战能不能取胜，一些干部心里划着个问号。但是，人们都熟悉徐向前的脾气：决心一下，不会轻易改变。

夜色蒙蒙，雷声在远方滚动，像是要有一场大雨，偏偏又不掉雨滴。徐向前一路随部队从青山口开进，心中也怕这次袭击失误。两个多月来，队伍不断打胜仗，伤亡小，缴获多，又不断补充新兵，在这节骨眼上，再打个漂亮仗，那是顺风的船，战士情绪会步步高；万一这一仗打不好，士气和今后的行动将会大受影响。他期待着一个新胜利！

半夜急行军，天快亮，前方距离花园车站不过十几里了，突然从后边传来话：后卫部队掉队，联络不上了。恰似一声炸弹，使徐向前吃了一惊。是前进？还是后退？这个战斗打不打呢？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转。不打，失去了一次夜袭的战机，天快亮了，撤回会暴露目标；打吧，后卫部队上不来，兵力单薄，要以少胜多呀！

部队在路上停了下来。徐向前和政委、参谋长等人蹲在路旁，紧急磋商。有的主张继续前进，坚决打这一仗；多数人表示，不要冒险，后撤，另寻战机。决心正难下，地方游击队一名侦察员跑来报告：昨夜花园镇敌人一个仓库起火，火势挺大，驻在镇里和车站上的白军，前半夜都出动救火了；驻在南街上的白军一个留守连前天撤走了……

情报来得及时，真是雪里送炭！徐向前当即立断：

“打！打！”

“我同意，同意！”政委立即表态。

徐向前分析说：看来，敌人没有戒备，没料到我们会袭击它，不然，不会把一个连调走；另外仓库失火，定影响军心，他们救火忙了半夜，肯定会睡个懒觉，我们按计划行事。队伍一边开进，一边派人与后继部队联络。

大家被徐向前说动了心，一致同意：打这一仗。

特务队，是红一师的一支“小老虎队”。战士个个虎里虎气，干部个个精明强干。

侦察、通讯、摸敌人的岗哨，都得心应手。现在又到了他们显虎威的时候了。一声命令，小老虎们跑步出动了。

天刚亮，东方闪出鱼肚白。守城门的敌军照例开开门，放赶集卖菜、卖柴的老百姓入城。特务队的几名“小老虎”混进城去，不费一枪一弹，把

城门的岗哨收拾了。这时，红军大部队冲杀进去。

花园镇与火车站，顿时枪声大作。敌军有的士兵已起床，正洗脸，不明情况被活捉；有的士兵，昨晚参加仓库救火，还蒙头大睡，被窝里当了俘虏。机枪营的 8 挺重机枪，连枪衣没脱，也成了“俘虏”。战斗仅两个多小时，敌步兵营、机枪营，全被红军收拾掉。

最后只剩下炮营，在敌副团长指挥下，依托李家祠堂顽抗，并向红军和居民乱发炮。徐向前当即下命令，把祠堂四周堆起柴草、棉花，点起大火，连烧加喊话，把最后一伙顽抗的敌军解决。那个负隅顽抗的副团长，葬身在火海中。

花园镇解放了，火车站里一些红军战士东奔西跑看火车头玩。许多从农家出来的战士，不但没坐过火车，连车头什么样都没见过。他们跑着，叫着：“那是火车头呀？”新鲜又奇怪。

徐向前最关心的，是机枪和炮。这次战斗，他心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夺几门炮，搞几挺重机枪。他看见战士们扛着缴来的步枪，抬着夺来的重机枪，兴高采烈出城去。只是不见有人扛炮。

“你们缴到迫击炮没有？”徐向前问一个红军战士。

“什么炮？”战士没听懂。

“迫击炮！”徐向前手比划着。

“没见呀！”有的干部回答。

“见到过哩，”一个小战士比划着说，“那玩艺，这么粗，这么长，这么重，大铁筒筒哩！”

徐向前听了，忙说：“对，那就是迫击炮！”当即命令一个连长，把步枪放下，回头去找迫击炮。

五门迫击炮，终于找回来了。徐向前看着喜，战士瞧着奇怪：这铁筒筒，怎么会是炮呢！当时战士们光知道要步枪、短枪，不懂得要炮、要机关枪。打胜了仗，一人身上背着三四支枪，长的短的都有。战士们不要机关枪、把枪身、枪鞍、枪架全拆了。徐向前也是第一次见到水机关枪，不会摆弄，找些俘虏的班、排长来，让他们装配好，当老师。从此，有了自己的重机枪手和炮兵。

花园镇战斗后，红军又大破了铁路，让铁路翻身，火车不通。为此，震动了武汉，也震动了南京，更唤起了民众。徐向前率红一师撤离铁路线，许多青年人纷纷要求当红军，几天的功夫，红一师扩大到三千多人。又进行了整编，将部队编成两个步兵团，一个机炮混成团。

从 6 月到 8 月，徐向前亲率红一师，西出平汉线，首战杨家集车站，接着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杨坪口伏击；再攻花园车站。一个月内，三战三捷消灭敌人三千多人。

有一首歌谣，唱出了徐向前率领红军出击平汉线三战三捷的情景：

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威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1929 年和 1930 年，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和胜利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原因在于：

第一，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和敌人统治薄弱环节，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坚持了工农武装割据

的道路。

第二，建军思想比较实际对头，并初步形成了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

第三，加强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关系比较正常。尤其是鄂豫皖特委的成立和关于统编红军的决定，意义重大，对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15

“棺材地炮”轰开新集城。双桥镇活捉敌师长岳维峻。这位“老上司”对徐向前说：“惭愧，惭愧！”

“鸡鸣狗叫惊三省”——这是人们形容新集城的位置。它坐落在河南、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属河南省。1931年2月初，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徐向前领兵来到新集城下。

这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编为红四军。徐向前由红一军副军长兼十师师长，改任为红四军参谋长。他随同红十师这支一手培育发展起来的老部队，围城苦战。由于城墙坚固，守敌拚死顽抗，红军连攻三次未能奏效。主攻团伤亡人数不少。黑夜，敌人在城墙上点起灯笼火把，得意地大喊狂叫。城里守敌虽然不过千余人，却极端顽固。鄂、豫、皖三省的边陲地带一些逃亡地主豪绅，结成联盟，纠集反共的“红枪会”、“黄枪会”、“蹦子会”和保安团，依仗城池坚固，死守待援。

攻城不下，主攻团的干部战士心急眼红。第四次组织“敢死队”，喝血酒，备云梯，准备再次登城。团长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老战士，个头高大，勇猛过人。他要亲自带领突击连爬城。

并宣誓似地说：“攻不破新集我不姓王！”

徐向前听说忙赶去，风趣地向王团长说，“同志呀，敌人不会因为你改姓，就大开城门欢迎呀！”

“攻进城去，要杀它个鸡犬不留！”有的连长愤愤地说。

“那，你这个连长要撤职啊！”徐向前严肃地说。“打仗，要勇敢加开动脑筋，你们拚命、发狠、骂大街，屁用没有。”

他批评了干部中产生的急躁情绪。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休整。然后，和一些干部战士研究对策。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徐向前很相信这话。办法很快有了：挖坑道，下炸药，轰开城墙。他们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开始选择地点挖坑道。新任的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都是新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对这个地区和部队的情况不熟，仗怎么打，工作怎么做，他们都尊重徐向前和当地干部的意见。

坑道的起点，选定在城北距离城墙五六十公尺的一个山沟沟旁边，沟前是个小坡，正好隐蔽自己，挡着敌人视线。红军战士多是种地的农家子弟，新兵打仗外行，挖土却是能手。一个班、一个班轮流上阵。寒冬天，滴水结冰，战士们却个个满头流汗，有的人赤着膀子挖土。土塌下来，找来门板用

粗木柱顶上。几天几夜，一条长五十多公尺的秘密地道，通到了城墙底下。地道一人多高，宽能拉进去马车。马车没进去，却抬进去两口大棺材。战士们进进出出，把一包包火药装入棺材，又装入迫击炮弹和从老乡家搜集来的碎铜烂铁。棺材装满了，盖好盖，用七寸的铁钉从外边死死钉住，外面再加上五道铁箍，最后把一大把引爆的导火线，从棺材头前钻好的小洞插进。

谁也说不出来，这叫什么装置、什么武器。徐向前和一些指挥员最后进坑道检查，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啊，这门炮就叫‘棺材大炮’吧！”

徐向前读书多，有时倒爱咬文嚼字，他说：“应叫‘地炮’。”

“好，‘地炮’！”

“棺材地炮！”

军事指挥员们此时像儿时游戏，说说笑笑。徐向前一次向笔者说：红军初期，近似印地安人用弓箭、长矛，还用榆木树造炮，石灰罐子当烟幕弹。有的红军还搞什么“火牛阵”、“火鸡阵”，把牛尾巴、鸡身上沾些煤油，燃起来向敌人那边飞、跑。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记述了“棺材地炮”轰新集城的情形：

“……新集三面环山，东临潢河，城墙高两丈余，全部用长方岩石砌成，易守难攻。”“我们将新集包围后，以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围攻一个星期，强攻难下，有些伤亡。”“我们令部队利用城北门外的小店掩护，秘密挖了四五十米长的坑道接近城墙，然后把几百斤炸药塞到棺材里，推进坑道引爆。一声巨响，敌人的寨墙被炸塌一截，成了斜坡，部队沿坡而上，冲进城内与敌巷战，经三个多小时的逐屋争夺，全歼守敌千余人。”“从此，解除了我根据地的一大心腹之患，打通了鄂豫边和商南根据地的路线，新集也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中心、首府。”

新集，这闻名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小城，自从成了鄂豫皖边区的首府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这里举行过许多会议和政治活动。这里办起了规模空前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医院、小学和干部学校；设立了“列宁号”飞机场。不过，徐向前住这里的时间很短。打下新集之后，过罢春节，他马不停蹄，又和红四军其他领导人率军西出平汉线了。

天降大雪，平汉路上的铁轨，被掩埋在深雪里。红军一路夜袭李家集火车站；一路截获兵车一列，全歼车上敌军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另一路袭击柳林火车站，歼敌一个营，击溃敌两个团。西出平汉线，共歼敌两千多人。被俘的敌人一个团长连声称赞：“贵军神兵天降，神兵天降！”

徐向前和红四军的“神兵”，并没就此结束行程，接着逼近信阳，迫使敌人就范。

此时，敌军云集，开始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六师集结信阳，令该师三十八旅、骑一师和三十一师之九十一旅、第二十路军、六十三旅等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应钦指挥新编第二旅守广水，令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令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

敌人的企图，摆在徐向前参谋长的地图上，一步步显示出来。徐向前每时每刻不离作战室，不离地图，手下紧紧掌握着特务大队中的一个侦察分队。参谋长的职责，是做好主要指挥官的助手和参谋。然而，徐向前此时在红四军军长、政委的心目中，是指挥部的关键人物。他情况熟，对敌人番号、

作战特点、主官姓名和爱好，都如数家珍记在心中；他对红军各部队摸得透，团以上甚至许多营连干部都熟悉，能呼出名，了解其特点和性格；再就是地形熟悉，平汉线花园这一带，已是他第三次领兵征战地了。

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红四军指挥部形成：吃掉岳维峻和他率领的三十四师！

是命运之神作怪，还是历史的巧合？岳维峻原是徐向前在国民二军时期的“老上司”。

这位岳师长，可谓是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任国民二军军长。蒋介石不重用他，他总想找个机会立下个战功。机会来了，他接到命令“围剿”大别山区的红军，便亲自率领部队出征。行军速度之快，求战之急，是少有的。3月8日孤军冒进到双桥镇。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灈水。是红军和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岳维峻率三十四师进入双桥镇为中心的地带，正举棋不定，红军突然发起进攻，夜晚冒着雨开进，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并占领双桥镇东南方向的小葵山和西南的尖鸡岗。岳维峻先是顽抗，要求上边派飞机助战，飞机来了投弹轰炸，无济于事；岳维峻又亲自指挥两个团向红军反扑，争夺制高点。战斗十分激烈。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叙了当时的激战：

“……大白天，我们站在山头上，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扑上来，我军反击下去；阵地被敌夺去，又被我夺回，敌我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格斗，扭成一团。我们的部队真英勇，发挥了近战歼敌的战术特长和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干部带头冲锋、肉搏，伤亡再大都不打退堂鼓，我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个硬仗，鏖战几个小时，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我们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我分割全歼，结束战斗。经七个多小时，我军毙敌千人，俘敌五千多人，缴枪六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十多门。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三十四师（一个师部、两个旅、四个团、一个山炮营、两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敌师长岳维峻的马弃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

大别山红军，头一次打这么大的歼灭战，捉到敌师长，从上到下，兴奋极了。战场上欢声笑语，用枪声代替鞭炮，庆祝胜利；四乡百姓，成千上万纷纷涌向双桥镇凑热闹，赤卫队员们原来是手持大刀、长矛参战的，这时也“鸟枪换炮”，换了新武器。徐向前听说敌师长被活捉，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走到附近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岳维峻。

已是黄昏时分，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着岳维峻。这位师长当了俘虏，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他虽然在逃跑时伪装为士兵，但肥胖的身体和那福相脸，使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他。一点不错，他正是徐向前五年前的顶头上司。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岳维峻蹲在地上，喃喃地说。“我要见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在一条长木凳坐下来。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看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红军，瘦高个头，身披灰大衣，佩一支小手枪在皮带上。红军服装一律，长官和士兵不分，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官越高，手枪越精巧。岳维峻却认不出问话的人是他的老部

下。

“请坐吧，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一只手遮着灯光，向徐向前上下打量着，似乎见过，却又认不出是谁，更不知姓名。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徐向前说。

岳维峻呆呆地望着。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有在北伐军中干过的，有在国民二军任过职的。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一些名将都是在军事情报中常看见的大名，只是不认识面前这位是何人了！

“五年前，你在国民二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六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六混成旅当过参谋呢？”徐向前不隐讳地说。

“啊，老同事，老同事……”岳维峻惊喜地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不得了。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暗暗发笑，什么老同事，应该说是“老下级”呢。打了大胜仗，使徐向前开心，捉住了他的老军长，让他感到自豪。

他想从敌军指挥官口中，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问题，便向岳维峻“请教”说：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此时此刻，岳维峻可能记得了，五年前在河南安阳，一个广东黄埔军校来的小军官，分在他军中的第六混成旅任参谋。

那时，他是威严的军长，一呼百应，一个命令全军动作，他没有机会和必要，同旅里的一位小参谋人员交谈。没想到五年后的今天，他败在了这位小参谋的手下呀！他连说“惭愧”，倒是诚实的态度。

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什么，只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头脑中闪出利用岳维峻的念头，但不是马上要谈判的问题。他站起身，向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楚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作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说：“是，是的，请……”

他还想多和徐向前谈谈，叙叙旧情，徐向前一无心思二无时间，匆匆离去。

双桥镇大捷，宣告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红军第一次“围剿”彻底破产。敌军纷纷后撤，红军乘机扩大根据地。根据地人口达二百万，红军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

从此，在大别山区和红军中，流传一个故事——徐向前活捉了“老上司”。关于岳维峻最终的下场，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留下一笔：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二十万套军装。

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十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中国的元帅，徐向前是第一个指挥空军的。他的“空军”却只有一架“列宁号”

一位红四方面军的老将军——徐向前部下的参谋，向笔者讲述历史，叙述徐向前的军事指挥艺术，忽然停住话，问：

“你们晓得吗？大别山红军是有飞机的啊，徐帅是中国十大元帅中，第一个指挥空军的嘛！”

“飞机？红军有空军？”笔者愕然。

“那空军，只有一架飞机，”老将军放声大笑，“还是一架教练机！”

故事，又从1927年说起：从黄麻起义，大别山里就诞生了工农红军。它在凄风苦雨里，吮着大别山人民的乳汁，渐渐成长。徐向前刚来大别山区前，红军钢枪都很少，使用的多是大刀、长矛、红缨枪。后来仗打多了，缴来枪炮多起来，1930年竟然得到一架飞机！

那是3月16日，宣化店上空，一架飞机转了几个圈，翅膀一歪落在陈家河一个河滩上。

山沟沟的人常听飞机头上嗡嗡，谁也没看见过飞机啥样；红军战士，常挨国民党军飞机扫射、轰炸，恨得在地上咬牙。现在，一架飞机自己落下来了，真是天外的喜事。红军、赤卫队和老少乡亲，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河滩。

飞机里爬出个人，摇着白毛巾投降。原来是一架德国双翼容克式高级教练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军用飞机，从南京飞往四川，飞行员迷了航，飞机上的汽油耗光了，只得落下来。

徐向前和红军领导人得到消息，都喜出望外。他们立刻下了道命令：一定要把飞机保护好，对飞行员实行优待政策，绝对不准伤害。

这时，红军正大发展。鄂豫边有红三十一师；豫东南有红三十二师；皖西有红三十三师。中共中央在上海决定，把三个区的红军合编为一个军，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合为鄂豫皖特区，并建立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鄂豫皖特委。这就开始了以大别山为依托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统一建设。

徐向前这时虽不在军队的最高领导地位，只是红一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他却常常从全局考虑，向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主要领导人，提出建议和意见。一天，红一军讨论整编工作，大家说到红军与苏区建设，不知是哪一位，又记起那架迫落在宣化店地区的飞机，半开玩笑说：

“把那架小飞机装备起来，成立空军怎么样？”

“哈哈……”会场上一阵大笑。

笑过之后，徐向前说话了：“我想过，造个飞机场，找关系去白区买些汽油，让飞机上天！飞去南京、飞去武汉，吓吓敌人，撒撒传单宣传品也好啊！”

年轻人都有股新奇劲。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都异口同声，要让那架飞机飞起来。大家你一言，他一语，议论起建立空军的工作。

半年多后，红军攻占新集城，这里成了鄂豫皖特委的首府。那架容克高级教练机起运去新集了。

水上行船容易，陆地走飞机却难了。从飞机迫降地到新集，路上要翻山越岭。飞行员龙文广一路跟着行走，总是叹气摇头，他说要是把飞机从山路上拖过去，会是一堆废铁。他没想到，红军和根据地的老百姓心齐，智慧高，一步一步地移，几十人轮换抬，终于把飞机移到了新集城外的平地上。飞机没碰破一块皮，零件也没少一个。

红军战士高兴地说：“嘿，我们有飞机了！”有人皱皱眉头，说：它是聋子耳朵，好看不好用呢。人们正议论纷纷，徐向前和军部的几位指挥员来了。他们围着飞机，看了又看，也眉开眼笑。有人问飞行员：

“它还能飞起来吗？”

“没汽油呀！”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擦着手上的油说：“它还好，只是没油了。”

汽油、机油都缺。”

“这宝贝，只喝汽油，不喝水，”有人开玩笑说，“要是喝水，大别山有的是泉水！”

“想想办法，去搞汽油嘛！”徐向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一定要搞些油来，让它飞！”

听的人都以为徐向前是跟着开玩笑。说得轻巧，在这穷山涧涧里，泉水到处流，哪里搞汽油来哟！

飞行员龙文广，是1927年国共合作时，去苏联学的飞行。

他知道中国的红军和苏联的红军差不多。他不相信白军说的，“共产党共产共妻”，更不信“红军是红眼绿鼻子”，他当了俘虏，看见红军待他好，见红军指挥员有本事，老百姓一个心眼跟着红军闹革命，他心上佩服。只是不相信红军能“办航空”。

他嘴上不说，心里说可没那么容易，要机场，要气象台，要汽油，要地勤人员，红军一样都没有啊！

有人又问龙文广：“要是搞来汽油，你真能叫它飞？”

龙文广说：“还要有机场。”

徐向前说：“机场好办嘛，这块地修修平平，不就是机场嘛。”

“还要……”龙文广想说要很多条件，他见红军指挥员一个个看着他，话咽了回去，说：“最要紧的是汽油。”

飞机没汽油喝，真像聋子耳朵，摆在那里，一点用也没有。

龙文广受到热情的招待。他不知道，红军到底怎么处理他和那架飞机。一天，他忽然听说，汽油快搞来了，又过了些天，红军一个干部和他谈话，说要准备办航空局，命令他当局长。龙文广简直像在梦里。他半信半疑，想看看红军怎么办这个“航空局”。

国民党军对红区实行封锁政策：去大别山区的一切行人都要检查，一箱火柴都不准运出；西药、食品、衣服、白布，几乎都是禁运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就在上海，在上海、武汉、南京哪个城市、哪个行业中，都有共产党员在“地下”活动。

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给大别山区那架飞机找油、买零件费尽了心思。

奇迹终于出现，飞行员龙文广要的一切：汽油、高级润滑油、小零

件等等，像会飞似的，从上海、从南京、从武汉等地运来了，而且完全是合格的。龙文广深深感到，共产党太神通广大，红军比国民党的川军办法多得多。

徐向前为这架飞机起飞，为办“航空局”，花了不少心血。

他操办过派人去白区买汽油，操办过机场的事，还参加议论过给飞机取名。飞机翅膀上刷写出三个耀眼夺目的大字：“列宁号”！

红军连队俱乐部称“列宁室”，根据地内有“列宁小学”，现在又出了“列宁号”飞机，真叫人听了高兴。红军和老百姓都看着喜欢。纷纷传说：“‘列宁号’要飞了！”

“列宁号”准备起飞时，徐向前已升为红四军军长。他率领红军主力，在前线作战，问从后方来人：“列宁号”怎么还不飞呀？有人告诉他：快了，快能飞了。

其实，徐向前关心“列宁号”的命运，不是想着它参战。他知道，一架飞机，又是架教练机，就是飞起来，也只能壮壮红军的威风，说明根据地样样都会建设。他一向把红军的胜利，寄托在与敌人斗智和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上。

一个晴朗的天，万里无云。新集城上空，突然飞起了“列宁号”。它像一只鹰，在蓝天上飞，在晴空中盘旋。这桩新奇的事，把四乡的人民，把红军的队伍轰动了。人们看见红军自己的飞机，有的喊，有的叫，有人落泪了。飞机在天上飞，人们在地上纷纷喊叫：

“快看呀！它飞得多高！”

“……它歪歪头了，歪歪翅膀了……”

“它叫啥名来？……”

“‘列宁号’！看，那翅膀上的大字……”

“上头坐的什么人呀？……”

“……兴许是徐军长吧！只有他才敢呀……”

“……会不会飞跑呀……”

徐向前有没有坐过这架飞机，说法不一。有的说他肯定坐过，飞过；有的说，他没坐过。80年代一天，笔者听徐向前元帅说起那架飞机的故事，问他：

“徐帅，你坐没坐过‘列宁号’？有人说你坐过。”

徐向前说：“我上去过，参观驾驶舱坐了一下，可没坐着飞上天。我也不允许别人上去飞，怕被飞跑了。有一次我在前线，听说一个政治委员掂着手枪，坐在飞行员后边，飞去了武汉哩！让飞机撒传单去，它要是飞跑不再回红区，那位老兄就和龙文广同归于尽！”徐向前说着笑开了。“那时都是勇敢分子，不怕死嘛！”

是哪位政治委员掂着手枪，坐在龙文广背后飞去武汉上空的，已无法彻底搞清楚，有一点历史事实，是有文字可查的：

1931年8月9日傍晚，“列宁号”确实飞临武汉上空进行侦察和示威，闹得武汉一片惊慌，国民党当局夜晚实行灯火管制和防空准备。《扫荡报》曾披露这样的话：“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曾连续骚扰满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蒋介石调动大军围攻大别山区红军时，敌军多次想夺去那架“列宁号”飞机。关于“列宁号”飞机参战的事，也有文字记载。徐向前的老部下秦基伟（90年代中国的国防

部长)在《故乡的战斗》一篇回忆录中,记述着:

“.....在一场大雪之后的一个晴天,我们的飞机果然出动了。大家高兴得简直坐卧不宁。有人兴奋地向飞机喊着‘同志,辛苦啦,下来休息一会再下蛋吧!’有的人嘱咐似地说:‘同志,要下准啊!叫他们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有的人把帽子、手帕丢上天空;有的人竟跟着飞机跑起来。大家都站在山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飞翔天空的红军第一架飞机。过去,当我们听到飞机声音的时候,感到是那样刺耳,可是今年听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声音,是那样悦耳和舒心。《星火燎原》第二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飞机在黄安城上空盘旋着,敌人却越来越多地涌向几块空地。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落下几颗炸弹。顿时传来了一片隆隆的爆炸声,黄安城烟雾弥漫着。烟雾消散以后,还可见到有些敌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飞机出神.....”

在“列宁号”准备投入战场撒传单前,徐向前曾命令“航空局”,准备些炸弹。这使他们为难了。这是架教练机,没挂炸弹的装置,再说刚刚学会造手榴弹,哪里去搞飞机炸弹?这时红军有个“兵工厂”,也是徐向前来大别山后才创办起的。只有20多人,多是铁匠、木匠,开始仿造枪一个多月造出支“撇把子”还打不响,后来多次试验才成功了,并开始造手榴弹。

“航空局”派人到了“兵工厂”,一说要炸弹,工人们都一口答应试试。他们说有一枚拣来的敌机投下的“臭弹”,说不定修理一下会响。几个能工巧匠,研究着把“臭弹”给治好了。另外,又送给“列宁号”一些自造的手榴弹,捆绑在复活的“臭弹”上,既作为发火辅助之力,又加大炸弹的威力。

这就是“列宁号”投入黄安城的“炸弹”。

这就是徐向前和红军战友们指挥的“空军”!

“列宁号”飞机虽然只在黄安城上空闹了一下,飞向武汉示威一次,南京、武汉城里的敌人却总是怀疑惊恐:共产党的红军怎么会有飞机呢?

红军的许多老战士,回忆起大别山的革命斗争,都不忘“列宁号”。它虽然飞了几次停飞了,可是,它在红军战士心上高高飞翔。大别山到处传说着“列宁号”的事,还传说着徐向前坐“列宁号”上天的故事。它需要汽油,油的来源中断;它需要更换零件,零件搞不到。后来敌人又大规模疯狂围攻大别山,红军主力转移去外线作战,“列宁号”飞不起,抬不走,人们只得把它埋藏在山沟里。敌人终于找到了它,作为战利品,把它挖走了,说缴获共军“列宁号”是特大的胜利。

“列宁号”永远在大别山人民心中飞!

黄安城欢声雷动。四大战役出奇兵,徐向前威震中原

黄安县,在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白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

成为红安。

徐向前把黄安说成“家”，这里不仅是他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起点，也是他妻子程训宣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每当红安县来人，他总是挤出时间接见。他知道笔者到大别山、红安地区访问过，谈话中常常像拉家常一样，说过去，论当今。他曾经满怀深情地向笔者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黄麻武装起义，攻打县城的农军从这里集合出发。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又是在七里坪。

七里坪镇上，最早出现了一条“列宁街”，一所“列宁小学”。1931年11月7日，两万多红军和数万群众赤卫队、妇女团、儿童团，一大早就排列在镇西门外河滩上。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红四方面军成立。清澈见底的倒水河，湍湍流动。

红旗、战马、刀枪的影子，映入河面。年仅30岁的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天格外精神焕发。他身穿洗得平平整整的灰色军服，外披一件深褐色大衣，和新到大别山区不久的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骑马检阅了红军。王树声这位农民出身的阅兵总指挥，从没进过军事学校，没见过正规的阅兵式，他却从徐向前、曾中生等名牌军校出身的人那里，领会了阅兵的一套规程，把这天的阅兵指挥得庄严、热烈、井井有序。此时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六个师三万余人；地方赤卫军共十五个师人数约两万之众。

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来了。特别受人注目的是张国焘。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共产党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5月初，当张国焘刚踏进鄂豫皖边区大门时，红军中一些领导人怀着敬仰而又疑虑的心情，迎接这位中央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毫不掩饰地写下他刚进大别山的情景：《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出版。

“……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焘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的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能全权代表中央，此来是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

徐向前对张国焘以及沈泽民、陈昌浩等领导人的到来，心里是高兴的。他眼看着苏区与红军大发展，深知自己难以驾驭这个局面，由党中央派高层领导人坐镇，感到今后好办了。他知道这位张主席经历不凡，北京大学学生，领导过学生运动；

1921年和陈独秀、李大钊齐名在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曾被聘请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在武汉时期与徐向前有过一面之识。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区半年后，才和徐向前见面。张国焘见到徐向前后，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评价：

“……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从此之后六年多，徐向前是在张国焘领导下，征战大别山、大巴山和雪山草地，曲曲折折，发生了一桩桩令他困惑、难堪和痛苦的事。

1931年秋季来临，大别山区老百姓正兴高采烈忙秋收，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

新任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发动了黄安战役。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

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敌人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军六十九师两个旅四个团防守城市，另有四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

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又以主力三个师，包围了黄安城……”

“我军经过十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敌曾两次前来增援，都被我军击退……”

“一天拂晓，敌人集中全部的兵力，趁我一个前卫排一时的疏忽，突破了我军阵地……”

“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响得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

“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唯有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了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

“……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

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

《故乡的战斗》，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徐向前就是这样，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四十三天，最后一举攻破。黄安战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

黄安城乡在欢庆胜利，北线敌军正不知红军动向，徐向前挥戈北上，发动了第二个战役——商城和潢川战役。

商城和潢川均为豫东南军事重镇，是国民党围攻红军重要的屯兵之地。敌第十二师驻潢川城区，第二师和独三十三旅布置在亚港东南商潢公路上；敌五十八师和四十五师等驻商城和以北的固始地区。关于商潢战役的经过，

徐向前在《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一文中写道：《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黄安大捷之后，我军挥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1932年1月19日，在亚港地区击溃敌二、十二、七十五、七十六四个师二十余团沿潢商公路增援。这时，敌人兵力虽大大超过我军，但敌正在运动之中，且不少已遭到严重打击；我军则连战皆捷，士气高涨。

于是我军就在豆腐店地区布好阵地，迎击援敌。

我军冒着漫天大雪，踏着遍地泥泞，正面冲击，侧翼包抄，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北逃，两千多人当了俘虏。困守商城之五十八师见援兵溃败，亦恐慌南窜，我军乃不战而收复商城。”

徐向前指挥的这次战役，搞得敌人昏头转向，不知红军从哪里杀出来的，蒋介石大骂第二师师长汤恩伯无能，气恼之下把他撤了职。

潢川战役还没完全结束，徐向前和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又开始计划了新的战役，这就是：苏家埠战役。

苏家埠是安徽西部一个大镇。正当红军在河南境内围攻固始之际，敌四十六师占了苏家埠、青山镇一带，准备向红军发动攻势。徐向前没等敌人围攻上来，提出作战方案：继续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几个点上，吸引援兵，在运动中歼其一部，然后再吃掉“点”上的敌人。这一方案得到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后，徐向前率红军立即出皖西，日夜兼程东进。3月22日渡过淝河，几经穿插作战，将敌四十六师等部六千多人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韩摆渡几个据点。

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频频向蒋介石告急、求援。4月下旬，蒋介石委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三个师共十五团约两万多人，从台肥等地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方向。

敌人援兵来势凶猛，这是未料到的事，于是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压下淝河‘放鸭子’。打仗要想困难的一面，不能只想胜利的一面，把不利条件，有利条件，败的可能性，胜的可能性，通通估计清楚，才好下决心。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

深夜，在距离苏家埠不远的小村里，红四方面军决策人的会议正举行。徐向前端着小烟袋锅，冷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有人主张打，坚决打到底；有人提出后撤。一双双眼睛，情不自禁地看看张国焘主席。

“打下去呢？还是不打下去！”张国焘声音缓和，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我们已经取得了大胜利，当然，应再接再厉，可是呀，敌人来势猛啊！我们就这么大的胃能装下去吗？哎！大家再深思深思。当然，我向来是主张一鼓作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者的军事斗争，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徐向前听过张国焘多次讲话，他的语调总是这样，含而不露，让你猜测、领悟，还常常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这也许就是领袖人物的风格。徐向前爱单刀直入，他经过思索认定的问题，从不拐弯抹角，明确地说出来。他把烟袋锅向地上磕磕，站起身拿一根小竹竿，在地图上指划了一番敌人动向，最后略略提高嗓门说：

“我的意见，打！打！一鼓作气打下去！”

这声音，使全场震动。许多人以为张国焘主席已表示不想再打了，会议正按最高领导的示意进行，没想到徐向前总指挥唱上反调，而且语气坚决。大家静心听徐总指挥的陈述：

“敌军虽多，但战斗力并不强，除第七师没和我们交过战，其他三个师都曾遭到红军打击，里边有我们放过去的俘虏兵，士气是不高的，它又是远道而来，疲劳之师；我军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士气高昂。这里是丘陵地带，更利于我们发挥野战、近战的长处。如果撤退，助长敌人气焰，后果是不利的。”

“我同意向前同志的意见，”政治委员陈昌浩发言了。他年仅 25 岁，是少壮派的脾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虽然没有多少领兵作战的实践经验，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口才好，善演讲，是半年前随张国焘从党中央来鄂豫皖边区的，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他的职位和某种吸引力，使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最后包括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都同意了打的作战方案。

红军第二师和十一师各留一个团，围困苏家埠；七十三师连夜布阵在六安县城以西的樊道桥一线，构筑工事，准备迎敌；十师和十一师主力设伏两翼，准备伺机迂回包抄。

为使敌援军上钩，徐向前特令七十三师一个营和六安县独立团，深入陡拔河以东的地区，装作抗击，边打边退，诱敌步步紧逼。一盘绝妙的棋，就这样摆好了。

5月2日，敌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冒雨突过陡拔河。

此时，天公作美，大雨倾盆而下，河水猛涨，敌军前进不得，后退困难。徐向前心中大喜：天助我也！趁此机会向红军发出命令：“出击！”

设伏在陡拔河两岸的部队，突然跳出阵地，不顾雨淋和寒冷，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包抄过去。敌军在大雨中挣扎，陡拔河两岸，混战一团。先头过河的敌军遭到打击，慌忙后退，纷纷落水；没过河的部队，见此情景，连忙抢占老牛口、婆山岭，企图顽抗。以逸待劳的红军，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一股作气，把敌人分割包围、个个击破。战斗到傍晚，将敌两万多人全部歼灭。

敌军“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还正在村中躲雨，一群红军战士冲到他面前。这位长官，脾气大，眼神不好，他成俘虏了还大骂着：“混蛋，混蛋，你们是哪部分，敢闯我的指挥部！我……”

他要拔手枪！

“缴枪不杀！”红军战士吼叫着，夺下厉式鼎的手枪。

“你们要造反呀！”厉式鼎以为他手下的人叛变了，仍泼口大骂。

这位糊涂指挥官，最后才完全明白过来，他的部队已经彻底垮了。他垂头丧气，双手抱着脑袋。他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败得这么快，这么惨！

徐向前本来有个习惯，每捉住敌军大官，都要会见一下，谈谈情况，验证一下自己的分析、判断，以便总结指挥经验。现在，他却没这闲心。那边苏家埠、韩摆渡还有两大堆敌人，等着收拾呢。

徐向前骑马飞奔，又来到苏家埠外围一个村庄。他虽然披一件大披衣，全身还是湿透了。警卫员抱进一捆柴点着，拉他坐下烤烤火，只有这办法，没有换的衣服。徐向前手一摆说：

“天不冷，烤什么火呀，身子一会儿就把衣服暖干了。快把电话接通前沿团指挥所！”

“接哪个团？”参谋忙问。此时包围苏家埠、韩摆渡的有好几个团。

“哪一个都行。”徐向前说。他指挥打仗，常常直接靠近前沿团指挥所。有时为了掌握敌人动向，把电话要到团队。

电话中，传来前沿第十师一个团的指挥员的声音：“报告总指挥，敌人三次突围，都被我们堵回去了。”

徐向前问：“苏家埠敌人现在怎么样？”

“他们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尿包了。树叶、树皮都当饭吃了。昨夜，从壕沟那边爬过来三四个兵，向我们讨饭吃哩……”

“你们要向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徐向前对着话筒大声说，“告诉他们，顽抗死路一条，厉式鼎被活捉了！”

在战场上，徐向前向来重视开展政治攻势。他认为，此时是开展政治攻心最好的时机，遂命令政治工作人员，尽快从被俘的援兵中找几个人，让他们到前沿喊话送信，攻心为上。

一场攻心战，在苏家埠四周展开。

红军战士用铁筒喇叭高喊：“白军弟兄们，快投降吧，穷人不打穷人，不要替地主、军阀卖命了……”

俘虏兵拉着嗓子高喊：“我们从合肥来的援兵，都被红军打垮了！总指挥都被红军捉住了！弟兄们呀，别抵抗了！红军不杀人，给好吃的饭……”

奇迹，又非奇迹出现了：5月8日苏家埠敌军指挥部，派人送出信来，说准备投降。

王宏坤在《苏家埠四十八天》一文中记述了敌人最后投降的情景：《苏家埠四十八天》，见《星火燎原》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下午两点多钟，敌旅长带着团以上军官来到我们师部——那座祠堂里，依照官级大小，低头排列在屋檐下。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的部队，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并宣布了四项条件：第一，不准破坏武器；第二，枪支捆扎好以后，按照部队序列，挨次交出；第三，军官全部集合，各连由师爷负责办理缴枪事宜；第四，部队按指定地区集结，不准乱跑，不准抢劫……”

“……我们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来慰问我们。四十多天以来，这些新区的群众已经和我们相处得很熟了。

“这时候，得到消息说，韩摆渡的敌人，也因为援兵被歼，缴枪了。我们出击皖西的战役，全部胜利结束了！”

四十八个日日夜夜，徐向前和他的战友们，熬红了眼，走肿了脚，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战果辉煌啊！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一名、旅长五名、团长十二名；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多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五部，其他军用品堆积如山。

红四方面军的战将们，齐集在总部驻的一个祠堂里。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召集大家又在部署新的战役。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第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第十二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等人，先后到来。最活跃的人物，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是陈赓。他们一个爱唱歌，喊几嗓门京戏；一个爱说笑话。把“死人说话、哭者说笑”的

陈赓，又在人们中讲着他的新笑话。空前的大胜利，使这些战将们变得像孩子似的天真。一阵说笑过后，大家又严肃起来，绷着脸，瞪大眼，看着地图，听总指挥徐向前讲下一个战役的设想：挥师西进豫南，在潢川、光山地区，再打个大仗。

红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作战期间，敌二十路军进驻到潢川，趁机南犯，占领双柳树、仁和集地区，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徐向前决心在那里发起第四次战役。会议讨论很热烈，没有反对的意见。前三个战役的胜利，使人们认识到徐总指挥是可以信赖的。此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又不在现场，大家说话更无多少顾虑了。苏家埠战役的结局，证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远不如徐向前英明。

5月下旬，正当红军西进路上，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发来一份贺电，祝贺苏家埠战役的伟大胜利。电报中说：“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

6月12日，徐向前率红军抵达光山南部。红军行动之快，保守秘密之好，使敌人为之惊恐。敌第二十路军军长张钫还正在梦想南下，他的部队突然陷入了红军分割、包围之中。于是，一场大战又在潢光地区展开。

潢川、光山战役，仅仅五天，从6月12日开始，到16日结束。徐向前指挥红军三个师在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彭店、双柳树、仁和集等地区，以分割包围、机动作战的战法，歼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反动民团近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六万余人。

四大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准备向鄂豫皖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彻底破产。

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

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多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正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俗话说人“三十而立”，徐向前这时三十岁刚过半年啊！

白雀园“大肃反”。徐向前呼叫“刀下留人”，却没能挽救他妻子一命。军事上的胜利与失败，不单是武器与勇气的决斗，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国焘被红军近年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不停地进攻，到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

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大肃反”的直接决策者是张国焘。

张国焘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坐在十二人之一的代表席上，和陈独秀并列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2年1月曾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与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列宁见过面、谈过话。他两次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是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从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回国后，就来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么经历不凡的大人物进了大别山，好像半个皇帝驾到，红军指挥员高兴，党和地方政权领导人高兴。大家说，这下根据地和红军要大发展起来了。谁知这位张主席一上任，连烧三把火，把党心烧乱，军心烧散。

第一把火，所谓的“调整组织”，把中共鄂豫皖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军事委员会，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是张国焘。党政军大权在一身，把他认为不行的干部撤换下去。

第二把火。所谓的“反右倾”。他打着反“立三路线残余”的旗号，给一些领导人扣上“右倾”、“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的帽子，把徐朋人等开除党籍，开会批判了红四军军长曾中生等的“错误”。

第三把火，就是大规模地展开“肃反”运动。从白雀园开始行动，越演越烈。“肃反”的烈火，很快燃遍大别山区，烧到红军各部队。

白雀园，是黄安县城西南的一个小镇。历史上这里没出过名人、奇案，旧中国分省地图上都难找到它的位置，可是从张国焘在这里发动“肃反”，白雀园出名了。多少年来大别山人一提它，就像说到地狱一样。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和许多史书中，“白雀园肃反”成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一页！

那是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人很多。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又不断发出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党政军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部审查。一桩桩案子使徐向前既不明内情，更难以理解。“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从大革命失败，到近几年的革命战争，在血与火的搏斗中，无数战友丧生，使活着的人，都从心底有一种仇恨。徐向前对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特十分憎恨。他永不会忘记，彭湃、杨殷等一些革命领袖都是因内部叛徒

出卖而丧生的。战场上，敌我阵线清楚：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是敌军，帽子上闪耀五星的是战友。可是，在无形的战线中，谁是敌人，谁是战友，使你难以分辨。由于这种原因，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领认为：

既然内部有混进的“改组派”、“AB团”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坚决清除。何况是中央的指示。可是随着“肃反”的发展，被捕的人增多，徐向前心中迷惑起来：反革命怎么这么多呀？有些同志，打仗挺勇敢，冲锋在先，退却压后，一夜之间也成了“改组派”？

“反革命”，大家都懂得，“AB团”是什么？“改组派”又是干什么的，连徐向前都不明白。“肃反”，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干部的事，指挥打仗是他这个军长的事，他不得多问政治委员的工作。半年前，曾中生任军政委时，他们二人还经常交谈，对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内部情况，彼此交换看法。自从新任的政治委员陈昌浩来了以后，他们彼此很少谈心。这位吃过几年洋面包从莫斯科回来的政委，除了打仗听总指挥的意见，平时工作，特别是“肃反”这类的纯属政治委员份内的事，从不和徐向前商量。抓人、审讯到枪杀人，徐向前都无权过问。

忍让，宽容，尊重政治委员，是徐向前的一种品格。他尽管感到这位新任的政委有些毛草行事，但喜欢他泼辣、果断的作风。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块从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是张国焘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他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徐向前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个安稳觉了。这一夜行军，路上比较平静，他骑在马上，打着盹，计划着下一步行动。黎明已经来临，马背的“床”上冷风凄凄，难以入睡。他跳下马，在路上小跑几步，停下来，等候着在队伍后边的政治委员，要和他研究部队驻下后的一些工作。

在路旁等了片刻，陈昌浩骑着马过来了。他看见总指挥步行，也不得不下马来同步并走，谈着工作。天蒙蒙亮了，徐向前忽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上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就随口向陈昌浩问道：

“那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说：“把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

徐向前又是一愣。好久说不出话。关于敌人策反的事件，他们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为什么还中敌人的离间计呢？周维炯又是什么问题呢？

他更说不清，想不通。

徐向前质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

陈昌浩没回答，快步向前走。他像是难言和理亏。

许继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和攻打武昌作战。两年前被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

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信中说：

“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奔”，“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交给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的军部。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明确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如今还是把许继慎抓了起来。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

关于周维炯被捕，徐向前更百思不解。这位师长，是河南商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河南商城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党的工作。他领导过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义，是首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师长。他领导开创了以南溪为中心的豫东南红色根据地。他是河南农民心目中的革命领袖。徐向前刚到大别山区，就听说豫东南有位周师长。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

队伍缓缓前进，徐向前心情沉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总指挥，只有在战场上拚杀、指挥部队的权力，在平时政治斗争中，他的地位竟如此低！他手下的两个师长犯了什么法，连通报一声都没有，就逮捕了。往后让他这个总指挥怎么带兵！

他想行军到达目的地，应找陈昌浩他们再谈谈。他不能袖手旁观。

红军大部队，经过两天行程，又移驻到黄安县七里坪一带。往日红军一进到这片土地，指战员都像回到家，几乎不等分房子，战士们便被老房东拉进门。区乡政府的干部们奔跑着，忙来忙去，筹备粮草；妇女会的人抢着为红军战士缝补衣服。可是，红军这次到来，人们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情了，村里村外，冷冷清清。这个变化，徐向前立刻意识到了。他想准是与地方上正大搞“肃反”有关。一打听，许多乡区干部和党员被关押审查了。

一些冤错案，使红区内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越来越困惑。一件使他惊人的事又发生了！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

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这真是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二十岁妇女干部头上呢！她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反革命呢！徐向前忍住气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泼，

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宣火爆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多得多。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划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军人的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向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肃反”继续扩大。红军大规模的作战计划难以实施。抓内部的“反革命”，一时成了高于一切的任务。红军中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人，抓起来审查；文化水平高的人，关起来写交待材料；丢掉枪零件和几发子弹的战士，关进禁闭室；说过对党的高级领导不满话的人抓起来追查“反革命”言行的组织联系。许多人内心恐惧、怀疑，而不敢说话。一些人宁死不屈，坚决抵抗这种错误的“肃反”。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位师长被处决了。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

国民党军的“围剿”加紧，步步逼近。徐向前每天飞驰在前线。一天，他从前方回到方面军总部驻地。正碰上开饭，他像往常一样走进伙房。他这个山西人，虽然在南方生活七八年，仍是不习惯吃大米饭，爱吃面食，没有面食，常吃饭锅巴。开饭时，常走进炊房找几块锅巴啃。炊事员都知道总指挥的偏好，每次做饭，都小心着不要把饭做糊，以便让总指挥吃上黄黄的香锅巴。有时炊事员把饭做糊了，锅巴黑了，徐向前只好苦笑一笑，抢一块黑锅巴啃去。这天，他拿着块锅巴正出炊事房，迎面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小战士，就问他：

“小鬼，你是哪来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小战士答：“我是犯了事，刚从家来的……”

“你犯了什么事？”

“我……”

徐向前明白了：又是受“肃反”的牵连。既然冤了人家，为什么又叫他当伙夫呢。

看这小鬼的模样，倒像读过书的，一问，确实是个小知识分子。他原是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战士周希汉，因为会写几笔字，成了被怀疑的对象。硬说他是“富家出身”，他不承认，被开除出党，送回老家。他回到当地找

区县苏维埃政府，开了贫农出身的证明，又找了回来，暂且在炊事班帮助记帐。徐向前翻看 he 写的帐本，见字写得工整，倒是个文书的人才。徐向前问他：“你愿意留在总部当书记吗？”小鬼正愁没出路，见徐总指挥看中他，一边说怕干不好，一边连连应着。于是这个名叫周希汉的小战士，就由炊事员提成了书记。

谁想，过了几个月，徐向前一次从前线回到总部，听说周希汉又被当成“反革命”抓进了保卫局。原因是，一次行军转移，周希汉把两个同名的村搞混了，为直属队号房子出了差错。军委主席张国焘发怒了，说他是“有意搞破坏”，让保卫局抓了起来。徐向前听说此事，即派警卫员去保卫局要周希汉。

警卫员跑回来说：“保卫局的人说，小周是‘改组派’，不能放！”

说不准要砍脑袋呀！”徐向前一听火了，亲自跑到保卫局，一看周希汉被吊绑着，正哭哭啼啼。徐向前大声向保卫局的人说：

“放开周希汉！放开！”

“总指挥，不能放呀，他是‘改组派’！”保卫局看押的人说。

“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保他，快给我放了！”

周希汉这才从死亡线上，拣回他的小命。就是这条生命，在战火里成长、升华、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了人民海军副司令。每当回忆起往事，周希汉总不忘徐向前元帅的救命之情，他深沉地说：“若不是徐总指挥的保护，说不准我这脑袋早掉了！”

不是夸大其词，更非戏言，那场错误的“肃反”，使许多忠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白白地牺牲了性命。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他除了指挥作战，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他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她会那样又说又笑。他祈望着程训宣不会遭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听说她已不在人间了。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没有人通知徐向前。

“肃反”和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使红军陷入内外交困。大仗一个连一个，败仗接连不断，战死的人越来越多。红军于1932年秋天，突破敌人重重包围，走向外线，越走越远，进入四川。

此后，在川陕苏区、在万里征途中，在雪山草地里，徐向前仍是怀念着程训宣。直到延安，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被彻底揭露和清算，红军在新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旗帜下，人们才敢于对“肃反”的事件提出公开的议论。一天，在徐向前住的窑洞口前，阳光下，红四方面军的几位老友聚谈，大家说起大别山、大巴山，又提到那令人心酸的“肃反”。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徐向前问在场的一位老友周纯全。这人曾是原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究竟有什么罪？”徐向前见周纯全沉默，又问了一句。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徐向前苦笑一下。多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疑虑、怨气，总算找到了可信的答案。他真想大哭一场。

多少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屡屡逃生，最后却冤死在自己的营垒中！怎么都不曾想到，在反“围剿”作战中，他日日夜夜运筹、拚搏，那位张国焘却站在背后阴险地暗算他，甚至下命令处死了他妻子。难怪，当年“肃反”

中大别山区的人民，在村口贴出标语：“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

战争年代的夫妻，多是难得共存的。徐向前和程训宣从相识、结婚到永别，只两年零三个多月。这短短岁月中，他和她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不过一个月。她没留下子女，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大别山区一位普通女红军战士。她年轻单纯，对共产党一片赤诚，对红军将领徐向前深深地眷恋着。笔者从徐向前的战友程训宣的哥哥程启光（一名老共产党员）言谈中得知：“肃反”时程训宣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怕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她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二十一岁！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女子程训宣。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没能最后挽救年轻妻子，为此，他深深内疚。用一位老红军将领的话说：“徐帅当时太老实，相信领导，当时是什么样的领导啊？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晚年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这段朴实的文字，是控诉，是血和泪的记录，也饱含着对程训宣和无数死难者深深的纪念，永久的纪念！

漫川关狭路相逢，是逃？是战？徐向前说：“战，战！”他指挥红军又获新生

在逆流中奋斗，险境下拚搏，似乎成了徐向前命中注定的遭遇。幼年蒙受种种磨难，从入黄埔军校，在国民二军，大革命失败后的奔波，广州起义、东江游击战争历经坎坷，多次险些丧生。他来到大别山后，在顺利的环境中不到两年，从统帅一支胜利之师，又陷入节节失利的困境。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又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攻。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军总指挥，共调集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另外四个航空队。分左、中、右三路出动，除左路军专门攻击湘鄂西红军外，重兵压在大别山区。这次围攻，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术上有了改变，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局面。在麻城、黄安、七里坪、冯寿二等地，先后接连苦战五个多月，虽然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击。红军伤亡惨重，处境十分艰难。

尽管徐向前精心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同生共死，红军还是一步步败退，许多杰出的指挥员战死沙场，无数战士倒在血泊里。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在苦战中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

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徐向前一路上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是走着到目的地的。

路上，他得知陈赓伤势严重，准备到上海治疗，刚刚宿营，听说陈赓来了，心中一阵惊喜。这说明，陈赓伤势不重，不然，他怎么找到指挥部来了。

徐向前正要出屋门去看看，从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喊：“徐总指挥！”声音尖锐，带着几分顽皮气。徐向前一听就知道是陈赓。

陈赓是一年多前从上海党中央机关来鄂豫皖苏区的。开始任三十八团团长，尔后升为十二师师长。战场上是一员虎将，平时却是一刻也不安静的“娃娃头”。只要他在场，话最多的是他，声音最响的也是他。徐向前虽和陈赓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因为不在一个队，那时彼此并不熟悉。徐向前听说，陈赓毕业后，第二次东征做过蒋介石的护卫，还从战场上背下来脚部扭伤的蒋介石，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徐向前真正熟悉陈赓，还是在他来到红四方面军当师长之后。开头，徐向前不太喜欢陈赓的那份顽皮像，觉得他缺少军官的威严；战场上的陈赓，却使徐向前转变了对他的印象。陈赓对总指挥徐向前的印象，是认为他指挥有方，决心硬，带兵严，就是笑脸少，过于古板。

今晚陈赓，是来向总指挥告别的。他左腿部伤势严重，骨头被子弹打断，需要去大医院接骨头。张国焘主席亲批让他去上海治疗。

“徐总指挥同志，我不想离开部队啊！”陈赓一见徐向前的面，孩子似地哭起来。

“你真是娃娃头，哭什么呀！”徐向前忙扶他在担架上坐起，安慰说：“上海医疗条件好，你的伤会很快好的。”

“总指挥同志呀，”陈赓泪流满面，“我陈赓掉脑袋都不怕，伤一条腿算个球！我伤心的是……”

仗没打好，伤亡大，处处被动。这也是徐向前心里的苦楚。

他说：“敌人也太多，太强了……”

“敌人打不垮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垮了，”陈赓气恼地说，“我真不明白，许多好人怎么一夜间成了反革命啊！白天打仗，晚上还要写交待材料！”

徐向前听得出，陈赓对“肃反”有怨气。其实，徐向前的怨气比陈赓大。红军中大批干部被逮、关押，许多人遭枪杀，他的妻子程训宣从被关起来，至今五个多月，生死不明。徐向前连打听个下落都没处找人。徐向前知道，“肃反”，是党中央指示的，在鄂豫皖这块土地上，“肃反”是张国焘主席亲自抓的，谁敢说什么呀。

“你去吧，好好养伤。”徐向前向陈赓说，“上海那地方是虎狼窝，不仅有国民党的暗探、特务，还有共产党的叛徒，你要多加小心！”

陈赓点点头，应着。茅草屋里点着一盏菜油灯，豆粒似的光亮，渐渐昏暗下去。徐向前摸出小旱烟袋，装上烟丝，叭叭叭抽着。他心中有千言万语，想对陈赓叙说，想让他到上海向党中央陈述，他认为“肃反”是错误的，张国焘的战略估计是错误的，可是，党中央领导人那位王明，只会相信

张国焘的话，哪会听他徐向前的。再说，陈赓是去养伤的，不应该让他去找中央说三道四。

“啊，陈赓你在这里！”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张国焘走进门来。他坐下后，脚伸进警卫员端来的一个大木盆里，热水烫着双脚，和陈赓交谈着。他声音低沉，少气无力，十分疲倦。几个月前，他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上，兴高彩烈讲形势，谈战局发展，说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红军粉碎后，蒋介石再无力进攻红军了；红军今后的敌人将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将是偏师。陈赓和徐向前一样，当时都认真去理解这个“偏师”说法，可是，四次“围剿”打来，才理解：国民党根本不是什么“偏师”。

“张主席，你要不要写封信，带给杨同志，”陈赓知道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在上海党中央工作。

“不写了，不写了，”张国焘说，“你见到子烈，说说情况，比写信好！信带在身上，多有不便哩！”

陈赓告别了张国焘、徐向前，黑夜坐担架走了。

红军损兵折将，从炎热的暑天，战至寒冬来临。经过枣阳、新集之战，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转战前漫川关。

漫川关，是湖北省和河南交界的一道重要关口。高山峻岭之中，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引向两座山峰之中。当地老百姓说：

“进了漫川关，恰似鬼门关，风吹石头响，仰脸不见天。”这里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只要派重兵把关口卡住，左右是高密林，步兵是难以冲出的。

站在这个险关隘口，杨虎城部三个团据关设防。胡宗南两个旅正从郢西方向追来；敌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也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的企图，是要将红军围歼于漫川关以东十余里的峡谷之中。

红军两万余人，陷入了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走进了一条绝路。已是11月中旬的寒冬天气，北风呼啸，漫山遍野一片枯黄。部队战士的干粮袋子已空，草鞋磨破，一双双脚板裂口流血。从离开大别山老区，至今已在转移路上走了二十多天，而且边走边打。

真是饥寒交迫。

总指挥部深夜进到漫川关东的康家坪。活蹦乱跳的政治委员陈昌浩，躺下起不来了；瘦弱的总指挥徐向前，强打精神，召集军事会议。军委主席张国焘一路骑马压后，身体虽强健些，也是气喘吁吁，说话有气无力了。茅屋昏暗，大家围坐在一盆火前，听参谋报告敌情和漫川关的地势。严峻的形势，使在坐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会场的气氛，少有的冷清和惊恐。从四次反围攻以来，红军经过麻城、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新集、土桥铺一场场苦战、恶战，损兵折将一万多人，大家心里明白，再这样受挫、伤亡下去，红四方面军就彻底垮了。

“我们不能再硬拚了！”有人说。“留得青山在……”

“不打，不拚，等着全军覆灭？”有人说。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面对现实。”张国焘说话了，“我想应该把大部队分散开，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他说话慢条斯理，讲着一二三四的理由。徐向前一听，急了。

等张国焘刚住嘴，他就站起来说：“不能分散，不能分散……”一点、两点、三点的道理摆出来。在徐向前晚年写的《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记

述漫川关前这次关系红四方面军命运的会议情形的：

“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

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形势很紧张，分秒必争。”

根据情报，徐向前分析了敌人的态势和弱点，提出北面敌兵力较小，又是敌两股部队的结合部，全军从那里突围出去。

他当机立断，决定了突围的方位。张国焘默许了，没再提出反对。于是，徐向前便匆匆赶到了第十二师指挥所，当面向三十四团团团长许世友交待任务去了。

许世友，是徐向前部下的一名战将。他从小因家境贫寒，在河南登封县少林寺里长大。为此红军中就传说，许世友是少林小和尚。其实，他不曾剃发出家，只在庙中混饭吃，倒是和少林寺的和尚一样，练就了一身功夫。他参加红军后，又历经艰险，无数次在血火中冲杀。他参加过黄麻起义和多次反围攻作战。他率领的三十四团善攻能守，每当战斗最激烈的关头，军师指挥员都派这个团上去。今天，全军又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徐向前向许世友说：“任务清楚了吗？”

许世友回答：“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说：“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徐向前经过周密的计划，入夜，命令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协同下，向敌四十四师开展了进攻。许世友跑到最前沿指挥冲杀，他发现一挺机枪突然停止了掩护，跑过去见射手牺牲了，自己端起机枪向敌人猛扫。他高呼着：

“共产党员们，冲上去，冲上去……”

夜色沉沉的漫川关，被战火照亮。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像是山洪爆发，冲击着敌阵，振动着军心。徐向前似乎忘记了他是总指挥，摸黑向着枪声激烈的方面前进。直到警卫员们拚命扯拉他的衣服，他才意识到，作为总指挥不应继续向前冲了。

红军的一位老将军罗应怀，在《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这篇回忆录中写道：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

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

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在全军传为佳话。直到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山垭口顶住了。”

“危急关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依然那样沉着镇定。徐总指挥部队，向以深谋远虑、出奇制胜著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了不少漂亮仗。

而今，敌人前堵后追，情况瞬息多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身系全军之安危，不仅要权衡敌我态势，而且还要不断排除来自张国焘的干扰，迅速而准确地决定每一步‘棋’的走法。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徐总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以清醒的头脑，调查着敌情的变化，抓住战机，克敌制胜，使我军多次化险为夷……”

当许世友指挥团队突破敌军防线后，侦察员发现了一条穿越漫川关的险道——一条只能容一个人通行的狭路。徐向前当机立断：从这条道穿过去。可是走不多远，前边又传来报告：“路越走越窄，驮炮的马难通过！”

徐向前命令：“驮马和炮扔掉！前进！”

丢掉驮马和炮，对徐向前和红军指战员来说，简直像丢掉战友和性命一样难受。每一匹驮马，都跟随红军征战几千里；

每一门炮，都是鲜血换来的！可是，事到如今，只有舍掉这笨重的装备，才好保存人啊！在到达漫川关后，全军已经作了动员，每个人都知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接到总指挥部轻装跑步前进的命令后，干部、战士只得忍痛扔掉了炮和行装，沿着崎岖的狭道，向前走。有几匹驮马好不容易穿过狭道，因山路太滑，又摔落深谷下。战士们忍住泪水，听着山谷下的马嘶，却无法搭救这无语的战友。

天将发亮，红军大部队越过了漫川关。可是，前进的道路仍是艰难险阻。一条崎岖的小道，指向海拔约1600米的高山。

徐向前从地图上判定，这是野狐岭。这一带绝无人迹，是只有野狐狸出没的深山。

红军战士在冷风中刚刚跨过重重山峦，竹林关又出现在前面。守竹林关的敌军虽有两个团，可是毫无戒备。他们万万没料到，红军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徐向前指挥红军，一举攻占了竹林关。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一条古道。徐向前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决定，趁关中敌人空虚，红军进入关中。可是，摆在队伍面前的却是一条艰险的古栈道。据侦察员报告：这条栈道，从竹林关两侧悬崖绝壁凌空架设，年久失修，木板有的地方已经朽了，大部队通过是危险的。

徐向前看着地图，问侦察兵：“你们调查过没有，栈道有没有人走啊！”

“老乡说，偶然有人从栈道上走走，只是单身行人。”

“就是说还可以走人嘛，”徐向前说着站起来，向栈道跑去。他心中着急，部队如不快速前进，后边敌军尾追上就麻烦了。栈道到底怎么样，只有亲自去看看，再决定行动方向。

跑不多远，只见右边是绝壁，左边是深谷。绝壁与深谷中间，出现了一条栈道。徐向前只是从旧小说中看到过栈道。领兵作战多年，从广东东江到大别山区，都没走过这种道路。他正要大步迈上栈道，警卫员从他身后钻出去，快步跑上栈道，而且一步不停，跑到尽头。又快快转回，说是中间一段木板朽了，不让徐向前总指挥继续往前走。徐向前一声不响，继续往前走。他的性格总是这样：险路往往是亲自走，地形要亲眼看过才放心。他从栈道入口，一直走到出口处，证实了侦察员的报告，栈道上确实只能单兵通过。他命令全军再次轻装，丢掉了过漫川关时没丢完的小炮和驮马上的东西，让

战士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从栈道上缓慢通过。寒风中，徐向前在栈道的头上，威严而立，这无声的动力，鼓舞着小心翼翼前进的战士。

走过栈道，红军进入了陕西平原，彻底摆脱了敌人重兵围攻、堵截。徐向前这才听警卫员说把一个皮包丢失了，里面是书和一块不能走的怀表。徐向前见警卫员十分不安，说：“丢就丢了吧，没什么好可惜的。”他喜爱读书，皮包里那几本书虽然珍贵，但是红军主力能保存下来，这才是最大的欣慰。此时，南京国民党军的情报机关说什么：徐向前部“仅剩下五千余人，毫无战斗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然而，敌人估计又错了。徐向前率红军 1.5 万余人，走出困境后，正向关中平原大步前进。

1932 年 11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平原后，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奉蒋介石的急电，派第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红军；敌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等部，向关中压来；

同时，敌第二师、第四十二师沿陇海路西进。蒋介石的企图很明显，又要在关中平原合围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红军，在王曲、子午镇、彷徨镇等地，击溃和歼灭敌军数千人之后，率部翻越秦岭，转兵向南部进发。

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海拔在两千公尺以上。此时严冬已至，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和草鞋，经过七天的行程，跨越重重高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 12 月 9 日，抵达城固县的小河口，使敌人合围又落空了。在这里，红军召开了有名的小河口会议。曾中生等红军将领迫使张国焘接受了一些正确的建议。

于是，小河口会议，成了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红军前进的路上，仍是艰难险阻极多。徐向前一路随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南进，夜色苍茫中，被汉水挡住了脚步。滚滚的河水怒涛汹涌，谁也说不出水有多深、多宽。背后敌军十七师主力又尾追而来。徐向前站在汉水岸边，焦急地等待着派出去寻找渡船与渡口的侦察兵。在部队开进途中，他曾亲自向老乡作过调查。老乡说枯水季节，汉水不深，是可以蹚过去的，眼前这水并不浅啊！这时，侦察兵跑来报告，说找不到渡口和船。

徐向前问：“水多深？”

侦察兵说：“老乡说，再往上去江宽水浅，这里江窄水深……”

“走！”徐向前不等侦察兵把话说完，沿着江滩向上游跑去。他腿长，走路快，等参谋、警卫人员反应过来，总指挥已出去好远了。大家急忙追赶。

江边的风呼啸不停，浪声却越来越小了。徐向前停住脚步，遥观对岸，月色下江面宽阔，水势平稳。他不顾身后的人叫喊，拄着棍子，慢慢走下江边。他从小在家门前滹沱河里泡过，“狗趴式”赛过一般孩子；在黄埔军校时，他游过珠江；在海陆丰红四师的年代，下东江洗过澡。这位游泳老手，使生长在大别山区的警卫战士望尘莫及。他们害怕徐总指挥淹着了，也不管水深水浅，前扑后赶，向汉江对岸走去。此时，正是 12 月 11 日，江水寒冷刺骨，大家见总指挥这样身先士卒，谁也顾不得冷了。

徐向前带领几名侦察人员和警卫人员，在齐胸的江水中，一步一试，走到对岸，又返了回来，这才下达徒涉的命令。黑夜中，红军大部队跃进江水，沿着侦察兵和总指挥探出的路线，涉过江去。尾追的一部分敌人第三天

赶到汉江边，红军已不见踪影。

说不清国民党军是耳目不灵，还是自我解嘲，就在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涉过汉水的时候，他们认为徐向前的红军彻底垮了。

红军战史中记载着：红四方面军从四次反“围剿”失败，脱离鄂豫皖苏区西征，历时是两个月，行程三千余里。在逆境中，歼灭敌军万余人。红军指战员们都不会忘记，漫川关前如果徐向前依了张国焘的“化整为零”，红四方面军恐怕真的会彻底垮了。然而它坚强地战斗着。

20

“巴山来了徐向前”。四川军阀心胆寒。“刘神仙”失灵。通南巴前一片红

在四川省的北部，横着一座名山——大巴山。当地老百姓说不出它多高，多险，只知道上下要爬70里，中间要走70里。

山南坡下三个县，一个叫通江，一个叫南江，一个叫巴中。老红军都称这片土地：“通南巴”苏区。

1932年12月底，正当国民党大肆宣传红四方面军“仅剩五千余人”即将“全部灭亡”时，徐向前率红军主力1.4万余人，出现在四川北部通江地区。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历时两个月，转战3000余里，突重围，跨秦岭，涉汉水、越巴山，兵分三路进入四川，占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

在中国工农红军征战史上，红军英雄们创造了无数奇迹。

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奇迹之一，是翻越大巴山。跨越210里的高山，对大山养育的红军来说，本不算多么难，可是，当时正是寒冬，大雪封山，在一片白茫茫的迷雾中看不见路，找不到人迹。红军战士经过三个多月征战，已经精疲力尽。许多人还吊着单衣，穿着草鞋。在决定红军要翻越大巴山时，徐向前彻夜不能成眠。他找老乡调查路线，找干部了解准备的情况。每个战士已经打好了两双草鞋。他说：“不够，每人再打一双。”他还命令每人携带一捆稻草，以备登山防滑和露营之用。

12月17日，这支全部“武装着稻草”的队伍，从西乡县钟家沟出发，缓缓向大巴山麓前进。崎岖的山路，开始还可以辨认出一些行人的痕迹。越走路越窄，行至半山腰，羊肠小道已被白雪淹没。先头部队边探路，边攀登，有的人一脚登空，滚下深谷。看不到路的山坡，渐渐开出一条路，积雪融化，变成泥路，结成冰面。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稻草，一撮撮散在路上，既能防滑，又成了路标。徐向前总指挥随同红十二师，一步步向上攀登。他和每个战士一样，身上背着小小一捆稻草，手上多了根柱棍。路滑了，抽几根稻草垫在脚下，休息时，把稻草捆放在屁股底下坐坐。“武装着稻草”登雪山，是徐向前从一位老农那里听说学来的。开始他让干部战士背上一捆稻草，许多人还讲怪话，发牢骚，直到稻草有用了，大家才恍然大悟：“总指挥神机妙算啊！”

走了70里山路，红军指战员一天就登上了山顶。夜黑，总指挥部发出

命令：山上宿营。战士们以大树和洞穴为巢，偎依在一块，把仅剩下的一把把稻草垫在身底下入睡。

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先遣支队中，发生了这样一桩事：一位名叫陈松庭的战士，宿营中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稻草给战友盖上，他自己堵在树枝搭的窝棚口，给班上生病的战友挡着风寒。第二天天亮，大家醒来才发现，这位共产党员已冻死在窝棚门口。1957年，徐向前元帅从一篇老红军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平凡而壮烈的英雄行为，深情地向红四方面军一位老将军说：“我们当年能从大巴山跨过来，正是因为有陈松庭同志这种精神！”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以“风雪大巴山”为题，记述了红四方面军跨越巴山、进军川北的艰难里程。他结论式地写道：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飞越过巴山，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徐向前的军事指挥艺术，又出色地展现在大巴山前。

四出省，此时被十几个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军阀，各霸一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着川北的险山和人民因穷困而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翻身，唱出这样的山歌：

红军同志来远方，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穷人掌印坐天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1932年2月，军阀田颂尧令孙震率军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人，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军进攻。徐向前根据川北地势和敌人特点，采取“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作战方针，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待敌兵力分散、消耗疲惫、攻势衰竭时，突然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的作战，共毙敌1.4万多人，俘敌近万人，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此时却被各派军阀闹得民穷财竭。

军阀挖空心思征税征捐，苛捐杂税，名目惊人。种田要收田赋、缴粮捐，除此之外，什么壮丁费、马路费、种烟费、被服捐、瘾民捐、月儿捐、子弹捐、火线捐，连讨饭的乞丐都要交花子捐；不种鸦片的农民还要交“懒捐”。田赋是一年数征，年年预征。

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等地，田赋征到了1983年（民国七十一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苍溪、南部等县，田赋征到1950年。据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25日载：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达1756种之多，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1987年。在这历史的奇耻年代，老百姓唱出两首哀怨的歌：

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

尖尖山上二陡坪，色谷红苔胀死人；

茅草棚棚笆笆门，想吃干饭万不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 1928 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1929 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

红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

在五十年代，笔者访问过徐向前提到的那位四川老革命家王维舟。这位老人参加共产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 1920 年。他从国外返回四川家乡以后，就办学校、救济农民，领导人民的革命斗争。川北老百姓不称他的名字，称呼他“王善人”。王维舟回忆红四方面军入川，兴奋地讲起当时川北游击军的历史，讲到与徐向前初次相识的印象。

“徐向前，真是‘向前’！”王维舟乐呵呵地向笔者说，“他率领红军翻过巴山来到四川，一日不停地发动进攻，把一些军阀打得昏头转向。红军突然而来，军阀措手不及。”王维舟说，在他没会到徐向前时，想象不出他是位怎样的人。会见以后，看他和普通的士兵一样，衣服上补着一块，脚底板穿着草鞋。人很瘦，话不多，一句是一句。

四川军阀却把他画成肥头大脸，悬赏几万大洋，要买他的脑壳！

历史记载：1933 年 8 月至 10 月，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个战役：从 8 月 12 日开始向南部仪陇方向进攻，半个月之内歼敌三千余人，攻占含仪陇和嘉陵江以东、南大片地区，占领了一百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 9 月 22 日开始，发动营山、渠县战役，半个月内，歼敌四千余人；10 月中旬，发起宣汉、达县战役，历时十一天，歼敌六个团，俘敌四千余人。

三次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及开江、开县。红军扩大到八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川陕红军的声威、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蒋介石和四川大小军阀惊恐不安。蒋介石任命大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拨款二百万元和枪万余支，驱使他率一百一十余团二十多万人，向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

刘湘于 1934 年 10 月 10 日在成都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要在三个月内将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剿灭”。这位刘湘是大邑县人，参加过历次的军阀混战。当过川军的团长、旅长、军长和重庆护军使。又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川康督办。1932 年冬天，徐向前率红军到川北时，刘湘坐镇成都“坐山观虎斗”。眼睁睁看着川北的军阀刘存厚、杨森、田颂尧一个个被红军打败，刘湘才出马。他向蒋介石“请命”：只要把统一指挥川军的大权给他，再拨给一大笔军费，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入川的红军。野心勃勃的刘湘，想独霸“天府之国”，还大搞“以神治军”，从 1925 年拜刘从云为师，把许多军阀和头面人物网入“一贯先天大道”。他曾在重庆用四万银元布设了华丽的“神仙府”。1929 年农历 8 月 15 日，在重庆真武山办了三天“移星转斗”大会。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盏灯，三天三夜不息，还请道徒们“吃神饭”、“练神兵”。刘从云利用刘湘发展道徒；刘湘利用他老师扩充军队。“刘神仙”被刘湘请出来，充当前线军事委员长，他身穿八卦道袍，在南充城烧香拜神。按吉日良辰发兵进攻红军。他还坐上二人抬的滑杆儿，到军队中讲道。

徐向前指挥红军和刘神仙的“神军”，在大巴山前拉开战线。

白军多是“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进攻前，他们点起大烟灯，吞云吐雾，过足了鸦片瘾，真好像“神”附身，发疯似的嚎叫。红军战士听说敌军里有“神兵”，有的惊慌，有人半信半疑。一些新入伍的农民，从小受到迷信鬼神的影响，缺少文化知识，暗地传播“神兵刀枪不入”的话。有的干部也说“神兵”难打。徐向前从小就反对妈妈拜佛吃斋，他初到大别山曾遇到过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早被他粉碎了。来到这里，又碰上“神军”，真好笑，穷中国到处是“神”。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讲到作战，笑着问：

“哪个见过神？”

“……”没人回答。

“谁见过刀枪不入的人？”

“……”没人回答。

徐向前说：“世界上，只有人，没有神。庙里的神都是人造的，神是不存在的。军阀无能，公开借助神符欺骗士兵为他们卖命，这只能说明他们虚弱，没有战斗力。当今世界，真正救穷苦人的不是神，是共产党，是红军。什么叫神？手中的武器，勇敢加战术，这就是神！”他还向干部们讲授战场上与“神兵”作战的战术。

“神兵”，只是刘湘的一种“以神治军”的把戏。摆在红四方面军面前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军阀从各自为战偏守一方，发展到联合行动，共同对红军作战。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四川军阀，警告他们要协力“剿共”，不然，“不仅各人的权位难保，而且将死无葬身之地”。

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的形势，方面军总部一面令前线部队抗击敌人，一面在通江开会研究对策。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和反三路围攻一样，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一条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通江会议决定，红军兵分两线：东线由徐向前亲自指挥，率红四军全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两个师，以及三十二军，共二十余团，对敌之主力第五第六两路；西线为钳制方向，由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三十一军主力、三十军和九军各一个师，共十余团，钳制敌之一、二、三、四路。

红军反六路围攻，苦战十个月，防御、出击、交错进行。许世友在《万源保卫战》一文中，记述了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情形：swy2

“打了两仗，总指挥徐向前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他见我们阵地坚固，敌人没能够上山一步，表示满意。巡视完毕，徐向前总指挥在棚子里坐下来，详细告诉我们敌我情况，他说大面山是敌人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重点阵地，一定要坚守。右侧的三十军，左侧的四军，都打得很好。最后他站起来笑着说：

‘考验是严重的，可是我们有百战中打出来的战斗作风——硬！’……”

红军的战斗作风“硬”，是徐向前精心培养、严格要求，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他认定正确的治军方针，就坚决贯彻，认准一个好的作战方案，就千方百计去实现。在反六路围攻最后向敌人反攻的关头，他不惜违背张国焘的意愿，独断专行，和李先念一路，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仗。

1934年9月，徐向前在东线指挥反攻，没能大量歼灭敌人，就率三十军和九十三师转到西线，准备对敌实施大纵深迂回。张国焘从后方通江洪口

场打电话，反对实行大纵深迂回，要实行浅迂回。徐向前在电话中反复讲，不能追着敌人屁股打，要一下插到敌人纵深，迎着敌人的头打。张国焘怕深入进去危险，硬是不同意。最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算了，随你们的便吧。”

张国焘是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他的话怎敢违抗？徐向前放下电话，向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说：“这回就是犯错误，也不能听他的。我们自己干，错了负责！”

李先念说：“对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当即命令李先念、程世才紧急集合部队，沿着义风场、雪山场向黄猫埡方向急进。他率少数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紧紧跟随在后。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黄猫埡，卡住了敌人西撤的道路。又经一天一夜激战，全歼敌十余团，俘旅长以下万余人，缴获枪支七千多支，迫击炮四十多门。这一仗打得漂亮，证明深迂回是对的。

战绩摆在那里，张国焘自然无话可说了。其实，张国焘虽是共产党内的“老资格”，从鄂豫皖到陕川苏区，都是党政军最高领导者，一贯搞“家长制”，事事自己说了算，但是军事指挥上远远比不上徐向前高明。

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徐向前指挥下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东、西两线共歼敌八万多人，缴枪三万多支，炮百余门。号称“宏威将军”的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他向蒋介石请罪，请求免去他“四川剿共总指挥”。那位“神师”刘从云，也躲进他的“神仙府”，从此闭门不出。

红军在战斗中涌现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钢军”、“夜老虎”、“夜袭常胜军”、“百发百中”等英雄团体。在11月召开的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徐向前作了军事工作报告；之后，在青江渡石开军事会议，徐向前全面总结了红军入川以来的作战经验。他针对四川敌人的特点和地形条件，提出：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并予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在战术上，则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之分进合击；发挥夜袭作战特长，来对付敌人据险扼守；以广泛的游击战争，来破敌之封锁围困和配合主力红军运动战。他总结的在川北作战的军事经验，丰富发展了在大别山时期的“围点打援”等战略战术原则，对培养提高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红军势如破竹，敌军一败再败，大巴山前乡乡村村红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兴盛发达的景象。

改造“烟鬼兵”，培训“夜老虎”。妇女团的女兵说，总指挥是个“怪人”

军阀盘据下的川北原来有五多：一是兵多，二是匪多，三是捐税多，四是纸票多，五是抽鸦片烟的人多。吸鸦片的人多了，老人吸，年轻人吸，连婆娘、娃娃也吸。男女老少，生了病不吃药，点起烟灯，抽几口鸦片烟。

老百姓敬神敬祖宗，摆一小碟子鸦片作供品；庙里的泥菩萨嘴边，也常常被善男信女抹上点鸦片烟膏子。富人家，家家户户炕上摆着镀金镶银的烟枪；穷人不少家里，都有烟灯和烟枪。城里和大集镇上，除了饭馆，还有大烟馆。人们进大烟馆像坐茶馆吃碗茶一样随便。军阀的队伍，几乎每个兵都有两支“枪”，一是打仗的枪，一是大烟枪。

当兵的吸大烟，没有钱就抢老百姓；老百姓吸大烟，没有钱只好偷，卖苦力。有的男人吸大烟，连婆娘都卖掉了。染上大烟瘾的人，个个骨瘦如柴，不抽烟走不动路，干不了活。烟瘾一发，流鼻涕淌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红军扩兵，扩进来不少“大烟鬼”。打仗抓来的俘虏，补进红军，更有许多“大烟鬼”。许多干部对“烟鬼”讨厌透了。提出：

“凡是‘大烟鬼’，统统赶出去！”

徐向前说：“老百姓当中、烟鬼也很多，怎么赶，都赶到白区去？闹革命，就是改造旧世界，旧世界是什么？重要的是人。

改造旧世界，就得改造人。”

干部们说：“俘虏好改造，土匪也能改造，就是烟鬼改造难。他烟瘾上来，你给他磕头，不如给他一口大烟！”

徐向前说：“地方政府都在发动戒烟运动，红军里首先要做好。现在，要来个比赛，看哪个连队戒烟搞得最好。往后，红军里一律不准叫‘烟鬼’，他们也是同志哩！”

总指挥的话传下去，干部、战士都觉得有道理。连“烟鬼”们听了，心里也热乎乎的。

红军打仗、筹粮、建设政权，又加上一条：改造“烟鬼”。徐向前亲自找戒烟好的人谈话，问他们是怎么戒掉了大烟。他向染上大烟瘾还没彻底戒掉的人讲抽大烟的坏处，做人的道理。

戒大烟运动，在苏区、在红军中开展起来。红军经理后勤部医务部门，制作戒烟丸发到全军，还散发给群众；政治部印了戒烟教育材料，印了歌片。革命根据地内，到处都能听见妇女、儿童歌唱“戒烟小调”：

洋烟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军阀弄来害人民，不让我翻身呀，嗯呀呀，不让我翻身呀！……

严明的纪律和各种措施，使红军中的“烟鬼”改掉了恶习。

戒掉鸦片的人，瘦黄脸变得发红、发胖了。可是，仍有些烟瘾深的兵，丢了烟枪像丢了魂似的，说话无力，走路没劲，有的偷偷跑进老乡家，讨口烟抽。红九军一个连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有个年轻的小战士，从小多病，家里人用鸦片给他治病，染上了瘾。他参加红军后，常常偷偷抽鸦片烟。部队发动戒烟，他戒了又犯瘾。一天，实在难忍，偷了老乡家新娘的裤子去换烟抽，被发觉了。连长一气之下，把他绑起来，抽了几皮带。此事，正巧被从此地路过的总指挥徐向前知道了。徐总最反对打骂士兵，他常说：“打骂人是粗野，是军阀主义，是无能的行为。”他把那位打人的连长叫到跟前，问他为什么打骂士兵。

“他习性不改，抽大烟，偷老乡家妇女的裤子，太给红军丢脸。”连长也知道打骂士兵是错误的，连忙向总指挥认错：“我犯了军阀主义残余，保证不再打人……”

徐总问：“你为什么不帮助他戒烟？”

连长说：“唉，他人小却是个老烟鬼，戒不掉呀！”

徐总说：“你说该怎么办？打，能把烟瘾打掉？”

连长说：“这样恶习难改的人，我看只有开除出红军。”

徐总本来心平气和，一听这位连长的话，火了：“你这更是无能！想过没有，让他回家去，村里又多了个烟鬼；他若跑去投了白军，又多增加一个敌人！我们搞革命，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先是要能改造人嘛！”

连长说：“我们慢慢教育他，改造就是了。”

徐总说：“改造教育人，不能急。戒大烟却不能慢慢来。限你十天以内，帮他把大烟戒了。”

“小烟鬼”被叫到连部。他一看徐总指挥，吓得不知该怎么办了。听人说，徐总指挥好厉害，军阀、老财、“神兵”听到徐向前的名字都发抖。他规定的红军纪律，说是“铁的纪律”。“小烟鬼”认为，他犯的事被总指挥知道了，不砍脑壳，也要送他回老家啃红苕去了。他正想着给总指挥跪下，只听总指挥说：

“坐下，坐下，不要怕。”

“我……我再不抽大烟了，”小鬼哭啼啼地立正站着说，“我不改，就枪毙我！”

徐向前一向宽容犯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的部下。他见那小鬼态度诚实，决心改过，给他讲了一番做人的道理，最后拍拍小鬼的头，和蔼地说：“那好吧，相信你的话。”

信任，是真诚的友爱，也是无形的动力。“小烟鬼”从那以后，在连首长和战友的帮助下，很快戒掉了抽大烟的恶习，又瘦又黑的脸，变得红润润的，身体也一天天壮实了。在反“六路围攻”中，他立了战功，当了班长，参加了共产党。连队中传出“小烟鬼”变成人的美谈。

这个红小鬼，在过草地时牺牲了。“鬼”变人的故事，不止这一个。人们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他从“鬼”变人的传说，和“巴山来了徐向前”的民谣，在大巴山下一直流传。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把戒绝鸦片烟说成川陕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十桩大事之一。他写道：“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尤其是妇女，深受鸦片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且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了……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人数即达千人以上……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军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作为红军最高的军事将领，徐向前不只是领兵作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办学校、搞军工厂，许多事他都参与策划，并亲自去做。随着革命根据地扩大，政权建设的发展，成立了造币厂，自己制造发行银元、铜板、纸币、布币。在收缴敌军兵工厂的基础上，徐总指挥组织领导建立了兵工修理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子弹材料缺乏，他命令部队把用过的弹壳如数交回。一个战士有50发子弹，战斗下来，必须交50个弹壳，否则不再

发给子弹。有的战士讲怪话：“总指挥这‘山西佬’，真抠门，哪有这样当兵的！他再抠，还叫人把打出去的子弹头拣回来哩！”

怪话传进徐向前耳朵里，一次干部大会上，他在讲话中说：“说山西人抠门，就是要抠呀！打出去的子弹头难拣回来，地面上的炮弹皮、手榴弹皮，倒可拣的。给大家一个任务：每人拣二斤炮弹皮来，多的有赏！”

于是，战场上，战士们打完仗，一个个像小姑娘拣蘑菇似的，拣起炮弹皮、手榴弹皮来。而且大家再不说怪话，知道红军办起了炸弹厂，制造的马尾手榴弹挺灵。拣起的弹皮，是最好的原料。

为改善红军的穿着和医疗，徐总指挥又策划办了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和制药厂。

后来还办起一个“脚码子厂”，专门制做一种挎在鞋底上的脚码子，每个红军战士发给一付，套在鞋底上，走泥路防滑，爬山得劲。

一滴滴心血，一把把汗水，浇灌着这片红色的土地。“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一副刻在巨石上的对联，展示着如火如荼的情景。徐向前除了晚饭、睡觉，全心扑在红军建设上。部队作战、训练任务繁重，加上一部分人从大别山区来水土不服，患疟疾、痢疾的人一天天增多；生疥疮、烂脚病的人更多。徐向前下令卫生部门加紧防治，他亲自编写了《简略卫生常识》，印发到连队。这篇文章不多的卫生常识，通俗易懂，针对流行病、传染病的发生和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病健身的措施。如不吃或少吃凉拌的生菜；饭要做熟，剩饭一定要加热，腐烂的食物决不要吃；天天要洗脚、擦澡；要常剪指甲，常理发；被子要常晒，衣服要常洗；每个连队到宿营地，要挖厕所，决不准随地大小便，等等。

“徐总指挥会用兵，更爱兵。”老将军陈明义曾向笔者说，“我们背后叫他‘老班长’。他每次到连队，总要看看伙食怎么样，检查饭菜卫生不卫生；有时还亲手教炊事员做菜。许多炊事员知道他爱吃饭锅巴，只要见到总指挥来了，就搞块锅巴给他。他就蹲在伙房，一边和炊事员谈话，一边啃锅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老班长’。”老将军们称徐向前为“老班长”，这亲切的称呼，反映了他和部下的关系，像是一个班生活的战友那样亲热平等。

徐向前爱兵又注重练兵。他常说：红军打仗主要靠有生力量，我们的有生力量就是有高度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的人。部队只有平时勤练、严练、苦练，上了战场才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根据川北的地势、敌情，徐向前命令部队开展夜战训练。第一线的部队，采取敌前练兵，把夜摸敌营的实战，作为一种练兵。夜深人静，红军小分队出击，趁敌军夜晚摆上大烟灯过瘾时，突然摸上去，消灭敌人后迅速撤退；第二线的部队，练习夜行军、夜间射击，连战马都在蹄子上套上特制的“鞋”，让它行走无声。红军是“夜老虎”、是“天兵”的威名，传遍四川。

随着红军的扩大，1934年3月，著名的妇女独立团诞生了。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到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和兵士，一色的女子。全团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川北有句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四川妇女特别勤劳、勇敢的本色，使妇女独立团跃身在红军中，成为一支威武、顽强的新军。工兵营、担架营、步兵营、日日夜夜随同主力部队转战。女兵们唱着她们新编的歌：

从前女儿受熬煎，好似掉在井里边，红军来了世道变，砸烂封建铁锁链；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当上女兵翻大山，跟上队伍打江山。

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

要组建妇女独立团，开初徐向前不怎么赞成。他说川北的男兵多着哩，插一个“红军报名处”牌牌，一天就招来几百人参军，何必再让女人扛枪。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三个女人一台戏，妇女团上千女人，那不把天吵破了！”这话是谁讲的无从查实。传进妇女独立团，却成了徐总指挥歧视女兵的一条“罪状”。女兵们吵吵着：

“总指挥不尊重女权！”

“封建脑袋瓜！”

“他呀，是个怪人，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看哪个会当他的娘姨……”

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惹恼了女人，一句话会吵吵三天。妇女团的老战士林月琴一次向笔者讲妇女团时说：她们当时背地里嚷嚷，见了徐总指挥连大气也不敢喘，高声说话的都没有。谁都知道徐总指挥难得有个笑脸。

妇女团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有从大别出一路征战过来的；有的是川北地下党员。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有的找到了合心的对象，有的悄悄在高级指挥官中瞅着。

徐向前这样的“光棍司令”，在领导人中不多。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爱在总指挥面前多说些话，多呆一会，可是见他总是那么冷冰冰的脸，只说工作，不讲闲话，女人们只好悻悻离去，对总指挥敬而远之。妇女团中唯一一人，敢和徐向前说笑几句，她就是川北人称为“张大脚”的张琴秋。

这是红四方面军中一位女杰。她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入川前，由于她参加揭发和反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被撤销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往通江县当代理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治委员。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

妇女独立团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张琴秋任政委期间，常常向总指挥徐向前汇报妇女独立团的工作、生活情况。有一次她汇报说：有些干部爱往妇女团转，想是找老婆哩。

徐向前说：“你说怎么办？”

张琴秋说：“我没办法，婚姻自由嘛！”

徐向前瞪起双眼：“没办法？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

总指挥接连说出几个“不准”，“不怕天不怕地”的张琴秋却与他论起理来。她说：革命包括妇女彻底解放，女人最大的追求是婚姻自由，不准结婚可以说，不准谈情说爱不妥。徐总说：军人与老百姓、与地方工作的妇女不同，硬是没那么多的自由。从严治军，才有战斗力。张琴秋提出：士兵不准结婚；干部结婚可加年龄限制，大龄的可以，年小的不可以。徐总说：团

内一律都不准结婚，凡要求结婚的，调出妇女团……

张琴秋折服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更敬佩他的品德。他没有打骂人的军阀习气，不贪吃贪喝，不近女色，唯一的嗜好，是端起小烟袋锅抽几口老烟丝。烟丝买不到，宁愿抽干树叶，也不准警卫员随便去找老乡的烟叶。军队中，干部打骂下级的现象，一度成风。

有位高级干部，在电话里被下属误骂了一句，那位首长气急败坏，骑上马跑出几里路去，找到那个误骂他的干部，骂了几句，打了几个耳光，这才又骑马返回。有的干部追求女同志，不择手段，发生种种丢丑的事。张琴秋常说：“各级干部，要向总指挥学习。有人说总指挥是‘怪人’，大家都像他那样‘怪’就好哩！”

徐向前怪，怪在一心放在红军建设上。他总是那个“怪”模样，很少笑脸，很少说话，行军累了，坐下来拿本书看看，休息好了，继续走；驻下来，先看地图，后看地形。

川北许许多多的山头，都有他的足迹。也许正是这位古怪的总指挥，才培养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

徐向前有一次向笔者说：“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才是见鬼的事呢！”

22

西渡嘉陵江，血战剑门关。徐向前与彭德怀笑会维古河畔。茫茫草原上，毛泽东主持典礼

春风吹绿了川北群山。1935年早春3月，徐向前率红军扫平了嘉陵江上游沿岸白军，开始了渡江西征的准备。江水滚滚，奔流在群山峡谷之中。对岸敌军共约53个团，还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师独立旅。他们凭借江防，阻止红军西渡。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奉命出兵过江。

渡江没船，沿岸大小船只，全部被敌人掠走。为了寻找有利的过江起渡点，徐向前带领参谋和工兵营的干部，沿着江岸一步步探测，走了上百里路，翻过数不尽的山头，最后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的塔子山下，作为渡口。这里背后有平坝可集结部队，方圆二十多里处森林茂密，可作为造船场。在徐向前亲自指挥下，一所造船工厂很快在丛山密林中开工了。没有高大的烟囱，没有机器马达的喧嚣，有的只是铁器撞击、砍伐锯截树木的声音：造船需要大铁钉，战士和工人们用收集来的废铁，用原始的方法在地上挖坑造炉熔铁，自己制造各式的铁钉。船造好了，采取人抬马拖陆地行舟，把七十多只船，秘密运至渡口附近。

徐向前根据敌人的设防和地形，采取偷渡与强攻结合，多路突击，重点突破。1935年3月28日夜，一举突破嘉陵江，席卷两岸守敌。乘胜前进，控制了嘉陵江与涪江之间的大片地区。4月2日，先头部队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剑门关位于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扼控川陕大道，‘插翅难

渡’，是邓锡侯部江防部署的支撑点。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依托险要地势及预构的集团工事防守。王树声在前面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摧毁敌阵地，我们同意。十一时许，部队发起攻击。我军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前仆后继，猛烈向敌阵地突击，多次与敌人展开肉搏。经半天激战，全歼守敌三个团，拿下了剑门关。

剑门关向来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而著称。三国时姜维就守过那个地方。战后，我去剑门关一看，真是个奇怪的地形。你从北面来的话，它是个高山，一壁千仞，险恶万分。

你从南面来的话，它是坡地。南攻容易北攻难。”

足智多谋，善于选择突击方向的徐向前，正是抓住了敌人这个弱点，又一举成功，创造了方面军战争史上又一奇观。至此，战史上称为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告捷。红军在二十四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钿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险境中，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万余里，突破乌江，两占遵义，四渡赤水，跨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向川西行进。徐向前每天都从电讯中、敌人的行踪上，得到些中央红军征战的消息。他时时关心着中央红军的行动，渴望着与党中央领导人相会。这几年，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胜利的欢乐，也有许多难言之苦，他身为总指挥，打仗、带兵要他决策，可是一遇到重大的决策，上头有个张国焘主席，身边有个陈昌浩政委。他们是党的化身，他们一个有军政大权，一个有军事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讲，要服从他们，可是张国焘军事上爱瞎出点子，陈昌浩又一味服从这位张主席。在鄂豫皖根据地，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向四川转移的路上，在川北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一些可行的作战方案，被他们闹得不能全部实现。特别是在红军中大“肃反”，杀掉了他的许多好同志，包括他的妻子；更使他不能理解的是，方面军全部脱离川陕根据地，既没让他参加议论，更无人正式告诉他一个“为什么？”

陷入苦闷中的徐向前，希望很快会见党中央领导人。他不打官司不告状，要求中央把他调出红四方面军。他深感个人能力有限，难以领导好这支红军。可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又在哪儿呢？何时才得相会？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县附近一个村庄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为摆脱敌人南北夹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军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地区创造根据地。

于是，徐向前率先头部队，向西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红军进入了山区。这里杂居着藏、汉、羌、回民族。多数村寨属藏民族。青稞粉和酥油混合成的糌粑、发酵的酸马奶以及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也是红军每顿要吃的食物。干部们说：

“大别山里穷，还吃得上大米；大巴山前苦，还喝得上红苕白米粥；这里一不见米，二不见面，又腥又膻的糌粑，实在难咽！有的战士硬是饿着不吃糌粑。徐向前就带头吃这些东西。他还风趣地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革命到底”，是红军的一个共同口号，大家常常挂到嘴边，也是表示决心的口号，若说谁不想革命到底，是最大的羞辱。总指挥的话传出去，红军干部和战士都皱起眉头吃起糌粑来，谁要不愿

意吃，讲怪话，马上会听到这样的话：

“总指挥都抓糍粑吃，你不想想啊！”

“总指挥说了，不吃这东西，就是不想革命到底！”

徐总指挥教育大家吃糍粑，还有更深的意义。一是为了和藏民打成一片，亲如家人；二是节省下粮食，准备送给中央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指挥到每个战士，都学着捻毛线、织毛衣，节衣缩食，为两军会合作贡献。有些干部战士开始听说要学习捻毛线、织毛衣，怪话又来了，说什么：“什么都要学，会不会叫大男人学生娃娃！”徐向前听说，认真地说：“当兵的，除了学不会生孩子，什么事都应该能学会。”一些不愿意学织毛线活的干部，看到总指挥随身带着织毛线的线团和针，休息的时候，一针一线地织着，惭愧地赶快也去学捻线，学织毛衣。

5月下旬，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越过天全、芦山、宝兴一线走向川北。喜讯传来，徐向前和四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即派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米高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策应迎接中央红军北上。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嘱咐说，要各部队多抽些炊事员去，带上炊事用具。“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信，详细介绍了川西北敌我态势，对当前的行动提出建议。信中热情地说：红四方面军以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信的内容机密、重要，为保万无一失，徐向前亲自交代警卫员康先海带一班战士，送去懋功。“一定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这是徐向前的嘱托。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懋功胜利会师了！

懋功，这荒凉的小镇，从此名垂史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历史上的第一次会师，从这里写起；历史的曲折，又从这里开始。

两军会合了，那只是双方的先头部队。徐向前正率领十几个团的兵力北上。他们沿着黑水河，日夜艰难前进。党中央领导人，他没来得及会见；中央红军的将领们，他没会到一人。他渴望着会见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

和这些人虽然没见面，但是他们的大名，早已听说。

一天，徐向前收到彭德怀的电报，说红三军团抵黑水地区。徐向前立刻回电，约定第二天一早，在维古河渡口会面。

翌日天刚亮，徐向前带领几名随从，骑着马飞向约定的渡口。两位相知不相识的红军名将，从不同的方向奔往维古河渡口。他们只是从地图上知道那地方，而且各自手中那份军事地图，明明标着这个桥的符号。可是，当徐向前来到河边时，却不见桥，一条宽约三十多米的河水，湍急奔流，挡住了马蹄。这条岷江支流，水势凶猛，既没桥又无船。从地图上看，河并不起眼，可是怎么过去呢？跟随着徐向前的参谋、通讯员和警卫员都焦急起来。

“这是啥人画的地图哟！坑人！”参谋人员看着图埋怨。图都是战斗中缴获的。旧地图上不准的村名、山名、河名多着哩。

大家着急地看着对岸。要是能找到只船就好了。可惜，一条小船的影子也没有。眼前只是一条急流。有人下水试试，冷得透骨，又不知到底多深，没办法涉水过去。徐向前在战场上，越是情况紧急，反而话越少。有时子弹

在身旁飞，他总是不紧不慢，手向身后挥挥，说声：“讨厌！讨厌！”如今眼看过不得河去，他在河边来回踱着，又习惯地说“讨厌！讨厌！”

河对岸，隐隐出现了一支骑马的红军队伍。这队伍，由远而近，飞奔到河边。从望远镜看，他们一样心急，一样望水兴叹。河这边挥手，河对岸挥手。河这边喊叫，河那边喊叫。声音被河水吼声吞没。隔河相望，谁也叫不应谁，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更不要说看清，认准谁是谁了。

从望远镜下，河对岸一队人中，一位身个不高、体格健壮、头戴斗笠的人，正向徐向前频频招手。徐总凭着敏锐的判断力，认定那位戴斗笠的人是彭德怀军团长。突然，河对岸有一个战士跳绳玩似的，扯着一根绳子，在空中转了几圈，一只燕儿似的拖着条小尾巴，穿过奔流的河面，“飞”了过来落在地上。河这岸的人，拾起来一看，原来那“飞燕”是块小石头，“尾巴”是条小绳。石头上捆着纸条。警卫员忙把纸条拾起，送给徐向前总指挥。纸条上写着：

我带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

彭德怀徐向前拿着纸条，眉头舒展，高兴地笑着向对岸挥手。参谋、警卫员、通讯员心里好喜欢。“鸿雁传书”的故事，他们听说过，小石头传书，还是头一次见！

“好办法！”徐总指挥说着，随手在笔记本上撕下页纸，写上一句：

“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

那块拴着绳的小石头，带着徐向前写的纸条，又像燕儿似的，“飞”了过去……

河两岸，一片欢笑。招手、欢呼。这边摇手，那边挥臂。此时此刻，感情比语言更热烈。一位来自江西，一位来自大巴山下，两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相会”了。奔流翻滚的维古河，在他们脚下，好像也在欢歌。

千山万水，挡不住红军，一条小小的河流，拦不断相会的心。通讯员泓水过去，把一条连接两岸的电话线架通。

“彭军团长，你们辛苦了！”

“徐总指挥，你们辛苦了！”

“这条小河，真讨厌啊！”

“是啊，有些讨厌！”

在电话里，徐向前和彭德怀相互问候着，亲切地交谈着。

这比来往甩小石头通信，更能表达相互的心情了。他们虽然是第一次通话，谁都不知谁的模样，却是一见如故，有说不尽的话。这些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是远隔几千里，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着。远隔几千里，共同唱着《国际歌》！

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电话中约定了：明天，在维古河上游一个名叫赤念的渡口相见。

地图上标着，那边有一座铁索桥。

漫长的夜，两位红军将领，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张国焘的错误，致使中央红军离开了江西，使四方面军脱离了通南巴苏区。现在红军正在受苦的路上，彭德怀和徐向前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是肯定的：两军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二天，两位红军领导人几乎是同时，来到赤念渡口。维古河还是切

断了路，这儿仍没有通行的桥。有座铁索桥是不错，但早已被敌人破坏了。河面上，只横着条溜索，吊着只用竹条编的筐子。附近的老百姓过河，都是坐在筐子里，攀着绳索，慢慢地溜来溜去。参谋人员正有些失望，徐向前总指挥坐进了竹筐。他要溜过去呀！

“不行啊，危险！”有人叫。

“总指挥！你过不去！”警卫员要拦阻。

“不行啊……”

从来不畏难，不怕险的徐向前，一个人坐在竹筐里，两手向前攀着。他是那么稳重，又像很熟练，很快溜到了河上空。咆哮的维古河，在他的脚下奔流。跟随徐总指挥的人员，瞪大眼，看着总指挥的背影。对岸，彭德怀军团长和随行人员，都不知溜过来的是什么人。

徐总指挥稳稳地溜到了对岸。他从竹筐里跳出来，上前握住了彭德怀军团长的手。

顿时，两只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徐总指挥，你坐过这玩艺？”彭德怀军团长笑着说。

“是头一次，”徐向前微笑着，“这东西，挺有意思呢！”

“真叫人担心！”

“是啊，刚坐进去，有点心慌，溜几下就觉得有意思。”

彭德怀和徐向前，肩并着肩，沿着河岸边，漫步走着，谈着。太阳高地照着维古河，河水泛起浪花，欢快地流着，它像是在唱一支赞美的歌。维古河畔，永远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那次难忘的相会，许多年以后，徐向前还记忆犹新，1956年，他写了一篇小文——《维古河畔》。

在维古河畔，徐向前与彭德怀见面之后，彼此通报情况。

徐向前问到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彭德怀告诉徐向前一些遵义会议的情况。

他这才知道，毛泽东又重新参加领导中央红军了。在此以前，徐向前听说，王明等人排斥了毛泽东，毛泽东不管军队，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徐向前向彭德怀说：“我真想见见毛泽东同志！”

“你认识他？”

“不，我们没见过面。”徐向前想到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在九江、在上海找毛泽东的情形，又想到如今在这茫茫草地与中央红军相会，觉得分外高兴。他虽然未和毛泽东见过面，由于大革命失败那年，那位“交通”给过一张“找毛泽东”的纸条，使他东奔西跑好多天，毛泽东这个名字深深地印在了他心里。

为迎接中央红军，迎接毛泽东，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命令红军指战员把草鞋、毛袜，作为慰问品。仅红31军，一批就送往中央红军衣服500多件，草鞋1400多双，毛袜500多双，毛毯100多条，鞋子、袜底300多双。徐向前因忙于指挥作战，直到7月中旬，才在芦花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

这天，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毛泽东和徐向前头一次握手相会。

毛泽东说：“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想见到你！”

毛泽东说：“我也是一样啊！”

这次会见，像早已安排好的，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把一枚五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并说明，这奖章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同志的，因为徐向前没能出席中央的会议，这奖章一直保存着。毛泽东主席还郑重地讲了一番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斗争中，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徐向前心中十分感动。他又一次记起 1927 年在武汉那位“交通”给他的纸条，要他“找毛泽东”。八个年头过去了，今天才在这荒无人迹的茫茫草原上相会。这八年中，徐向前经历了广州起义与东江游击战争，经历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经历了川陕区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八年前，徐向前只是武汉军校中的一名少校队长，如今，他成了统帅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八年前，他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时，开始只有两支手枪和几个手榴弹，如今，他统帅着八万多人的红军主力。这八年中，他有无数个胜利的喜悦的日子，也有说不尽的失败的经历。这几年，他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对他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心情不愉快。他心中早已暗暗想，见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他要提出请求，希望离开红四方面军，到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徐向前在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中，说出了请求调动工作的话，毛泽东只是微笑着，其他领导人不语。毛泽东向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还是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好。”

毛泽东仍是微微笑。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于是大家又议了议北上作战的问题，就分手了。

这次相会，使徐向前终生不忘。毛泽东的安详大度，周恩来的敏锐和口才，朱德的平易近人，张闻天的学者风度，给徐向前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因为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古河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

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张国焘闹分裂，红军兄弟险些动武。徐向前一语千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第三次过草地，柳暗花明

在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有三大会议，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川西北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宁城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三次大会师，徐向

前两次是领兵的主将，给他留下的是欢乐、是痛苦，是永生不灭的记忆。

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日益展开。

开始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红军向哪里发展。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整天忙于指挥作战，中央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未得参加。对于和中央红军相会，徐向前从内心是高兴的。

但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他却没有思想准备。开始，张国焘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徐向前和张国焘相处几年，只觉得这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难处，却没看透他野心勃勃的本质。每次传达中央的会议情况，张国焘说一些好听的话，又半阴半阳讲几句不好听的话。因为他阴阳怪气惯了，许多人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有的话放在心里，有的话一听就过去了。一些议论中央是非的话，在会议上和谈话中，传进徐向前耳朵里。什么“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什么“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什么“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等等，徐向前甚感刺耳。他组织纪律观念强，一向反对不负责任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他常说“共产党员有话讲在面上，不准背后乱说乱道”。7月2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对四方面军工作的认识。徐向前只参加了一天，第二天便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松潘。事后，当张国焘说到芦花会议的争论，散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不管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住在这里挨饿，得赶快步。”

徐向前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1935年8月，中央终于说服了张国焘，红军分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左路军行动，向阿坝地区开进。曲折的历史也从此激烈展开。

从8月22日起，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的边缘地带，开始了穿越草地的进军。在茫茫草地中行军，没有粮食，红军战士天天以野菜为主食，许多人病了。许多人吃黄麻菜，嘴都肿得说不成话。徐向前听说周恩来患疟疾不能起床，特地带了一块牛肉去看望。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还把自己的烟袋送到毛泽东手上说：“抽抽我这老叶子吧，挺好呢！”毛泽东说：“我这几天伤风，戒烟了。”说着还是接过烟袋看着直咳嗽。徐向前知道毛泽东烟瘾大，真想为他搞一些纸烟，可是，荒凉的草原上，牛屎房里除了酥油茶味，哪里能见着纸烟啊。

这是军事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界的殊死搏斗。

茫茫荒野，神秘无情，天气令人莫测地变幻着。上午还是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夜间气温达零度以下，红军战士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黑色的泥池，被深草覆盖着，一不小心，人和牲口陷进里面，就被吞没了。水塘不少，却大多含有毒汁，战士们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渺无人烟，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红军指战员充饥的食物。战士体力消耗太大，部队减员多，为减少死亡的发生，徐向前和指挥部的同志想了些办法，令前锋部队在沿途标上安全路标，指示道路；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尝“百草”，能吃的再通知下去，严禁个人随地挖了吃。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

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给伤病员，必要时宰杀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让大家围在一起，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些日子里，徐向前常常见到毛泽东，有时行军路上，有时是中央开会。徐向前铭记在8月20日毛儿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要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讨论中，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他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徐向前的发言，显然十分高兴。

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难得的。就在这次会议后，徐向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包座战。

包座，是四川省松潘县北的重镇，是红军越过茫茫水草地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它分为上下两个包座。上包座处于群山之中，四周尽是原始森林。胡宗南四十九师依山靠水驻守要地，另派四十七师正向包座前进，企图把刚刚走出绝境草地的红军，一举歼灭。

在毛泽东亲自决策、徐向前直接指挥下，红军于8月29日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

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特别是使红军获得了大批粮食、牛羊和军用物品。这次战斗，比起徐向前在大别山区、在大巴山指挥的那些战役，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小仗，可是，它是与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是红军越过茫茫草地、以野菜为食的战士拚杀得来的。毛泽东十分满意徐向前的指挥才能，如果说以前是从报告中知道徐向前，现在亲自看到了徐向前不愧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徐向前对包座之战，在《历史的回顾》中写下这样的话：

“包座战斗，我三十军立了大功，四军打得也不错。”“我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了全歼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北进的道路打开了。全军将士无不欢快。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已经过来，那种吃野菜、煮皮带度生的艰苦日子，在大家心目中，不会重返了。徐向前和许多战士一样，开了笑脸，计谋着新的行程。就在这个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突然变卦，他率兵出阿坝不远，借口葛曲河水大、粮食困难，妄图改变北进的路线。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提出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阿坝地区。9月3日，张国焘又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并转中央，说什么上游侦察七十里，不能架桥，不能徒涉过河，部队的粮食只能吃三天，电台已经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

从和中央红军会合，徐向前的心情一直处在惊喜、忧虑、矛盾的状态中。他驾驭战争的变化，指挥各种条件下的战役、战斗，不说处处得心应手，多是牵着敌人鼻子走；可是，党内上层的路线之争，使他感到被动苦闷，有时难辨正确与否。他在过草地前，一天夜晚曾坦率地向政治委员陈昌浩说“我

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

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由他来代替我。”他请陈向张国焘反映自己的要求。事到如今，工作没调动，像处在十字路口，越来越为难了。

9月8日，张国焘公开了他的南下决心，并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原来和徐向前一样，是拥护北上反对南下的，现在变了调，说什么：“建议力争左右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可以考虑南下。”电报往返争论，会议上的气氛越来越令人不愉快。徐向前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

8日夜，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又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运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傍晚，徐向前正住在一座喇嘛庙里，不知该怎么办，毛泽东来了。两军会合以来，徐向前多次见过毛泽东，他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方针。毛泽东也尊重徐向前，认定他是位高明的军事将领。他们站在屋外谈话。毛泽东说，红军可能又要分开了，问徐向前怎么好。徐向前说，已经会合还是不要分开，要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谈话不长，毛泽东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刚刚起床，便得到报告，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走了。事态发展突然，徐向前坐在床板上，惊呆了。这时，指挥部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电话里请示说：“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政治委员陈昌浩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此时他却问徐向前：“怎么办？”

在茫茫草地上，红军经历过人世间少有的苦难，同志之间原是那么相爱，有的人宁肯自己挨饿，把一袋干粮送给战友；

有的人自己挨冻，把织好的羊毛袜，赠给远道来的红军同志。

现在居然要打起来。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愤怒了。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不加任何思考严厉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一语千钧，稳住了部队，维护了红军团结，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这一伟绩，是历史上重重的一笔。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远去了。左路军那边张国焘来电报，促右路军南下；中央又来电报，要右路军北上。徐向前蒙着头，躺在床上流泪。只听陈昌浩骂骂咧咧，什么“逃跑主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看来他铁了心，决心要率军南下了。怎么办呢？

徐向前的内心矛盾、痛苦，不知找谁去说。他想不顾一切，带上警卫员，骑马追中央北上，可是，作为总指挥，离开部队，见到中央领导人说什么呢？让你北上，是带领部队啊，光杆司令，怎么回事呀！要下命令给部队北上，政治委员陈昌浩定会坚决反对，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徐向前想到这些年，和四方面军这支部队生死与共，眼看着它分裂成两半，各走一方，心里更难以忍受。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的一段话。是一番真诚坦率的自我解剖。

在南下岁月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

污蔑、辱骂、“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明里暗中进行了抵制和争斗。在10月5日早木碛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徐向前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同意，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反对分裂，希望团结。他支持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意见，劝说张国焘不要这样搞。朱德向张国焘说：“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对朱德无奈，对徐向前、刘伯承只得“用着看”，军事指挥上离不开他们。

南下的红军，第二次穿过草地后，已是寒冬季节。部队冒着风雪严寒，翻过一座座高山，忍饥挨饿向南走。张国焘无视党中央的警告，不顾随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劝说，他坚持要把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五军、九军团，拖向川康边去。他诬蔑党中央率军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说南下才是正确的“进攻路线”。一般下级干部和战士是分辨不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中高级以上干部，是知道路线正确与否极关重要的。可是，这时候许多人已被吵闹得糊涂了。

有人纳闷：中央路线正确，为什么从江西跑出来？张国焘的路线不正确，怎么会从大别山出来两万人扩大成八万？有的人在两军会师后，听到说什么红四方面军“军阀土匪作风”极为反感。徐向前虽然比下边干部高明，分辨得出是非曲直，可是中国革命的大战略向哪里发展，他达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认识高度。他希望南下的红军能打胜仗，尽快摆脱雪山草地的困境。于是，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打仗上。敌情、地形占满他的头脑。他认为：军队的生命是战场上的胜利，只有不断打胜仗，军队才能生存和发展。才会有吃、有穿、有武器弹药。

然而，川康地区并不是敌人的薄弱点，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正云集那里。苦战、恶战在等待着徐向前和他们的红军。蒋介石借“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把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从武汉移至重庆，随即整编川军，一手控制了四川大小军阀的部队共七个整编军又两个暂编师和五个旅。

南下红军于10月24日翻过夹金山，向天全、芦山、宝兴发起进攻，准备实行《天芦名雅邛大战计划》。朱德和徐向前共同指挥了这次行动。11月1日，红军进占宝兴，乘胜前进，十多天以内连下宝兴、芦山、天全等城，歼敌五千多人，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川康边境大片地区。国民党的成都告急，重庆震动，蒋介石遂调动重兵，与红军在百丈关一带山地展开决战。徐向前指挥红军苦战七天七夜，歼敌一万五千余，自己也伤亡一万多人。从此，南下的红军失去了连续作战的能力。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百丈关决战，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这年冬季，又逢十多年不遇的大雪，红军许多人病倒冻伤、饿死在雪地里。敌军重兵压迫，致使南下红军只好后撤。此时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一再电示劝告，共产国际也出面说话。张国焘只得认输了。

徐向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直怀着深情。他多次告

诉身旁的人，要好好照顾一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他心里怀念着中央红军。百丈关战斗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的消息，十分高兴，亲自拿着电报找张国焘，提出发个捷报。张国焘当面冷淡，事后又不得不允许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消息登上红军小报。

1936年2月，南下失利的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前进。部队翻越过夹金山、折多山、党岭山，一路战严寒、驱敌兵，转战五个多月，7月初在甘孜地区与长征到此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会合。

徐向前格外重视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的团结。会合前组织部队准备粮物，动员干部战士注意团结。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

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遵照党中央指示，徐向前率领红军又经毛儿盖一线，向北行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活动被粉碎，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行程，又踏上北上的道路。徐向前认为此时是“柳暗花明”。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广大指战员兴高彩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会宁。在这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会宁城里，一片歌声。红军战士，个个心里充满欢乐。万水千山，千难万苦，终于让红军征服了。胜利，给人们带来了欢笑；胜利，也使有的人忘乎所以。部队中违犯纪律的事，又增多了。会宁一带，粮食虽然比草地牧民多些，水却像油一样缺。地上没有泉水，连条小河都看不见。老百姓常年靠天上下的雨水活着，每家每户，在院里修口旱井，下了雨，院里、屋上流下的黄泥汤，流进旱井里，沉淀一下，再提上来吃。红军部队，每天为吃水的事和老百姓争争吵吵。徐向前亲自抓整顿纪律。他常说：“军队有良好的纪律，不能打胜仗。”就在他大抓纪律的时候，红军总部警卫排却发生了一件偷换马的事。

事情是这样：警卫排有个小红军，忽然瞧见几匹战马拴在院里。那几匹马膘肥毛亮，甚是喜人，当夜，他偷偷把自己的老马牵去，换出一匹枣红马。此事被徐向前知道了。

他把偷换马的小鬼叫来，劈头说：“你这个鬼东西，人不大，胆不小啊！”

红小鬼知道总指挥很爱小战士，长征路上，总把马给小兵骑，好吃的东西，也给小红军。小鬼们在总指挥面前，从不怕什么。

徐向前板起脸说：“为什么私自偷偷换马？”

红小鬼解释着：“我的马老了，我想……”

徐向前浓眉下那双眼里带着几分怒气：“鬼东西，你只想自己，为什么不想打仗！”

这马是调给骑兵用的，他们要打仗，应该有好马！”

小鬼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总指挥这些天整顿纪律，批评了不少干部，

这一下自己麻烦了。

徐向前又问：“你违犯纪律，该受什么处分？”

红小鬼说：“怎么都行。”

“把马换回去。”徐向前严肃地说，“自己到警卫营去坐禁闭！”

红小鬼从来没坐过禁闭，没想到为换一匹马，惹下大乱子。他离开总指挥部，先把马换回来，然后自己走向警卫营坐禁闭去了。

会宁大会师，标志着红军万里长征结束。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在会宁城里，徐向前意外地会见到陈赓。陈赓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如今是一方面军红一师师长，他率领部队来会师，又是为欢迎徐总指挥而来。从鄂豫皖四次反“围剿”陈赓负伤去上海养伤，一别就是三年多。陈赓孩子似地抱住徐向前，又说又笑。

徐向前问他：“你怎么来了？”

陈赓说：“来迎老首长啊。我总想再见不到徐总哩。”

徐向前说：“我活着嘛！只要活着，总会见面呀。老百姓都说，两个山难碰到一块，两个人会碰面呢。”

陈赓说：“上次在川西会师后，我很想见见你，没机会呀。

现在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

陈赓这番话，意思很明显：一、四方面军分开又会合，二方面军也来了。雪山、草地都过去了。张国焘分裂党不得人心，他的第二“中央”已宣布取消了。徐向前此时心情也愉快多了，特别是能天天收到来自陕北党中央的电报，得知形势好转，抗日统一战线有新发展，张学良已和我们党有了秘密协定，停止了敌对行动，军队之间变成了友军。

徐向前感到内战的局势不会再长久继续下去了。他正想着如何利用黄埔同学的关系，多做做国民党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工作。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发来电报，要徐向前写信去做胡宗南的统战工作。于是，1936年10月18日，便有下面这样一封信，发给国民党军陆军第一军中将军长胡宗南。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鄙部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夜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鄙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鄙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夙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鄙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尔进言，叩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徐向前手字徐向前与胡宗南确是“学兄”、“学弟”的关系。1924年4月，他们同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徐向前在第一队，胡宗南在第四队。他们在一个大操场上集合，一个饭堂吃饭，一起聆听孙中山大元师的教导，一起听校长蒋介石训话。唱一样的校歌。

他们还一路东征作战平定叛逆。不同的是，徐向前参加的是“青年军人联合会”，胡宗南参加的是“孙文主义学会”。那时，这两会对立，斗争尖锐，只是他们都算不上头面人物，因此并无直接冲突。从1927年“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向前和胡宗南才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各唱各的歌。胡宗南率军多次“围剿”、堵截徐向前的红军；徐向前多次指挥部队，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现在，胡宗南仍按蒋介石的命令，在堵截、围歼红军，不思改悔。

给胡宗南的信，会不会有效果呢？徐向前没多去想，他肯定，那位“学兄”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徐向前握手言欢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封信，是投向胡宗南心窝的一颗无声的炸弹！

24

奉命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三大主力红军西北会师，造成西北抗日大好局面。红军这一历史性的举动，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如芒刺在背，风风火火调兵遣将急下西北。他的战略意图是：一方面，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机，对立足未稳的红军实施最后的“围剿”，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另一方面，强令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其“灭共”计划，并在与红军作战中削弱他们的力量，实现其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

同国民党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老蒋的险恶用心无时无刻不在防备，事事处处都在施以对策。这时，张学良将军又把蒋介石的有关作战部署通报给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尽快实施宁夏战役，控制黄河以西地域，接通与苏联的通道。中共中央纵观敌我友三方形势，果断作出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代表党中央向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传达中央的指示，明确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其一、为阻击南敌进攻，在西兰通道地区形成了扇形运动防御，确保红军主力在预定地区展开；

其二，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3个军西渡黄河攻宁。造船任务由木匠出身的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负责。军令如山，可谓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然而，这个军令意味着什么？徐向前心里明白，要南阻敌攻，西渡黄河，不是件容易事。朱德总司令仿佛看透了徐向前的心思，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操着浓重的四川腔说：“向前同志，你们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们见到彭德怀同志，就马上和你们联系。”

这时的蒋介石已把他的战略意图变成了战役行动，10月16日下达了“追剿”令。18日，国民党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军司令朱绍良颁布《剿匪计划纲要》，扬言“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之朱（德）徐（向前）等股匪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面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附近地区而歼灭之”。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多善纸上谈兵，得意忘形，

朱绍良当然也不例外。

19日，敌总攻开始，20日老蒋亲飞西安督战，野心勃勃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剿灭共匪残余”。敌人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向红四方面军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像一群群饿狼扑向华家岭、界石铺、马营、通渭至静宁的红军阵地。

红军将士靠劣势的装备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展开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定西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有不少伤亡。徐向前冷静分析战场形势，发出边打边撤、向会宁一带集中的命令，并利用那里的山丘扼守，既可控制会宁至靖远大道，又可寻机诱歼敌人。战至23日，敌占领了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会宁、界石铺等阵地，但由于徐向前指挥得当，在打中退，在退中打，拳头越收越紧，对进攻之敌的打击仍然是很有张力的。

由于敌人的大举北进，红军西渡黄河的计划必须尽快实施。这时的三十军在李先念、程世才的指挥下，已完成了造船任务。23日子夜，徐向前下达了渡河的命令。渡河地点是早已侦察选定的靖远一带红咀子渡口。黄河流到这里，已改变了旋涡密集、浊浪雷奔的势头，成了一位胸怀坦荡，一身柔情的母亲，河面开阔，水流平稳，两岸是大片大片的梨园。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渡河先遣部队就隐蔽在河东岸的村落和梨园之中。程世才、熊厚发遵照徐向前的命令，指挥二六三团先遣连实施偷渡。该团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辉分别充任先遣连的连长和指导员。他们率领从全团挑选出来的英勇善战又懂水性的战士，在一无声响，二无光亮的情况下，迅速登上16只木船，在夜幕下，飞速向对岸驶去，只用了10多分钟就“抢滩登陆”了，上岸后才发现这是河中的一个沙岛，前面还有河水相隔，如再绕过沙岛登岸，时间已不允许，只好回返，第一次偷渡失败了。

徐向前在指挥所得此报告后，心急如焚，他再次下达命令：分秒必争，另选渡口，请老船工掌船，务必在这一带突破黄河天险。为保障渡河部队安全，他又急令四军、三十一军坚决阻击南敌北进。这时，党中央已获悉蒋介石抵西安督战，连电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率第八十八师和二六三团的干部经精细勘察，选定虎豹口（今河抱口）为渡河点。这里在靖远南20公里，是个老渡口，河东岸山岩峭立，河西岸一片平滩，河面较窄，水流虽急，但只要把稳船舵，渡河是有把握的。

入夜，在大芦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所一片沉寂。徐向前不停地抽着烟袋锅子，红红的烟火像电台的显示灯一样，忽闪忽闪地发出红光，并不断从里面传出丝丝的响声。

紧张、期望攥住每个人的心。徐向前在电话机旁踱来踱去，有时竟下意识地抓起听筒，然后又放了回去。子夜，电话铃突然响了，传来了李先念兴奋的报告声：“徐总指挥，三十军先遣连队偷渡成功，后续部队已开始一批批渡过黄河，马家军的河防阵地已被我——突破。”徐向前万分高兴，他放下话筒，用宏亮的声音向通信参谋发出命令：

“立即向总部和军委发报！”

红四方面军突破黄河天险，摧垮了马家军的黄河防线，这一胜利的消息，像一把钢刀刺痛了蒋介石的心窝子，刺痛了河西马家军的心窝子。白天，敌人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西，可一到夜晚，敌机不敢飞了。敌人不敢出来了，就又成了红军的天下，大小木船和羊皮筏子在河面上穿梭往来，

马灯红光闪闪，电筒光柱扫动，河面全部控制在手。27日拂晓，红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胜利渡过黄河，随后，红五军也渡过了黄河。

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的胜利，动摇了甘、宁、青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马家军”的统治。他们的“祖业”、“土皇帝”的宝座受到了威胁，一场殊死的决战将在这古战场展开。

初冬的黎明时分，倘若在鄂豫皖，天气是十分清爽的，可在河西地区，已是寒气逼人，风沙扑面。徐向前不顾几天来指挥渡河作战的疲劳，跨上战马，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挥鞭催马驰向一个小山头。他双手举起望远镜，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反复观察扫瞄前面的地形地物地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干涸的河床，荒凉的戈壁滩，枯黄的骆驼刺迎风抖动，像似在求天，又像似在求地，可谁也救不了它们在寒风抽打中死亡的命运。

黄河沿岸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坡。高坡上一道道深深的雨裂沟，像无情的战刀劈开冷血动物干瘦的皮肤，似乎已死亡了数千年。

此情此景，徐向前不由自主地记起在太原国民师范就读时曾学过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铤之群。……”一阵强劲的寒风袭来，参谋和随行人员用身体围住徐向前。徐总指挥在他们的眼里，是兄长，是师长，是最值得信服的指挥官。徐向前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前方。眼前的这片荒凉之地，就是一片古战场。自秦汉以来，中华儿女不分种族，共守疆土，在这里多次打败匈奴的入侵。今天，历史又把共产党人推上了这片战场。他们就是要在这一带，同反动军阀马家军作战，杀出一条路，接通苏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

渡河后的三个军共 21800 人。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向敌人展开了进攻。战役的第一个目标，是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大门和通道。第二个目标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夺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红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和陈昌浩决定，以三十军为前卫军，猛打猛进，抢占一座山、五佛寺地区，控制五佛寺渡口；以九军攻占锁罕堡，打拉牌等地，屏障三十军，遏阻西南方面的援敌；以五军殿后，驻三角城休整和看守船只，警戒兰州方向的来援之敌；总指挥部、总直机关和医院、妇女团等居中。总指挥所开设在三角城至一条山之间的赵家水。战斗一打响，龟缩在一条山村寨的马家军猝不及防，很快被勇猛冲杀在前的三十军先头部队消灭。继而红军攻克距一条山 15 公里的五佛寺，控制了那里的渡口和船只。九军在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的指挥下，也消灭了打拉牌等地的守敌，并将锁罕堡守敌 5600 多人包围起来。河西部队首战告捷，打得顺手，为开展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场就像是一个“万花筒”，只要轻轻一转动，就会带来千变万化。留在河东的部队在敌人强大压力下，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一线歼敌一两个师的计划未能实现，可能与敌成相持状态。这一情势，意味着宁夏战役计划已不能按计划实现。甚至有流产的可能。

徐向前对此深感焦虑不安。他同陈昌浩分析研究了面临的困难和对策：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至四天的干粮，此地人烟稀少，缺粮缺水，决非大军久留之地；敌我态势对我亦极为不利，我军三面临敌，背水作战；敌人多为骑兵，来得快，打得快，撤得快，我军势必被动挨打；部队如单独北进

定远营，腾格尔大沙漠很难通过，而孤军深入此地也有极大危险。

徐向前和陈昌浩根据以上分析决定：一面令各部队在现地待命、构筑工事，准备迎击马家军的反扑，一面向军委详陈面临的困情，建议河东部队力争按原计划渡河，进行宁夏战役。倘若此计不成，则河西部队准备向凉州、大靖、古浪、永登一线发展，伺机配合河东部队进宁南或打通远方。请军委早日明确河西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正当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军委之时，马步芳、马步青这两个同胞手足已调集五个步骑旅赶到一条山地区，统由马元海指挥，向九军、三十军阵地实施反扑。徐向前在指挥所一边仔细观察研究作战部门送来的敌战态势要图，一面拿起电话，向九军和三十军发布命令：“坚决顶住，不得丢失阵地。”坚守一条山村寨的是三十军的3个团，深知徐总指挥命令的份量，他们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组织指挥下，沉着应战，巧妙抗击，英勇拼杀，利用土坑、土围子等地形地物，与敌作战。在一条山以南，三十军政治部的近百人被两千多马家军包围在一个小寨子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将仅有的两个步枪排、一个手枪排和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组织起来，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李先念派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率部分兵力向南出击，救出了政治部的人员。11月3日，九军将马步青的600多人紧紧包围在锁罕堡，经一再争取，被困马家军表示接受联合抗日的主张，交出部分粮食后被放回凉州。经四天激战，红三十军、九军共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千余人，狠狠打击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被迫停止了向红军阵地的进攻。

11月3日22时，徐向前收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发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通告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及陈云来电内容，说苏联从宁夏运送物资已不可能，可否派部队从新疆方向接运物资。并要求徐、陈“率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11月4日早晨8时，徐向前、陈昌浩就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给朱德、张国焘发报：“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咀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西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不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电示精神，连夜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电报中央军委，这一计划的“纲领”是：“我四方面军西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对内动员中心口中：‘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猛烈扩大红军，武装保卫西北’；‘联合回民、蒙民共卫西北’；‘配合一、二方面军，直接准备对日本军作战。’”11月8日，徐向前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与此同时，中央及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决

心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为西路军，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时限为一年。对如此重大变动，徐向前、陈昌浩当时是一无所知。特别是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的战略变动，事后也没有得到通报。他们知道的和急待执行的是实现《平大古浪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平番、大靖、古浪和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段，明长城遗址的南侧，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就经过这些要塞重镇。在历史的长卷上，这里描绘了东西方的友谊，也洒下了战乱的鲜血。

徐向前指挥红军，沿着丝绸之路古道，兵分左右向古浪前进。

入冬的河西走廊，寒风卷起沙土像一条条无形的皮鞭，抽打着衣衫褴褛，赤脚穿着草鞋的红军将士们。这支曾经三过草地的红军如今虽已疲惫不堪，仍是满怀着新的希望，去打通远方的“国际路线”。

右路军前进至大靖地域，太阳已经落山，夜幕笼罩着大地。指挥所电台机要人员给徐向前、陈昌浩送来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由于河东未能战胜敌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正在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与西路军暂时隔离着，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根据电报精神，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议题的焦点是西进还是东返？徐向前坐在马灯前，随着忽闪忽闪的灯光，不紧不慢地讲述自己的意见，他说：我看西进新疆是完全必要的。第一，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没有靠背，我们的“腰”就容易酸痛；第二，能拿到苏联援助我们的抗日武器；第三，经过补给武器装备的红军再回过头来打到马家军，易如反掌；第四，红军的行动与作战都是相互联系的，此举可以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第五，相比之下，东返要比西进困难更大。……西路军的将领们对徐向前的发言十分信服，就是有最后决定权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也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于是，会议作出了西进的決定，并急电告中央：

一、毛周真十一时电悉。此方详情今望电报总部。指挥部直、五军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军主力位于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二、马步芳部（政王廖）五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一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约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三、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共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昨两日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四、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根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五、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造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六、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七、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已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

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5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一）

同意你们向凉州进。（二）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徐向前得到中央如此明确的复电，进一步增强了西进必胜信心，立即将部署作了调整，在西进的大方向上，三个军交替挺进、迅速西插，打了一手妙仗。13日，九军攻克古浪城，马家军风风火火急驰古浪救驾。

三十军来个“时间差”，乘虚向西跃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当时，不学无术的马步青就在凉州城内，有将缺兵，吓得他脸都白了，连夜组织民团、商团，用钱雇百姓登城，点无数盏灯笼火把，虚张声势，唱起“马氏”“空城计”，当得知红军围城不攻城，只是借路西行打通抗日路线，才解除这场虚惊。18日三十军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段，为全军西进开辟了通道。此时五军又来一个大踏步跟进，接替了三十军防务。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打仗也是如此。正当西路军盛势西进之时，一着不慎，九军在古浪吃了个败仗，给整个战局蒙上了一层阴影。

古浪南北两侧是高山险石，沿红凉山西进古浪，只有一条“马不并骑，车不同轨”的狭路，为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冲，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城西则无险可守，一道平川，直下凉州。按说红军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是不该吃败仗的，但由于九军最初防御作战准备不足，麻痹轻敌，在敌人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的优势兵力轮番攻击面前，又有些慌，仓促应战，死打硬拼，在血战三昼夜，敌我双方各伤亡2000余人的情况下，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增援，九军才突破敌人包围。这场战斗，使九军减员三分之一，军参谋长陈伯犀、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壮烈牺牲，军长孙玉清负伤，基层干部伤亡就更为严重。为此，陈昌浩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整顿，徐向前令三十军在四十里铺阻敌，置九军于二线休整，总结教训，调整建制，恢复战力，以利西征。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由于河东形势的需要，11月19日周恩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

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陈昌浩一边看电报，一边说：“西路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

徐向前听罢，用力磕去烟袋锅子里的烟灰，语重心长地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一带能不能站住脚？这里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这些都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看看敌我力量对比，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看还是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吧！”

陈昌浩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仍漫不经心地说：“还讨论什么？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

徐向前再也捺不住了，豁地站起来，异常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可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他边说边伸出双手，掰着手指，“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夜更深了，寒风更猛了，吹得土房的纸窗呼呼作响，徐陈二位时而争吵，时而沉默，陈昌浩说徐向前是右倾机会主义，徐向前说陈昌浩昏头胀脑。陈昌浩找了军政委员会成员谈话，试图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才作罢休。

两位主官带着分歧，带着气愤，于11月21日率总指挥部从凉州城外进抵永昌城。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1日20时，23日20时和24时亲自起草电文，连续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军的行动方针，24日的电文写道：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

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垒，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垒。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

（丙）这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垒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

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药耗尽，都用大

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部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团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

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打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击敌。

在事实面前，陈昌浩也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前途的危难，他拿起笔，在这封电报上诚心诚意地签上“同意”二字。

11月25日，中央对徐向前亲笔起草的电报发来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并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12月12日，“西安事件”发生不久，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占领安西，“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份夺取甘、肃二州。”徐陈接此电报后，立即动员部队，准备西进：

这时，张学良向共产党建议，要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兵力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

为此，中共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能否以一部东进抵兰州附近，在于学忠处补给弹药被服，然后东渡黄河作战。西路军刚动员部队准备西进，现在又要东进。西路军领导人又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东进，徐向前认为西进最为有利，会议将不同意见上报军委主席团，并暂停西进的动员准备工作。

12月24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同时又指出“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一番争论，给军委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向前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指挥员，他在组织上是绝对服从的，于是连夜调动部队，准备东进作战。

就在西路军尚未东进上路之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军委主席团急电徐向前、陈昌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此时，极不平凡的1936年就剩下最后6天了。寒冬给河西走廊换上了银装，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呵气成霜、滴水成冰。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撤离永凉，开始西进。

12月31日，部队在西进路上停下来，举行了辞旧迎新的篝火晚会。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骨寒”的河西大舞台上，他们唱起了“我们是铁的红军，钢的力量，工农的儿女，民族的希望。不打通国际路线，不是红四方面

军！”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等也都出现在篝火旁，同红军战士们共同欢乐。可谁料到，这竟成了西路军的最后一次集会，最后一次欢乐，等待他们的却是继续苦战，流血和失散。

1937年1月初，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这里人口较多，粮草丰裕，部队准备稍作休整后，继续西进，速夺肃州和安西，力争在短期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东打个“回马枪”。可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到南京时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在南京扣押和审判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向河东红军逼近，使军委又一次决定变动西路军的作战方向。

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

1月7、8两日，又连电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陈昌浩建议四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来援，未被批准。他们对军委给西路军的任务一变再变，提出了意见。然而，得到的回答是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以个人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复电，他一反过去在长征路上同中央闹分裂的常态，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当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徐向前、陈昌浩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已明明白白地预感到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这条弄堂里，等待将士们的将是一场场殊死的决斗，1月12日，马家军以一部兵力钳制九军、三十军，然后用重兵对孤守高台的五军实施全方位的包抄突击，五军的将士们在无电台与总指挥部联系的情况下，同当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经血战一周，在大量杀敌的同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多人壮烈牺牲。徐向前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后，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但受到敌人优势与我军骑兵拦击，又是一场大血战，全师官兵用马枪马刀与敌拼杀，最后大部伤亡。

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永久存放在高台烈士陵园陈列室里的一张照片，是当年敌人拍下存档的，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是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在高台县人民政府中的一株老槐树下，留给后人一副壮烈的画面：马家军曾凶狠地将一名坚贞不屈的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如今，人们称誉这棵根深叶茂的粗壮槐树为“红军树”。

马家军攻克高台得手后，急转矛头指向临泽西路军指挥部。机关干部、直属分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以单薄的力量，同骠悍的马家军厮杀，经连续三天血战，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此时的西路军已由过河时的2.18万人，减至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这里共43个屯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水丰粮余，每个庄屯都有高2至3米的土围子，便于红军坚守。红军到后，群众由害怕逃走，到亲亲热热地返回，一时间，这里成了一片红色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还建立了地方武装。

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关键在西安，西安局面如果转向有利发展，将使二马难于积极对付西路军”，“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整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争取尔后以一部西进条件下，并大大向东

扩展甘北根据地。”晚了，实在晚了。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家军就从窘境中彻底解脱出来。这群“野马”挥舞战刀、甩鞭狂奔，狰狞狂笑，就像是一群吃人的恶魔。他们在连连得手后，庆祝“胜利”，给蒋介石发电“邀功”，集中优于西路军的重兵民团、围追西路军不放，声嘶力竭地叫嚣“死力堵截，阻止西进和东进”，“消灭共匪于河西走廊”。到2月1日，马家军投入总兵力7万余人，西路军在这块弹丸之地，以寡敌众，同敌人血战40天，“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这是中国西部天边的“圣火”，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圣火”。

西路军的勇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长矛、木棍、石块与敌人死拼。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在房顶上指挥战斗，他从一个房顶跳到另一个房顶，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他毫无畏惧，用身先士卒的气概，激励指战员们英勇杀敌。

战至2月中旬，先后打退敌人向倪家营子的进攻达八九次，仅在这一处战场上，就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云海以下1万多人。然而，此时的西路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万人了。2月24日，西路军在血战中，给中央军委发去了再次求援的电报：“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东进也不可能”，“请求军委派8个团以上的兵力，西进向凉州地区，以救援西路军”，“不然我们只有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而已。”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又经过七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

兵败祁连山。挥泪奔延安。毛泽东说：“有鸡就有蛋”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徐向前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他和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入惨败的局面。

中央军委主席团为解西路军之危，曾于2月27日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骑兵团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其西援前提为第一不要影响和平大局，第二不要使增援部队亦陷入困境。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向镇原方向开进。周恩来也在西安和顾祝同周旋，申明援西军西进的理由，要国民党政府从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勒令二马即停向西路军的进攻。但此时，反共到底的马家军更不会悬崖勒马了。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又一次与敌血战，九军政委，年仅25岁的战将陈海松和他率领的八百勇士，全部壮烈牺牲。至此，西路军兵力已不足3000人了。这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必须采取特种办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之目的。为此，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二是就地分散游击。徐向前率领一部分部

队，边打边撤，13日进入祁连山的康龙寺地区。尚未稳住脚跟，追兵像梦幻般地又出现在眼前。

这场血战，部队弹尽粮绝，不成建制，有的竟从徐向前身边跑过，向祁连山上的林中跑去。徐向前以超人的沉着，在敌人的围追堵截的混战中，大声向溃败的红军战士喊：“同志们，共产党员同志们，要顶住！顶住！共产党员在最危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指战员们听到总指挥悲壮的声音，有人停住脚步，回头迎击敌人，有的坐在地上，互相包扎伤口，整理身上的装备。

这时，陈昌浩派人找到了徐向前请他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参加紧急会议。

石窝山，在祁连山脉中并不出名。这里山林茂密，没有居民，偶尔有裕固族游牧人在这里放牧。先行败退到石窝山的一部分领导人，在山洼里举行了西路军军政委员紧急会议。陈昌浩没等徐向前到会，就主持讨论决定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最后的一次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形成了决议：第一，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并将此决定立即向中央发了电报。第二，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共8人组成。

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第三，将现有部队2000多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一路由王树声、毕占方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带电台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对这一决定，徐向前是有保留意见的，51年后，他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了四百余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祁连山为古匈奴语，意思是“天梯之山”。在甘肃河西走廊南侧，当地人则称之为“南山”。此山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崇山峻岭，高凌霄汉，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一个又一个山峰，终年头顶洁白的雪帽。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留下千古绝唱《关山月》：

明月照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徐向前少年时代就读过此诗，那时只是朗朗上口，而今，他实实在在地体味到了诗的真情实感。他身为中国共产党人，红军高级将领，虽然在此地遭到惨重失败，但他不相信“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只剩下不到两千人的队伍，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一个警卫排护送，启程东返。他们沿着祁连山北麓，千方百计避开马家军的追捕，由西向东、由高向低昼夜兼程。快出山时，为了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人留下来就地打游击，只带一名保卫干部同行。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徐向前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见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便找了个能避风雪的石棚，决定停下来休息。陈昌浩对保卫干部说：“我们就在这儿过夜了，去找点水来。”

夜沉沉、雪茫茫，满天繁星闪寒光。徐向前、陈昌浩仰望星空，相对无语。是啊！

还有什么好说呢？六年前的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北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两个人一武一文，有张有弛，尽管在路线上昌浩出现过偏差，但两个人总的说来配合得是不错的，由鄂豫皖打到川陕边，走过万里长征路，带出了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可如今……徐向前坐不住了，不停地走动，四个多月的血战，像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里闪过：西路军指战员们为了打通国际路线，严寒艰苦何所惧，笑洒热血不低头，这是一支多么好的队伍啊！他们都到哪去了？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九军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犀、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多么好的战将，多么好的兄弟，他们一个一个地在徐向前脑海里闪现。他们没有死，他们永远活在总指挥的心中。

东方渐渐由漆黑变成灰白色，繁星在蒙眬的晨曦中消失了，可出去找水的人也像星星一样不见踪影了。徐向前、陈昌浩估计可能要出事，他俩强忍着饥渴，风风火火地上路了。后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保卫干事在找水时同搜山的马家军遭遇被俘，距徐陈的夜宿地并没多少路，好险！

徐向前、陈昌浩不敢走大路，他们按军人特有的本领，准确地把握前行方位，向东、向东，迂回转向后继续向东，时而走羊肠小道，时而走沙滩草地，太阳被丢在身后的西山下时，他俩来到大马营南侧的一个小屯庄。他们在村边停留片刻，十几户人家，炊烟袅袅，一片安静，判断此处无敌人，便径直朝一户人家走去。户主姓但，百家姓不常见的一个怪姓，汉人，是个医生，祖籍湖北，因常有人来看病，和陈昌浩又是老乡，几句湖北话一说出来，就显得格外亲热。杀鸡烧饭，屋子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从饥寒交迫中挣扎出来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总算吃了一顿好饭。夜色已晚，徐陈睡在一个炕上。

徐向前说：“老陈，明天早点起来，早点离开这个屯庄。”陈昌浩吱吱唔唔，不知说句什么话，很快就入睡了。鸡叫四更的时候，徐向前醒了，窗户纸已由一片漆黑变成了深灰色，他用手推了推陈昌浩，压低嗓音说：“老陈，该起床上路了。”陈昌浩似醒非醒，好像在说：“肚子疼，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徐向前见他称病不肯走，想是有老乡掩护，要多休息几天，于是，他决定一个人上路。

此时的徐向前，孑然一身，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但他又绝对不像“司令”：几个月没刮胡子，都长疯了，好像是“猛张

飞”；穿着件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破面上已是脏兮兮的；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这身打扮已看不出他是个36岁的人，倒像是个50开外的“老羊倌”。他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饿了就找老乡要点吃的，渴了就随便找口水喝。经永昌，下凉州，一路没遇上敌人。在凉州城外的小路上，碰上了西路军特务营营长曹大头，尽管他也化了装，可一眼就被徐向前看出来，因为他的脑袋很大，人送外号“曹大头”。曹营长见到总指挥，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像执行侦察任务回来一样，向总指挥汇报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重赏。”徐向前轻蔑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曹营长讲的这些，是徐向前估计到的，敌人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可还有很多事，他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的。此时，王树声率领的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与敌游击，吸引敌人兵力，掩护另两个支队转移。3月15日至18日，连续与马家军激战，击毙敌团长谭成祥、马占成以下官兵数百人，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毕占云率领的支队也与敌人激战数日，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战士英勇牺牲；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被俘，被押解到青海西宁，马步芳软硬兼施劝降，均遭孙军长唾骂，后经蒋介石下令惨遭杀害。

李先念率领的支队1000多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大部成员随行，于3月14日晚向南进入祁连山深部，部队断粮无盐，白天靠打猎充饥，夜晚在凉窟山洞宿营。他们带着电台，同援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当他们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西行到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时，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中央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进入新疆，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李先念、李卓然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多么顽强的红军队伍啊！

徐向前和曹营长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有曹营长在身边，徐向前感到放心多了，他只顾大步流星地向前！向前！而曹营长走得可不轻松，他要用尽浑身解数，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用自己的“特务”本领乃至生命来保证总指挥的安全。他们经土门、景泰，一直向东，走着走着，黄河出现在眼前。他俩停止了脚步，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细心观察河边的情况，看到不远处有个放羊的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徐向前问：“前面有渡口吗？”老人开始有点紧张，但一听是北方口音，不是马家军要抓的“南蛮子兵”，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他说前面有渡口，都被大兵看守着，说是要抓什么西路军的人。徐向前谢过老人，若无其事地向渡口的上游走去。大约走了5公里，发现河中有人正划着羊皮筏子由东向西摆渡，他俩急忙走过去，同摆渡人打招呼。这是个壮年汉子，头上扎着一条黑不溜秋的黑毛巾，说话粗声粗气，一看就是个憨厚老实的人。徐向前从衣袋里掏出两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小兄弟，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一下。”壮汉子的大手接过钱，一边微笑着说：“上来吧！”一边小心地将他俩扶上筏子，二话没说，拼力朝东岸划去。5个月前，徐向前是指挥千军万马，在枪炮声中，在胜利的欢呼和进军声中，随出征的将士们西渡黄河。如今，孤零零地东渡，去找党中央，去找毛主席，胸口又翻起一阵心酸。

在黄河东岸甘宁交界地区，汉族居民明显增多。这意味着已甩掉了马步芳的追捕。

他们不仅吃住方便多了，对这一带的地理也比较熟悉，紧张的心情算是放松了一点。两个人放开脚步，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一个小镇子，6个月前，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曾在这里商讨宁夏战役部署，可现在，宁夏战役流产了，西路军失败了，在小镇依稀留下的是红军宣传队在房舍墙壁上书写的大字标语。徐向前和曹营长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打听一下风声后再继续东返。为了活动方便，他俩用一个金镏子换了两套衣服，徐向前穿上了棉袍，像他从军前当过的教书先生，又像是个商人。曹营长是一身小伙计的打扮。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一次哈哈大笑起来。“走，上街上找点报纸，打听打听消息，”徐向前说着就向外走，大头“小伙计”紧跟在后。

在这个偏僻小镇，哪里能找到报纸呢？还好，人们说话倒挺随便，听到不少消息，诸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蒋委员长翻脸不认人扣押张学良，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啦……

徐向前判断，这里离红军根据地已没有多远了。他俩离开打拉池，翻过六盘山，直奔平凉城。该城虽然不大，但却是陇东重镇，国民党邓宝珊的队伍正向西开拔，本来就不宽的小街，一下子有这么多国军经过，弄得鸡飞狗跳，一片混乱。趁这个乱劲，徐向前钻进一家书店，买了张地图，找了个客栈住下，他和曹营长一边查看地图，一边研究下一步前行路线。

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他俩就上路东进，空肚走了两个多小时，当太阳在东方高高挂起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在路边摊贩那里买了几个馒头。他俩边吃边四处观察。

忽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一支队伍在行动。他急忙咽下这口干馒头，问这个小摊贩：“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小贩肯定地说：“是红军”。一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营长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顺手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给小贩，起身就走。等小贩说声“给你找钱”时，他俩已走开好远了。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在小屯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飏和刘志坚。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

晚上，镇原县城的援西军司令部灯火通明。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闻讯都赶来了，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白天，刘伯承忙于向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彭德怀发电报，报告徐向前归来的喜讯，没有坐下来同徐向前多谈，这天晚上，他同徐向前一直谈到深夜。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血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几乎全军覆灭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话来。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儿再干！”

5月16日，徐向前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叶剑英等，并一起合影留念。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杨看望徐向前。他俩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2年来相聚又分别，分别又相聚，两颗革命的红心，一片深情，难以言表。

徐向前急着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因牙痛难忍，便随周恩来一起去西安。临行前，他从贴身的衬衣里取出一个温热的小布包，里面是十多个金镏子。他对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此情此景，使钢

铁般性格的彭大将军心里一酸，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1937年6月18日上午11时30分，周恩来安排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让徐向前同他一道飞去延安。这种飞机是航校教官带飞行员用的，一架只能搭乘一人，训练飞行时，有时教员在前面，让学员坐在后面体会飞行感觉；有时让学员在前面驾驶，教官在后面检查考评。徐向前就坐在第二架飞机的后舱里。周恩来在第一架飞机上，起飞不久，就同后面失去了无线电联络。徐向前在红安时，虽然指挥过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参战，但他从没坐过飞机。这次可谓“大姑娘坐轿——第一回”。飞机在2000米上空飞行，气流很不稳，飞机时上时下，像只飘动的大风筝，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徐向前感到头晕脑胀。驾驶员回头问他话，他什么也听不清，只好写条递过来，上面写道，“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徐向前哪里当过领航员？但他看到下边有条细长的“白带子”，判定是洛河。于是徐向前在纸条上写道：“顺河北上飞延安”。没多一会儿，延安机场出现在航路的前方，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对准跑道，呼啸着从天而降，于下午3时安全落地。

徐向前一步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到，徐向前和在场的人都很不安。直到徐向前到了延安城，才接到周恩来的来电，说飞机迷航，油不够又转回西安了。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亲切接见了徐向前。他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无比深情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他一边说，一边关切地从徐向前的头看到脚，又说了一句：“瘦了，瘦多了！”接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送给了徐向前。

两个人一边吸烟一边交谈，室内充满轻松自然的气氛。毛泽东并没有把西路军的失败看得很重，更没有问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只是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的汇报，当徐向前沉痛地讲到西路军的失败与自己的责任时，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泽东用那深情、慈祥的目光看着徐向前，接着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对西路军的赞扬，徐向前听了很受感动。

一场战争的胜利或失败，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到一点去研究，倒也不复杂，这就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就西路军的主观因素而言，这支红军的指挥班子是坚强得力的，这支队伍是能征善战的，尤其是他们的战斗作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出来的，其特点是“对敌狠、骨头硬、反应快、冲杀猛、战术活”。

他们就是凭着这些自身的优势，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在5个月的征战中，共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这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十分关注的历史大课题。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他写道：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诚自己，以鉴后人。”

如前所述，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5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其一，“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河西走廊是条‘弄堂’，两万多部队在从山丹到凉州三百多里的地区，拉成了‘一字长蛇阵’，既不能建立根据地，又不能‘集中兵力’、‘齐打齐进’”。

其三，“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他在张国焘长征路上搞分裂的问题上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他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其四，“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

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

徐向前一直把陈昌浩的安危挂在心上，把失散的战友挂在心上。他在和毛泽东谈话中，曾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说来凑巧，就在徐向前回到延安后两个多月，8月14日他到洛川准备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天在街上与陈昌浩相遇了。陈昌浩穿着一身便衣，见到徐向前无比激动，问长问短。他说：“你大马营走后，我一直闹肚子，病愈后那个房东老乡送我去汉阳老家养了段时间……”徐向前终于又见到了老战友，他高兴地向陈昌浩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不少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回来，就是你音讯全无，叫人想啊！现在回来就好了。”

出席洛川会议。走上抗日前线，头三脚踢得好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中极不平凡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平西南郊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借口在所谓的演习中听到一声枪响，并发现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县城搜索，野蛮无理地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件像一声炸雷，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革命根据地延安。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在延安联名给蒋介石通电，请缨杀敌，为国效命。同时致电第二十九军将领，愿为其后盾，与日寇决一死战，支持他们抵抗日军的侵略。为了动员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徐向前正以满腔热忱、满腔仇恨，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在延安窑洞里，他几乎天天都把目光盯在全中国地图上，将日军侵略的势态用蓝笔标志在地图上：北平、天津先后陷落，蓝色的箭头又指向了南口，居庸关和华东的淞沪地区。

徐向前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无比愤慨地自语：

“企图速战速决，五个月内灭我中华，白日作梦！”

在极其严峻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陕西省的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沿洛河南下，两天走了90公里，于14日傍晚抵达洛河的中游重镇洛川，住在城关的一所教堂里。因会期和会场都还没有定下来，他和一些领导同志在城里住了8天。洛川的城池虽然不大，可历史比较悠久，早在北魏时就开始设县。抗日战争前，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的交界地。会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此处是延安与西安的中间部位，便于红军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徐向前到了冯家村，住在一户不算富裕也不算穷的农民家里，独门独院，整齐干净。毛泽东住在村西南的村塾学堂，是两孔窑洞，靠路边，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就是会场。

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开会，25日圆满结束，为时4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侑钟、周昆等23人。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饭桌、条桌、八仙桌，凳子则有长有方、有高有低，好在大家都苦惯了，比起爬雪山过草地要强多了。

徐向前坐在会场偏后的一条长凳子上，前面是张条桌。他细心地听着张闻天主持会议的讲话，津津有味地聆听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秦邦宪、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发了言。大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报告，也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谈了一些不同意见。

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表述作了一些变更，明确指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给，吃饱了饭再说。

徐向前打心眼里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

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 11 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会议的成功，给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生和胜利的希望。

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曾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共中央酝酿很久的一次重大举措。蒋介石此时已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继颁布《战争指导方案》之后，又于 7 月 22 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只允许编第一一五、一二二、一二九 3 个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在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被任命为副师长，在当时曾有一些猜测和传说。有人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 4 个师，徐向前是 4 位师长之一，谈判时蒋介石只给三个师的编制，编号又都有不很好的背景，才让徐向前当了副师长；还有的说，一二九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开始就是让他当师长，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的。对于这些议论，徐向前曾实事求是地向部属作过解释，他曾表示，和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相互了解更深了，伯承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是很高兴的。他还说：“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党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根据洛川会议确定的出师三分之二的原则，党中央令八路军总指挥部率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二师先赴山西抗战；一二九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暂不出动，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需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棘手问题。8 月 29 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找徐向前谈话，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

徐向前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使命。

洛川会议胜利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和高级将领兵分两路离开冯家村。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一路向北回延安，一路向南去西安和太

原。徐向前同朱德乘坐美式捷姆西卡车冒雨赶路。由于连下几天中雨，多旱的黄土地喝足了雨水，往日黄土飞扬的公路也泥泞起来，汽车被陷入泥水中。徐向前、朱德等都下了车，拼命推拉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后轮空转，卷起的泥水向推车人的脸上，身上射过去，个个成了泥人，只好弃车步行。第三天赶到耀县庄里镇的一二 师贺龙、肖克的指挥部，遇到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乘火车赴西安。周恩来此时已先到西安。这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已为八路军将领安排了去山西的专列。9月5日子夜，徐向前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肖克、程子华及国民党军将领张治中同车去山西。列车在风雨中缓慢地行驶在陇海线上，79 公里的路程竟用了几个小时，天亮才赶到潼关。大家下车后，乘船渡过浊浪翻滚的黄河，到达山西境内的风陵渡。

此时徐向前的心境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不同，他默默无语地走着，心潮起伏，无比激动。13 年前，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大业，离开了山西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这十多年来，他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为了抗日，他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是命运的安排？是革命的需要？他心里当然明明白白。

徐向前和同志们来到风陵渡车站，阎锡山已派他的上校秘书梁化之站在专列的站台上恭候。这个专列比起陕西安排的专列，显得十分小气，小车头、小车厢、小铁路，简直就是由骑马变成了骑毛驴。心直口快的彭德怀一上车就操着湖南腔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朱德看了看徐向前，风趣地说：“当心咧，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哩！”小小的车厢里，已不显得局促了，回荡着欢快的笑声。

小火车在南同蒲路上向北行驶。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个个显得沉着、干练、没有一点紧张的神态，他们时而谈笑，时而向窗外眺望，从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对未来充满胜利的信心。这同他们在风陵渡看到的兵荒马乱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梁化之仿佛也忘掉了日军已攻陷了张家口，正兵分两路直攻山西大同和太原的险恶形势，被八路军将领所感染，介绍起山西的风俗人情来。6日下午，专列驶进太原车站。

阎锡山没有到车站或宾馆迎接共产党八路军将领的到来，此时他的心境充满矛盾。

日军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了，一向标榜是山西父母官的他，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待；

打一家伙吧，又生怕引火烧身，让日本人端了老窝。对八路军在此关键时刻的出现，既欢迎又防备，还要摆出山西“土皇帝”的派头。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乘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小汽车，在梁化之先导车的引导下一路风驰电掣，来到雁门关以西的阎锡山的岭口行营。阎锡山早已脱去便装，换上军装，大概是由于年轻时就读于日本振武学堂的缘故吧，风纪整洁，坐立笔挺，有股子“武士道”精神。他站在客厅正中，满脸堆笑地握着徐向前的手，一本正经地说：“同乡同乡、欢迎欢迎！”阎锡山之所以能够在山西统治了26年，由清末的八十六标教官爬上山西都督的宝座，除此人善于政治投机外，利用同乡发展个人势力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以五台为中心向外辐射崞县、定襄、忻州等籍贯的军官为亲信，杨爱源、赵承爰、王靖国、李服膺等将领均属此辈。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徐

在东冶镇的永安村，阎在河边村，滹沱河从中流过，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他未尝不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这个一向耍手腕的两面派，当众曾说，“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而暗地里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硬是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徐向前参加几次周恩来同阎锡山的谈判。每次谈判，周恩来都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又都注意准确地把握周恩来的意图。两个人密切配合，使谈判取得了成功。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正当建议和要求。徐向前还参与了帮助阎锡山拟制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疏通阎与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的关系；到阎锡山的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表抗日演讲，这使阎锡山感到吃惊，他感叹道：“徐向前这样的人才，怎么走到共产党一边去了，不是楚才晋用，而是倒过来啦！”

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徐向前率领第一二九师官兵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战，反“六路围攻”取胜，“反九路围攻”告捷，他亲自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震动华北大地，刘伯承师长称赞说：“向前还是当年！”

晚秋的晋北高原，凉风习习，落叶飘飞。日军向晋东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使这里显得既混乱又阴冷。徐向前在友军活动半个月后，回到八路军总部南茹村。10月26日下午，接到朱德、彭德怀从寿阳景尚村发来的电报，要他率七六九团南下昔阳归建，打击向晋东来犯之敌。这个团是徐向前从鄂豫皖带出的一支老部队。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都是徐向前的部下。鄂豫皖肃反时，陈锡联和另几个人曾因一起买过油饼吃，被人诬为“吃喝委员会”，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

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委员会’”。张国焘听了，警惕地瞪了徐向前一眼，想了片刻，挥挥手说：“那就放了吧！”笔者在为徐向前编写传记的过程中，几次见到老将军陈锡联，每谈到往事时，他总是说“是总指挥救了我”。汪乃贵没文化，说他是粗人又粗中有细。1988年笔者到武汉征求老将军们对《徐向前传》的意见，年逾八旬的汪乃贵和老伴准备一晚上的发言稿，还像当年接受作战任务那么认真。陈、汪在抗战之初，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徐向前率领他们一路南下。他们在徐向前面前，什么心里话都敢说。陈锡联、汪乃贵告诉徐向前，红军改为八路军，戴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帽徽思想转不过弯来，只给编三个师，红军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当了团长，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上级做了不少工作，情绪才安定下来。徐向前对他俩说：“蒋介石就是那么个人，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阎锡山也一样。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好办法。”

到五台县永安村附近时，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于是，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几个团干部请到家中吃午饭。这是他入晋后第二次回故乡。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彭雪枫就让他回去看看，彭德怀还送给他六十块钱。

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就是在国民党反共剿共最凶的时候，也没到家里找麻烦，这次徐向前回晋是以抗日将领身份出现的，就更不好怠慢，于是，阎锡山派出了他的小汽车送徐向前回五台故乡。两次与家人团聚，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投入到晋中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抗日斗争中去。他把部队分散开来，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武装，几天时间，以石拐镇为

中心，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都有徐向前派出的小分队在活动。夜深了，他坐在指挥所的一张条桌前，用铅笔尖拨去油灯上的灯花，火光显得明亮了。他翻开日记本写道：“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才能巩固，不然，是无法站住脚的。”是啊！抗日战争就是全民族、全民众的战争，徐向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之举，给这一地区抗日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于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挺进晋东北，第一二师转赴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布置，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在平型关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0月中旬，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太原，组织忻口防御作战，从5个军中抽调13个步兵师、5个步兵旅，约13万人担任战役正面，八路军于两翼侧击。日军投入兵力5万余人，在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下，激战20天，中国军队不顾重大伤亡，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使日军伤亡2万余人。此间，一一五师一部向繁峙至平型关一线发起攻击，克复平型关和灵丘，围困代县城，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日军供应线；一一五师另一部进至广灵、灵丘之间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敌百余人，缴获大车百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一二师在雁门关黑石头沟地区设伏，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日军前进机场，歼敌百余人，毁伤飞机24架。两次设伏七亘村，共歼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量作战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

11月至12月中旬，八路军先后在黄崖底、广阳、东封户等地与日军作战，在晋察冀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大量杀伤了敌人。

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顺利展开，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占领太原之后，便实施战略方向上的转变，把矛头指向八路军的区域。1937年12月22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出动步骑兵5000余人，兵分六路，气势汹汹地围攻一二九师。

从寿阳县城出动日军2500余人，并配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向驻松塔的第七七二团发起围攻，另五路分别由平定向西寨；阳家经龙泉、广阳向马坊；榆次、长凝经阔郊向马坊；大谷经范村折向水晶坡；昔阳经关帝庙出击和顺。这五路投入兵力共2500多人，每个方向200—700人不等。妄图实施“围点打援”，一口将七七二团吃掉。

军情十万火急。徐向前将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领导工作交付他人，集中全力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指挥反六路围攻的战斗。

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敌人轮番向松塔方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天两夜，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部分营连干部负伤，战斗减员60多人，被迫撤到南军城。日军自以为初战得手，攻击越来越猛，采取粘网式战术，故意暴露侧翼，引诱对方出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在危急时刻，徐向前于24日出现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作战。他识破了敌人的战术，采取了反粘网战术，以正规军和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避敌强点，打击弱点，避

敌正面，击敌一翼，偷袭疲惫之敌，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在他的指挥下，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诱敌主力，将敌人“粘”住，然后将主力快速、隐蔽地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日军的飞机大炮失去了用武之地，打得日军既要“抱头”，又要“护尾”，一下子歼敌400多人。在另五个方向上作战的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配合、外线出击，毙敌200多人。日军原想在1938年元旦以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围攻，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动摇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敌人打错了算盘。他们非但不能速战速决，反倒被八路军、游击队给“粘”住了。时值隆冬，寒气逼人，离开据点的日军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不熟，士气低落，战至第五天就无法继续打下去了，放火烧了一些村庄，各自向原出击方向败去。

这次胜利，对部队，对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1938年元旦。徐向前应邀出席了辽县各界人士举行的新年宴会。徐向前在宴会上向大家祝酒，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根本战略，介绍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并用反六路围攻和各次战斗的胜利，说明抗日战争是民众的战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抗战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一次举起酒杯，坚强有力地说：“希望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保卫华北，保卫山西！”

1938年3月下旬，春风伴着硝烟血雨，吹拂着山西大地。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入晋虽只有半年多，却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眼下，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又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他们首先分析了敌情，徐向前指着地图说：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其目的是由晋南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将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使被卷曲的“蛇身”伸展开来，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之预定企图。当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小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刘伯承说：“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我们要再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徐向前赞成师长意见，补充说：“选好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包个大馅饺子！”邓小平是前不久石拐镇会议时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下到师里当政委的，他对此表示赞同。这时，刘伯承接到了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的通知，他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

徐向前住处，便衣侦察组十几个人有农民打扮的，有小贩打扮的，也有的化装成教书先生，很随便地围在徐副师长身边，徐向前说：“还是老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现在派你们出去，详细收集日军在黎城至涉县的兵力部署情况，活动规律，为再打一次伏击仗提出详实的报告。”这些侦察员大部分都是红军战士，有的是排干部，有的是连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向徐副师长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两天后，侦察组送来了附有文字说明的报告要图：日军本月上旬在神头岭遭我伏击后，惊魂未定。邯长大道沿线戒备森严。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头据点，驻兵150多人，涉县守城军增至400多人，黎城千人有余。公

路上昼夜有武装军车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盲目射击，为往返车队壮胆助威。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 50 公里，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在响堂铺伏击敌人是着好棋。

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通路，守无凭借，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最远距离，不等敌人增援赶到，我们已打扫完战场了！”他看看邓小平，问：“邓政委，你看如何？”

小平信心百倍地说：“好棋、好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于是，定下了战斗决心：定于 3 月 31 日，在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

3 月上旬，一二九师曾决定在神头岭伏击日军，战斗部署下达后，徐向前和邓小平去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留下来指挥作战，在神头岭伏击成功，共歼灭日军步骑兵 1500 余人，骡马 600 多匹，轻重武器一批。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下良以南地区休整，总结作战经验，表彰作战有功人员。刚刚打了个大胜仗的干部战士，听说又要伏击敌人，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心完成刘伯承临行前交待的作战任务。

26 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队从下良出发东移。几天来，春雨夹着清雪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寒气逼人，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在风雨中前进。30 日晚饭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三个集结地域开始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1）31 日拂晓前进入阵地；（2）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3）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4）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5）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救治伤员。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命令，把伏击部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必胜的整体。

午夜后至黎明前，部队在黑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伏击地域。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的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展开；七七一团在正面的宽漳、后宽漳一线展开，陈赓的旅指挥所在该团阵地后侧开设；七七二团在马家拐展开，徐向前的师指挥所就设在该团左前方。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和战士们一道忍受着寒冷和潮湿，等待着一场战斗的到来。

天亮了，但仍见不到太阳，设伏地域静得出奇。突然电话铃响了，徐向前一把抓起听筒，传来了陈赓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 200 余人进入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指挥作战一向是比较沉着老练的，但像今天这样大的伏击战对他来说并不多见。他判断，可能敌人在某一点上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迂回包抄，断我后路。他请示徐向前：“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徐向前一面要他通知部队继续观察，绝对隐蔽，一面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等于不战而败。

电话铃又响了，“撤不撤？”陈赓的声音很急。徐向前还是以稳对急，要他“冷静一点”。此时，陈赓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悄悄地撤到了路北，以防不测。

指挥所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徐向前则注视着地图自语道：“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造也。”他断定：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来“打草惊蛇”。他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

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徐向前放下电话，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

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他派身边两名最得力的参谋前出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他叮嘱道：“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指挥所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满一锅烟丝，用手压了压，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叭哒叭哒地抽起来，红红的烟火，随着吱吱的响声闪耀着。他看看表，时针已指向 6 时 30 分。

上午 8 时刚过，参谋回来了，笑呵呵地向徐向前报告：东阳关方向之敌无异常动静，前沿警戒分队观察到的“敌骑兵”，只不过是老百姓赶的几头毛驴。徐向前听了汇报，也不由自主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自信：“好！太好了！”他一把抓起电话，将所发生的情况向邓小平政委作了报告，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钓鱼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鱼儿咬钩；捕鸟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鸟儿贴网；打猎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野兽入围。打伏击战的人，最兴奋的时刻当然是敌人钻进口袋。

8 时 30 分，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辘重队两个汽车中队的 180 多辆汽车摆成 2 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敌人仗着车多人多火力强，一路威风，一路尘扬，9 时左右，完全进入伏击的口袋。徐向前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顷刻间，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车队的头尾已燃起熊熊大火，整个车队前逃受阻，后退无路，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战士们一个个从冰冷的掩体冲杀出来，与顽敌展开肉搏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逞凶一时的侵略者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驻在东阳关和涉县的鬼子兵急忙出援，遭到打援部队的迎头痛击，又慌慌张张地龟缩回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 400 多人，击毁汽车 180 多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将缴获的大量作战物资用车拉、马驮、手提、肩扛，迅速退出伏击战场。这时，日军 10 多架战斗轰炸机出现在响堂铺上空，对爬卧在公路上的一辆辆残破的汽车狂轰滥炸，徐向前带着部队已全部转移到秋树垣等安全地带，干部战士像看大戏一样观赏日军飞机炸日军汽车，爱开玩笑的陈赓风趣地说：“好！炸得好！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山谷里回荡着徐向前从心窝里迸发出的胜利喜悦：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

胜利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到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正在沁县城东南的小东岭村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专员兼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

一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等三十多人。朱德当即决定邀请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到响堂铺参观。十几天前，徐向前到总部开会时，曾受朱德之意，去拜访了曾万钟军长，徐向前针对曾军长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的思想顾虑，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入晋以来打游击的经验。

徐向前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曾万钟军长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向他建议：“曾将军不妨一试。”

百闻不如一见。曾将军站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浓烟滚滚的响堂铺战场，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说：“贵军如此善战，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老战友刘伯承向他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断！”

山谷中传出伟人们的胜利笑声。

27

习惯山地游击战的人，来到平原打游击，怎么办？徐向前说：建造平原的人山

在十年内战中，徐向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打游击，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和战友们的青春热血，留下了那辉煌的战绩和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共同实践的人，才会有共同的感情和思想。徐向前对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作战原则心领神会，运用自如。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游击战是“拿手好戏”。并将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分别以管涔山脉、吕梁山脉、恒山山脉及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旗开得胜，并依托山区开始向平原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于1938年4月21日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即令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1938年4月23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辽县西河头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会上宣布：

全师主力以平汉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九团及曾国华第五支队，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第三八六旅，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左纵队的行动。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南宫、邯郸、新乡和石家庄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背靠太行山，

脚踩大平原……一定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看看向前，又看看陈赓，对与会干部说：“同志们，大家的担子都不轻哟！”

4月26日，徐向前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指战员们晓行夜宿，沐浴着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像一只下山的猛虎，直奔南宫。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然而又是有规律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相一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巧合，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好戏。对冀南平原，徐向前早有所图。如今率大部队来了，就要和自己曾多次派出的部下会师了，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激动。

事情还要从1937年12月初说起。当时，国民党在冀南战场的军队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纷纷逃跑，国民党县政府也塌了台，乱得一塌糊涂。中共冀南地方党曾派人到一二九师，请八路军去收拾局面。当时刘伯承和徐向前商定，先派张贤约带几名干部组成先遣支队去摸摸情况，视机开展工作。张贤约一行迅速进入冀南的沙河、邢台一带，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12月中旬，又派孙继先、胥光义带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发动群众，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人数达400余名。

1938年1月，派出第三批人员下山入平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中共晋冀省委书记李菁玉率步骑兵6个连组成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一些土匪、伪军，在平原站稳了脚跟。3月中旬，宋任穷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马玉堂的地方独立支队开赴冀南。在4个月内，第一二九师先后派出4批干部和部队进入冀南，进一步巩固了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1938年5月7日，徐向前率部经过十余天的行军，在陈赓、陈再道、张贤约、张南生所部的配合和掩护下，没费一枪一弹进入平汉路东，大张旗鼓地经过巨鹿县城，顺利地进入南宫。南宫县城是控制在八路军手中的华北平原重镇之一，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资丰富，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公路成网，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八路军、游击队在大平原的生存发展和与敌周旋。以南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已具备良好基础。徐向前的指挥所就开设在南宫城北街华兴烟草公司院内，由他统一指挥冀南的八路军部队。他的领导班子还有陈再道、宋任穷和刘志坚，他们在一起研究平原根据地的建设，研究这里的地形、民情，总结前几个月的斗争经验，丰富了徐向前的军事思想，率先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并经过几昼夜的思考，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发表在1938年5月21日的《群众》周刊上。50多年后，这篇文章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文章指出：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

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

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

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民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运动，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徐向前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好戏。

巧打六离会，唤醒民众投入抗战。徐向前首战威县虽不很理想，但也足以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日军清水、高桥所部伪军高德林，先后从威县、临清撤出，相继逃往邢台，威县落入八路军手中。但盘据在南宫一带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被反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仍与八路军为敌。他们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抢走电台马匹，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引起了徐向前的注意，决心列入武装打击的对象。

六离会为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八卦为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八卦分教见于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阴掌领坤卦，真明掌领艮卦，真行掌领巽卦。”其中坎卦为八卦之首，统领其他七卦。该教中之离卦、震卦，从清朝开始曾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分立独立教派，南宫一带的六离会同其他地区的一炷香离卦教、义和门离卦教均属六离教派。因“离”为八卦之六位、象征火，故六离会的信徒崇尚火红，身穿红衣，头扎红布，大刀长矛均是红柄、红杆、配有红缨、红穗、红飘带。六离会头头李耀庭是南宫人，青年时考入保定武备学堂。毕业后投身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孚麾下，当过中将旅长，卢沟桥事变后，投靠日本侵

略者，是个铁杆的大汉奸。六离会号称 5 万之众，除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

徐向前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研究了打击六离会的对策，针对受蒙蔽群众是绝大多数的特点，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和四条具体措施：“（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二）

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

（三）对反动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徐向前一面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作战方案，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宋印亭一伙自以为人多势众，拒不接受同八路军谈判。为打击反动头头的嚣张气焰，徐向前派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和被俘的战士，对残害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六离会骨干分子宋殿元当众宣布死刑，就地枪决。

就在打击六离会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给徐向前等领导人复电，完全同意他们提出的方针原则和战斗部署。徐向前继续派人与六离合头头联系，争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汉奸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他们鬼迷心窍，自不量力，决心与八路军对抗到底。5 月 16 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方向的张马、甘狼一带，纠合一万多人，向八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这群乌合之众人人吃了“硃砂符”，说是“刀枪不入”，他们头扎红包布，身穿红衣服，手持红枪红棒，把大地染成了红彤彤的一大片，随着“刀枪不入”的喊声，一浪接一浪地向前滚动。徐向前为了减少对方的伤亡，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采取了西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枪炮齐放，将他们击退，并决不迫杀。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六离会成员眼看“刀枪不入”是骗人的假话，活着的狼狈溃散。5 月 17 日，地方政府与八路军部队在孙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到各乡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红布包着的法衣和那“刀枪不入”的护身符，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大汉奸李耀庭、反动首领高大奎等人。在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五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势力派和惯匪，纷纷打起抗战旗号，简直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三十多个市县的村、乡和城镇。这些武装有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有的东一枪西一炮地打日本鬼子，也有的在老百姓中称王称霸。另外，日军组织起各种伪军、汉奸部队，经常向八路军进攻。

徐向前决定对各式抗日武装，采取分化、收编的方针；对伪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可谓“两个拳头出击”。

1938 年 5 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第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东进纵队和第五支队，在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张屏卿、冯午桥的“皇协军” 1000 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消灭了汉奸李殿清、李守兰部的 1000 多人。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的倒戈反正多达 3000 人。

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邓小平政委通报了鹿钟麟将要到河北的新动向，收编工作迫在眉睫。徐向前首先对杂色武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人“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他们“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

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为此，徐向前提出：凡属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保证：一、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枪；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和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取得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四、帮助其进步。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是一支较大的杂色武装。“司令”段海洲是地主出身的大学生，国民党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6000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陈再道、宋任穷先行冀南，已对他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到南宫不久，段海洲先派秘书陈子平求见，后又亲自登门拜访，对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收编抗日武装的方针原则表示赞赏。徐向前对他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就叫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吧！”段海洲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他回去后不久，就把大队人马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一块空地上，宣布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他当司令员，请八路军派去的李聚奎当政治委员，后来徐深吉又去任副司令员。在艰苦抗战中，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成为抗日英才，只是部分旧军官和土匪，陆续开小差了。最后1000多人改为新四旅。

另有一支队伍，名叫民众“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素质要比“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好。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司令”赵辉楼是河北省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他就初步接受了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地区。徐向前到冀南后，赵辉楼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赵月舫来到南宫，要求正式改编。徐向前和宋任穷接见了，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后，又请赵辉楼来南宫面谈。徐向前对民众抗日自卫军要求改编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他同赵辉楼商定两条：一是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下设3个团，每团2个营；二是活动范围暂为原地区不变。赵辉楼对这两条都很满意。晚上一觉醒来，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天一亮就来到徐向前指挥部，要求在部队番号之首加“八路军”三个字。徐向前说：“好！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吧”。

并明确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政治委员。两个月后，与汪乃贵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夏，笔者在武汉洛加山宾馆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将军汪乃贵，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十分动情地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汪乃贵和几位老将军都谈到，当年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

是忠义救国军，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在他盘踞的县城里，不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七六九团出击，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这一改一打，震动冀南。仅两个多月，在方圆二十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部队扩展到 1.85 万人，拥有 1.15 万条枪，分编为 18 个团及支队。

抗击日寇的进攻和“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日游击战如火如荼，局面蓬勃发展。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这是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难以吞下的两颗苦果。从 1937 年冬到 1938 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小战斗 1400 多次，从战略上，紧紧拖住了 30 多万日军。八路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 3 万多人猛增到 25 万多人，控制了晋西北、开东南、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的大片地区。蒋介石私下对他的幕僚们说：“共产党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可小视。”他非常赞赏阎锡山“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的反动立场。

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赶走”八路军；接着又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子，来根据地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收复失地”。

面对这场严峻的斗争，徐向前早有精神准备。他多次向战友们说：“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鹿钟麟刚到河北时，中共中央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徐向前等领导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待鹿提出方案后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等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就开小会进行谈判。

徐向前当众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请鹿主席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省府主席的名义，正式委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 8 月 14 日正式成立的，由 1930 年加入共产党的大学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 6 个专署，管辖 51 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鹿钟麟是带着蒋介石的“使命”来的，身前身后不少国民党特务，他避开实质性问题，冠冕堂皇地客气一番：“鄙人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正式委任’嘛，好商量，好商量！”

鹿钟麟虽属杂牌军老手，但反共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一到河北南宫，明里与八路军友好，暗地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他委任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将民军赵云祥及杂色武装胡和道的人马拉入他的麾下，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定，真乃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专找鳖亲家”。

9 月下旬的一天，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长枪短枪，向八路军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了突然袭击，杀害了 10 多名战士，包围县城，用洋铁皮做成的喊话筒狂喊乱叫：“我们要求撤换县长！”“八路军滚回太行山去！”

徐向前明白，鹿钟麟是后台，就出面强烈抗议。最终迫使他宣布解散胡和道收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被他们抓走的政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一波刚息，一波又起。赵云祥为了配合胡和道的反共活动，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鹿钟麟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民主政权的茬儿闹事。一次，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工作报告时，由于将“鹿主席”三个大字没放在“台头”处，他竟以“对省主席不尊敬”为由，提出撤换这位县长。紧接着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和区长，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徐向前针锋相对，采取“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最后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人山”众志成城，平原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38年10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县城兴华烟草公司的大院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则，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他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冀南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化整为零与敌周旋；敌人失道寡助，兵力有限，供给不足，“扫荡”的正面不可能太宽，时间也不会太长；我士气旺盛，具有运动战和夜战之优长，能够灵活地打击敌人。他要求干部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要看到平原地区交通发达，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战场变化快；根据地形成时间不长，部队和群众都还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汉奸暗中打黑枪，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徐向前提出了反“扫荡”的四项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向冀中学习，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1938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已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由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日军集中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混成旅、一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多人，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徐向前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县区机关干部转移，主力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徐向前和他的指挥部转战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日军情报机关发现后天天叫嚷“消灭八路军，活捉徐向前”！可就是捕不到踪影。“人山”保护着徐向前和他的部队，“人山”阻挡着侵略军的行动。历时16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28次，共歼敌600余人。最后敌人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

敌人“扫荡”占去的大部分县城，又回到了八路军与人民政权的手中。

日军经过一段喘息之后，1939年1月7日又对冀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集中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

各一部共 3 万余人，分 11 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矛头直指冀南抗日根据地。狡猾的日军针对八路军、游击队在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形势十分严峻。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南宫。他们共同研究，针对日伪夹击的严重形势和平原地便于敌人快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经过一段时间后，将敌人拖得差不多了，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五个主要战斗集团，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寻机歼敌。

反“扫荡”战斗打响了。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指挥下，八路军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迟滞敌推进速度，拉开与敌决战的架式。与此同时，另一部兵力对宁晋、广平、肥乡、高唐之敌进行突然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势头。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在八路军、游击队的伏击中惊魂丧胆，伤亡过百，三天只前进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遭到八路军、游击队的阻击、伏击数次，半个月未能接近县城。曲因日军步骑兵 100 余人进占安寨，被全部歼灭；进占大杨庄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有 200 多人亡命黄泉。当敌人主力占领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津浦、平汉铁路被八路军破坏，炸火车、断桥梁，交通被迫中断；德州至临清的水上交通也成了八路军的打击目标，日军汽船被击沉，30 名敌人丧身鱼腹；陈赓、王新亭第三八六旅在威县香城固一带设伏，“引蛇出洞”，2 月 1 日，敌人进入了“口袋”，经八小时的激战，歼灭 200 多敌人，缴获汽车 9 辆，战炮 4 门。日军吃了大亏后，更加疯狂，第二天上午，出动飞机 2 架，掩护 70 余辆汽车，载敌 2000 余人，对八路军进行大举反扑。陈赓、王新亭已率部安全转移了。

敌人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再拉过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主力继续留在这里目标大，不利于“保存自己、歼灭敌人”，便主动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淇县一带。而在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3 月间，太行山区战况吃紧，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一部昼夜兼程，火速回去。冀南反“扫荡”的重担全部落到徐向前的肩上，他看准时机，带一部兵力重新杀回南宫、威县、清河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春去夏来。冀南大地麦穗香，迎来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经 400 多次的大小战斗，共歼灭日伪军 5000 余人。徐向前望着那翻滚的麦浪，更深深感到：平原的“人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老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这段战斗历程时，这样写道：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来的。

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地。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

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

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由于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愤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

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

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师齐鲁大地，建政权，战日寇，军民抗战谱新篇

徐向前元帅既善于领兵南征北战，又善于开创新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中共中央根据北方局的建议，由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调徐向前、

朱瑞等赴山东领导抗日工作。1939年6月7日他告别冀南，向齐鲁大地进发。

山东省素称齐鲁大地，位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之水由此放慢了流速，浩浩荡荡，注入黄海。它是联结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枢纽，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代，它是齐、鲁建都立业，振国兴邦之地，也是孔孟之说的源头，中华文明摇篮之一。

徐向前对派他到这一地区领导抗日战争，既感到巨大的压力，又充满必胜的信心。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数月。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战略进攻的侵华日军，将参加武汉会战的重兵大部回调，调集多路部队“归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实现其“确保占领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向日寇投降的危险倾向越来越严重，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趋公开化。在山东，蒋介石派于学忠为苏鲁战区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山东省府主席，率十余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与八路军抗衡。沈鸿烈公然提出“统一划分防线”、“统一行政、军不干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的所谓政令，限定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纵队只能在泰安、徂徕山以南、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妄图将八路军驱入敌伪兵力集中的滕县、宁阳、泗水一线，达到削弱和消灭八路军的罪恶目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直接令山东纵队调往北宁路作战，限制八路军向南发展，以防同新四军联成一片。

面对严峻的形势，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急需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了15个县的地域，兵力2万多人；

三是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兵力8000人左右。徐向前清楚地理解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他和朱瑞到山东，担子是重的，斗争将是极为复杂的。

6月初的冀南平原，麦香味掺杂着战争的硝烟，一起冲入人的肺腑。徐向前告别这块希望的田野，战斗的田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田野，带着一支警卫小分队、一匹马、一辆自行车，踏上了新的征程。在馆陶，他与朱瑞会合。朱瑞从山西来，带着100多名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干部。其中有王建安、罗舜初、袁也列、徐黎平、谢有法、刘志超、李竹如等同志，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洗礼，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听说跟徐向前、朱瑞去山东，个个都兴高采烈。

行军途中，徐向前有时骑马，有时骑那辆德国造的自行车。自行车在今天，连五六岁的孩子都会骑，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挺稀罕的洋玩艺儿。八路军干部会骑马，但会骑自行车的很少。同行的干部战士看看徐向前灵活自由地骑着车子跑，感到很新鲜，有的干部也想试试，不是上不去，就是连人带车甩倒路旁。有的自我解嘲说：“这洋骡不好骑，还是骑马好”。

徐向前笑笑说：“征服它并不难，只要你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你就自由了。”他们走梁山、勒口、泗皋、在泰安以南经过津浦路，经西石莱、东石莱、白马关，于6月29日进入沂蒙山区的代庄。

沂蒙山区因沂山、蒙山、沂河像兄弟姐妹一样汇合在一地而得名。它位于山东中南部，与苏北接壤。别看这里历来贫困，困境也能出文韬武略之才。荀况、诸葛亮、三羲之、刘勰、颜真卿等著名历史人物，就曾出生在这里或在这里一展风采。历史的长河流入1939年，这里又成了齐鲁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个重要战场，徐向前成了这里指挥抗战的主将。

代庄是在孟良崮西南的一个小庄。退可上山，出可上路，是战争年代很好的指挥所。

徐向前、朱瑞到这里第二天，就会见了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领导人。徐向前坐在一张旧“太师椅”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听汇报和同志们亲切交谈。他虽是初到山东，但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一无所知。一年以前，他就参与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南宫，他曾两次邀见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专区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保安司令、鲁西北的著名爱国人士范筑先，同他建立联合战线，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联成一片。徐向前在一次欢迎范筑先的大会上致词说：“范司令是山东的抗战老人，他曾坚决拒绝了韩复榘叫他退到黄河南的命令。团结了鲁西北的广大民众，组织了抗日武装，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范司令这样的年纪，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辞劳苦与敌人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要亲密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筑先在致答词时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亲密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

向徐向前汇报工作的张经武、黎玉，1938年8月奉命离开延安，带160多名干部到山东开创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经冀南到徐向前的指挥部。徐向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打心眼里赞成，他在南宫同张、黎交换了意见，对山东如何开展游击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还抽调一个营的兵力跟随他们去开展斗争。

冀鲁边的根据地建设，是山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也凝聚着徐向前的心血。1938年5月，徐向前根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示，与陈再道、宋任穷提出了组织一个纵队挺进胶济路南活动的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的赞同，后改为出兵冀鲁边，徐向前和当时任冀鲁豫省委书记的李菁玉研究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马国瑞率曾国华、孙继光两支队出兵天津以南、回归黄河故道以北的地域。徐向前为马国瑞送行时说：“你带五支队和津浦支队到冀鲁边一带，开辟冀鲁边区的工作。战略上以乐陵为中心，先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搞黄河以北的鲁北一带，与清河区打通。”

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10日、18日，山东《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

案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副总司令彭委令开兹委徐向前为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等因奉此，遂于七月中进抵鲁南就职视事。自维轻材，难膺重寄，绠短汲深，每虞殒越，惟了兹国难，只有勉竭駑駘，在总司令于、副总司令沈、韩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

统一战线奋斗到底。敬恳时赐南针，以匡不逮，谨电奉闻，伫候明教。

通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政界、军界乃至民间的重视。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在徐向前等人来山东之前，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曾一度影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由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退让太多，诸如：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取消了北海行政会署及北海银行；没能像冀南那样，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逃跑时委任自己的专员、县长和区长，有的即便委托一时，后又被国民党省主席沈鸿烈一下撤换；对顽固派以至汉奸的进攻，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还击。如此这般软弱，使山东根据地与抗战曾一度受到挫折，党中央对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领导，被动局面已开始好转，徐向前和朱瑞的任职，又是一个实际行动。

一踏上齐鲁大地，徐向前感到八路军在此立足不稳。他在鄂豫皖有自己的天下，在川陕边有自己的天下，在冀南也搞了一块自己的天下，所谓自己的天下，用他的话说就是“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可眼下，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粮秣弹药，几万军队穿衣、吃饭、治伤医病都成了问题，连徐向前吃饭都受到威胁。一次他到部队开会回来，肚子饿了竟没有饭吃。他苦笑着对身边人员说：“蒋委员长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只能自己解决喽！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不行啊！”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徐向前熟读兵书，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世根底，思想倾向，性格习惯也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政权，就要对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和沈鸿烈采取一拉一打的不同方针。

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山东蓬莱人，清朝末年考中秀才。北洋军阀时期，他先在吴佩孚手下当官，后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麾下，当过师长、军长和临绥驻军司令。

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暗中拉他脱离东北军，他不干。“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于学忠暗中坚决支持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对蒋关押张学良不满，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张学良的忠心，把少帅骑过的马养在身边，自己不骑，也不准别人骑。笔者的祖父马海洲曾是张作霖之子的军马官，也讲过这个故事。于学忠虽然对蒋介石不“忠”，对共产党也不“热”，还领兵打过红军，骂过共产党。因国共合作了，使他很尴尬，不得不奉行：“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哲学。

八路军要在山东建立政权，首先要从上层做于学忠的工作。于是，徐向前登门去拜访。于学忠把徐向前作为贵宾接待。

只是一谈到八路军的供给等问题，于学忠就板下脸。他说：“徐司令，我的处境也不好啊！”徐向前说：“于司令，我们八路军在山东抗日，可国民党却不给我们武器装备和薪饷。要打鬼子，打汉奸，我们共产党人没人民政权，没稳定的根据地不行！”一谈到“政权”二字，就像拨动了于学忠的神经。对此他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

八路军是军队，不搞政权也可抗战呀。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哩！”徐向前进一步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

于学忠很敬重徐向前。又是初次相会，不好把关系搞僵。

表面上友好，实际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最后于学忠提出，八路军搞政权，要合乎法律，要经省政府核准与委任。徐向前诙谐地说：“于司令，我赞成你说的前半句话，我们八路军一定要搞政权，后半句话就不好办了，你还不清楚？要合乎蒋委员长的法律，要省府批准，我们的军队早就不存在了！”

徐向前和于学忠谈判之后，随即发电延安，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他写道：于学忠对我提出的一般问题经解释后，尚不坏，仍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但思想太旧。于学忠与沈鸿烈有矛盾。

沈鸿烈何许人也？此人出生湖北天门县，18岁中秀才，1906年春考入日本海军学校，为第二期学员，1927年7月张作霖委任他为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任海军上将副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时，担任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日军在青岛登陆时，他不战而逃，跑得比韩复榘还快还远。

可他很会脱身。古代有“五十步笑百步”之说，而他来了个“百步告五十步”的刁状。据说蒋介石杀韩复榘，与沈鸿烈告状有关；又据说，他因告状有功，当上了苏鲁战区副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此人打日本鬼子外行，反共产党内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见人就捉，动不动就杀。他扬言：“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徐向前在冀南时，曾会见过他，对他限定八路军在山东的人数，活动范围给予坚决驳斥。徐向前告诉他：“抗日需要多少游击队，我们就发展多少；抗日需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总不能让日本人横行，而对抗日军队加以限制吧！”

徐向前到山东后，采取的方针是：稳住于学忠，狠狠打击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坚定发展人民政权。到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十四个专署，250多个区政权。有了政权，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切，无不惊呼：“共产党徐向前厉害呀！”

四十多年后，徐向前在回顾山东抗日政权建设时，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建立政权，采取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我抗日根据地内或条件具备的地方，一律经民主选举，产生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各级政权机构。雷厉风行，发号施令，行使职权。那时还不叫“三三制”，但各级政权机构中不光是共产党员、工农和群众代表，还包括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社会名流等。

所以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稳定局面，坚持抗战。

山东是著名的齐鲁之邦、孔孟之乡，有重视文化的传统，且不说交通发达的城镇，就是穷乡僻壤间，也不乏书香门第，差不多每个区乡，都有举人、秀才、教师、医生等人物。还有些是从大城市跑来根据地抗日的作家、记者、学者、社会名流等。他们多数有爱国思想，拥护八路军抗战，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又有文化知识，参加各级政权机构，对我们有好处。

鲁中敌人大大“扫荡”时，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塌台，县太爷们逃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成了无政府的空白区。

好得很！我们抓紧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泰安等县，搞了一大片政权。那些国民党县、区镇长摇大摆地回来，没有人买他们的帐，只得夹着尾巴溜掉。这类地区的政权建立工作粗糙些，形势逼出来的，当然要做许多善后工作，逐步调理和巩固。到1940年3月间，山东境内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有40多个；年底，发展到90多个县政权及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山东省参议会亦宣告成立，由进步人士范明枢任议长。他是位德高望重的抗日“老寿星”，年近八旬，仍不辞辛劳，为抗日事业忙碌奔波。不久，还成立了黎玉任主任委员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

各级政权机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新局面。在扩大兵员上，通过深入宣传、拥军优属等活动，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形成了参军、拥军的热潮。在统筹部队给养上，实行按土地多少，合理负担，统一征粮的办法，部队所需的粮食，一律由县政府筹粮机构按计划供应和调拨，初步改变了过去“走到哪村吃哪村”的状况。在土地政策上，贯彻减租减息、低利借贷，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农民抢种抢收，多打粮食，支援抗战，改善生活。在财改上，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按照累进税原则，征收必要的税款；发行货币，抵制伪币，流通金融，繁荣商业；开源节流，利用各地的资源，多办些小型矿业、工厂、手工业生产，严禁贪污浪费。在地方武装工作上，各县均组织自卫团，发展区、乡、村的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显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优越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双方经常拉锯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

这类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逐步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里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送情报，他给日本人送的是假的，给我们送的是真的。我们过铁路，就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样，村长敲着锣喊：“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安全通过。我们在村子里吃住，他好好招待一番。临走时，部队才派人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报告呀！”就蒙混过去了。这也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造就的一种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不甘心当亡国奴，有套应付复杂局面的本领。当然，关键在于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有实力，又有正确的政策，因而才能吸引他们，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把他们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变成对抗日有用的力量。

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要他们多办好事，少

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1939年日军对鲁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团体”取而代之。

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及时提出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徐向前深知毛泽东的部署，为达此目标，他和朱瑞、罗荣桓、张经武、黎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抓部队质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大部分干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新成份大量涌入，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也使部队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題。山东纵队是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部队扩充快与干部培养训练跟不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徐向前明确提出：“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必须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务和要求。”

第二，强化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徐向前本人是教书先生出身，深知教育的重要。他积极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培训队，办干部培训班。从上到下层层办学。还选调一批干部到抗大山东分校深造，分别对在任的团以上干部和营以下干部提出学习的课题和规划，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干部的必学内容。

第三，为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第一一五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为保证第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两支部队互相交流，并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的目的。

第四，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气势。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不择手段地在各地扩展实力，短短几个月，就在山东拉起民团、游击军之类五花八门的队伍达10万之众，为积极反共做准备。徐向前对此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一方面，八路军和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另一方面注意争取和收编愿意抗战的杂牌武装，在人力上与国民党“拔河”，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第一一五师1940年初为5.8万人，到9月份就发展到7万多人。

第五，对山东纵队实施整编整训。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

支队，可谓迈开了正规化的步伐。

第六，千方百计改善八路军的物资供给。除向前刚到山东时，由于政权建设是个薄弱的环节，7万大军的物资供给极匮乏。后来，由于有了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筹粮、筹款、做军衣做军鞋支援八路军，供给比过去改善了。但当徐向前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宁愿吃糠、吃野菜糊糊也要保证部队供应时，他为山东的百姓的精神感动了，他号召部队：不能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由于徐向前等领导人对山东部队的质量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这支部队实践了他们提出的“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的响亮口号。民主政权的巩固，武装力量的壮大，为粉碎日寇的“新扫荡”奠定了必胜的保障。所谓“新扫荡”，是与日军战略进攻时的“扫荡”比较而言的，徐向前将其特点概括为：

-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 “扫荡”是不平衡的；
-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徐向前指挥部队采取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和伏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狠狠打击了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胜利，孙祖战斗就是生动的一例。

1940年3月14日，敌据点铜井有从沂水、莒县方面增来之敌，朱位也有增敌。铜井之敌当夜幕降临后开始向依汶出动，朱位之敌附之南下，占岸堤，袭击我沂水五区区政府和游击队后，折而东进，铜井故占依汶，袭击安堡庄后，两路敌人约400余人于15日上午10时在牛王庙会合休息。徐向前一面分析送来的敌情报告，一面注视作战地图，认为敌人下一步可能继续向岱庄、孙祖“扫荡”，尔后再转回铜井据点。徐向前认定这是一次伏击歼敌的极好时机，于是星夜调第二支队一部北上，同时集中了第五支队的交通营，在兵力上形成了优势，埋伏地点选在孙祖与铁峪一带。16日战斗打响，经两昼夜的游击战，共毙伤日军二百余人，缴获一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打了一个胜仗。

类似孙祖这样的战斗打了多次，诸如：1939年6月的莒山战斗；1939年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8月的梁山伏击战；1939年9月的冶源战斗；1939年10月的五井战斗；

1939年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的总破袭战；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1940年4月的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等。至于零星战斗几乎天天都在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多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名，破坏公路1.2万公里，铁路500公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舰一艘、汽艇7只，击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显示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

寇的“新扫荡”屡遭惨败。

重返延安。毛泽东派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新校长办校有方

沂蒙山区的初夏，缺水的大地降了几场中雨，田野里麦浪滚滚，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丘陵披上了绿装。战火夺去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夺取了无数绿色的生命，但坚强的中国人民，辽阔的中国大地，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征服，仍在顽强地战斗着。

徐向前在临沂至孟良崮之间的青驼寺指挥所，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要他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齐鲁大地战斗了一年多，这里的战友，这里的百姓，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待完工作，于1940年6月7日带着一个警卫连、一名医生，走出青驼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战斗旅程。

何以称之为“战斗旅程”？从山东沂蒙山区到延安，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坐上汽车、火车，不过三五天的事，要是坐飞机，就更快了。可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中，这一段路程可不容易。

徐向前和他带领的50多人，经过200多天的艰难跋涉，于1941年元旦前夕才到达延安。

为了参加党的七大，来自几个抗日根据地的代表中，竟有几十人没有到达延安就在同日伪的遭遇战中，长眠在漫漫旅途中了。徐向前一行一路走下去，经常与敌人遭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一道道封锁线，用老师自己的话说：“走得并不顺当！”

经过几天的行军，徐向前和护送他的警卫连进入了新泰地区，津浦铁路从这里穿过，铁路两侧碉堡林立，鬼子的巡逻队严密监视这条大动脉，过铁路就是过封锁线。夜深了，徐向前一行在老交通的引导下，选择敌人的薄弱处开始通过封锁线。警卫连按前三角战术展开，将徐向前置于绝对安全的“空心”部位。尽管特别小心、快捷，还是被伪军发现了。敌人的探照灯光柱扫过大地，接着就是一排排子弹射过来，一部分战士在连长的指挥下护送徐向前飞速跃过铁路，指导员指挥战斗分队向敌人猛烈还击，把敌火力全部吸引过来，边打边交替向前跃进，尾随前头分队迅速向山区转移。惊恐万状的伪军并不知虚实，追了一段后才发现离开铁路和根据地仅几百米了，便慌忙后撤，生怕被八路军吃掉。

徐向前到达泰安市境时，将护送他的连队干部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需要你们，我身边留一个警卫班就够了。连长、指导员不肯回去，坚持要送徐向前到延安，直到徐向前下了命令，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返回。

继续向西行进，在肥城地区，碰上敌人“扫荡”，前进受阻。

徐向前决定同鲁西部队一起投入反“扫荡”斗争。他们时而甩掉敌人，时而又突然向鬼子的薄弱部位狠狠地打一家伙，打打转转，转转打打，一打一转就是二十多天。当时正是雨季，敌人在泥水中拖得精疲力竭，只好退回

据点。徐向前开始向梁山地区进发。

几场大雨，使东平湖水暴涨，水面宽达 10 多公里。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梁山好汉们的天下，如今成了八路军一展雄风之地，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徐向前一行乘上一条小木船渡过东平湖，穿过梁山地区，到达郓城、鄄城一带鲁西军区司令部，在这里见到了军区政委肖华和宋任穷。徐向前和宋任穷在南宫一别已经一年多，如果是在今天，一定要好好聚一聚、谈一谈，可在那时不允许，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八路军。朱德、彭德怀虽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石部调至洛阳整训，但蒋迟迟不批。徐向前和肖华、宋任穷一见面就得跟部队东奔西跑，转了好一阵子。在冀鲁边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这里稍平静一些，孟庆山请求徐向前给干部讲讲抗战形势，多住几天养养身子。一天，徐向前刚端起饭碗，只听外面说说笑笑来了不少人，原来是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路过这里，男男女女 40 多人，好不热闹。

第二天，中央来电，要徐向前负责带队，将这些代表带到延安。

徐向前的队伍由 10 多人猛增到 50 多人，从冀鲁豫边向延安出发，要两渡黄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川溪，要躲开敌人的据点，避免与敌遭遇，保证七大代表的安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鲁西，由孟庆山派部队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形成一条安全走廊，使徐向前一行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冀东南边界后，当地交通选择了大名和金滩镇之间的卫河拐弯处准备过河。这里离敌人据点比较远，避开了轻重机枪的射程，但由于人员较多，分几批渡河，被一个据点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用迫击炮向渡河点射击，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渡船附近，巨大的水柱溅起一丈多高。有几位同志被弹片擦伤，大家一边互相包扎伤口，一边拼命向北岸划水。突然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在小船右舷不远处水中，炮弹爆炸时掀起的波浪差点把小船打翻，就在这一瞬间，坐在左舷的华南代表，一位大学教授不幸落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体人员渡过卫河之后，敌人停止了炮击。徐向前选择了一片芦苇荡，让大家稳定一下情绪，清点人数，组织护理伤员，继续前进。他对那位不幸牺牲的教授，表示惋惜！

雨季提前到来，太行山的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注入漳河，使原先并不宽的河面，成了一片汪洋。没有桥梁，没有渡船，好在河水不深，徐向前只好让护送的连队找了一些绳子，再将这些绳子三股合为一股，横跨漳河两岸。每隔几米就站立一名健壮的战士，将缆绳拖起，形成一道水上长廊，人们涉入齐腰深的河水中，双手抓紧绳子，从激流中拼搏过去。这时在冀南的高厚良按徐向前的安排，亲自带上警卫分队迎接并安排代表们到威县以南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村庄里休息。一年前，徐向前曾在这一地区战斗过，如今路过此地，看到的是队伍更壮大了，平原游击战越打越顺手了，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星期，受伤的同志基本痊愈了，便告别高厚良和他的部队，从邢台、邯郸间的永年地段穿过京广线，连夜通过敌封锁沟，向巍巍太行山前进。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农民在春天播下的种子，到这个时候，已是果实累了。英雄的八路军将士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收获。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自 8 月 20 日开始，到 9 月 10 日结束，已胜利完成交通破击战，摧毁正太铁路的任务，使日伪的交通命脉受到无情的分割，第二阶段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各兵团正扩大战果，连续破击交通线、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

徐向前一行抵达辽县八路军总部后，见到了正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彭总向徐向前介绍战役进展的情况后说：“徐总，你离开一二九师一年多了，我也要去那里研究一下作战，我们一块去看看。”这也正是徐向前想说又不便说的事。

他怕影响彭总指挥，怕给师里的同志增添负担。听彭德怀说要去“研究作战”，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在一二九师部，徐向前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他们对副师长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虽然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可此时此地，互相握手、拍打、谈笑，简直就成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少年。徐向前提出要到前沿去看看离别一年多的一二九师官兵，彭、刘、邓满口答应，都说一路去。陈赓的部队正在攻打一个山头，日军死守这个高地，双方打得很激烈。日军火力甚强，居高临下，凭险扼守。八路军英勇顽强，轮番冲锋，久攻不克。彭德怀火了，骂道“这群小鬼子，都是他妈婊子养的，我让你好好尝尝八路的厉害！”于是，给陈赓所部下了死命令：“用牙啃也要把这个山头啃下来，非攻下不可！”最后小鬼子实在坚持不住了，部队终于将鲜艳的军旗插上山头。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到12月5日基本结束，八路军参战的号称一百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缴各种炮53门，长短枪5800支（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八路军自身伤亡1.7万余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徐向前重返延安的后三个月旅程，都是在百团大战期间走过来的。走走停停，敲敲打打。徐向前同彭德怀在一起，一转就是一个月。当战斗紧张气氛稍一缓解，他便告别彭总，继续西行，由祁县、崞县之间渡过汾河，经交城地区沿吕梁山脉行进，至军渡坐船过黄河。此时的黄土高原已入冬季，纷纷扬扬的雪花，把大地染成一片银白。

风雨冰雪，枪林弹雨，艰难行程数千公里，历时200天，徐向前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开始，他被安排在小砭沟北面的一座窑洞里，左邻右舍住着傅钟、黄克诚和张经武等。毛泽东听说徐向前已顺利回到延安，便告诉秘书：要尽快安排向前同志来我这里，谈谈山东的情况。徐向前也很想早点见到毛泽东。一天下午，在杨家岭窑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毛泽东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一路辛苦了。”他从徐向前的头一直看到脚，再从脚下看到头，似乎又记起徐向前从西路军回来时，他对徐向前说过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句话。转眼三年过去了，徐向前真像一只大母鸡呢！他从冀南到山东，又参加造就了近10万大军。谈话中，徐向前向毛泽东面交了朱瑞给党中央的关于山东一年情况的一封长信。毛泽东没有马上看信，还是认真地倾听徐向前谈山东的情况。两个人谈得十分高兴。毛泽东对山东的局势是比较了解的，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掰着手指说：山东是我们重要战略支点之一，不论现阶段还是将来的战略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徐向前认为毛泽东高屋见瓴的分析十分正确。他一边点头，一边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着。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说

到这，毛泽东做了一个自搥手脚的动作，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接着说：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既要有打，也要有拉。一打一拉本是蒋介石对付我们共产党的手段，我们现在拿过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接着，毛泽东告诉徐向前：七大哪一天召开还没确定，要他先休息，看看文件，抽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敌后的情况。在徐向前告辞时，毛泽东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现在住小砭沟是吗？”徐向前答：“是”。毛泽东“噢”了一声。

几天后，中央机关将徐向前接到了王家坪大院。朱德、叶剑英等都住在这里。王家坪环境幽静，树木多些，虽然都已落叶，但株株挺拔，充满生机。

光阴似箭，一转眼徐向前在延安住了两年多。其间，有一次他去给派往山东的干部介绍情况，他骑的马在途中受惊，嘶叫狂跳，徐向前摔断了左腿胫骨，治疗半年才痊愈。

这时七大尚未召开，代表们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为了做好迎接党的七大的思想准备，中央决定先组织高级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徐向前同叶剑英、李涛、边章等编在高级研究组。1942年5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样，原先还准备返回山东的徐向前，就留在了延安。

贺龙和徐向前，原先一个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一个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现在成了正副职。两个人都把精力放在部队建设上，一面参加整风学习，一面组织大生产；一面抓部队训练，一面指挥边区部队同国民党军的摩擦进行斗争。有时两个人抽出空闲也聊聊天，关系融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3年初春的一天，徐向前正在王震指挥的三五九旅审查生产规划，检查春耕准备情况，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徐向前告别王震，快马加鞭回延安，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见徐向前风尘仆仆地赶来。赶忙递给他一支香烟，开门见山地说：“向前同志，今天请你来，是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徐向前眼睛一亮，脱口问了一句：“是让我上前线啦！太好了。”毛泽东夹着香烟的大手在空中一摆，一缕淡蓝的烟在空中留下一条斜杠，这条用烟划出的杠杠，已否定了徐向前的猜测。

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治军先治校，要办好军校，第一重要的是选好校长。他对徐向前说：抗大总校要从邢台搬回来，同第三分校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口，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作准备。抗大缺个校长，林彪从红大就是校长，名义上没变，可是他去一一五师快6年了。党中央决定，要你代理抗大校长。

对此，徐向前感到很突然。他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忙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

毛泽东的目光落在徐向前身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十分信任地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当过先生，又是黄埔生，指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有作战经验，办学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

徐向前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毛泽东笑着继续说：“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

徐向前表示：“既然组织定了，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接换我。”

毛泽东接着又强调了办学的任务和要求：抗大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干部，准备反攻。

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像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最后说：“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要讨论式，不要搞‘先生’一言堂。

向前同志，这些你是知道的，就算‘老生常谈’喽！”

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始创办时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林彪，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兼任，教育长罗瑞卿，党总支部书记莫文骅。这所学校于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前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1937年春，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将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部也由瓦窑堡迁到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副主任莫文骅接任），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以后相继在抗大任过领导职务的还有张际春、胡耀邦、许光达、陈伯钧、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从成立到1943年已培训了八期学员，其中毕业学员已达1万多人。先后成立的12所分校，分布在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培养了7万多学员，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指挥员。

1943年3月中旬，徐向前离开延安，到绥德走马上任。走了4天的山路后，绥德出现在眼前。何长工派人将徐向前接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徐向前握着何长工的手说：“长工同志，你是办校专家呀！从井冈山的教导队到今天的抗大，可谓‘桃李满天下’了。”何长工笑着说：“说不上桃李满天下，毛主席让我办教导队，我就去办教导队。毛主席让我办抗大，我就来办抗大了。毛主席派你来主管抗大工作，我一定尽心尽力，共同把学校办好。”

过了些时候，李井泉也到任了。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了。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对抗大进行整编，端正思想，建家立业。“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付诸实施。徐向前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求，对抗大进行了整编机构、统一编制、调配干部、充实教学第一线的工作。校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外，教学工作只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只设供给处、卫生处，科、处均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编5个大队，46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都一身二职，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校干部和教员仍缺额很多，不得不从学员中调任一些，从延安编余干部中又补充

一部分适合做院校工作的干部。

端正学员的思想，培养抗大校风，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环节。徐向前上任后，一面建校一面招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有从各根据地，来的青年学生；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有男学员、也有女学员。一批批涌入抗大，多达 6000 余人。人多，各种想法也多。有的对办院校，培养储备干部，准备反攻的战略思想不理解，片面认为前方打仗光彩照人，入校学习脸上无光；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心里凉了半截。针对这些思想，徐向前和抗大校领导人决定，要在全校首先开展端正入学态度的专题教育，要求学员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沟通，互相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学员队，与学员们谈心。一些来自敌占区的学员说：到抗大的第一课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时间不长，胜读十年书啊！

抗大，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训练器材，都是十分困难的。

全校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边学习，一边建立革命家业。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自己挖，课堂自己盖，粮食蔬菜自己生产。徐向前身体弱，腿脚行动不便，仍跟学员一道劳动。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努力，全校共挖窑洞 200 多眼，大大小小的课堂遍布七沟八岭；新开荒的土地上长出了玉米和谷子。学校还开办了合作社、油坊、豆腐坊和磨坊，养了成群的猪和羊，全年收入近 300 万元，改善了办学条件。

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既保证了办学，改善了学员生活，又提高了抗大的战斗力。这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令胡宗南集中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号召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徐向前组织抗大教职员工，边教学边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学员都发了枪，按一线、二线的防御作战梯次配备。

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边区军民准备充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被击退。

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的第二件大事，是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党整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安整风，是从 1942 年初开始的，取得了不少经验，是全党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抗大的整风审干怎么搞？徐向前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正开会进行研究。徐向前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

其目的是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结合整风学习，对干部进行必要的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大胆使用，该处理的就处理，这对保证党和军队的纯洁性是完全必要的。会议还对学校加强整风学习的领导，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给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抗大总学习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

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和徐文烈负责。总学委于 1943 年 8 月 14 日发出了《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地密切地配合进行”。抗大的整风审干运

动在全校各大队、各学员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抗大的整风审干是在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的基础上展开的。校的各级领导对学员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认为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学校在运动之初强调把文件学好，从上到下普遍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和文章，提高思想认识，消除顾虑观望，提高对运动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在学习领会文件的基础上，运动比较健康地转入对照检查阶段。有的学员们自觉地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有的学员主动交待历史问题，每个人都开始写自传，向组织亮底交心。在这段时间里，用徐向前的话说：“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然而，由于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左”与右的两种倾向，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影响党的工作。从1943年10月中旬开始，抗大的整风审干滑向了“左”的一边。党内的“运动专家”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搞“逼、供、信”，独断专行，指导运动，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大抓什么“红旗党”，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偏偏在这时徐向前被召到延安，同林彪、张宗逊一道主持练兵，毛泽东还亲自到练兵现场看望过徐向前等同志。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兵上，而抗大整风则偏离了正确方向。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本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372人，占57%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12月间，毛泽东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1944年7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民以食为天。抗大学员当然也不可抗拒这规律。他们一边开展整风运动，一边掀起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有不少人则是一边写检查、一边搞生产。1944年金秋时节，抗大农田丰收，蔬菜肉食自给自足，创收4.76亿元，比1943年增长160倍。当学校整风审干得到纠正后，学校立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的第三件大事，是组织学员转入正课学习。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是在徐向前到绥德不久就着手制定了，但因校领导对计划几经讨论研究，反复修改多次，再加上整风审干等诸多因素，到1944年6

月才正式颁发。徐向前在颁发教学计划的大会上向教职员工讲了这个计划的总方针和教学原则，他说：“第八期教育计划的总方针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话，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里面，政治、军事、作风都有了，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抗大培养干部的目的和要求。”徐向前讲话，作报告总是不急不慢，一句接一句，让人听起来很有节奏，记录也不难。他接着说：“关于教学原则，我们从实际出发，参照抗大建校以来前七期的教学经验，提出七条原则，第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第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要因人施教；第三，军事、政治、文化教学既要按比例，又要相互结合；第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第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第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徐向前讲得口干舌燥，一阵干咳，头上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他喝口水，静一静，继续往下讲。他不喜欢长篇大论说空话，却爱把问题说透，说得条理。

在徐向前领导制定抗大教育计划时，同志们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预感到两三年内必有大变化。因此，他们把抗大第八期的学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主要学习政治文化，占全年教学日的70%；军事占30%，主要是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本科一年，转入以学军事为主，根据各大队学员的不同基础，设置不同的军事课程，军事占70%，政治和文化则降为30%。两年学制，军事、政治、文化课程的比例是符合抗大学员的实际和对日作战的需要的。

拼命工作，勤于思考，是徐向前的作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终究又把自己累倒了。1944年7月，他突然患肋膜炎，整天发高烧，在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才退烧。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没能出席党的七大，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等负责，徐向前自己说：“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

30

病卧和平医院，毛泽东亲去安慰：“蒋介石决不会让你休闲，仗有你打的”

抗日战争的后4年，徐向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延安渡过的。在小砭沟、王家坪、联防司令部、柳树店和平医院和枣园，处处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他和毛泽东不能说朝夕相见，也可以说经常相会。开会、谈话、一块儿视察，有许多难忘的日子。自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经过四年的延安整风，全党更加认识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原则，善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智慧 and 领导艺术，使徐向前深深敬服。

军事家的爱好、兴趣往往比较单一。徐向前在延安期间，除了学着拉几下胡琴，空下来就是读书。他认认真真地读了、听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章和讲话。他联系自己投身革命以来的战斗经历，细细品味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

断，在整风笔记中这样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他还给自己提出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1. 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 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 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 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 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 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 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 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 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

10. 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

徐向前还写道：

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纠正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偏向，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等等。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央决定，对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留在党内，分配适当工作，也是必要的。从而为无产阶级政党解决路线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表现了我们党的伟大气魄和自信力。历史证明，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做出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很器重徐向前的才能和品格，关心他的健康。在徐向前进进和平医院治疗期间，毛泽东日理万机，既要主持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又要指挥抗日作战，同国民党的摩擦作坚决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仍不忘派人到医院看望慰问徐向前，后来又亲自前往和平医院探望。徐向前因重病住院，身体虚弱，没能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的《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送到徐向前手上。他翻到“两个前途”的论述时，一边细心阅读，一边用红铅笔在轻轻地画着杠杠，“从整个形势看，以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绝对卧床休息，”这是医生对徐向前提出的要求。他像一名士兵对班长的命令一样，服从着医生的嘱咐。可是，医生只能限制他的行动、饮食，却不能限制他的思想。

徐向前在病床上，每天都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徐向前的视线，转移到国民党蒋介石身上。一天下午，他正在读文件，洁白的门帘掀开了，毛泽东高大魁伟的身影出现在病房。护士扶着徐向前坐起来，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治疗得好吗？”徐向前说：“感谢主席的关心，医院对我的治疗可费心哩！”说

着，毛泽东在他床边坐下来。徐向前十分动情地对毛泽东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让我再去打一仗吧！”是啊，他怎么能平静，他怎么能不动情！

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喷薄欲出的时候，他没能带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而是躺在这平静的病床上，他的心情难受啊！

毛泽东亲切地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还是那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身体养好了，以后国民党是不会让你闲着的。’”

徐向前已预见到中国的前途，向毛泽东说：“主席，你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我都看了，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太了解了，他不发动内战才怪哩！”

毛泽东说：“是啊！我们争取不打内战，但蒋介石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毛泽东用两个指头点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提高了嗓音说，“我们也不怕，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快吃晚饭了，毛泽东才离开病房。

毛泽东的到来，给徐向前战胜病魔增添了巨大力量。抗战时期的和平医院、药品、营养品都十分匮乏，关向应、张浩等领导都是患肺病在这里病故的。徐向前要战胜结核性肋膜炎，谈何容易！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向病痛做斗争，他以高度的纪律观念，服从医务人员的治疗和护理。医生要他“戒烟”，他马上交出全部香烟，不再吸一支。医生要他“卧床静养”，他就不言不语地一躺就是个把月。贺龙司令员还专门向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作了交待，尽量谢绝同志们的探望。

陕北高原的金秋时节，天高气爽。徐向前以顽强的毅力向病魔作斗争，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高兴，为自己战胜疾病高兴。他开始下床活动，散散步、打打拳、拉拉胡琴、敲敲扬琴，琴技虽说不高，但民风民俗味甚浓。病房活跃起来，医生、护士有时和徐向前一起娱乐、唱唱陕北民歌。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爸爸拉胡琴的声音，也会把小嘴贴到护士的耳边，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知道女儿在谈什么，他看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心里顿感甜滋滋的。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小雪，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延安枣园披上了淡淡的银装。徐向前离开和平医院，作为毛泽东的客人安排在这里，他戴着口罩、披着大衣，站在雪地上，吸着清新、凉爽的空气。住进枣园以来，他每天都坚持看文件、看电报、阅读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重要演讲。有些重要的观点已深深地铭记在脑海里，“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人民得到的胜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徐向前像教员备课一样，自言自语地品味毛泽东的演讲，忘记了自己是站在雪地上。

徐向前在枣园的日子里，有时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散步，边走边谈论如何对付国民党向解放区军事进攻的问题。徐向前一谈起军事，一谈起打仗，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总是斩钉截铁地说：“要打，就是要狠狠地打一家伙，对蒋介石不打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

一提到蒋介石，徐向前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经过 10 多年的内战，对他的这位校长实在太了解了。他是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硬硬人物，内战是很难避免的。徐向前决心早日康复，准备新的战斗。

1947 年 7 月，徐向前在延安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作战会议，讨论如何用正义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议到山西战局时，有的同志认为阎锡山在山西经营 30 多年，太原又是他的老巢，就解放军在山西的兵力，一时还难以攻下太原。

徐向前站起来：“主席，我对山西的战局谈点意见。”

毛泽东笑笑说：“坐下，快坐下，听听向前的高见！”

徐向前说：“阎锡山虽然尚有 20 万大军在手，还有日军留下的顾问，但我们完全可以击败他，攻下太原，解放山西。理由是：第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有充分思想准备，对形势分析准确，全党全军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常言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我们已为渡过战争初期的困境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二，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海边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从大势上看，阎锡山已处在我军的战略围困之下。第三，全解放区人口已近两亿，我们的正规军 120 万人，地方武装和民兵 200 多万人，形成了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北、东北、晋绥六大战略区，形成了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第四，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是盲目的，三至六个月‘消灭共军’是一个狂妄的计划，指挥作战凡狂妄者必败，就同兵书上所说的‘骄兵必败’是一个道理。”徐向前由于身体虚弱，说话的声音很低，头上渗出汗珠，但他的发言是有力量的，会场一片肃静。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很赞赏，诙谐地说：“我们的向前同志不愧是黄埔的学生，‘红埔’（指抗大）的校长，研究起战争来有板有眼。”

徐向前此时此刻，并没想到他将是解放全山西的总指挥，是最后把阎锡山钉上耻辱架的战神。

革命家婚姻大事，多不美满。徐向前与黄埔老同学黄杰结成伴侣，共同走上前线

中国人常把“婚姻大事”挂在嘴边。然而在战争年代，革命家总把结婚这种“大事”，当成小事一桩。关于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情景，一位随徐向前多年的警卫员有这么一段记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四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她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叫他们快作准备。内心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声。

当我随着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时，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哎！小鬼！”。

这里说的“那天”，是1946年5月4日；“保育院的黄院长”，指的是黄杰。这一年徐向前45岁，黄杰36岁。他们都在延安。战争夺去他们的青春年华；战乱，也使他和她失掉了爱情。

徐向前在20岁上，由父母包办与东冶镇朱门家女子朱香婵结了婚。香婵倒是一位勤快、文雅、懂情理的人，次年生一女孩，取名松枝。爷爷起这名的意思，想使她在贫寒中能像松树一样苍劲耐寒。哪知道这孩子命苦，刚满周岁妈妈就得了一种不能吃、不能喝的病死了。此时，徐向前已经离家远去，投考了在广东的黄埔军校。从朱香婵死后四年多，徐向前一直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心思也没有机会再娶。

1930年徐向前到鄂豫皖苏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安县七里坪的女共产党员程训萱。他们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结婚不到一年，张国焘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大“肃反”，把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给杀害了。徐向前深深怀念着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好妻子。从程训萱牺牲到1939年的八年中，徐向前转战了许多地方，都没想到再结婚。

尽管他手下红军中有不少女将和女兵，在川陕苏区还建立了一个“妇女独立团”，爱徐向前的女子不少，徐向前却把心情用到作战上。直到1940年春临离开山东去延安前，才经同志劝说与一位姓王的女干部结了婚。婚后三年，两人因感情不合分手了。离婚后，徐向前没心思再娶。谁想他从到延安后，不是落马负伤，就是患病，许多战友，特别是一些“老大姐”，左说右劝，四处说合，这才和黄杰结婚。

黄杰，也是一位婚姻不美满、个人经历坎坷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原名黄书莲。两岁时父亲病故，她和一个智力不全的哥哥，随同母亲靠出租土地和卖油生活。伯父黄仲甫是郝穴镇上有名的地主豪绅、民团团总。他不仅不照顾黄杰这一家寡母弱女和可怜的侄儿，反而多方欺凌他们，想逼迫黄杰的母亲改嫁，硬要把黄杰嫁给镇上姓刘的商会会长流氓成性的儿子。黄杰从小性格倔强，渴望自由，反对旧礼教，反抗缠足。1924年她不满15岁，就逃出黄家去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书。第三年又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就在这一年，北伐军攻下武昌，黄杰又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这个女生队当时共招收了183名学员，后来不少人成了女中豪杰，像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就是其中的一位。黄杰在军校中，算得上人小志气高的女兵，她身着灰色军装，扎着皮带，打着绑腿，英姿飒爽，十分活跃，学操典，打野外，还读《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军校学生还编为中央独立师，参加保卫武汉的西征作战。

女生队参加战场救护，向群众宣传，黄杰事事跑在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杰潜回家乡，在白色恐怖下先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参加共产党。随后被派往松滋县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她开始以松滋女子学校教员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这里，她领导了九岭冈暴动，指挥工农革命群众收缴反动民团枪枝27支，武装起自己的队伍，并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九岭冈暴动在敌43军镇压下最后失败，黄杰则成了松滋县反动政府通缉的“女犯”。

1929年4月，黄杰被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开始她以电话接线生为掩

护在法南区委工作，曾爬上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楼上平台，把革命的传单撒向南京路。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她随曾中生（曾钟圣）去南京组织领导秘密工作。不久曾中生被正式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黄杰在他的领导下，经常化装四出活动，1930年秋，黄杰随曾中生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就是这时候，她和曾中生结了婚。她们结婚不久，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工作，从此失去联系。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她和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们一样，化名六妹，冒死战斗着。不久，闸北区委书记被捕，黄杰在那个区呆不住了，又调到沪东区继续做女工部长。

1933年“五一”节奉命组织沪东区工人游行集会，被巡捕抓住推上了黑车。在英租界法院看守所，她死不承认是共产党人，一口咬定叫赵映华，是刚从外地到上海碰上游行，跟着看热闹的。法院抓不到证据，此时，宋庆龄又请律师为一批被捕的革命者作辩护，黄杰最后被法院定为“违犯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五年，“念其年幼无知的妇女，减半执行”。黄杰在租界女监，度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涯，1935年底被释放。她辗转到香港，终于经过种种曲折，最后找到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

徐向前和黄杰说起来也是有缘分的。他们在武汉军校时，曾共同学习、战斗过。不过当时徐向前是军校的队长；黄杰只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女小兵。黄杰真正知道徐向前的大名，那是30年代后，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这时，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开始为红四军），把“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徐向前的名字。徐向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和曾中生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两个人朝夕相处。徐向前从曾中生口中，知道黄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跑“交通”。

黄杰和徐向前，都是曾中生最亲密的战友。黄杰和徐向前结婚后，两个人常常深情地谈起曾中生。黄杰念念不忘和曾中生一块儿在上海、在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日日夜夜，一次次脱险的情景。她十分敬重曾中生的勇敢、机智和高度的党性原则。在她晚年写的《风雨年代》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和曾中生相识、共同战斗、结婚和离别，直至他被张国焘杀害的情况。

她深情地写道：“我和中生结婚不久，聂荣臻同志找中生谈话，派他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那时，只晓得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生死离别是常有的事。我们虽然依依不舍，但仍然服从革命需要。中生和我约定，几个月后在鄂豫皖相聚，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由西北军委印发全军干部，人手一册，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曾中生同志于1935年8月在川北卓克基被张国焘密谋杀害时，年仅三十五岁。”

人生的路曲曲折折，徐向前和黄杰都不曾料到，他们从武汉军校分别，十年后又又在延安相会，而且成为终生为伴的夫妻。

共同的革命理想，坎坷的个人婚姻，使徐向前和黄杰十分珍惜他们的结合。婚后，徐向前处在养病之中，身旁又有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黄杰既要当“护士”，又要当好妈，更要管理好保育院一窝孩子和全院工作。白天

黑夜忙，家里家外跑。一次徐向前半开玩笑向黄杰说：“人家结婚找个快活，你找个麻烦呀！”黄杰只是笑笑。她已经习惯了苦难的生活，再苦再累，从不发一句怨言，特别是对徐向前前妻留下的孩子，她看得比亲生的还亲。她把每一个革命后代，都当亲生的儿女一样。她期望着孩子的成长，期待着和平尽早来临。

然而，战争终究又全面爆发了。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大军，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起全面进攻。自蒋介石从“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后，把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放弃延安的指示》。同时，决定将一部分机关、医院、保育院和伤病老弱干部，先行疏散到晋绥解放区。徐向前、黄杰以及王明、郑位三等都属于疏散之列。毛泽东在欢送徐向前等人的会上，说战争要准备打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要大家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徐向前此时不想别的，只想身体快快恢复，早上前线。

徐向前和黄杰在绥德住了20多天，转眼就到了年底。前线的战报不断传到绥德。徐向前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心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一天晚上，徐向前一边看着闪闪跳跃的灯火，一边看着在灯火下为快要降生的婴儿作衣服的妻子黄杰，轻声轻气却又非常坚定地说：“战局这样紧张，老呆在后方转来转去，实在不安，我们还是一起到太行前线去吧！你虽然怀孕在身，但路上有人照顾，我看不会出问题。”黄杰理解丈夫的心情，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拿来纸墨笔砚，对徐向前说：“快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个报告吧！”徐向前心里格外高兴，笑容满面，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妻子而自豪。

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徐向前，批准他先到太行山地区休息，待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到晋冀鲁豫军区任副司令员。徐向前和黄杰接此批复十分高兴，马上收拾行装，向徐特立、王明两家告别，带上警卫人员、伙夫、女儿鲁溪，牵着两匹战马，向山西进发。

正是数九寒天，西北风像一条条冰冷的皮鞭抽打着人的全身。一路上，越过数不尽的沟沟峁峁，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只有到中午时，才显得有点暖意，大家也就显得更快活。徐向前一行到达黄河边的军渡渡口，当地部队派人护送他们乘船东渡黄河，冒着小雪继续前进。1947年元旦前夕，他们到达晋绥根据地的柳林。贺龙得知徐向前到来，特别高兴，专程从兴县赶来看望、拜年，两位老战友痛痛快快地过了一个新年。

1947年2月初，徐向前和黄杰离开柳林，经离石翻越吕梁山脉，到达汾阳。陈赓派查玉升带一个连来接徐向前。陈赓知道徐向前的身体还很虚弱，黄杰又快临产，特意交待查玉升预备担架。他们选定祁县以南、崞县以北过汾河。入冬以来，河水一天比一天浅，但让徐向前一路涉水过河显然困难。接应护送的连队在查玉升指挥下，在附近老乡家借来一些门板，木料搭成浮桥，趁着夜暗通过了汾河。突然，徐向前一行的后边响起一阵枪声，查玉升紧张起来，担心敌人发现了，围追堵截，立即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去查明情况。原来是敌人给自己壮胆，乱放一阵枪。进入太行山脉。山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险，“后悔沟”出现在眼前。为什么叫“后悔沟”？意思是人走到这里，稍一不慎就会跌下山沟断崖，命归黄泉，后悔也没用了。为徐向前驮行李的牲口在“后悔沟”拐不过弯，把徐向前的书箱子翻到了沟里，使大家出了一把冷汗。他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后悔沟”，终于到达山下的马村，陈赓已

达这里等候迎接。一见到徐向前，陈赓显得格外高兴，一直陪同徐向前来到安泽。他给徐向前介绍了太岳军区的情况和山西的战局，还为徐向前配备了几个警卫员。

春节期间，徐向前到达山西长治市。这里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市面繁荣，春节的喜庆使这里鞭炮不停，锣鼓喧天，好不热闹！徐向前在一所日本式的宽敞住宅里住下来，第二天黄杰分娩、生下一男婴，取名徐小岩，这是他们夫妻唯一的一个儿子。长治市的驻军是起义不久的高树勋部。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经常在暗中搞点名堂。高树勋对徐向前的安全很关心，既来拜访，又请徐向前去吃过饭，徐向前对高树勋起义之举说了些鼓励的话。因黄杰产后身体虚弱，徐向前也倍感旅途疲劳，他们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

一天，突然空中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敌机临空，在驻地附近扔了三颗炸弹，最近的爆炸点离徐向前住房只差几十米。徐向前分析，他的目标已暴露了，肯定是特务引导敌机搞的鬼，便决定马上搬到离城 20 多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住下，一直住到清明节。此时，战场上的消息不断传来：胡宗南已占领延安这座空城；我军在各战场上连战连捷；敌人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耗；解放军正准备转入战略反攻。6 月上旬，徐向前到达太行山区的河北省武安冶陶，13 日，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当主力部队根据中央“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指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徐向前则留下来，开始指挥解放山西的战斗。

32

老将率新军，攻战运城。新部队也能啃下硬骨头

自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先后奉命外线出击，强渡黄河，挥师南下，挺进中原和豫西，将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新的战场，拉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历史性一幕。

就在徐向前送刘伯承出征时，两位老战友难舍难分，刘伯承说：“咱们还是分开好，分开以后，你指挥内线部队作战更能发挥你指挥作战的才能。留下的部队太少，全靠你扩编和训练了。”

此时，留给徐向前指挥的正规部队确实少得可怜，怎么办？徐向前胸中有全局，一心顾大局。他一方面从地方武装中升级，转为正规部队，以解兵力不足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又积极动员 2 万常备民伕，于 8 月间随陈谢兵团南下，继而又动员 7.3 万名新兵补充到刘邓、陈粟、陈谢、彭张等野战部队。徐向前一手抓支前，一手抓部队的组建，为在山西展开一场与阎锡山的决战作准备。他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第八纵队，辖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旅六个团，作为军区的主力；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一、独二两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八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二旅（独一旅组成后即归属刘邓大军南下）；以太岳军区第十八、十九、二十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总兵力 5 万余人。这些部队大多数是由地方武装干部

组成的，干部新、兵员新、装备差，各旅团按“三三制”组建，均达不到齐装满员。徐向前知道，要指挥这样的部队面对阎锡山 20 多万大军，去攻占山西的几座重要城池，是艰难啊！

长期的战争，艰苦的磨炼，使徐向前养成了钢一般的性格。“难”字，在他的字典上几乎难查到。他最讨厌叫苦的人，最喜爱那些不怕神、不怕鬼的干部。他说：“革命就是难事，共产党员就要迎着困难上。”历史的经验赋予他的正是这样：路线正确，军事指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部队人数会一天天扩大，胜利会一个接一个；路线不正确，军事指挥上犯错误，部队人数会由多变少，甚至有覆灭的危险。他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也对自己的军事指挥充满着信心。部队整编起来后，司令部有的参谋人员不会写命令，他“手把手”地教；干部、战士地方性、散漫性与游击习气严重，他苦口婆心说服教育。

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从实战中提高，使新组建的兵团，迅速成长。

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使命是：独立完成内线作战的任务，围困和消灭山西境内阎锡山的 15 个正规旅，解放山西。对此，朱德总司令就内线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问题，专门同徐向前谈过一次，要他在内线作战中，专门培训攻坚部队。徐向前深感责任重大。此时山西境内的敌人，已处在解放区的四面包围之中。他们凭借优势装备，由北至南盘踞在铁路沿线的大同、太原、榆次、临汾、运城等重要城市及晋中地区的一些县城，继续与人民为敌。运城，位于山西省南端，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南扼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北联“卧牛城”临汾。攻下运城，我军便封住了晋南的门户，既能解除陈谢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又能切断山西敌人南逃的通路，对牵制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也有积极作用。徐向前同滕代远、薄一波共同研究决定再次打运城，一面攻坚，一面打援，在攻城作战中锤炼部队，为解放山西全境摸索经验。他们将作战方案报请中央后很快得到批准。

此时，运城守敌 1 万余人，由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和第十七师各一个团、汽车第六团，阎锡山的保安第五团、第十一团及其它杂牌军组成坚固防御体系。城墙坚固，明碉暗堡星罗棋布，构成一道道、一层层交叉火力网。敌人为了长期固守，储备了大批粮食弹药，誓与人民解放军死拼到底。1947 年 5 月间，太岳部队曾攻打一次该城，经一番激战，占领了飞机场、西关和北头，但越向里打越艰难，因部队要执行南进任务，遂主动撤离转进。

时过 4 个月，徐向前于 9 月下旬组织制定了第二次攻打运城的部署。其作战决心是：以王新亭第八纵队和吕深独立三旅，太岳兵团等部，担任主攻任务；以一部兵力部署在临汾、运城之间的要道处，防敌南下增援；以另一部兵力扼控三门峡、茅津渡、凤陵渡等黄河之渡口，阻击胡宗南派兵增援。徐向前心里很清楚，他所指挥的这支部队是比较新的队伍，除部分指挥员打过仗外，多数基层干部和战士没打过仗和恶仗，如今要攻打敌人防御坚固的城池，就更需要对部队深入动员，周密准备、反复进行坑道作业、爆破、组织火力、诱敌出击和登城破堡的演练，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和滕代远、薄一波于 9 月 30 日电示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

你们攻运城，务作充分周到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

不消耗战，不轻敌。注意下列工作：

一、详细侦察敌工事构筑，特别地堡群构筑情形和有无地道及秘密之处，兵力、火力点等。过去我们对敌地堡认识不足，曾吃了不少的亏。对敌炮火，亦应注意侦察。

二、攻城器材应充分准备。根据敌情同时作各种攻城手段之准备。

三、战斗前，应联系实地情况作反复的战斗演习，特别是攻地堡、爆破外壕与城门，坑道作业（筑碉推进，以地堡对地堡）、火力组织，以及突击队之专门训练等，吸取前次攻运经验，并准备一次攻击不成作连续攻击。

四、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性的讨论，发挥群众智慧，并进行遵守群众纪律之教育。

五、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代价的，只要能全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

以上供参考。

徐向前身为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在一场大仗没有打响之前，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作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他要像老练的电影导演一样，对战斗作一幕幕的设想、分析和决断，拿出比敌人更高明的一着棋，将敌致于死地。就在攻城前三天，徐向前、滕代远和薄一波于10月5日又给王新亭、张祖谅及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发一急电：

只要有把握攻下运城，支付一千人乃至更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你们对时间和敌情不可有任何顾虑，专心一致攻城，充分进行土工作业，并激励全军奋勇战斗，为人民立功。打下运城，不仅解决我区财经问题，且对八纵是一个重大锻炼，尤可夺取大量武器装备自己。你们配有几门野炮、榴弹炮，如炮弹不足，拟即赶运一部给你们。

1947年10月8日，三颗闪闪发光的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发发炮弹射向运城外围守敌的阵地，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战斗开始了。战斗过程中，徐向前等再次电示八纵：对攻击运城，提供下列意见：

一、攻下运城即有把握攻下临汾，望不必顾虑时间与周围的敌情，专心攻城。

二、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

三、估计敌仍将继续反扑，建议你们在敌可能反扑地区，预先布置秘密的短兵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公尺，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打击。

四、以小部队（一个班至一个排）夜间连续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疲惫敌人。

五、所有交通壕沟，应有顶盖设备，以防敌曲射火力，特别六炮及枪榴弹之杀伤。

第二，第三梯队位置，亦均应筑工事（不规则形）。

六、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

七、要克服指战员怕做工事的心理，可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鼓动口号，以充分准备和小的代价，取得决定胜利。

经过一周的激战，我八纵将士扫清敌外围据点，运城守敌已有我大军包围之中，敌电台将求援的电波一次又一次地抛向天空。胡宗南深知，丢掉

运城对他亦极为不力，唇亡齿寒，不能不管，便派其钟松师4个旅，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以十万火急增援运城。

战场情况的骤变，使原先部署的打援部队，已无法阻挡敌人，于是便急令攻城主力部队撤围，开至平陆一带打援。由于敌人装备精良，突击力和快反力强，而我军火力差，又缺乏打硬仗的锻炼，被胡敌一部突破我之防线，窜入运城，再硬打下去对我极为不利，于是只好暂时取消攻城计划，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攻。徐向前写道：

“这一仗打得不理想，部队士气颇受影响。新部队打仗，最怕头一炮不响。一仗下来，没取得多少战果，指战员们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肯定攻城战斗牵制了胡敌南进，对外线作战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同时，指出打援失利的原因所在，由领导上承担主要责任。号召大家加紧训练，积极进行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准备。这样，部队情绪才稳定下来，全力投入攻城训练中。”

1947年12月初，徐向前组织制定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说也巧，此时王震率西北二纵队路经晋南，休整待命。徐向前等领导看准了这支生力军，请王震来司令部作客，同他商量参加攻打运城的作战。王震是位战将，性格开朗豪放，一听说参加攻城作战，哈哈大笑，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了声“行！”答应得很痛快。徐向前立即将此案上报中央，毛泽东复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部署，是因为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潼关、陕州、洛阳一带有4个旅另一个骑兵团，是渡河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联系第二次攻打运城的失利，故特别强调注意黄河以南的胡敌北渡。

正在这时，徐向前和薄一波、滕代远要继续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的全区土地会议，于是，决定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和西北二纵两支部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攻城任务以八纵和二纵主力担任，其余部队置于黄河北岸和东岸的要点，准备打击援敌。攻城作战前，王新亭和王震反复研究敌情、地形，提出首先扫清外围据点，选定城西与城北为主攻方向的作战方案。徐向前认真审查了此案，签署同意。

1947年12月16日夜，运城内外一片沉静，静得令人可怕。天下着大雪，寒风刺骨。

突然，一颗颗信号弹升入夜空，接着是一道道炮弹飞行的闪亮轨迹，划破漆黑的夜空，雷鸣般的爆炸声惊天动地，第三次攻打运城的大幕拉开了。此时运城守敌为胡宗南、阎锡山部及杂牌土顽，共1.3万余人。他们重新修复了被我军二打运城时摧毁的明碉暗堡，加固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凭借强大的火力，在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上，顽强抵抗解放军的攻击。我军的炮火有限，打了一点炮弹，对部队是个鼓舞，对敌人是个震撼，但真正叫劲的还是靠战士们抱着炸药包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爆破。攻城指战员冒雪破堡，横扫外围据点。

经一周外围争夺战，敌四大护城防御阵地均被摧毁，阵地上死尸遍地，血染雪红，残敌为了活命，丢下阵地逃入城中。这时，胡宗南4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重演渡河增援的“好戏”。我军如不迅速攻下运城，全歼守敌，一旦胡敌北援，战场又会出现被动，甚至会功亏一篑。

24日，参战部队发起猛攻，激战两天两夜，没能破城。在这叫劲的时候，徐向前心里十分清楚：敌我双方的绳子都绷紧了，正在进行一场流血的拔河赛，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他拿起电话：

“要王新亭司令员！”王新亭拿起听筒，传来了徐向前的钢铁般的声音：“王司令，我命令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王新亭坚定地回答：“是！”

保证完成任务！”

27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组织爆破队，用3000公斤炸药爆破城池，随着一声撕谷裂肺的爆炸声，翻滚的蘑菇云升入天空，北城爆破开了，突击部队的将士们像潮水般地涌入城内。

城西亦被王震指挥的部队突破。敌人慌乱不堪，有的负隅顽抗，有的躲藏保命，有的成热锅上的蚂蚁，经过一夜巷战，将万余守敌全歼，1947年12月28日，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晋南运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由于我军迅速攻克运城，胡宗南北援之举破灭了。他为了给“蒋老头”表示一下“精诚团结”，其先锋从太阳渡抢渡黄河，但遭我太岳三分区部队的顽强阻击后，激战一天，便急忙退回黄河南岸。从运城南逃的千余残敌，亦被太岳三分区部队围堵全歼。

运城攻坚歼灭战的胜利，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守城的信心，也锤炼了部队，使新组建，新升格的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战斗意志、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和城市攻坚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总结了宝贵的攻城经验，为攻打“卧牛城”——临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片欢庆运城解放的锣鼓声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西北二纵队和根据地的翻身群众，迎来了1948年元旦。

李自成攻不克“卧牛城”，挂甲而去！徐向前挥军破城而入

运城解放后，临汾成了敌人在晋南盘踞的一座孤城。这座相传4000多年前尧帝建都的古城，外低内高，坚固宽厚的城墙依自然地形砌成，站在高处眺望该城，就像一条硕大的黄牛伏在汾河东岸，因此，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传说明末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于1643年，兵临城下，屡攻不克，气得“挂甲”于屯庄的树上，拍马而去。历史的长河流逝了三百多年，“挂甲屯”这个历史的遗迹，仍坐落在临汾城郊外。这座古城在日军和阎锡山的盘踞经营下，壕沟交错，碉堡林立，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要塞。

历来的军事家，总是把目光盯在最有影响的战略部位，即便这个部位是块钢铁，也要把它融化。在徐向前来看，这座“卧牛城”虽然难于攻克，但并不等于不能攻克，在共产党人面前，没有推不倒的山，没有攻不破的城。拔除这个据点，对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守敌，落实党中央解放战争第二年度内线兵团“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的作战方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春节刚过，徐向前就率军区前方指挥所从河北冶陶镇来到山西翼城，并提出部队先在翼

城地区集中整训，总结攻克运城经验教训，为攻坚临汾进行政治上、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全面准备，待开春后实施攻坚临汾的计划。这一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邓后，很快得到批准。2月18日，军委复示：

“（一）完全赞成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

（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贯彻中央军委的批复精神，防敌北逃，争取在野战中歼敌，是战前兵力部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徐向前认为，临汾附近地形开阔，如大兵团过早逼近敌人，势必打草惊蛇，暴露我军之作战企图，故决定主力部队仍按原计划集结在临汾东南百里之外的冀城地区；而以八纵第二十四旅布于临汾以东50华里的大阳地区，太岳一个旅布于临汾东北的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第三旅、第七旅布于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离临汾更远些。如敌固守不动，各部队则整训待机；如敌北窜，则同蒲路东西两侧部队迅速出击，抢占预设要点，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主力部队从冀城出动、36小时的急行军即可抵洪洞、赵城一带，实施野战歼敌。

一着好棋布设既定，冀城整训全面展开。2月21日至23日，在冀城召开了千余人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运城攻坚战的经验，动员攻打临汾。徐向前在会上作了讲话。

他讲话的第一部分是“晋冀鲁豫军区的作战任务”；第二部分是“指挥员的责任”；第三部分是“关于政治工作几个问题”；第四部分是“城市政策问题”。他在讲到作战任务时说：“本军区春季攻势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

会后，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攻坚训练。干部和战士各有训练重点，干部基本上是学战术、练指挥，但也要懂得技术；战士基本是学爆破、攻城等技术，练实际操作，但也要懂得战术。

军事训练搞得热火朝天，政治教育也搞得生动活泼，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深情。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解放临汾的物资准备也越来越充分。一场大仗恶仗即将打响了。

徐向前所部首先派出侦察员和情报小组，对城里城外的地形和敌情进行侦察。并利用情报小组多次给敌人送去解放军北上，准备攻打太原的“情报”，以假乱真，稳住了敌人。侦察得知，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筑起明碉暗堡，由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步炮掩体相联，组成四道环形防线，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7米左右的双层水泥主碉，周围有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和雷区；环城的外壕是利用旧护城河改造而成，深20米，宽30米，外壕距城墙20米，城上守敌的手榴弹可居高临下直投到壕沟的外沿。在城内，敌人进一步加固了古城墙，高14米、厚10至30米的城墙，将市区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城墙上面可并行两辆卡车，守敌物资、人员的机动十分方便，城墙的上中下三层分别设置了火力点，可对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实施全天候火力控制。城墙的内侧，则是环城内壕，集团工事、炮兵阵地。城里城外的火力相互交叉，交通壕互相贯通，构成坚固的纵深防御体系。守城总指挥为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指挥2.5万人

马。敌人为固守临汾，长期顽抗，大肆抓兵、抢粮，聚积武器弹药和生活保障品，并在内部进行反共宣传，实施特务控制。在阎锡山看来，临汾是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是阎某人的“马德里”。

根据地形和敌情，徐向前组织制定了攻坚临汾的作战方案。其作战部署是：太岳1个旅在赵城、洪洞一线控制同蒲路，防敌北窜，相机打援；位于汾河以西的吕梁部队一部，牵制城西守敌；八纵位于城南，十三纵位于城东，太岳部队位于城北，扫清外围，三面攻城。如晋中之敌来援，则以一部兵力围城，防敌外逃，然后调动主力北上打援，野战歼敌后回师再克临汾。

如晋中之敌迟疑，一切攻城准备已完成，即拟一举攻克临汾，再向晋中发展。并预定3月10日发起总攻击。徐向前成竹在胸，于3月6日清晨将此作战部署上报军委。

初春的晋南，阳光明媚，轻风宜人。连续几天几夜的战前准备，使本来身体比较虚弱的徐向前，感到十分疲劳。他坐在院子里草垛旁的躺椅上，边晒太阳边批阅文电。中午时分，参谋送来情报：据太岳军区情报处临汾城内情报小组报告，蒋介石突然发来急电，要把他的嫡系胡宗南二十旅空运西安。6日清晨，敌人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的庙宫机场降落，已将旅长尹羸舟及约一营人运走，明日还要继续空运。徐向前看完情报，脸上的疲容荡然无存，脱口而出：“不好，敌人要跑！”他拿铅笔在上面重重地写上4个字：“失之过迟！”随即吩咐参谋处长梁军，马上给部队下达紧急出动命令，并向军委报告要提前攻打临汾。

临汾守敌虽然号称2.5万之众，但真正能打仗的要算三十旅了，把这块硬骨头留下来啃，既可牵制敌人、配合西北野战军保卫党中央的战略目的，又能使部队真正取得“攻坚”经验，完成培养过硬的“攻坚”兵团的任务。于是，徐向前立即签发了部队提前出动的命令：八纵全部立即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天亮前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太岳部队全部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到达临汾城北，与八纵以向心合围的态势逼近城郊；十三纵完成河西歼敌任务后，迅速移河东向临汾城郊压缩包围；吕梁部队控制汾河以西，监视敌人和担任打援。

指挥所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无线电台“嘀嘀哒哒”地发报，参谋人员急忙整理文件、装具，随时准备前移。下午3点多钟，徐向前要通信参谋接通八纵王新亭司令员，但因王已上路，联络不上。他心急如焚，立即写一手令：“不能让敌人跑掉！”

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到敌人飞机前边，不能叫敌人逃走，最好是在敌机降落以后发起攻击，缴获它几架飞机。”并立即派两名参谋坐上他的美式中吉普去追部队。在车子开动前，徐向前再次叮嘱道：“必须在部队宿营以前把命令送到，亲自交给王司令员！”中吉普卷起路面上的黄土，像腾空的巨龙一样飞驰而去。徐向前随即坐进一辆十轮卡车的驾驶室，向临汾进发。

王新亭接到徐向前手令后，在行军途中拟定了作战方案，一面交给两位参谋回前指复命，一面命令二十四旅于七日凌晨首先向南郊机场发起攻击。指战员们在信号弹的闪光中向机场猛烈开火，两架运输机被击中，但由于没经验，不会封锁跑道，其余几架运输机没等停稳，就又仓皇滑行上跑道起飞。

机场一片混乱，敌人几个校级军官爬上吉普车就向市里逃命，后面几

百名国民党官兵像放羊似地尾追其后。机场很快被我军占领，胡宗南的空运计划彻底落空了。攻打临汾的炮声，敲响了守城敌人走向灭亡的丧钟。敌守城总司令梁培璜，是个死硬的反动军官，他一方面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坚守待援；一方面对属下实施法西斯式的管控。他在高级军官的会上宣布“八杀”的命令：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城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守城敌人在梁培璜的军法高压下，只能顽抗到底。徐向前对前指人员说：临汾是个“硬核桃”，决心不大，牙齿不硬，就甭想咬碎它。

战役第一阶段是扫清外围、形成三面攻城之势。经过一周的激战，夺取了城外的大部主要阵地。徐向前的指挥所随即前移 20 华里，进驻东堡头村。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城垣附近实施猛烈突击，但由于敌人依托集团工事和密集的火网，迫使我军无法前进。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徐向前出现在进攻部队的前沿。他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听取攻城部队指挥员的汇报。他深感这场攻坚战要比原来预想的更复杂、更难。临汾城池呈“吕”字形，上部的小“口”朝东，没有设关，不仅有密集的居民建筑，而且有雄厚的高大城墙护卫；下部的大“口”座西，背靠汾河，其西、南、北三面设有城垣、城门，设有城关。城西紧靠汾河，大部队无法展开；城南为开阔地带，敌人设防严密，形成体系，使进攻部队很难接近城垣；城北地势较高，有登城阵地，敌守备薄弱，但开阔地深广，部队无法隐蔽接敌；只有东关是攻城部队实施突破的有利地段。可惜，敌人设防时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将战斗力比较强的第六十六师放在这里扼守，是“卧牛城”的主要防御方向。

经再三研究，徐向前最后决定改变从东、南、北三面攻城的作战方案，把城东与城北作为重点攻击方向。命令以十三纵向东关突击，力争消灭守敌第六十六师主力，并策应城北部队攻城；以八纵第二十三、二十四两旅位于城北北门及以西地段，主攻兴隆殿等要点，以太岳部队 4 个团位于北门以东地段，主攻日本坟等要点。战斗打响后，两支部队注意协同，在攻击过程形成合力，破垣入城；以八纵第二十二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位于城南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

3 月 22 日子夜，攻城部队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为数不多的大炮小炮一齐向城墙部位轰击。一道道闪光、一阵阵轰鸣，伴随着喊杀声，交织成一部震人心弦的“交响曲”，震颤着临汾城池。第十三纵队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攻击东关城垣，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攻击东关要点电灯公司。电灯公司这个要点被敌人视为“生命线”，它紧靠城垣北侧外壕边沿，筑有一道道的围墙，挖掘了不少暗道和外壕，明碉暗堡加多种类型的铁丝网，构成了独立的“小城堡”。三十九旅的指战员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一举突破敌前沿阵地、撕破了阎锡山“铜墙铁壁”的老脸。敌人像输红眼的赌徒，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一手拿着马鞭，一手提着短枪，亲赴现场督战。攻坚部队每占领一座房屋，每爆破一个碉堡，都遭到敌人拼死的抗击。一个个年轻的战士，倒在攻城的战火中。第一一五团一连五班班长毛德兴等七勇士，发挥攻坚尖刀班的作用，连破守敌三道战壕，炸毁碉堡两座，占领了电灯公司机器房北面的一排厂房。敌人组织一个营的兵力反扑，用火炮和机枪向五班阵地射击，厂房被炸塌了，砖瓦石块和弹片哗哗啦啦地落下

来。战士们互相鼓励说：“流血换来的阵地，绝不能让敌人夺去，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扑，守住阵地！”房塌了，墙倒了，临时筑起的防御工事被打平了，战士们硬是用血与火顶住了敌人的冲锋，没有后退半步。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终于摧垮了电灯公司这座“小城堡”。在东南方向，三十八旅采取坑道掘进爆破和四门火炮齐射战法从护城垣上打开了缺口，突击队借助硝烟，一鼓作气登上城垣，但因缺口太窄太陡，后续分队难以跟进，被敌人压了回来。一一二团七连战士李海水因负伤，没能撤回阵地。他立即把十几名伤员组织起来，继续同敌人战斗，先后打退敌人步兵连的7次反扑。第二天上午，敌人又组织了更多兵力准备反扑，疯狂地叫喊：“你们已无退路，快投降吧！”

“抓几个活的回来！”李海水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沉着应战，组织伤员撤退。当敌人一窝蜂似地向他冲过来时，他将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投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第9次反扑，掩护16名伤员安全撤回我军阵地。徐向前得知李海水的英雄事迹后，立即打电话给十三纵队首长，要求全部队官兵都要向李海水学习，接着又发布了嘉奖令，命名七连为“李海水英雄连”。

攻城，古今中外的兵书上都称之为恶仗。我攻城部队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但由于敌人有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第二次攻打东关仍未成功。城北部队经激烈战斗，攻克四号碉堡，在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中，杀伤敌人500余人，巩固了阵地。

但日本坟、兴隆殿等要点均久攻不克，原定从北关破城的计划没能实现，经过22天的战斗，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第一阶段的作战遂告结束。

战役的第二阶段，夺取东关，为最后攻下临汾撕开突破口。

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系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

朱德总司令得悉攻坚临汾作战的情况和议论后，当即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指示决不可自动放弃临汾，嘱全力给徐向前一切支持，临汾一定可以攻下。朱总司令的指示，增强了军区领导和后方机关对夺取临汾战役胜利的信心。可是，徐向前并不知朱总司令写信的事。他坚信梁培璜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哪有攻不下的道理？！前敌指挥所于3月31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在会上作了《关于攻临外围作战检讨及今后作战等问题》的报告。他在向大家介绍第一阶段作战基本情况时指出：

1. 敌情：敌人工事，外围据点均挖有两三道外壕，并有暗道通城内关，城与关内均有内壕，城墙设有三到四层枪眼，并且还有所谓倒火点。阎锡山花样多，一贯主张防守战法，当我开始包围临汾时，敌远距离外围据点，不战而退；但近距离城壕外围据点则拚命固守，土顽换为正规军。敌伤亡消耗很大，对此非常恐慌。我打电灯公司，敌六十六师正副师长亲自督战，后退者杀头，害怕我们炸破。

2. 我们主力尚未动用，准备打援。在今天敌来援兵可能性不大，等我们打到一定程度尚有可能。守敌待援无望，突围有被歼之危险，只有死守一条路，我们人力物力消耗亦很大，也只有坚决打下临汾的一条路。

3. 敌人守关全部兵力只有5个团。我虽伤亡3000至4000人，敌人伤

亡总在 2500 至 3000 人数。敌人疲劳程度超过我们几倍，因为敌人要时时注意，处处防守，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攻，从哪里攻？我们不但可经常换班，而且主力亦未动用，因此，有条件、有把握打下临汾。

他在检讨作战指挥问题时指出：

在战役指导上，开始对敌人工事特点估计不够，企图在短的时间以小的伤亡解决战斗。战斗部署改变几次。八纵由南面转到北面，又转到东关。太岳两个团（四十六、四十九团）由北面转到南面，又转回北面。开始企图打关，同时准备攻城，兵力火力有些分散。部队转移时民力器材浪费很大。这应由我负责。

在战术指挥上，战斗组织不细密，存在粗枝大叶；步炮协同动作不好，射击技术不熟练，自己炮打着自己的人。依靠炮兵打天下，步兵顽强性不够，或者不相信炮兵；冲锋道路和炸破口未成一线，使突击队走弯路。

对攻城的战术问题，徐向前就像是军事院校的战术专业教员一样，给团以上干部上了一堂既生动又可操作的一课。他指出：

1. 坑道是对付这个敌人的最好手段。首先是坑道安全问题，无论是超越外壕，或到外壕去作坑道，都要控制外壕，在外壕里作地堡。如敌在外壕里作有地堡，即以炸破扫除之。要派得力部队担任这一任务，倘被破坏，担任这一任务的首长要负完全责任。同时，坑道内亦要准备战斗，直线挖不过去可转弯。

用三角钢耙来挖可减少声音；硝酸铵炸药可用，但必须封好口，安好雷管，电发与点火并用。八纵与十三纵同时炸破当然很好，但有困难，因两处坑道距离相隔远了点，我们不要求同一时间炸破。同一时间炸破好处很多，可以研究。

2. 巩固突破口，不是要部队等在那里，而是向城上两面发展，突破口愈大愈巩固。

上城以后，要迅速改造工事，开辟交通壕，做好地堡，打通友邻联系，不是做肉城墙。

3. 纵深战斗要有阵地的向前发展。可以抢占房屋的应首先占领城墙，并应以小组炸破内壕，不失时机地向纵深发展。

原则是沿交通壕，依托城上火力，再向纵深发展。

4. 炮兵组织，在炸破前先行炮火摧毁。开始炸破与炮兵同时射击。步兵发起冲锋后，平射炮向两翼（相当距离的两翼，即步兵预定第一步控制的位置，需要继续向前发展时由步兵发信号，炮兵延伸射击）曲射炮向纵深射击。第一步打内壕外沿；第二步转向纵深。步兵所到地方均发信号联络炮兵，步炮开会订出协定相互遵守。

徐向前在报告中，还对各级指挥员的任务区分；建立严格的战场检查报告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明确的阐述。与会的团以上领导干部边听边记，生怕漏掉点什么。他们从徐向前的报告中受到启迪，受到教益，受到鼓舞，从思想深处增强了攻坚临汾的决心和信心。最后，徐向前庄严地宣布攻临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

决定八纵、十三纵联合攻取东关，十三纵在左翼，八纵在右翼。战斗分界线，以春牛巷、东街（含）以北归八纵，不含以东南归十三纵。今天战争要根据智、勇、物质三条件来决定，只有一个条件或两个条件不行。这次要以艰苦、持久、顽强的精神，打下临汾。

会议结束后，各部队根据新的作战部署，以徐向前的报告统一思想，加强训练。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学习英雄李海水的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干部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不怕流血牺牲的顽强斗志。在军事工作方面，掀起了战地练兵热潮，侦察地形，挖掘坑道，苦练爆破，搞得如火如荼。到4月9日，攻击部队共挖掘接近护城垣的坑道4条，将1.6万多斤的炸药装入坑道顶端的爆破室，给敌人的脚下安上了四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完成了第二阶段作战的最后准备。

10日下午，徐向前的表针指向4时整。他把手一挥“进攻开始！”瞬间，我军9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同时开火，对敌人阵地实施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营连的各种火器同时开火。

火力准备持续两小时，打得敌东关阵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紧接着，重头戏开场了，惊天动地的坑道大爆破，如火山爆发，几百吨的砖石、土灰和敌人一起被抛上天空，城垣炸开了两处缺口。突击部队的勇士们冒着浓烟烈火，迅猛登城，潜水般向敌纵深发展，经一夜激战，敌六十六师大部被歼，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之时，八一军旗已高高飘扬在东关上空。

我军攻下临汾东关的消息，像一声惊雷在南京爆炸。此时此地，南京正在举行“行宪国民大会”，上演选举伪总统副总统的历史闹剧。出席大会的山西议员们惊恐万状，如丧考妣，遗老遗少们相互搀扶着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请求他立即派飞机助战，以解临汾之危。蒋介石为了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为了收买人心，多拉选票，在大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请山西父老放心，请在座的各位代表放心，我们决心保卫临汾。”蒋介石派空军出动飞机助战，一面对我围临部队的阵地实施狂轰滥炸，一面给守城的敌人空投面粉、大米和罐头，安抚军心。阎锡山龟缩在太原，无力派兵增援临汾，三次电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阎锡山还是放心不下，又亲自派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递阎的手令，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

梁培璜看着电文，有气无力地对副官说：“给蒋总统、阎总司令回电，我梁培璜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可惜，历史的车轮已压住了他的双脚。

攻临部队占领东关后，徐向前和前指机关立即指示部队巩固阵地，整顿小结，调整兵力，准备攻坚临汾城池。敌人感到夺回东关已不可能，便对东关的房屋、工事进行地毯式轰炸，给攻城部队的隐蔽、运动和补给带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刘少奇专门给徐向前等发来电报，介绍聂荣臻所部攻坚石家庄的经验，希望攻临指战员再接再厉，攻克临汾。毛泽东在去晋察冀的途中也发来电报：“庆贺你们歼灭阎敌六十六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晋南人民从战役开始以来，支前工作越做越好，出动民工20万人，支援门板26万块，梁木10万多根，粮食数百万斤，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中央首长的关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攻临指战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4月15日，夺取护城壕外沿据点的战斗打响了。十三纵位于城南门以东地段；八纵位于城东南角至大东门地段；太岳部队位于城东北角至大东门地段。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坑道，同时并举。

攻城部队在城东和城南与守敌反复争夺一号碉、老鸦咀、火车头、二十号碉、二十一号碉等阵地。敌人用杂牌军守碉，把他们推到决一死战的境

地，一旦阵地失守，我军又尚未站稳脚跟之时，敌人后面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第三十旅就进行反扑。攻城部队每夺取一块阵地，都要遭到敌人拼死抵抗和疯狂反扑。

4月21日，太岳部队四十四团向一号碉发起攻击，由于战前认真学习了徐向前的战术要求，战斗中协同好，采取火力掩护、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的方式，经一小时的战斗，夺下了敌人守备坚固的1号碉。26日，胡敌三十旅九十团二营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1号碉阵地实施反扑，整个阵地顿时笼罩在战火与硝烟之中，坚守阵地的四十四团四连指战员高喊：“人在阵地在！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了！”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后只剩5人，仍不后退半步，配合增援部队将敌人击退。

敌人在地面反扑的同时，又从天上用飞机向我阵地轰炸扫射，我军一个团指挥所被炸弹击中，团长、政委等全部被埋在土里壮烈牺牲。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竟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和燃烧弹，护城壕外沿成了一片火海。我军将士们顽强坚守阵地，激战10多天，牢牢控制着护城壕外围阵地。

攻击部队遵照徐向前关于“坑道是对付这个敌人的最好手段”的指示，同敌人在地下展开了又一场殊死的搏斗。我们向城垣挖，敌人则从城垣向外挖。他们企图以“坑道对坑道”的办法，破坏我用坑道爆破攻城。指战员为了争分夺秒抢挖坑道，在缺少工具的情况下，有的战士就用刺刀、瓦茬、手指挖，手磨出血泡，手指甲裂开了，战士们忍着剧痛继续拼搏。坑道越向前延伸，空气就越稀薄，有的昏倒了被拖出来，一阵轻风吹醒后，又钻进去挖掘。从旅长到战士，都争着下坑道，涌现出一批掘进能手和英雄。到5月上旬，攻城部队已挖掘破城坑道15条，掩护坑道40多条。除被敌发现破坏以外，攻城前有三条主坑道完好无损，巨大的药室直抵城墙墙基。

就在准备攻城之时，中央给徐向前来电，说明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晋冀鲁豫战场当务之急。要求攻临部队抽出三个旅，昼夜兼程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徐向前当即决定将太岳一个旅及吕梁部队两个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北上晋中，牵制阎军。攻临作战仍按时开始。

5月17日17时，由八纵、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两个团组成的攻临部队开始发起总攻。榴弹炮、野炮、山炮及82毫米口径以上的迫击炮一齐开火，破坏敌城垣上下的各种火力点。

两小时后，在炮火延伸，向城内实施压制射击的同时，攻城坑道的炸药室于19时点火。

巨大的爆炸产生了有感地震，使站在地上的人左摆右晃，临汾城垣被炸开了两个大口子，一个宽37米，一个宽39米，由二十三旅组成的第一梯队突击队潮水般地涌入突破口，迅速向纵深及两翼发展；太岳军区部队作为第二梯队适时投入战斗，攻入城内展开夜间巷战；二十四旅、三十七旅迅速攻占了八府囿、鼓楼、铁佛寺、南门楼等要点。指战员们在敌人雷区多、工事坚、火力强的情况下，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战斗至24时，城内之敌全部被我军歼灭。敌守城总指挥梁培璜等高级将领裹挟部分群众从西门逃跑，徐向前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晋绥部队和二十二旅一定要活捉梁培璜。指战员果然在敌人逃跑的途中将梁活捉。5月18日晨，临汾战役胜利结束，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这一仗打了72天，共歼敌2.4万余人，我伤亡1.5万人。

战后，徐向前来到城垣上转了一圈，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厚的城垣，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固的防御工事，也第一次看到坑道爆破产生的强大破坏力，深感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他对身边参谋说：“给党中央、毛主席发报要写上‘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九个字。”不久，毛主席在临汾战役的经验报告上批示：

“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七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临汾战役的胜利，将永远载入中国战争的光辉史册。

34

横扫晋中，三战三捷，活捉野战总司令赵承绶

在徐向前指挥部队攻坚临汾期间，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由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兼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任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所指挥的部队包括八纵、十三纵、太岳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46个团，6万余人。

在攻克临汾之前，徐向前就做了晋中作战的准备。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建议：“我们攻克临汾后的第二个战役计划，拟北上攻歼介休、平遥、孝义、汾阳等地之敌，并吸引南援之敌击歼之。”他在给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信中提出：“在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运行计划，则拟自晋中作战。”临汾大捷，震惊了阎锡山。这位自认为多谋善断的“山西王”，思来想去，又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对部下说：“共军在临汾伤亡两万多，大大损了元气，不可能很快恢复，更不可能一步跨入我晋中腹地以卵击石！我军在晋中的主要军务就是趁麦收屯粮于手，巩固晋中，保住太原。”

民以食为天嘛，军人打仗拼命，更要吃饱肚子。阎锡山深深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此时，他在山西的兵力尚有3个集团军（5个军14个师）、3个总队、22个保安队，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人。他要抵抗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保住老巢，就要首先解决军粮问题。以每人每天1.5市斤食计，每月就要耗粮585万斤，再加上大小城市和县镇居民口粮，阎锡山怎么能不感到头疼。好在晋中平原，沃野千里，粮丰菜绿，猪肥马壮，于是乎，他决定派出重兵保粮、抢粮、屯粮。置三十三军于祁县、太谷地区；三十四军及四十师置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四十三军及“亲训师”置于汾阳、孝义地区；六十一军置于文水地区。为了防止徐向前兵团北上，还专

门组成“闪击兵团”，作快速机动之用。阎锡山提出“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口号，要用他的所谓“运动战”对付徐向前的“运动战”。

6万大军北上晋中，去面对阎锡山10余万人，并非容易。

其一，从全国的战略全局看，阎锡山虽已被包围，但他的兵力2倍于徐向前所部，而且工事坚固，装备精良，机动力强，这些都占优势。其二，徐向前所部经过运城、临汾两次攻坚战消耗，部队相当疲劳，加上老一点的战士和干部成员较少、新兵多、新干部多、新组建的部队多，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这些情况明显影响部队北上作战。其三，晋中平原烧柴问题很难解决，6万大军作战，就要有10万民工随行保障，16万人马烧水做饭，一天就要消耗30万斤柴草。后勤保障是很困难的。正在这时，彭德怀、贺龙请求徐向前兵团投入西北作战；杨得志、罗瑞卿几次请求徐向前兵团协助打傅作义。面对这一形势，徐向前并没有动摇自己成竹在胸的计划，仍坚持北上晋中作战，并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向前兵团现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徐向前感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既着眼于战略全局需要，又符合山西战场的实际，是在给自己压担子，一定要独当一面，先横扫晋中，再攻克太原，完成解放全山西的重任。

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徐向前兵团的实际困难，只要求他在晋中先歼敌一至两个师。

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提请兵团作战会议讨论。他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第一，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

第二，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六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四至六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亦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徐向前还风趣地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防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这笔帐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

作战会议开了好半天，有的指挥员仍然提出许多困难。徐向前想：当断不断，必误大事，个别人的意见只好再做个别工作。于是他坚定有力地说：“战机紧迫，就按歼敌4至6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请同志们放心，我提出这个目标是有把握的，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战役成功了，是大家的功劳，人民的功劳。如果错了，我一个人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1948年6月9日，徐向前、周士第发布了《晋中战役作战命令》：

其一，敌情及估计：

一、自我华北及晋绥解放军先后攻占寿阳、临汾、应县、歼敌卅旅，六十六师晋南团队全部及四十九师大部后，晋中阎匪面临最大困境，仍以确保太原老巢为目的，将其主力三十三军（欠三十八师），三十四军，十九军

(欠三十九师),八、九、十诸纵队集结太原以南至灵石同蒲线上,另以六十一军(欠六十六师已歼)及四十三军之七十师,集结太原至汾阳公路线上,防我大军进攻;并在上述地区,强化乡村特务活动,编组民卫军实行坚壁清野,提前抢麦文水、交城、汾阳、平遥等地。阎匪均已开始破坏据点附近的青苗;并强圈民地(拟麦熟七、八成即收,某些地区且将农具悉破坏),妄图以此作垂死挣扎。

二、估计:阎匪当我军移师晋中展开新攻势时,必将以其全力从军事、政治、特务各方面与我展开全面决斗,其兵力部署,可能收缩兵力围守若干要点,并以主力寻机与我作战。

其二,我之作战要旨:

一、奉军委及华北局命令:为保卫晋中麦收,大量削弱阎匪有生力量,缩小阎匪占区,创造攻取太原条件为目的,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统一指挥野战军一兵团、太岳主力,太行二分区,北岳二分区全部地方武装(两区地武组成一个集团统归肖文玖指挥)及晋绥军区主力,组织晋中战役。为达成上任务,决定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御防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必要据点,清剿地方杂匪,重点则远于太谷至介休两侧地区,兵团主力,以掩护地方开展工作确保群众麦收。作适当集结,以便随时进行机动。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其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到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而后攻取太原有利条件之目的。

其三,兵力布置与任务区分:

一、以晋绥二、六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于本(六)月十六日,进至太原,以此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太线两侧之麦收。

二、以吕梁集团本月十九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间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必要之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以确实控制文交汾孝及清源之平川,保卫麦收。

三、以太岳集团本月十六日迫进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保卫麦收。

四、以肖文玖集团本月十九日逼近榆次南北地区,切断榆次至太原及榆次至太谷间交通(破坏铁路及桥梁)保证太原地区之敌不能向祁太支援并派遣多数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原三角区,保卫麦收。

五、以十二纵本月十九日拔除子洪地区敌据点,而后攻歼东观之敌,切断太谷至祁县间铁路,主力集结太谷以南东观地区机动。

六、以八纵队本月十九日拔除平遥以东及以南地区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平遥祁县间铁路,主力集结平遥以东地区机动。

其四,注意事项:

一、各部在出动前,应先派出得力侦察人员,接合地方政权察明所要方向之敌情地形及居民情况,以供给部队备用。

二、部队接近边缘区时,应在夜间开进,以求企图隐匿保持战役突然性,进至敌占区,应注意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及驻村防谍(部队人员均应进行防谍保密教育)并新筑主要工事以防意外。

三、各地在行军前与行动中,应在干部中深入研究此一战役之特点与阎匪战法的特点以此一战役我之有利条件与困难在思想上预有准备。

四、确实进行夏季行军作战之卫生教育与防疫准备。

五、联络规定，见通实七号通报。

其五，我们于战役开始前（十八日）进至白晋线上之南关附近地区，而后位置另行通知。

其六，此系基本命令，而后适应情况变化，当以战斗命令行之。

此令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周士第各部队按作战部署开始行动，并将战役发起时间预定为6月20日。一切安排就绪，为迷惑敌人，让阎锡山睡几天好觉，徐向前带指挥所的人暂去长治市，派周士第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和华北局汇报晋中战役计划和部署。毛泽东听完汇报后，熄灭了正在吸的半截香烟，神采飞扬地作了如下指示，其大意是：

（一）“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

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二）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保存人民，保卫麦收。（三）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听说阎老先生也要学我们的“运动战”，还归纳出16字诀：“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其实呀！你们的向前是希望他跑出太原的，只要一跑出来，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还有十四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就慌喽！下面的文章就好做！

阎锡山为防范徐向前率军北上，倒也费了一番苦心。他将把守晋中南大门的重任交给了“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何谓“闪击兵团”？阎锡山在决定成立该兵团的一次训话中说：“共军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节节取胜，其战术就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一路万有，一跑万胜。因此，我决定成立‘闪击兵团’，闪电雷击，要比共军跑得更快！”山西野战总司令赵承绶，新提的“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不愧阎锡山的老乡，带头鼓掌，其他将领因来不及摘下白手套，也跟着鼓掌，发出“扑扑扑”的声响。

阎锡山春风得意，继续高论：“听说林彪在东北有‘三只虎’，我这晋中也有‘三只虎’，这就是‘闪击兵团’的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还有两个‘小家伙’，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嘛。”又是一阵“扑扑扑”的掌声。

徐向前明白，北上晋中必经“南大门”，敌人三只“老虎”守在那里，硬拼必定吃亏，世人都知山西人能算计，当然徐向前也不例外，赔本的买卖不能做。于是，他决定用“调虎离山”的大门自开之计，出奇不意，直下晋中。其战役部署是：将吕梁、太岳部队放在西南面，令其先出动，摆开架子向晋中挺进，迷惑和吸引敌主力向西“闪击”，而以主力八纵、十三纵严密隐蔽开至太谷、祁县、介休、平遥南侧山区，乘虚突进汾河以东的晋中腹地，摆开战场，机动歼敌，以达首战告捷，旗开得胜之目的。

6月11日，吕梁部队一部提前出现在汾阳、孝义间高阳镇地区；太岳部队沿同蒲路北进，13日攻占灵石。阎锡山得知徐向前率大军北进的消息，先是一愣，接着又平静下来。

他判断：共军不敢从正面北上，只能以一侧进击，这正是我“闪击兵团”大显身手的时候。于是，他急令高倬之率13个团分路从平遥、介休、汾阳、孝义出动。高司令年轻气盛，高傲地说：“给阎总司令发报，我高某正以‘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直扑高阳镇，聚歼徐向前主力。”不愧“闪击兵团”，机械化一开动，风驰电掣出现在吕梁部队面前。6月14日，吕梁部队在彭绍辉、罗贵波的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并重创敌

第三十四军军部。敌见势不妙，又派出“亲训”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打得难分难解。

西边战斗打响后，徐向前立即率领兵团指挥所离开长治。

当时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既不能乘车，也不能骑马，只得坐在担架上，沿白晋公路依山而行，向子洪口一带急进。子洪口是从东山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县城仅30华里，13纵准备从这里突破，直下晋中。

根据徐向前的作战时间表，北上晋中的主力可以出场了！

为减轻吕梁部队的压力，调动敌“闪击兵团”回援，在它回窜途中聚而歼之，他决定第八、第十三两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人要点，并前出同蒲路东南平川作战。

6月19日凌晨4时30分，我军向敌阵地发起攻击，下午4时，八纵与太岳军区部队分别攻占了平遥，介休东南山的東西泉、段村、洪山等多处要点。吕梁八分区部队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与敌第七十师展开激战，将其少将师长侯福俊击毙。

敌人的晋中大门被彻底打开，主力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出现在平遥、祁县地区，像潮水般作宽正面展开。此时，负责向忻（县）、太（原）、榆（次）、太（谷）间破击的部队，亦按计划攻下敌据点，斩断了敌人铁路交通线，使敌人的机动受到牵制。

徐向前的这着棋果然灵得很，又一次拨动了阎锡山的算盘珠。他万万没有料到共军部队如同天兵天将，直向腹心杀来。他为保太原的绝对安全，急令高倬之回师东“跑”，要越快越好，并令榆次、太谷守军南下祁县与之靠拢，以防结合部“空档”，被分割掉。

为捕获这只“晋中虎”，徐向前两次张网。

第一次于6月20日凌晨，令八纵及太岳军区部队进至平、介东侧堵截。徐向前和兵团指挥所随八纵行动。十三纵进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阻击南来之敌。吕梁部队一部对敌实施追击，赶“虎”入网。可敌人鬼得很，回窜的敌第三十四军竟从汾阳以东渡河，直“跑”平遥县城，同敌第十九军军部，暂编第四十师会合。敌“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则返回介休。我军指战员们冒着滂沱大雨，在野外伏击一夜，敌人没能入网，干部战士一不怕苦，二不埋怨，他们深信徐向前司令一定能指挥打胜仗。

徐向前判断，敌人企图北窜。于是，他决定火速将兵力北移，再次张网拦截，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

6月21日，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由介休向平遥靠拢，行至张兰镇地区，进入八纵及太岳部队的网底，激战3小时，敌人全部被歼。这一仗共歼敌7000余人，缴获山炮24门，重迫击炮12门，一只“老虎爪子”被完全斩断。亲训师、团完全由日本军官当教官和顾问，接受的是“武士道”精神，装备的是机械化，是阎锡山苦心经营起来的“铁军”和“精神支柱”。这两个“小家伙”的覆灭，使阎锡山如丧爱子，老泪横流。

6月23日，敌第十九军军部及暂编第四十师由平遥北上，行至洪善地区，又一次钻入网中，被在那里预伏的十三纵包围，经激战一夜，歼敌大部。后将残敌赶入北营村的一个角落里，仍与我负隅顽抗，经2小时的猛烈炮击后，遂发起总攻，解决了战斗，又歼敌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两个建制团，并生俘敌第十九军少将副参谋长李又唐。

徐向前对这次获胜及时总结了经验，通报作战部队并向中央军委作了

书面报告，现摘录如下：

此次歼敌七十二师及暂编四十师主力，其主要原因：

（一）主动地调动了敌人。我以吕梁部队在汾（阳）、孝（义）地区佯动迷惑敌人，阎锡山以其所谓五大主力（暂编第四十、四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诸师）全部出动，创造了我野战歼敌条件。

（二）我行动秘密、突然。事先敌未发觉，战斗发起后，敌部署全错乱，星夜北撤，予以歼灭战良机。

（三）我火力高度集中。不怕敌人在村落内集中多数兵力（在村落未坚固设防条件下），愈集中，则兵力愈不易展开，愈易遭受伤亡，部队亦愈难掌握。北营村歼灭战中，因四十师主力被我压缩于北营村一个村落，我乃集中炮兵轰击两小时，发八二迫击炮弹一千五百发，敌伤亡极大，队形混乱，我步兵乘势突入，敌被迫突围，绝大部分被歼，只逃少数。

毛泽东看到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懂得，在两军交锋形成对峙状态时，就要想点子转换战场，调动敌人迫其就范。徐向前不愧是卓越的军事家，他这样做了，而且达到了预期目的。

从参谋人员汇报的情况中得知，敌人在平遥、祁县地区与我形成“顶牛”之势；而在榆、太、徐、祁地区则守备薄弱。这里便于大部队展开，麦收正在进行，是野外围歼敌人的好战场。

于是，徐向前决定以太岳部队并北岳军分区肖文玖集团攻歼太谷守敌，破袭榆太铁路；吕梁部队袭取徐沟；八纵主力控制祁太铁路以南地区，以一部破袭祁太铁路；晋绥军区孙（超群）、张（达志）7个团，切断黄寨至太原的铁路，威胁太原并占领有利地形，牵制阎军第六十八、四十九师南援。如赵承绶集团由平、祁向太谷增援或回窜太原，我则集中八纵、十三纵、吕梁部队及太岳部队一部计9个旅的兵力，在祁太铁路南北地区消灭之。作战时间定于7月1日黄昏开始。这一部署，就是拦头切断敌人北逃太原的通道，在预设战场迫敌就范，聚歼太原绥署野战总司令赵承绶集团。这一大胃口的作战方案报告军委后立即得到批准。

晋中的盛夏，天旱少雨，烈日当空，战地流火。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非战斗成员增多。为争取时间，创造战机，徐向前、周士第令参战部队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按既定部署行动。徐向前随八纵行动，由于身体有病尚未痊愈，就坐在担架上指挥。八纵从司令员到战士都为之感动。他们深知，现在是制敌先机的关键时刻，先于敌人到达预设战场，就能打胜仗，迟了一步就会放跑敌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

徐向前率军向北运动，像拨动赵承绶中枢神经一样，立刻把这条大鱼引上了钩。

6月30日，赵承绶即令所部停止在洪善地区的攻势，准备回师北窜。7月2日，敌第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第三十四军及十总队亦向祁县集结。平、介两县城仅留新兵团及土顽部队防守。汾河以西的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地区，尚有守敌第六十九、七十两个师。徐向前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敌主力，而后再回师横扫汾河东西两岸之敌。

于是，令八纵紧紧咬住敌第三十四军于祁县不放，并以一部攻占徐沟；太岳部队及肖集团顶住太谷之敌的攻击；十三纵袭占东观镇，将敌逼入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包围聚歼。吕梁部队置于河西，阻敌第六十九、七十两师渡河东援。

又一场同阎锡山较量的大仗，在晋中大地展开了。北线的太岳部队和肖集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坏了榆次至太谷间的铁路和桥梁，控制了北起东阳镇、南至董村地段，死死封住了敌人逃往太原的退路。孙、张集团的7个团在太原以北张开大网，将从忻州逃向太原的敌人一部全歼。这时，第八纵队已开始围攻祁县县城。敌人发现退往太原的通路已被堵死，惊魂落魄，只得作垂死挣扎。先后动用第九总队、第三十三军主力、第七十一师全部、第四十六师一个团及第十总队，计9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指挥步兵营、团向我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地猛攻。赵承绶和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戴上钢盔，提着手枪，亲自上阵督战，然而被一条钢铁般铸成的阻击防线死死拦住。

董村阻击战的成败是关系晋中战役获胜的关键。这个村庄位于太谷以北15华里，坐落在铁路东南，离铁路仅二三百米。敌人要想回太原，就非得拿下董村不可。太岳军区第四十一团在两天只吃一顿饭，两夜没睡觉的情况下，在这里坚守阻击阵地。第三天，敌人出动4架飞机，6辆装甲汽车助威，整营整团地向董村发起进攻。我董村前沿部队的一个营，炮弹、枪弹全部打光，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在全营最后剩下几个人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徐向前从电话里听完这一壮烈事迹，亲自打电话对坚守董村的指挥员说：“你们是好样的，一定要坚持守住，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不能放敌人跑掉！”最后又下一道死命令：“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阵地守住！”

敌人连续几天突不破董村防线，沿铁路北逃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于7月6日被迫改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徐向前预设战场，迫敌就范终获成功。十三纵及八纵一部，追击敌第三十四军，并抢先一步插入徐沟以东、子牙河以南、城镇以东地区，切断了敌人归路；以太岳部队及肖集团向西接通十三纵，使两个巨人拉起手；以吕梁主力跨河东东进榆次西南永康地区，堵溃打援；令八纵主力7日攻占祁县，歼敌第三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8日北上徐沟东南地区，合围敌人。战役打到这一步，阎锡山、赵承绶如恶梦初醒，但已晚矣！3万大军完全钻入了徐向前的口袋。

在总攻前夕，徐向前和周士第将指挥所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徐向前因身体不好，是用担架抬到前线指挥所的。

他当时伤脑筋的不是自己的身体多病而是深感兵力不足。他风趣地对前线指挥所人员说：“我们包了个大馅饺子，但皮很薄啊！”由于天气酷热，连续行军打仗，指战员疲惫至极，减员聚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不足70人，最少的连队仅有27人。十三纵三十七旅人数最多，但每营只能编两个连，每连编两个排，每排编两个班。论武器装备更不如敌人。如果此时的赵承绶头脑清醒，突围是可能的。

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赵承绶，此时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兵力分散。当徐向前对他已成合围之势时，仍兵分三路作战，形不成气候，只能坐以待毙；二是昏聩无能，当断不断。在危急之时，没有主见，全听中将副司令原泉福的摆布。原泉福是日本人，看不起赵承绶，更看不起“土八路”，他认定不须突围，决心在现地“同共军决一死战”。

这些因素无疑为晋中决胜提供了客观条件。

徐向前决定，立即发起总攻，自西而东，分割歼灭。八纵因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即临汾旅）刚结束解放祁县县城的战斗，步兵强行军赶到预设战场，重炮没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时间就是胜利，现在用一发小炮弹就可打掉的敌人阵地，等敌人喘过气来，就要用三发重炮弹，你算过这个帐没有？！”

7月10日，天刚蒙蒙亮，总攻的号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一颗颗信号弹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在灰白色的天空闪闪发光。八纵、十三纵的指战员们忘记了疲劳，个个如龙似虎，以闪电般的速度，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攻方向，插向敌人的阵地。担任助攻的太岳部队及肖集团，也以主攻的姿态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疲惫不堪的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锅粥。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均有坚固的围墙。一来用于防水，二来用于防贼，青砖青瓦的房舍紧密相联。敌人利用这些地形，把村落当阵地，固守顽抗，垂死挣扎。敌机频频出动，向我军出击阵地轮番轰炸扫射，先后被我击落两架，打退了敌人的空中攻击。我进攻部队的各种火炮猛烈射击，摧垮了敌人利用村落围堰改造修建的火力点、工事和障碍，打开了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击队，对敌实施穿插分割。

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十三纵队攻下了敌三十四军守地大常镇，中将军长高倬之被击伤后，丢下阵地，化装逃回太原。八纵血战南庄，摧垮了由原泉福坐阵指挥的、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的第十总队。此时，赵承绶率1万多人，被困在西范、小常、南席、新戴4个村庄里，呼叫阎锡山派兵增援。

太原城内，阎锡山官邸，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阎锡山惊恐万状，一面急令第四十五、四十九师及四十师残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企图援应赵承绶残部突围北上；一面慌忙收拢晋中各县杂牌兵力速向太原集中，以补守城兵力之不足。一夜之间，汾河两岸的10多座县城的守军纷纷弃城北窜，这正是野战歼敌的良机。

徐向前当机立断，调整部署，除十三纵及太岳部队主力继续围歼赵承绶残部外，其余部队均投入追堵北窜之敌，聚而歼之。“汾西集团”的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十旅、第八分区部队和第二十四旅，将敌拦截在交城、太原之间的旷野村镇之中，共歼敌1万余人。有三位战地记者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发现一大群敌人惊慌不安、游蛇般跑来，就举起手中的照相机闪光灯，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大喊：“站住！这是苏联进口的“死光灯”，谁不放下武器，我一闪光就死。”敌人被“死光灯”吓破了胆，一个个眯缝着小眼，谁也不敢正视这“新式武器”，乖乖投降，共俘敌排长以下37人，缴获大炮2门，轻机枪2挺，步枪10多支。太谷守敌第九总队也在弃城逃走的路被全部歼灭。

15日，十三纵三十七旅、三十九旅和二十二旅攻占西范村，敌中将副司令原泉福此时才猛然醒悟，他坚持的“同共军决一死战”，得到的是自己死到临头了。他对野战军参谋处少将处长杨诚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话音刚落，无情的子弹将他击毙。这个双手粘满中国人民鲜血，为阎锡山卖命的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日，太岳部队攻占南席村、新戴村。赵承绶残部全部被赶入小常村，继续防守挣扎。

7月16日，喷薄欲出的朝霞，映照着硝烟弥漫的战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晋中战役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然而，敌人仍作垂死挣扎。天亮后，

敌人选定小常村西北地段为突破口，用硕大的红布铺开一个“丁”字，直指在这里准备发起攻击的三十九旅阵地。

敌人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轰击掩护下，轮番向这一阵地冲击，准备突围，以便拉住阎锡山派出的“南援兵团”这根救命稻草。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下午3时30分，总攻开始。三十九旅一一七团三营营长曹烽琴和九连连长周谨莫带领突击队冲入小常村，从敌特务营两个俘虏口中得知，赵承绶还躲在村中一个大院内的掩蔽部里。曹营长立即派一个小分队去攻击这个据点，几枚手榴弹投过去，战士们大喊：“缴枪不杀！”硝烟中，一件白衬衣系在枪杆上左摇右摆，一个佩戴中尉军衔的敌人爬出洞口，颤抖着说他是赵总司令的副官。请求与解放军长官讲话！一个战士大喊一声：“什么时候啦，还摆官架子！”说着便冲了过去，刺刀对准了地堡口。赵承绶和少将参谋处长杨诚、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三十三军少将参谋长曹近谦，一个跟一个地钻出洞口，简直就像从地窟里爬出的魔鬼。

晚霞还没有被黑暗吞没的时候，战场上演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历史剧。几名身着将军服的战俘，被解到兵团指挥所的院子里。

徐向前坐在一把老式的椅子上，冲着站在面前的赵承绶问：“还认识吗？”

赵回答：“认识。”声音很低，很颤。

10年前，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来到太原，同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战的事。徐向前多次同阎军的高级将领见面。在一次集会上，赵承绶把徐向前介绍给他的部属说：“请俺们五台徐向前将军训话！”此般情景，怎能忘记。

徐向前问：“你们在作战中为什么使用毒气！”

赵承绶被这一问吓坏了，他只是说：“有罪，有罪”。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徐向前问：“你看我们作战指挥上有什么缺陷？”

赵承绶不敢正视徐向前，喃喃地说：“战败的人，哪能看出缺陷！要能看出来，哪能走到这一步！”

这时，警卫员搬来凳子。徐向前让几位败将坐下，对他们说：“看你们为阎锡山打了这么多年，该是多么不合算！你们应当认清形势，太原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要选择自己的道路，站到人民一边，为解放太原做些事情。”见他们连连点头，便问道：“太原还有多少粮食？能维持多久？”

一提到粮食，赵承绶“唉”了一声，回答说：“谁人不知！阎锡山历来是不准管粮的问枪，管枪的问粮。不过，据估计也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样子。”

徐向前道：“那你们是不是回城里去劝劝阎锡山，叫他和平解决吧。我们可以保证人身、财产安全。”

赵承绶听说要他回太原，吓了一跳，苦笑着说：“我损失了他这样多军队，我回去，他非杀我的头不行！”

徐向前说：“你可以写信去劝说，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谈，今天先休息吧。都很辛苦了嘛！”

徐向前指挥作战就像一位象棋大师一样，每走一步棋，都要看下一步，下两步以至更远、更深。在围打赵承绶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已把目光转向太原了。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给军委报告，提出拟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夺取太原。16日，军委交电同意。

电文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在给徐向前、周士第复电同时，毛泽东又给粟裕等和华东局、中原局发电，通报晋中战役情况，电文如下：

“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

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晋中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正规军 7 万人，非正规军 3 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 16 人，毙敌师以上军官 9 人，阎军主力第七集团军总部及 5 个军部、9 个整师、2 个总队全部就歼，击落敌机 3 架，缴获各种火炮 3704 门，长短枪 3 万余支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

晋中的 14 座县城全部解放。中共中央、华北局，各个野战军，还有华北各行政区的党、政、人民团体的贺电，雪片似的飞来。

中共中央贺电的全文是：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肖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九日

运筹帷幄太原城下。出席西柏坡“九月会议”，群英相聚

无巧不成书。7月21日，太原战场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在这一天，晋中战役胜利结束。我解放军将士，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像潮水般地从晋中平原向北涌来，逼近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解放区的人民敲锣打鼓，祝贺晋中大捷，预祝早日攻克太原，解放全山西。太原城里的居民百姓奔走相告，喜上眉梢传佳音：

“徐向前的队伍要打太原了！”

“阎锡山土皇帝快当不成了！”

“俺们翻身解放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第二件大事：在这天，徐向前等领导人就准备发起太原战役，给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作了如下报告：

（一）我收复榆次、太原县城及控制南机场后，太原市外围的作战业

已基本结束。

我主力现已接近太原郊外筑垒地带，今后则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击战。总之，晋中保卫麦收战役已结束，进攻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已开始。

(二) 阎匪太原外围据点工事，南起王村、亲贤村、狄村、椿树园、北至韩寨、西庄、新城、凤阁梁、后沟，东起孟家井，西至石千峰、白家庄、西铭，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系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

(三) 阎匪主力除我此次歼灭约五万五千余人外，其余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全部，六十八师、四十师、八总队残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正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十二个保安团，至少在六万人以上。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由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师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另阎匪兵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员数量充实。

(四) 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八纵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八百人左右，每团机枪兵只百余人；十五纵一二九团三个连，每连只六个机枪兵。全兵团一千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下三人，营级干部只剩下一人；六十八团团干部全部负伤；六十九团连干部只剩下四人；

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五) 根据上述情况，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同时抽派一部继续完成控制机场，攻取东山、西山某些据点及工矿任务。

(六) 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通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中央军委很快同意这个作战方针的计划，并命令组成以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陈漫远(兵团参谋长)、胡耀邦(兵团政治部主任)为常务委员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及晋西北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和华北炮一旅，“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

7月23日，徐向前主持召开了太原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训计划，拟定了进攻太原的作战指导原则。

徐向前在会上归纳作战指导原则时指着地图说：“我们要切实完成对太原市的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的补给；在军事上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从政治上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它。”

第三件大事：在这一天，一架银灰色的“中正号”专机冒雨从济南军用机场升空。

飞抵太原。

蒋介石“总体战”的“新战略”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击破，所谓的“分

区防御计划”正面临破产，在这种巨大失败的压力面前，蒋介石飞来跑去，安抚军心。为了给阎锡山吃“定心丸”，他一下飞机就许诺向太原空运援军。蒋介石在接见山西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时说：“太原是全中国的‘反共模范堡垒’，所有国军将领都要向阎司令长官学习！”

阎锡山受宠若惊，当即要以“火海战术”打败徐向前的“人海战术”。蒋介石还给刚从西安空运来的第三十师团以上军官每人发金元券5000元(合法币150万元)，作为对嫡系的犒赏。

历史上巧合的事何止这三件！

太原，是徐向前家乡的省府，太原还有他青少年时的母校。蓝蓝的天，蓝蓝的梦，一件件往事都清晰地留在徐向前的记忆中。历史的车轮转过30年，徐向前统帅9万大军兵临太原城下，将最后和他的“老师”决战。阎锡山的命运已紧紧操纵在徐向前手中。

8月4日至9日，徐向前抱病主持了在榆次相立村举行的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团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大家看到徐司令员身体瘦弱，都为之担心，但看他的精神那么好，又都增强了攻打太原的决心和勇气。古人云：“胜败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尔”，实有道理。

会议开了6天。徐向前作了《晋中战役总结报告》后，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围困、瓦解、军事攻击”的攻取太原的指示，搞好整训，尽快完成攻打太原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11日，军委在批复前敌扩大会议报告和整训具体计划的电报中提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及中央一谈。”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想见徐向前，徐向前又是多么想见中央首长啊！

1946年11月，在欢送徐向前先行离开延安去绥德的时候，毛泽东说：战争还要打3年、5年或者10年，大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如今，解放战争已经打了三年，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战略进攻即将转入战略决战，在这决战前夕，他很想见到中央和军委首长，共商大计。同时，他也想利用部队整训的机会，到石家庄的和平医院检查治疗自己的疾病，为解放太原作准备。就在8月16日他决定上路的第一天，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太岳军区部队正式升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十五纵队。这支部队是徐向前看着成长，又一手带着壮大起来的。他的心情和十五纵队的指战员们一样高兴，于是欣然提笔疾书祝贺：

“钢是炼成的，钢铁般的队伍是经过艰苦奋斗的过程锻炼出来的。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军事和政治，不怕艰苦，排除困难，才能锻炼成为毛泽东式的、钢铁般的队伍。”

他想到十三纵队过些日子要召开晋中战役祝捷庆功大会，自己参加不上了，便又写了一幅祝词：

“争取更大的胜利，消灭更多的敌人，为功上加功，为光荣上加光荣而奋斗不懈——敬赠给十三纵队的战斗英雄们。”

启程的日子到了。可是徐向前并没有急着上路，下午5点多钟，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十五纵队成立大会的会场。

越战越勇的这支地方部队，今天正式升级为野战军了，指战员们个个欣喜若狂。徐司令员出现在会场时，全体官兵起立，爆发出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徐向前脸上挂着微笑，忘掉了一切病痛，打开自己的小本本，按

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作了题为《升级是一个喜事》的长篇报告。

他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讲话，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生动具体地说明地方武装、游击队升为正规军的意义；他用指战员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战斗，教育大家要提高军事素养，要学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本领；他在讲到政治工作时，要求提倡尊干爱兵，战场上少死人，打胜仗是最好的爱兵，当然这样的指挥员也就受到战士尊重；讲到攻打太原时，他既自信又风趣地说：“我们要打下太原，还须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甚至于比打临汾还要艰苦一些。”“阎锡山不是傻瓜，吃了亏后也聪明一点了，所以要死守太原，工事又做得多，这就不好打，还需要相当时间、相当代价。能不能不打？非打下太原不行！胡子白了也要打下来，说胡子白了是表示我们有决心，并不是真的要打到胡子白了，那还得了？！”

会场一片欢笑。徐向前作完报告，身披火红的晚霞，启程去石家庄。

石家庄和平医院是从延安迁来的。徐向前和一些医生认识，他一进门就提出，要给他来个“速战速决”。医院各科医生对徐向前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对照了他三年前的病例，发现他不仅旧病复发，而且消化功能极差，每餐只能少量吃些麦片粥一类的流食。一位日本医生诊断的结论是：“病情到了极点，”并提出诊断意见：至少静养两三个月，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工作。黄杰根据医嘱，劝丈夫多休息一段时间。徐向前望着从军区后方赶来护理自己的妻子，微微一笑说：“医生的话不能不听，三年前我在这个医院住那么长的时间，是最听话的。

但也不能全听医生的，我还要去中央参加会议呢！”

9月初，徐向前接到要他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的通知。他离开石家庄和平医院，来到西柏坡。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知道徐向前一直是抱病在前线指挥作战，对他十分关怀，一再叮嘱他注意休息、注意饮食。治疗是很重要的，调养也不可小视。他当时自我感觉很不好，有时竟出现咯血，呼吸也不顺畅，怕支持不了几个月就得倒下，影响攻打太原的战役。趁会议还没召开，他向刘少奇谈了自己的顾虑。

刘少奇说：“你的身体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去顶替你。开完会后，你先回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刘少奇一边说，一边用充满慈祥和期望的目光看着徐向前清瘦的脸庞和体单力薄的身躯，本来还想说什么，却戛然而止了。

徐向前理解少奇的心情，坚定地说：“我治疗一段时间就回前线！”

正式开会前，先举行预备会议。来自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人先后汇报情况。

7日，徐向前发言，汇报华北军区第1兵团的战况。当他说到参加晋中战役作战的部队只有55950人时，毛泽东微笑着打断他的汇报，惊喜地说：

“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

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毛泽东插完话，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徐向前。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每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他爱听，想听，汇报的人可以放开话题讲下去。可徐向前没有这样做，他从来都是打胜仗了，把功劳记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帐上；仗打坏了，先从自己的带兵上、指挥上找原因。

他随着全场的笑声，讲了部队干部战士英勇作战，讲了山西人民的大力支前等情况。当大家感到徐向前应该讲讲他的成功指挥时，他的话题却转向攻打太原的设想。他说：

“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等，我共 9 万多，敌也 9 万多，其中民卫军 1.5 万，因此打起仗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给部队说过，我们长出白胡子，还是要我们打下来。”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会意地点了点头。

中共中央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后举行的。8 月 3 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终于承认：“就整个军事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要振作军心，提高士气”，“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为此，调整了重点战区，规定了重点战区的主要任务；决定加强以徐州、济南、太原等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使解放军“啃不烂”；组成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的若干个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使解放军“吃不掉”。企图以此挽回颓势。

9 月 8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中直机关小食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 7 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4 人，重要工作人员 10 人，已经中央任命为华北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也列席了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徐向前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及贺龙、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薄一波、邓颖超、杨尚昆等同志，备感亲切，内心充满喜悦之情。

会上，毛泽东于 8 日、13 日分别对会议作了报告和结论。

刘少奇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建军 500 万，大约 5 年左右（从 1946 年 7 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

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 115 旅（师）的作战任务。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 40 个旅（师），攻占济南和苏北、豫北、皖北地区的若干大小城市；中原野战军歼敌 14 个旅（师），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 12 个旅（师），并锁控胡宗南集团；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 2、第 3 兵团歼敌 35 个旅（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市以外的一切城市；徐向前华北第 1 兵团的任务是歼敌 14 个旅（师），攻占太原。会议结束后，徐向前让胡耀邦先行回兵团传达“9 月会议”精神，他又回到了石家庄和平医院。

太原，并非是“太平原野”的缩写。它在中国版图上的存在，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既写下了人民生产、生活和发展的诗篇，也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流血的战争。这里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占领太原时期，修了数不胜数的防御工事。日军投降后，阎锡山为了反共反人民的需要，以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为名，收编日军 3000 多人，专门设立“碉堡建设局”。

用日本军人帮助他训练军队和指导修筑防御工事。为了用美好的语言来粉饰战争，还巧立名目：在山头上修筑“守山堡”，在山坡上修筑“护山

堡”，在山脚下修筑“伏地堡”。

北起周家山、南达武宿；

西从石千峰，东至罕山，在围城的“百里防线”上，依山就势，修筑了种类繁多的各种钢筋水泥碉堡 5000 多座。这些碉堡用坑道、交通沟和战壕相联，越接近城垣，碉堡的密度就越大。在南北机场等数十处重要据点，均以大碉堡为核心，以地堡群为卫星，环以外壕、劈破及一、二、三列桩铁丝网，蛇复式铁丝网和雷区，组成防御体系，号称“小要塞”。而太原东部的重点防御方向上，在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构筑了更加坚固的防御阵地，号称“四大要塞”。太原，算得上名符其实的“碉堡城”了。

阎锡山在陪同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国记者参观太原城防时，曾夸下海口说：“地球转动一天，工事就要加强一天”。“要把每个阵地，都修成能经得起一万发炮弹轰炸的永久性工事”。

一个美国记者，越看越惊奇，越听越惊奇，他用洋味十足的中国话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

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网。”

阎锡山为死守太原，在不惜血本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还对部队进行了扩编和重建。

他把从西安来的第三十师，扩编为第三十军，把从榆林来的第八十三旅、改为第八十三师，两部的将校坐地晋升加薪，以笼络“客军”。他还派人四处招兵买马，收贤纳士，大抓兵丁，重新恢复了第六十一军军部，重建第十九、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等 4 个曾被彻底打垮的军部和 8 个师、两个总队。其中所谓的“亲训师”又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出现在太原。为加强诸军兵种协同防御作战的需要，又新编了工兵师、重迫击炮师和机枪总队。还把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的残兵败将，编入“雪耻奋斗团”，总兵力约 10 万人。

太原城防坚固，守敌也很顽固。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党的一批将校，拒不接受解放军的任何和平解决太原的方式。在徐向前没去西柏坡参加“九月会议”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惨事。

在阎锡山四面被围的情况下，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局和军区派出工作组，来到太原前线。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想利用自己曾是山西国民师范生，抗战初期又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的旧关系，亲自潜入太原，与阎锡山谈判。

徐向前听了王世英的想法，摇了摇头说：“你很大胆，但不能进城去！”徐向前如此果断，是因为他对阎锡山太了解了。徐向前曾亲自做高树勋的工作，做被俘的阎军高级将领的工作，想通过这些关系争取阎锡山，但毫无成效。徐向前认为，如今虽兵临太原城下，但阎锡山还有可观的实力，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王世英和军区工作组人员也感到徐向前的意见有道理，但又想试探一下，看阎锡山的态度有点什么变化没有。于是，便请来了阎锡山的一位老师，问他愿不愿进城见阎锡山，动员他和平解放太原。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满口答应：“行！阎锡山是我的学生，你们又曾是阎锡山的学生，我看差不离。”于是，军区工作组以徐向前的名义，给阎锡山写了封信，大意是：

太原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成了一座孤城，劝他认清情势，以太原 30

万父老兄弟姐妹的性命为重，还是和平谈判解决为上策。

老秀才进城后，当面将徐向前的信交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大发雷霆，对部下说：“凡是共产党派来说和的，一律杀掉！”那位老秀才，死在阎锡山的屠刀下。

老先生被杀的消息从城里传出来，震惊世人。徐向前对王世英说：“你看，阎锡山对上可杀老师，对下是不会放过你这个学生的。你要是进城去，脑袋早已搬家了！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在太原只有一条：‘打’！”

“九月会议”前后，华北一兵团在太原四周进行了整训补充工作。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机关进一步充实加强，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均已到职。后勤部正式成立，裴丽生任后勤司令员。

通过整训练兵，基层干部和战士的战术技术迅速提高。徐向前在去石家庄和西柏坡前，曾在干部大会上对训练工作讲了话，他指出：每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都大，这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总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7个营级干部负伤，有5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第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仍继续通过，就不知变个战术，结果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察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

根据徐向前的讲话精神，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提出了十条要求：

- 充分准备，精心计划；
- 进攻防御，都要精通；
- 军事民主，服从命令；
- 隐蔽突然，敏捷机动；
- 主要方向，力量集中；
- 插入切断，连续进攻；
- 发挥爆破，步炮协同；
- 互相援助，一致行动；
- 全歼敌人，建立战功。

由于干部加强了战术训练，也带动了战士的技术训练，全兵团战斗连队100%的人掌握了射击、投弹技术，70%的人掌握了爆破技术。

兵团后勤部成立后，对作战物资的准备卓有成效。他们提出：“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响亮口号，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大小橛子（比较细的圆木）30余万根，门板30多万块，麻袋30多万条，炸药800余万斤，运输队、担架队得到充实和加强。

大力加强了对太原防御体系和兵力部署的侦察。一是由兵团领导和有关部门与赵承绶等被俘高级将领谈话，用政策开导，使其提供情况；二是派出侦察员与城内地下情报站沟通联络，随时掌握敌军动态；三是从不断瓦解过来的阎军官兵中，了解最新情况。

通过多种侦察手段，基本摸清了敌人的防御体系和兵力部署。

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就绪后，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兵团前委在徐向前住院期间，于9月下旬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其要点为：

（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三个

月内结束战役。

(二) 进攻步骤分三步。第一步突破敌之第一防线，以火力控制南北飞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必要的外围据点；第三步攻城。

(三) 攻击方向选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以东南为主要方向。以两个纵队用于东南，一个纵队用于东北。

(四) 对于攻城防害不大之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分割包围，结合政治瓦解，歼灭敌人。

预定 10 月 18 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把这一作战方案批给徐向前，并派人专程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徐向前阅后，复信如下：

聂薄滕赵（尔陆）并请电话转毛主席：

一日信及转来主席指示和一兵团前委电均奉悉。

对攻取太原的计划，我因地形尚不熟悉，没有别的意见。

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遭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攻使敌更疲惫后再猛攻之。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

关于兵力分配与使用上，我亦同意前委决定，时间于十八日开始亦可以。因时间已迫近，我亦无时间再休息，拟于七日夜即赴前方，待太原攻下后再抽暇休息。

关于弹药问题，前已谈过，我没别的意见，前方必须照顾后方的生产力与财力，亦属重要。其他一些详情待我到前方再报告。

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的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

谨 复 并 致 布 礼 徐 向 前
十月三日

徐向前抱病指挥争夺“四大要塞”。总攻太原的决战关头，彭德怀来到前线

阎锡山为了振作士气，炫耀实力，破坏人民解放军攻城准备和抢夺粮食，贸然于 10 月 1 日出动 7 个师的兵力，分 3 路南犯。经军委批准，徐向前部首先围歼南犯之敌。5 日发起进攻，提前打响了太原战役。

10 日 6 日凌晨 1 时，中央军委电示：

九月二十八日作战计划电、十月三日作战部署电及十月五日战况电均悉。你们原定十月十八日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

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

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因此你们发布战讯时不要说敌人向外扩张，而应说你们业已开始太原战役，并且战讯要待外围战大体告一段落时发表为宜。

当日，晚8时，中央军委又电示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并告华北局：

（一）五日二十一时及六日九时电均悉。歼敌两师甚慰。

（二）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向前三日函称，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期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垣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是中策，旷日持久是下策。此项意见和我们晨电意见相同。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如我军伤亡不大，城内敌人不多，城防不甚坚固，则应乘胜攻城。此外，尚有一点即城外之敌大部歼灭，一部尚未歼灭（例如北面），是否可以派兵监视城外残敌，使用主力即行攻城，此点亦可考虑。望你们相机处理。

（三）攻城所需弹药请聂荣臻、薄一波迅速接济。

（四）太原有速下可能，华北局应速即完成接收太原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太原已下，无人接管。

就在10月6日这一天，徐向前不顾重病未愈，提前出院，昼夜兼程回前线。夜1时到阳泉以西的坡头，因患感冒，咳嗽加重，左肋区闷胀，头也痛得厉害，不得不停止前行。

10日晚赶到太原前线总指挥部，连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落实军委指示精神，尽快进入攻打太原外围“四大要塞”的作战。

会议开始了，前委成员、各纵队的领导都期待着徐向前对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他们相信自己的司令员一定早有成竹在胸的方略。可徐向前朝着大家笑了笑，把目光落到参谋长陈漫远身上，提议：“还是先说说近期调查搜集的敌情资料好不好！”当然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陈漫远开始报告各方面侦察所得的情况。当说到前两天从敌占区东山柳树沟村来了位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时，徐向前马上问：“人走了没有？赶快把他请来！”

会议休息时，这位支部书记来到徐向前面前。他中等身材，脸色黑红，看外表长得很“老相”，实际还不到50岁。那年月，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地下党员大都是这个样子。他不仅收集了关于敌军的许多情报，还亲自摸索出一条直插牛驼寨的秘密小路。牛驼寨，正是徐向前在作战预案中想定的突破口，他对新提供的这条小路颇感兴趣，他边问边在地图上标出这条楔入敌人要塞背后的羊肠小路，并命令作战科放大绘制挂图，立即进行绝对保密的现地侦察。

夜深了，会议重新开始。

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太原战场的形势，讲了意见。他指出：从太原的地形地貌和敌人的防御重点看，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的“四大要塞”。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攻陷太原的战例，一次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义军于1642年2月攻取城池；一次是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华北，于11月8日攻陷太原。这两次均是由城东为突破口攻入太原城的。不过，不管是李自成还是日本侵略

军，他们都是先攻东山的主峰，抢占制高点后，再向西平推，组织进攻。而我们决不能走那条“老路”。按照军委迅速转入攻城意图，走老路拖不起。徐向前主张由南北两个方向，夹攻直插东山“四大要塞”，坚决攻占这南北16华里的阵地，把太原与东山主峰拦腰斩断，守东山主峰的敌人，不投降就把它困死。

汽灯越烧越亮，发出嘶嘶的响声。凝神静听的纵队干部，在徐向前喝水润润嗓子的片刻，不约而同抬起头，显现出信服、赞同和振奋的心情。周士第看到徐向前病瘦的身体抵不住夜晚寒冷，立即将大衣披在他身上。与会者从这件小事中，看到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深情，深受教益。徐向前接着说：“阎锡山自己有个比喻，他说‘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头，手是南北两个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

那么，攻下‘四大要塞’就等于割断他的咽喉，整个东山就被我控制，既可以奠定攻取太原城的基础，又可以打通后方人民群众支援我们作战的通路，‘土皇帝’就变成‘瓮中鳖’了。”

徐向前指着刚绘制的一张放大地图，继续说：“东山看着险，听起来也玄乎。但只要打得妙，就一定能拿下来。休息时柳树沟村地下党同志给我们提供一条路线，看，就在这里，是敌人东山守备区与北区的分界线，两区都不大管，这就给我们攻占牛驼寨提供一条最好的巧取之路。阎锡山扬言共产党不敢攻打牛驼寨，我们偏要攻打牛驼寨。目前，我军刚在城南、城北发起猛攻，敌人正集中力量在这两处顽抗。我们要乘敌不备，采取突然袭击，迅速夺取牛驼寨，进而一举拿下四大要点。”

会议最后决定：1. 继续按计划围歼出犯城南之敌，夺取武宿机场，攻下古咀子，打开东山碉堡防线。2. 趁敌人兵力已被吸引到南北两个方向，东山出现空虚之际，于13日发起攻占东山诸要点战斗，并确实控制北机场。3. 前两策得手后，迅即逼近太原城垣，进行攻城。

具体部署是：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等部由太原东北楔入东山纵深，袭击牛驼寨，并以炮火控制北机场；另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面向大窑头方向十五纵队相联接，切断罕山，孟家井敌归路，并歼灭之；十三纵队向城东南角进击；晋中军区部队除一部分在汾河西积极活动外，其主力置于太原南一线，对各据点作牵制性攻击；八纵为兵团预备队。

根据新的部署，对5日拂晓开始的太原外围作战，略作调整，经11昼夜的连续战斗，于16日告一段落，全歼敌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师，重创敌“亲训师”、七十三师、六十八师，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宿武飞机场，攻克了太原东南的石咀子和东北的凤阁梁两处重要阵地，打开了东山防线之门。本想出击“捞一把”的阎军，反倒丢了不少血本，使敌人大为震惊。

更使敌人震惊的是17日夜，解放军按徐向前预定的作战方案，正面攻击与背后抄小路偷袭相配合，一举攻克了牛驼寨大部阵地。

牛驼寨位于城东北10华里处，坐落在东山山麓的顶端，可屯兵5000人。由3大集团阵地构成环形防御，10个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地势险要，多劈坡绝壁，易守难攻。阎锡山得知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牛驼寨10个碉堡丢了9个，大部阵地失守，暴跳如雷，誓死要夺回阵地。一场更大的恶仗开始了。

敌人集中1500余人的兵力，在几面炮火的轰击和掩护下，于18、19

日发起一次又一次反扑。枪声、炮声、喊杀声交混在一起。我十九团的指战员们誓与阵地共存亡，打退了敌人的10次反扑。21日，敌以其精锐第三十师和以留用日军为骨干的十总队共3个团，在飞机大炮和毒气的支援下，发动了向牛驼寨更疯狂的反扑，仅一天的功夫，我军阵地上就落下1万多发炮弹，平均每人近10发炮弹，工事全被摧毁，交通壕全被填平，七纵七旅十九团官兵伤亡过半。徐向前得此战报，在电话里深情地对彭绍辉说：“谢谢你们，谢谢英雄的指战员们！”遂下令弃守牛驼寨，转进以东阵地，准备再与敌人较量。

阎锡山明白，丢掉东山屏障，将意味着太原城垣暴露给我军，唇亡齿寒啊！所以，他尽其所能抽调兵力，增援“四大要塞”。令十总队另第六十八师1个团守牛驼寨；第四十师六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窖头；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第九总队另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另以第三十师全部、四十师2个团，组成机动兵团，担任反扑，援应任务，并命令城东支子头至双塔一线的9个炮兵群，不惜一切代价，对“四大要塞”实施火力支援。

两军交战，实乃兵对兵、将对将。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地球上的人类打了几千年的仗，大概均没跳出这一模式。

此时的徐向前不顾病痛，时而躺在担架上到前沿巡视，时而拄根棍子支撑着身子和指战员交谈，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把部队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如何把对城市的损坏控制在最低限度，以较小的代价夺取更大的胜利。在战斗如此激烈艰难的时候，指战员看到他们的司令员抱病出现在血与火的战场，受到巨大的鼓舞。

经战场视察，徐向前也对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改变了前一段进攻面较宽的战法，决定集中兵力、火炮，坚决攻克“四大要塞”，趁势向城垣发展。10月23日，他指着放大的挂图，向各纵队司令下达战斗命令。七纵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八纵4个团攻取小窖头向杨家峪发展；十五纵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十三纵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

给各部队三天准备，听总攻命令投入战斗。

10月26日夜，东山像一座巨大的幽灵，在夜幕下把守着太原的东大门。没有灯光，没有声音，如神话传说中的魔鬼地域。

突然，一颗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照亮了夜空，紧接着我军强大的炮火射向“四大要塞”。幽灵的身躯晃动起来，一场空前的恶战开始了。

攻打牛驼寨的七纵由三旅担任主攻任务，十二旅为二梯队。总攻一开始，就遭敌拼死顽抗，猛烈反扑，每占领一块阵地，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以上的突击。二十团二营为炸掉敌人四号碉，在团长钟声善的指挥下，绕到碉堡后面，但先后组织6次爆破，由一次爆破用100斤炸药，增加到400斤炸药，敌碉堡安然无恙，第7次爆破用了500斤炸药，碉堡只炸了一个四五尺宽、三四尺深的一个大洞，仍然没将碉堡炸穿。

爆破组长张玉山骂道：“我看阎锡山的王八盖到底有多厚？跟我来，继续炸！”他带领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每人背六七十斤的炸药，在地上匍匐前进。地面上散落了一层带刺的各种弹皮，划破了战士们的膝盖、双肘和肚皮，鲜血直流。他们忍着剧痛，将750斤炸药运到敌4号碉堡底部，在炸药里埋放了一批雷管。他们将几根导火索点燃，终将敌最坚固的“碉堡王”炸上了天。战至11月13日，我七纵用血的代价，将守敌全歼，彻底占领牛

驼寨。

攻打淖马的十五纵，经激战，比较快地打垮了守敌，占领了主阵地。

徐向前在指挥所得此报告后，立即拿起电话，接通了十五纵前指，对刘忠说：“你们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根据牛驼寨、山头的经验，敌人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疯狂的反扑。你们要立即布置，做好准备。派谁去守？”

刘忠答：“我们派一二七团去。”

徐向前听了很高兴：“好啊！告诉一二七团要发扬董村阻击战的顽强精神，把敌人消灭在主阵地之前。但也要估计到，这次战斗会更困难、更残酷。要利用敌人反扑的空隙，赶紧修筑工事，补足弹药，休养兵力，研究对策。兵团和其它纵队的炮火会大力支援你们。”

果然不出徐向前所料。敌“执法队”首先出现在淖马残存的阵地上，个个如凶神恶煞，将放弃阵地的敌八总队一团二营营长姜啸林以下二十余人统统枪毙。执法杀人的枪声刚落，敌借助这股杀气，这股威风，集中第四十师全部、八总队残部共 2000 余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左中右三路向一二七团阵地反扑。经一天激战，敌人多次进攻被打退，阵地前丢下五六百具尸体。阎锡山给八总队和四十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再拿不下淖马主阵地，就不要回来见我！”并把三十师一部也调来加入反扑淖马的作战。

经近半个月的激战，敌人始终没能夺回阵地。11月9日晚，阎锡山打电话给坚守残存阵地的八总队司令赵瑞，勒令他收拢残兵再次实施反扑，如完不成任务提人头来见。赵司令在阎锡山的威逼下，不甘再为他卖命到底，率领 500 余人举行战场起义，至此，淖马要塞全部被我攻占。

“小窖头要塞”在“牛驼寨”和“淖马”之间，大小 15 个山头，以 13 号阵地和 14 号阵地（即石人脑）最为险要。八纵司令员王新亭把主攻任务交给了二十四旅。

在总攻发起前，徐向前亲自打电话给旅长邓仕俊，询问作战准备情况，徐向前说：“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你们要多想一想，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

邓仕俊说：“都准备好了。就是炮弹少了点，敌人的碉堡很多啊！”

徐向前话停了停，好像在计算什么，然后说：“好！设法多给你们一些炮弹吧。这次战役，我们的炮弹比以往哪一次都要多。不过，要和敌人比，还少得很。所以，用炮弹还要适当掌握。”

小窖头很重要，敌人非反扑不可，你们的任务也就艰巨了，不过你们一定得把它打下来，只要能坚持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26 日夜发起总攻后，经两天战斗，攻下了一至十五号阵地，敌人丢掉十三、十四号阵地后，就丢掉了制高点，整个阵地已处垂危之中。为了挽回败势，调来三十师一部向这两个阵地发动猛扑。敌人使用了燃烧弹、毒气弹，打得异常惨烈。为了争夺这两个主要阵地，双方夺来夺去几个回合，二十四旅几个团轮番攻守，一直打到敌人再也无力反扑为止。11月1日，八纵的战旗牢固地插上小窖头最高点，迎风飘扬。

“山头要塞”位于城东南 10 华里，是维护城垣的重要屏障之一。整个阵地由山头村东北一块方圆 500 米的高地和附近的大脑山组成。两个高地之间，沟壑纵横，峭崖险峻，地雷密布。由以留用日军为骨干的九总队守备。

十三纵将主攻任务交给三十八旅。战斗打响后，3 个团相继投入了战斗，

突击队多次发起冲锋，均未攻克，伤亡较大。后将三十七旅、三十九旅拿上来加入战斗，从三个方向发起总攻，至11月10日占领山头主阵地，12月上午又乘胜攻占了山头村以西的野战阵地，整个要塞完全被十三纵控制。攻打“山头要塞”的战斗先后用了17天，前后经过五次强攻，两次智取，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消灭了阎军7个团的大量有生力量。

至此，整个东山“四大要塞”的争夺战胜利结束。战斗之惨烈，在徐向前指挥作战的历史上是少有的。阎锡山除以5个师守备西山、城南和城北外，其余8个师、3个总队及保安团均全部投入战斗。徐向前先后投入近28个整团，共歼敌1万余人，平均每消灭一个敌人消耗重炮弹1发，82口径以下迫击炮弹4发、手榴弹8枚，子弹110发、炸药2斤。我方伤亡8500人。敌人动用的弹药不计其数。46年后的1994年9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一座徐向前的高大铜像和高4米、长50米的高大浮雕在“牛驼寨”落成，成了传统教育和旅游景点，后人将永远铭记这场历史上的鏖战。

东山战斗胜利结束后，徐向前决定改变乘胜攻克太原城的计划。一是部队伤亡较大，疲劳已极。除4个建制团未投入战斗，完好无损，其余均程度不同受到损伤，个别营连所剩无几，亟待补充休整。二是太原城内敌整编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夭折，我地下工作者王震宇和八战派去联络的参谋处长晋夫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就义，里应外合攻城的方案已无法实现。三是东山战斗期间，敌人在汾河以西秘密修建了五个野战机场，将敌八十三旅偷偷空运来援，如攻城太急，敌空运兵力会陆续增加；给我作战造成更大困难。四是从全国战局看，攻克太原也不宜过早。于是，经前委研究决定停止攻城，暂时转入休整补充阶段，并上报军委。

11月16日军委电示徐向前、周士第：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

（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如何？盼复。

徐向前和前委的同志们一致认为，军委的决定是英明的，有远见的。同时也给攻太原部队更多的休整准备时间，有利今后作战。此时徐向前的病情已相当严重，肋膜炎造成胸部大量积水，发烧不退，翻身困难。周士第派人请钱信忠帮助诊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了两名得力医生赶来太原前线，并于12月2日发来电报：“向前同志俟史、黄医生赶到诊治后，尽可能早日回至后方静养。”然而徐向前脑子里除了攻打太原，似乎别无考虑。后经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的再三劝说，他才同意去榆次的峪壁村暂住一时，一面工作，一面治病。

根据中央推迟攻打太原的指示，太原前线加紧对敌展开更大规模的政治攻势。阎锡山部队虽然毒化教育深，特务控制紧，军法处理很严，但并非铁板一块。在我军强大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黄樵松策动起义；八总队司令赵瑞在火线上与我接头，起义成功；东山战斗结束时敌军先后投诚的多达1.7万人；被俘的高级将领受到宽大，表示立功赎罪。特别是由徐向前夫

人黄杰将赵承绶女儿女婿从上海接来太原前线团聚之举，更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城内爆炸，对揭露和粉碎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和野蛮控制，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震撼了阎锡山和他的高级将领的中枢神经。阎锡山在城内开动特种宪警指挥处、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等对内镇压的机器，对有所谓“通匪”者，格杀勿论。

徐向前为打好政治攻势仗，提出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针对性，要“猛打加瓦解，二者相结合”。徐向前说：“诸葛亮讲过，‘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作战最重要的要有针对性，针对性越强，越能深入人心，成果就越大。”

从11月中旬起，兵团成立了以王世英、胡耀邦为领导的对敌斗争委员会。各旅成立政治攻势委员会，团营设政治攻势中心指导小组，连队设政治攻势小组，在各级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做好政治攻心战的工作。兵团政治机关，针对不同心态的人，不同阶层的人，印制了不同内容的传单和不同内容的喊话要点40多种，50多万份。诸如：

对阎锡山抓来的守城新兵，鼓动他们放下武器，回家分田：“晋中各县，土地平分，阎军官兵，家中照分，快逃回家，参加平分。”

对新编三十军则指出：“胡宗南，恐慌在西安；蒋介石，准备逃台湾；太原很快被攻占，三十军你们怎么办？”

对与我相峙的敌前沿官兵喊话：“放哨看地形，打柴看路线。知心朋友商量好，看准机会一起跑。白天过来用记号，黑夜过来高声叫。解放军大力掩护你，不怕误会跑不了。带上子弹和步枪，谁敢追赶打他娘！”

这些宣传口号通俗易懂，打动人心，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阎锡山利用秘密修建的5个野战机场不断运兵，运作战物资。这条空中走廊，给追随阎锡山的一些人带来了“希望之光”，似乎惊恐万状的心又平静了一点。打掉这5个机场，无疑对敌人心理上是巨大的震撼，对瓦解敌军会更有力量。

东山战斗结束后，徐向前在指挥东线，南线和北线继续扫清外围据点的同时，于12月初，派十三纵一部西渡汾河，配合晋中部队作战，将敌人新修的万柏林、三角村、王村、红沟子等野战机场全部控制起来。阎锡山的空中运输线基本被切断，就像垂危病人被拔掉输血器一样，发动了数十次疯狂反扑，但已无济于事。断了输血的人，是没有多大挣扎之力的。战至12月底，毙伤敌2500余人，击毁坦克2辆，将太原城紧紧围困起来，使敌军的心态更为恐慌不安。

经半年之久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的工作，使阎军战场起义、投诚和逃亡的人数增至近3万，为最后攻取太原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9年春，部队按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按正规化的要求进行整编。华北军区第1兵团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仍兼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八纵改为第六十军，十三纵改为第六十一军，十五纵改为第六十二军，每军均9个团。3月1日，兵团在太原前线举行了命名典礼大会。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于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正规军154.7万人，国民党部队的主力大部被消灭，剩下能作战的部队只有130余万，分散在西起新疆，东到吴淞口的漫长战线上。人民

解放军正规部队达 300 多万人，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崩溃已成定局。

3 月中旬，杨得志、杨成武率十九、二十兵团西进参加太原会战，使进入山西的部队达 40 余万人。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于 3 月 29 日，借口所谓商讨“和谈”大事，孤身乘飞机逃往南京。曾几何时，这个指着 500 瓶毒药和棺材对美国记者标榜“死守太原”，“如果失败，我就和我的军官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的反动头子，也不得不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他为了安抚人心，作出还要回来的姿态，只得将心爱之人“五姑娘”留下，同梁化之、孙楚、王靖国等反动头目一起“誓死保卫太原”了。

40 万大军云集山西、兵临太原城下，为增进团结，协同作战，徐向前指示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制定了“八大守则”，发各部队贯彻：

- (一) 随时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
- (二) 协同作战时要积极主动，不争夺缴获。
- (三) 行军相遇时，要主动让路；驻军一起时，要主动让房子，不借家具，不争购物品。
- (四) 当兄弟部队有困难时，要尽力帮助。
- (五) 说话时要态度和蔼，礼节周到，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
- (六) 不许私自动用兄弟部队的武器弹药器材及其他物资。
- (七) 兄弟部队的规劝和建议，要虚心诚恳接受。
- (八) 见兄弟部队有违犯政策纪律时，要经过组织提意见，不许背地议论。

三个兵团会师后，杨得志、杨成武都先后到峪壁村去看望徐向前，各军之间也互相走访慰问，充满团结友爱、欢欣鼓舞的气氛。

3 月 17 日，经党中央、毛泽东指示，以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周士第，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时，成立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统一领导各部队。成员为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由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徐向前任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任副书记。

经 5 个月的作战，阎锡山在太原的防御重点为城垣外围阵地，在东 7 里、南 10 里、西 20 里，北 30 里的范围内，分为 5 个战区，投入兵力 13 个师；另以 2 个师及绥署直属队防守城市；以三十军及八十三师为机动部队；以亲训炮兵团、榴炮团及 4 个独立炮兵营共 900 门火炮、分 18 个小炮群，置城外 5 个防区后沿。总兵力为 6 个军、17 个师，约 7.2 万人。

徐向前用于攻打太原的兵力为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晋中部队，一野第七军，四野炮一师，共 25 万人，火炮为 1300 余门。根据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此役不论在数量上，素质上，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根据敌我情势，总前委决心以插入分割战法，彻底扫清外围后立即总攻城。1949 年 3 月 30 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将此案电报中央军委：总前委讨论太原作战方案，报告如下：

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

第二步攻城，其具体部署：

1. 以二十兵团一个军，由城东北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新城以

南之北飞机场；另一个军主力（两个师）及西北第七军之一一个师，由兰村沿汾河西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之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北机场以北之敌而歼灭之；另由西北第七军以一个师配合二十兵团，同时攻占牛驼村（城东北），继向北黄家坟敌进攻，并钳制该敌。

2. 十九兵团以一个军及晋中部队三个旅，由城西南汾河西攻击南屯义井，继向大小王村、大窰流、南社村（均在城西）

追击，控制该地区，配合二十兵团由汾河南进之军切断河西之敌而歼灭之，另十九兵团又一个军，攻击城南汾河东之杨家堡、老军营、大营盘、狄村之敌；另十八兵团以一个师同时由山头向南攻击马庄与双塔寺间之阎家坟，配合十九兵团攻占狄村之军，进击双塔寺与大营盘以南之敌而歼灭之。

3. 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之主力第一步暂停攻击，而以佯动配合南、北、西等区作战；待以上地区攻击得手和被切断之敌全部被消灭时，即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由城东大东门方向，十九兵团由城南首义门方向，二十兵团由城北工厂区三面攻城，晋中部队留河西配合攻城。攻击时间定于四月十五日开始，争取半个月攻下太原城，但仍作一个月之作战准备。以上方案彭总已同意。

当否？请军委指示。

此时，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奉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已于两天前即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接替病中的徐向前指挥作战。彭总一到，就来峪壁村看望徐向前，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革命友情难以言表。徐向前和彭德怀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虽各率一路大军，但仍有几次难忘的相会，结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合，徐向前和彭德怀在维谷河畔相识；1937年洛川会议后，徐向前和彭德怀又曾一起随周恩来、朱德去太原同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以后两人就再没相见：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徐向前虽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因病没能出席大会；1948年“九月会议”，徐向前参加了，彭总又因在前线指挥作战缺席。如今能在太原前线相见，共同携手指挥攻打太原，怎么能不高兴！

三十八年后，徐向前深情地写下了这段往事：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结束（我因身体关系，请了假，未出席会议）。毛泽东要彭德怀返西北途中，来太原前线看一看，解放太原后，即可将十八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指挥。他到峪壁村看望我，讲了二中全会精神，我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我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他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布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3日，军委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复电：

（一）同意三月三十日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

（二）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这时，国民党以首席代表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23人，正在北京与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及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谈判。4月5日，毛泽东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彭德怀发电：

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

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

躺在病床上的徐向前看过电报，闭目不语。他深切地感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太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阎敌可谓仁至义尽，网开一面，让条生路，但对阎锡山及其干将，徐向前实在是太了解了。总前委研究后，决定致函孙楚、王靖国，派被俘阎军将领赵承绶、高斌、曹近谦去太原试谈，结果被敌六十一军军长赵恭挡驾，给赵承绶等人回信曰：阎司令临走有命令，不许被俘人员返城。通过其他途径也都拒之门外。对太原，只能是强攻了。

4月20日凌晨2时，到达各攻击地域的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从四面八方向太原突击。22日晚，扫清了城垣外的全部守敌，城垣暴露在进攻战士的面前。

24日清晨5时30分，天还没放亮，彭德怀一声令下，1300门大炮按预定的26个突破口，同时开炮轰击。一发发炮弹倾泻到城垣上，炸得浓烟滚滚，砖石横飞，人仰马翻。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城垣被打开了十二个大缺口，为步兵攻城开辟了通路。锐不可当的我军将士破城而入，横扫歼敌。第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五五三团奉命攻打太原绥靖公署，活捉战犯孙楚、王靖国及师以上军官43人。梁化之和“五姑娘”在绥靖公署东北花园的地下室里，效仿希特勒和艾娃，服毒后点火自焚。阎锡山反动统治38年的山西太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7

“打跑阎锡山，来了徐向前，五台人又沾光罗！”哪知这位司令官却“六亲不认”

太原解放当天，以徐向前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周士第、罗贵波、肖文玖、裴丽生、解学恭、康永和任委员的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到职视事。以罗贵波任司令员、赖若愚任政治委员、肖文玖任副司令员的太原警备区和以肖文玖任司令员、赖若愚任政治委员的太原市卫戍司令部已投入紧张的工作；以裴丽生为市长的太原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接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太原公开。

胜利的炮声，人民载歌载舞欢庆太原解放的锣鼓军乐声，像历史的迎宾曲，迎来徐向前进驻太原市。来自全军、全国各地的贺信、贺电像雪片似地飞入太原，出现在徐向前的眼前。

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十二个人民团体联名电贺太原大捷。

原电如下：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诸将军并转太原前线全体指战员同志：

太原的解放，最后结束了敢于顽抗的战犯阎匪锡山在山西近四十年的罪恶统治，使华北由此宣告完全解放。我们为这一伟大的胜利欢欣鼓舞，谨向英勇善战的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祝捷致敬，并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团结一

致，积极支援前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迅速、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匪军一切敢于顽抗的残余势力，为最后解放全中国胜利前进！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华北文艺界协会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中国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北平市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

中共中央特于“五一”节贺电太原解放，电文如下：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诸同志及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山西及华北各省全体军民同胞们：

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三十八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长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於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在胜利面前，徐向前牢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戒骄戒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他一心想着革命大业，一心想着人民群众，在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立起了无字的丰碑。

徐向前身在太原，胸怀全局。在欢庆解放的日子里，他正在地图上标出全国各大战场追歼残敌的形势。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已完成渡江战役，南京总统府上空的“青天白日”旗已飘然落地。再过些日子，他将送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随彭总进军西北，彻底消灭沾满西路军将士鲜血的“马家军”。想到这儿，徐向前两眼湿润了，因身患重病不能同彭总一起西征而感到内疚和遗憾。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自己能做的事。

为了总结太原战役的经验，徐向前强忍病痛查看缴获的大量军事档案，文件和电报，从敌人的资料中为总结的经验佐证。关于太原战役初期和中期作战情况的报告，都是他边指挥作战边写成的，太原战役后期作战经验他虽然没有亲自动笔，但也下了不少功夫。

在他进城后，又支撑着坐担架到双塔寺等处要塞查看，仔细研究敌人各式各样的碉堡结构和爆破的经验。他在审定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的一份报告上，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大胜后容易骄傲，有成绩也就容易掩盖缺点，故各部均应于整训前三评工作中，着重注意自己尚有缺点的研讨与发现弱点！”

各兵团经过短期整训和三评，奉党中央毛泽东的命令，陆续开始向西北战场进军。

在第十八兵团出发前，徐向前心潮涌动，夜不能寐。解放战争以来，徐向前带领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横扫山西，他很想去做一次告别，可身体不行啊！于是，他让工作人员拿来笔墨，一字一字地写下了《告第十八兵团指战员的题词》，全文如下：

我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之下，与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及前后方各机关密切合作之下，在我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工员、后勤员英勇作战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精神之下，终于打下了蒋阎匪帮进行内战

反对和平的坚固据点之一的太原城。

但敌人尚未全部消灭，尚图作困兽之斗，幻想着卷土重来。因之我们每个指挥员与战斗员决不可稍有骄傲和松懈的心理，我们要本着打下太原的决心勇猛前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敌人敢于在哪里抵抗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哪里！把人民胜利的旗帜插到全中国的领土上去！

徐向前一九四九年五月 220 字的题词，徐向前歇了两次，用了近 1 小时才写完，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才派人送往十八兵团。

徐向前是太原前委书记，又是太原市军管会主任。他要求太原警备区进城后，要把这座劳动人民经历几千年，用血汗建起的城市“接好、看好、交好”。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军管会和警备区的领导成员和部队一起出现在太原大街小巷、工厂和机关。按总前委和军管会命令，各野战军攻进城后，必须在 12 小时之内全部撤至郊外，将许多工矿、企业、仓库、机关、学校、城门、卡口移交给警备部队。指战员们为了“接好、看好、交好” 228 个重点单位，他们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每个战士一天站岗执勤超过 11 小时，没有人叫苦叫累，一双警惕的眼睛总是雪亮的，终于完好无损地将这些单位交给了人民。胡耀邦将这些情况向徐向前报告后，徐向前才松了口气，高兴地说：“我们攻打太原，解放太原，就是让人民来接管太原，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

太原刚解放，潜伏隐蔽的敌特到处活动，暗杀、放火、放毒、破坏交通，无恶不作。

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跟着起哄，推波助澜，使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于是，徐向前把分管治安的军管会成员和卫戍区首长请到床前，对他们说：“我们只有狠狠地打击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护人民，对敌人的仁慈，就等于对人民的残忍，一定要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为了执行徐向前的指示，军管会成员，警备区司令，亲自动员部队打好维持治安、保证社会安定这一仗。五旅十四团协同太原市公安局组织联合纠察处，担负市区的警备纠察任务。

在市区建立固定哨和游动哨，严密检查重要关卡，进出的人员，发现可疑之处，就一查到底，仅入城不到 10 天，就查获匿藏的阎军副师以下军官 136 名，歼灭一小股企图搞破坏的武装特务，处理各种抢劫、杀人、偷窃、贩毒等案件 1604 起，扑灭大火 31 起。

为收容、处理阎军俘虏和散兵游勇，防止他们在社会上闹事，根据徐向前的指示，采取了以下措施：对老、弱、残、废，二次被俘，顶名壮丁，经过几天教育后发给路费、路条，送其回家；对青壮年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政审合格后，编队训练，加强阶级教育，动员参军打老蒋；其余人员经过个别教育后分别处理，将有血债的敌特分子移交公安局，将部分可为我工作的送山西公学学习，将几千人遣返回原籍。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和手段，为维护治安，稳定人民，恢复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这座 4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解放的第 5 天，市内邮电、交通、供水、供电、商店、书店相继恢复营业，人民大戏院，新华戏院重开锣鼓，电影院也开始放映电影。

郊区的翻身农民将粮食、蔬菜、肉禽蛋源源不断地投放市内菜场粮店，较好地解决了市民的饮食问题。在庆祝解放南京、太原伟大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徐向前带病出席，他胸前佩戴大红花，向工人秧歌队、学生秧歌队和解

放军秧歌队挥手致意。

阎锡山以太原为老巢，在山西经营了 38 年。“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在阎锡山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封他为“土皇帝”实在是当之无愧。他非常看重老乡关系，多年来，他把一批又一批的山西人，特别是山西五台人，笼络到自己麾下，加官晋升，委以重任，当地有句顺口溜曰：“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

徐向前入城后，社会上很快流传“阎锡山跑了，徐向前来了，五台人还是沾光！”这话传到徐向前耳朵里，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可不是阎锡山，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符合革命的原则，要用事实证明我们和阎锡山是完全不同的人。

一天，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名义的五台商人，点头哈腰地找上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说：“赚了大钱，发了大财，还不是为五台人争光添彩！”

还有些亲戚朋友找徐向前要官当，说什么“大小当个头，不用站岗楼，给个官当就比老百姓舒服”。徐向前对这些来访者，总是动之以情，言之以理，给以耐心帮助教育。

一些人理解了，逢人就讲：“还是共产党的官好，不贪不占不徇私情，咱们国家大有希望！”也有的一时不理解，没能沾上光，说徐向前当了大司令员“六亲不认”。

有一回，徐向前的两个姐姐徐先月和徐春月结伴从五台县的乡下风尘仆仆地来到太原，找到了徐向前。她们见到久别的弟弟，高兴得直流眼泪。徐向前在家排行老六，从小就受姐姐疼爱，如今胜利了，解放了，姐弟团圆了，也由衷地高兴。

姐姐对弟弟诉说父亲临终前的遭遇：当地反动派得知徐向前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扬言要对徐家剿根灭门，永安村姓徐的几乎全部株连。有的为找条活路，不得不更名改姓。

父亲在家里躲不住了，就跑到南山的一座庙里，有位好心肠的老人偷偷地给他送点吃的东西，后来害了大病，三天两头断粮，惨死在破庙里。从姐姐的言语中，徐向前听得出，他们这些年日子挺惨。他想到父母、姐姐和众乡亲，受了他多年的连累，吃了许多苦，这沾的是什么光啊？！

更使他感到内疚的是抗战开始那年回家，两个姐姐把两个心爱的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徐向前对两个外甥没给一丝一毫的特殊照顾，放到了打仗最多、最激烈的部队，因为那里最需要热血男儿啊！不幸的事发生了，大姐的儿子郭福安和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都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中弹身亡，为国捐躯。今天看到两个姐姐，他心里仍十分难过。

这些都过去了。在姐姐的心目中，过去的幸都是命里注定。而如今，弟弟当了大官，一定会念亲情，看在牺牲的两个外甥的情份上，也应该沾些光，享点福了。太原城里收缴和没收敌人的东西堆积如山，怎么也得给老姐一点，这也是命啊！然而，徐向前没有给姐姐什么。他给姐姐的，只是好言劝慰，说他们为革命养了两个好儿子。他对姐姐说：“我这个司令和老百姓一样，是个穷司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阎锡山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共产党干部再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也跟着吃什么，在这儿吃几天，就知道共产党的官是怎么回事了。”

老姐俩住了几天，发现弟弟还是过去的弟弟，真的是人民的官，什么东西也没要，空着手回乡了。

徐向前在太原虽然只住了一个多月，但他留在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却是一座无字的丰碑。

38

新中国的第一任总参谋长，就碰上朝鲜战争。奉命前往莫斯科谈判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壮丽的一天。隆隆的礼炮声，送走了黑暗的时代，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了。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徐向前没有出现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没能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和三十万首都人民群众一起欢庆这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胜利。

此时，他正在青岛海滨休养治病，他和夫人黄杰坐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宏亮声音，如同一声声春雷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滚动。徐向前和黄杰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两位大革命时期入党，走上革命征程的老战士，无比激动地互勉：

我们为之奋斗的愿望实现了！

徐向前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被载入中国史册。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9日，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没有出席会议。党中央、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信任，使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百废待兴，军队的任务异常繁重。作战、剿匪、建军、军管、整编、支援新区土改、参加生产劳动等等，事情千头万绪，徐向前心急如焚，这副重担让副总参谋长（后为代总长）聂荣臻一个人来挑，实在感到内疚。聂老总后来曾对徐向前说：这一段是他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

1950年5月，徐向前的身体刚好转，便从青岛来到北京。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来北京，看到首都和各方面工作都走上了正规，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心情无比喜悦。

6月6日至9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负责人列席43人。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等分别就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人民解放军整编、税收、党的建设和整党问题作了报告。

此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的编制定额，继续削减陆军兵员，以加强海、空军建设。徐向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

参谋长，虽然病魔缠身，仍然日夜关心着军队建设。他不能负责繁重的工作，就利用会前会后或制定文件时，谈些想法，提些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的各位负责人，都十分关心徐向前的身体，再三嘱咐他安心静养，争取早日康复。中央军委还指定由聂荣臻代行总长工作，徐向前深情地对他说：

“聂总，你多辛苦了！”

聂荣臻同徐向前共事多年，很理解徐向前的心情，爽快地说：“大事共同研究，请示中央。日常工作就请徐总放心好了。”

会议结束时，聂总握着徐总的手，再一次请他放心，安心养病。革命的友谊，强劲的暖流，在两位老战友全身涌动。

徐向前身为总参谋长，仍保持他那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回到青岛后，首先精简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徐向前和黄杰亲自找工作人员谈话，讲解部队整编的意义，帮助他们识大体，顾大局，跳出个人感情的“小圈子”，不论到哪里，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争当英雄模范。

这些同志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有的归建第十八兵团，奔赴大西南；有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当了干部；有的复员回乡，解甲归田。这些人跟随徐向前多年，战争年代为了保护首长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徐向前为减轻身边工作人员的劳累，也经常自己动手做些事情，相互间结下了浓厚的感情。

徐向前任总参谋长后，文件越来越多，可他一直坚持使用跟随他南征北战的那个连油漆都没刷过的木板箱子，就是到北京参加三中全会带的也是这个箱子。秘书建议买个好一点的皮包，他说：“我看这就行啦，不必买了。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国家财政又很困难，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把钱用到军队建设上。”

他身体刚一好转，就告诉炊事员不要为他单独做饭，和大家一起就餐。一件衬衣，一双袜子都是穿了补，补了再穿。他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嘛！”徐向前一生就是这样：衣不求华，食不厌粗。

身在青岛，心系世界风云。徐向前身为总参谋长，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就时刻警惕着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动态。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更引起了他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6月25日凌晨，朝鲜爆发了战争。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命令美军对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派兵入侵朝鲜。与此同时，又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侵占了台湾。

面对即将席卷新中国的战争风云，国家主席毛泽东于6月28日发表词严义正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在这一天发表声明，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提出强烈抗议，他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徐向前反复细读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和声明，越来越感到形势严峻，中国被卷入这场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对夫人黄杰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一心一意想搞建设，可帝国主义不允许你搞，怎么办？打！只有打完了，

打胜了，我们才能继续搞建设。”黄杰知道丈夫的心思，晚上让炊事员加了两个菜。开饭时，徐向前觉得餐桌上“超规”了，问黄杰是怎么回事，黄杰取笑说：“要打仗了，总参谋长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啊！”说得徐向前乖乖地动筷吃饭。从此，对活动也参加得多了，经常出去散步，打太极拳，晒太阳。

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走到海边，去看“观海楼”。这是面海背山，用花岗岩盖起的一座小楼。据说是侵略者德国总督为他爱女建的别墅。后因蒋介石和宋美龄来青岛时，到此观赏过海景，于是便得雅号“观海楼”。徐向前来到此处时，空无一人，石壁斑绿的古堡式建筑，在朝霞映照下，光怪陆离。看到这种景象，想到朝鲜战火对中国的威胁，他不禁吟出了“群魔已为浪淘尽，此地空余观海楼”的词句。

说也怪，不知是战争在呼唤一个军事家，还是医生们的医术高明？徐向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9月初，在青岛治疗休养14个月的徐向前，在战火即将烧到祖国东北边境的严峻时刻，全家来到了北京。

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有关部门便暂时把他安排在颐和园佛香阁下的一个小院里。

在朝鲜半岛，战火已越烧越烈。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突破三八线，打到南朝鲜东南端的洛东江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集结7万大军，在海、空军的运送和掩护下，于9月15日在汉城西南仁川港登陆，拦腰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人民军腹背受敌，伤亡严重，被迫后撤，面临被歼的危险。

中朝亲如兄弟，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为所欲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9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会议厅召开会议。徐向前接到通知后，预感到是入朝参战问题，及时赶到会场，在会议厅后排坐下。周恩来进来后，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一眼看到了徐向前，马上指着他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此刻，所有在场的高级领导同志和徐向前一样，都被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所感动。果然不出徐向前所料，这次会议是在比较小的范围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的决定。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分路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10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十三兵团机关为基础组成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陈赓、宋时轮、韩先楚、洪学智、杨得志，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下辖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三兵团、第二十兵团、第二十三兵团以及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六十六、第十六、第一、第二十一、第五十四等军，空军、海军、防空军、铁道兵、工兵部队、装甲兵部队各一部。徐向前为成立志愿军的决策和部队的调动与编成尽心尽职。

为了朝鲜战场的胜利，为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毛泽东点将徐向前，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出访莫斯科。那是1951年“五一”节后的一个夜晚，徐向前和夫人黄杰正在庭院里散步，忽然，中

央办公厅打来电话通知：毛泽东主席约见徐向前。毛泽东深夜约见，必有要事。徐向前急忙驱车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毛泽东正在办公室和统战部长李维汉谈工作。见到徐向前到来，中断了谈话，迎到客厅门口，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沙发要徐向前坐下。毛泽东亲切地问：“近来身体好一些吗？我看气色比上回好一些喽！”

徐向前回答说：“天气一暖和，就好多了。我感到可以工作啦。”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先向徐向前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他说：朝鲜战场的形势对我有利。已经打了4次战役，5次战役正在进行。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都是顽固派，你不打他，他就不舒服，现在打掉他23万人，那个麦克阿瑟不得不下台喽！我看啊，李奇微也没有让地球倒转的本事！彭德怀率百万大军入朝参战已半年多，先后发动了5次战役，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志愿军急需补充武器装备，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急需武器装备。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求助苏联了。

接着毛泽东向徐向前交待去苏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说：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是不行的。过去有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现在靠谁？朝鲜战场消耗大，缴获少，打仗要靠我们自己造枪造炮造坦克！

徐向前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点头，一边记录。

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判哪些具体项目，还有什么困难，可同政务院和彭德怀商量。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治病，对外保密，你要去听听他的意见。

徐向前说：“请主席尽管放心，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努力完成。”

毛泽东习惯晚上办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徐向前受领任务后，告别毛泽东和李维汉后，没有回家，便驱车去彭德怀的住处，商谈此事，连夜拟定了代表团名单和谈判内容。

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代表团由徐向前任团长，成员有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炮兵参谋长贾陶、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中国驻苏联使馆商务参赞江泽民，武官吉合。代表团正式成员8人。另外还有3名工作人员。

代表团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是请求苏联援助我国兵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152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

双方商定：此次谈判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

徐向前率代表团于5月25日由北京乘火车出发，陪同代表团出访的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军事总顾问柯道夫中将及夫人。列车横贯亚欧，走行9昼夜，于6月4日抵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等人到车站迎接，并送代表团到莫斯科大旅馆下榻。什捷缅科大将给徐向前的第一印象是高大而匀称的身材，仪表堂堂，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军人风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副总参谋长，陪同斯大林到过前线视察，是位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颇受斯大林的器重和信任。

在徐向前下榻的会客厅，两位总长就谈判事宜交换了初步意见。徐向前向他说明了代表团来苏联谈判的主要任务，希望苏方大力协助，以便早日达成协议。什捷缅科再次表示，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致以最诚挚、最友好的

兄弟般的欢迎。他仿效斯大林与毛泽东前年冬天在莫斯科的会谈模式，对徐向前说：“我奉斯大林的指示，也组成了 8 人的谈判代表团。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们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徐向前初次出访，没有外交工作经验，但他懂得“客随主便”之礼仪，认为朝鲜战场打得这么激烈，请“老大哥”支援一点武器装备和技术，不会有什么困难。故表示同意什捷缅科的安排，没想到这一谈竟用了 4 个月，直到 10 月中旬才达成协议。

在徐向前和什捷缅科的高级谈判中，什捷缅科说：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请徐总长放心，一定会办好。

军队编制要适应战争需要，搞得合理才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我们卫国战争的经验，健全后勤组织及编制步兵、炮兵、坦克、骑兵师团是十分必要的。

什捷缅科建议：根据朝鲜战场和中国的国情，中国军队师的编制不应一个模式，不要强求一步进入机械化，师属火炮可用汽车牵引，团以下的火炮用骡马牵引和驼载即可，便于随行步兵作战。坦克团必不可少，宁肯少编几个军，也要把师属坦克团编配好。在师进攻和师防御的主要方向，一定要加强坦克，这是机动自由的、快捷的、钢铁的堡垒。

当徐向前问及军事订货的问题时，什捷缅科回答：我们的运输能力有限，今年还有 6 个月，只能给你们发运 16 个师的装备，其余 44 个师按每年运送三分之一计算，至 1954 年完成。徐向前提及援建兵工工厂问题时，几次谈判什捷缅科都以外交词令回避，毫无进展。徐向前感到，他率代表团来苏联，总的说来，苏方是友好的，热情的。他们对中国革命胜利只有一年时间，就出兵抗美援朝，表示钦佩，也愿意提供一些军援。但是，他们怕和美国打仗，怕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办事吞吞吐吐，缩手缩脚，很不痛快。

徐向前陆续将谈判情况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电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能否参照苏方对我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以便统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

第二，今年 16 个师的装备订货，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多定些高射武器、战防武器，步兵武器则不定或少定。

第三，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视兵工生产谈判的结果而定。

原则上我们能生产者不定货；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少定货；不能生产又急需者全部定货。

根据徐向前的建议，6 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又派高岗来到莫斯科，带来了 60 个师的装备定货单，由徐向前转交什捷缅科。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作战物资品种繁多，数量甚大，在徐向前没去苏联前，往往是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来解决这些重大事宜。现在，只得由徐向前出面交涉，弄得苏方颇为头痛。

当时，苏联也正忙于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一个牺牲了 2000 万人的民族，恢复元气很不容易。莫斯科的房舍、街道，仍是战前的，新建筑很少。男人牺牲很多，男女比例为 1 : 8。旅馆里的招待人员，多为伤残人。斯大林格勒到处是断垣残壁，工厂开工的没几家。人民生活品匮乏，买黑面

包都要排长队。而我国当时的宣传只讲苏联如何强大，对人家的困难讲得极少，徐向前来到莫斯科，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向毛泽东发电报，反映自己焦急的心情，毛泽东复电：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10月的一天，布尔加宁在莫斯科同时接见金日成、高岗和徐向前。他对三位客人说：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只有5年多，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对于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援助的，应当援助的，一定会援助。徐向前听得出，他讲话的意思是有困难，不能满足中朝方面的要求，希望谅解。不久，苏方通知徐向前的代表团，原定今年提供16个师的装备订货，减为10个师。其余50个师的装备，从1952年1月算起，每月发运1个半师，到1954年上半年，全部发运中国。徐向前和高岗商议，请高岗出面去找布尔加宁，要求仍维持原计划不变，但没能如愿。10月间，什捷缅科正式答复徐向前：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设一些军工工厂。至此，双方达成了谈判协议，互相签字交换蓝本，敬酒祝贺。

10月下旬，徐向前一行离开初冬的莫斯科，乘火车启程回国。因劳累过度，路途中受了风寒，列车刚刚进入祖国边境满洲里，他开始发高烧，又病倒了……

39

胸怀战略全局，情系军旅生涯。人们说他“是帅又是兵”

战场上，徐向前是叱咤风云的主将，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胜利后进了北京，当了元帅，他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胸怀战略风云，情系普通一兵，人们赞美他“是帅又是兵”。

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徐帅呕心沥血。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这些重大制度的研究。他以中国军队的长期实践经验为依据，借鉴外国军队建设的一些好形式，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些被毛泽东采纳了，对加快人民军队的建设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担任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此时的徐向前身体仍然很虚弱，战争年代留给他的偏头疼经常发作。但他仍像战争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积极参与军委的集体领导，支持彭德怀的工作，军委例会很少请假。有时在会议中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悄悄

地到休息室吞片药，待病情缓解继续参加会议。彭德怀是位粗中有细的人，甚为徐向前的身体担心，休息时劝他说：

“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向毛主席请假。”

徐向前感激地说：“谢谢彭总，比当年打太原轻多了，实在坚持不住我会请假的。”徐向前不仅没请假，在讨论军队各项制度时，都很认真地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摆到桌面上，同大家共同研究。

徐向前对军委分工的具体工作，积极大胆地实施组织领导，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分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成立，防空军是在1954年10月23日成立，由于缺乏军种建设的经验，空军和防空军在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有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徐向前在组织人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5年4月12日和13日，请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和空军、防空军首席顾问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解决了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等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新中国的10位元帅，从此闻名天下。

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任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

根据林彪的提议，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组长。这个战略研究组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委员会，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任战略委员会主任，他深谋远虑，以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向党中央提供了两条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在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方面，徐向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实际影响，首先对“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

他在华国锋主持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他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你们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

徐向前重申自己的意见，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后来，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家难得一聚。

在谈到外交战略时，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地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在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方面，徐向前从历史的经验中，从对世界风云和我国国情的分析中，也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

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尚未建交，中央对战争突然爆发的考虑比较多。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备战工作上去，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后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军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徐向前对此十分拥护，徐向前说：“按照中央的决策，军队工作也有个转移的问题。”但当时对战争的估计还把握不准。到1980年4月5日，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讲话中，就讲得比较明确了。他说：“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11月24日，他在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汇报召开全军参谋长和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当然不是说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要搞战备。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认清形势，抓紧时间把干部培训好。把军队整顿好。”徐向前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无论是在党内、军内都是很有影响的。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深刻的认识，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的论断：“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在认识上的转变，是伟大战略转变的重要方面，是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认识战争形势的伟大升华。这一转变的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识，使人民军队的建设在新的起点上迈步向前。

徐向前身为中国元帅，不仅胸怀战略全局，而且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兵、是个老兵，情系军旅生涯，心中装着人民和战士，深受全国军民的衷心爱戴。

第一次穿上元帅的礼服，第一次佩戴元帅军衔的那天夜里，他久久不能入睡。荣誉地位，使他感到欣喜和不安；悠悠漫长的历史回顾，使他心如潮涌。童年的永安村，太原国民师范，珠江岛上的黄埔军校，蒋介石校长找他谈话，广州起义，手拿地下党给他的小纸条去找毛泽东，鄂豫皖的斗争，白雀园“大肃反”妻子和一批好同志被张国焘错杀，万里长征路三次过草地，血战河西走廊……想着想着，他的眼圈湿了。他动情地对夫人黄杰说：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是一条用革命烈士鲜血浇注的路，列宁讲的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太深刻了！

他始终不忘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1956年，管理局的人给徐帅家送来一块新地毯，铺在屋里的砖地上，孩子们可高兴了，有的躺在上面装睡觉，有的在上面翻跟斗。徐向前却不高兴。他问秘书，一块地毯值多少钱你知道吗？秘书摇头，说不出价，可徐向

前心里有数，硬是让秘书把地毯退回管理局，并对秘书说：“现在国家还很穷，一块钱都应用到建设上，我们为什么要把上千元的东西踩在脚下啊？”

按规定，元帅家里配两台小汽车，一辆吉姆，一辆华沙。可徐向前想，一辆车跑起来，顶战争年代多少匹马啊！有一辆就足够了。于是，他硬是叫秘书退回一辆。还立下规矩，夫人和孩子上班、上学，一律不准接送。

徐向前跟普通人一样，也是一个爱看戏、爱看电影的人。

但他很少去看戏，他不喜欢看戏后上台接见和作“指示”。随着军队文化事业的发展，影片多了，放映队伍也扩大了，为高级领导人到家里放电影已成司空见惯的事。可徐向前一直谢绝到他家放专场电影。他总是说：“看戏看电影是一种娱乐，为什么不到人民群众中同娱乐？想着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好！”日子久了，徐帅家里形成了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而他本人由于工作忙，很难按钟点到电影院看电影。后来，有了电视机，徐向前看电影的问题才算解决了。

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困难，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滑坡。粮肉等食品更是奇缺，局部地区还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徐向前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全国军民一样勒紧腰带共渡难关。管理人员为了照顾元帅的健康，想买点肉给他补补身子，他知道了，马上制止，并深情地对管理人员说：“全国人民都很困难，毛主席那样爱吃红烧肉都带头不吃了，周总理也和大家一样粗茶淡饭，我能吃得下吗？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想着人民，想着部队的官兵，不能有丝毫特殊啊！”

尊干爱兵，这是人民军队的又一光荣传统。徐帅身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之一，始终把爱兵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在他身上，官兵们既能看到一个中国元帅的威严，又能体会到一个长者的慈爱。

1965年，他到部队视察，听完有关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就一头扎到连队，看战士们的训练表演，听战士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查连队宿舍的内务卫生，就像一个老连长又回来似的。临走时，徐帅突然想起没去炊事班看看，便又快步来到炊事班查看战士们的伙食，并握着炊事员的手亲切地交谈。

陪同他的一位首长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回想起攻打太原时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9年初春，因徐向前病情越来越重，前委决定将他用担架抬往峪壁村休养治疗。他躺在担架上，坚持要到前沿阵地去看看在那里战斗的官兵。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在场的人都吃惊了。谁对他劝说都不起作用，只好将他抬到距太原最近的东山十五纵队阵地。在这里，他看到炊事员为保障前线官兵能吃上热饭创造出底下能生火的保暖饭桶，高兴极了。他说：“好啊！好，这样同志们就不吃凉饭了！”并指示马上在参战部队推广使用。16年过去了，这位首长看到徐帅还和当年一样，爱战士、疼战士、无微不至地关怀战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徐向前80多岁高龄时，新中国的元帅，健在的只有他和聂荣臻了。可他并没有因年龄老而淡化对士兵的深情。

1979年，我昆明云南边境部队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有一批干部战士阵亡和伤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牺牲的烈士要给予抚恤，对伤残的战士“酌情安排工作”。

一些地区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正之风的影响下，一些残废军人没有得到妥善安排，在昆明街头出现了军人佩带勋章乞讨的现象。一些烈

士家庭，生活则更是困难，全部抚恤金买不到一头牛，有的人家抚恤金还没拿到手，就用来还债了。

徐帅得知这些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对有关的同志说：干部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牺牲和伤残，战后都应给予妥善安置，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影响军心也影响民心啊！徐帅提议军委办公会议要研究这个问题，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这个问题。

军队要求不要太高，但地方各级政府一定要负责安置好，建议拨专款解决，专款专用。

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工作时，杨得志一字一句地宣读了徐帅的谈话，各位书记认为老帅提出的问题重要，建议可行，不久，国务院重新下发了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后来，又陆续下发文件，将烈士的抚恤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件事的过程，中国军人有多少人知晓？中国老百姓有多少人知晓？徐帅并不想让人民和士兵知道这些。只要问题解决了，他的心就可以平静了。

在祖国西部祁连山下的荒漠里，掩埋了当年跟随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的成千上万西路军将士的忠骨。还有一些流落异乡的幸存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有的在政治上还继续受到打击。可这些人并没有忘记党。有一位红军女战士，在衣食都很困难的情况下，默默地存钱交党费，分分角角地存了几十年，到1984年竟存了400元，向党交了一次特殊的党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罕见的一次党费。徐向前听到这件事，深为西路军战士对党的忠贞所感动。伍修权、王定国等深入甘肃，调查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情况返京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在徐帅等一批老同志的关注下，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总政治部、民政部共同商定，作出了对西路军流落老红军战士的照顾办法。

后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在徐帅、李先念和胡耀邦的关怀和支持下，修建了西路军纪念馆、纪念碑，让他们的业绩光照千秋。

文革”中徐向前被推进动乱的漩涡，历经坎坷。为稳定军队夜闯“林帅府”毛家湾

1966年5月，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汹涌翻腾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几岁的娃娃，以对毛泽东的无比“忠”心，卷入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于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一场大动乱，就像一艘开足马力外地被推入这动乱的漩涡，历经风险和坎坷。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

产阶级的文化战士”，“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指出这“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各大报刊电台，都原文刊登和广播了这一通知。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文化大革命”如同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席卷全中国。自1965年11月以来陆续遭到批判的罗瑞卿、杨尚昆、彭真、陆定一，如今已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学生停课造反，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戴上高帽，打上花脸，拉上大街游斗。

这突如其来的天下大乱，使徐向前越来越不理解。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报纸上画了不少圈圈和杠杠，可脑子里却一片茫然。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老元帅，一向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如今怎么却理解不透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头戴嵌着一颗红五星的绿军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金水桥畔，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的100万红卫兵。这一天，除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几位元帅事先都没有接到穿军装的通知。在天安门城楼上，大会主持人临时通知，说接见红卫兵之后，毛泽东要和元帅们合影。徐向前和其他几位元帅立即派工作人员乘车回家取来军装。贺龙元帅多年来一直主持国家体委工作，基本不穿军装了，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衣帽，照像时由于帽子太小，搞得很局促。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同元帅们合影。

在这动乱的年代，军队一些单位如履薄冰，随时有可能陷入狂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认为，军队和地方不一样，不能搞“大民主”，不能乱，他日日夜夜在为稳定部队操心。

然而，林彪则希望部队和地方一样，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投入“文化大革命”之中，以显示忠心。中共中央于1966年10月5日批发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的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

文件下达后，全军125所院校，数十万学员，像打开闸门的洪水，涌向社会，出现了军人和红卫兵混在一起大串连的复杂局面。军区机关、总部机关不断遭到冲击，一些军队的领导干部被揪斗，戴高帽，坐“喷气式”，搞得乌烟瘴气。有的院校学员竟把木板搭到警卫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

狂冲击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如此大乱并没有使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放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步骤。徐向前曾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

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林彪对徐帅的建议置之不理，在他的坚持下，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使全军出现立体动荡。

1966年11月间，全军院校来京串连的学员已逾10万人，驻京各军事院校、机关，甚至部分连队都住满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红卫兵”。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200万“红卫兵”。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徐向前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来京学员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师接见、讲话。”徐向前说：你们起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要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战备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肖华说：“可以，不过还是请老师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徐向前点点头，表示同意。

没过几天，肖华带着讲话稿来到徐帅家，徐向前看后作了些小修改，增加了战备的内容。

11月13日，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

体育场的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满清一色的年青军人，有男有女，不下10万。他们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有的“方阵”还集体背诵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周恩来和陶铸在主席台上同大家见面后，说明还要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便退出会场。

继续留在会场的四元帅先后讲了话中，他们虽然都表示拥护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但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队机关，希望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人员以大局为重，做出好样子。

陈帅打头一炮，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

“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

徐帅在讲到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不要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时指出：“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

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

这样搞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到敌人袭击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

叶帅在讲话中，苦口婆心地劝导大家，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背语录，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

“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

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这时，长春兽医大学的一名学员，向主席台递了张条子，质问这个大会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看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人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不少人回答：“不相信。”

叶帅继续说：“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在几位老师讲话时，会场上时而鼓掌，时而沉默，时而交头接耳，时而骚动起哄，已不像军人的集会。

11月29日，总政主任肖华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再次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请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师出席。徐向前一踏上主席台，就感到会场的气氛比上次更有“火药味”，到处贴满了批判陈、叶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连“炮轰”、“火烧”的词也都用上了。陈帅没理这套，按事先准备的讲话稿理直气壮地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党内的“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几天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没准备讲话，只是硬挺着到会，坐下不一会儿偏头痛发作，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元帅们的两次接见，成了江青一伙整军队的导火索。她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刘志坚被打为“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撤掉组长职务。陈帅、叶帅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不知道听谁的好。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从五所打电话给徐帅夫人黄杰说：“你那隔壁有事（指“造反派”揪斗廖汉生同志），我去不方便，你陪老师到我这里来一下，有要事相谈。”徐帅和黄杰一到杨成武的住处，杨便向徐向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徐向前听了感到吃惊，黄杰也不知说什么好。会客室突然沉静下来，连钟表嘀达嘀达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徐向前这位带兵40年的老师，对党所交给自己的任务从不说一个“不”字。在他眼里，“服从”就是军人的天职。可这么多年来，他身体一直不好，毛主席怎么把这样一副重担交给自己呢？徐向前百思不解。

他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

徐帅听到江青的名字，更感到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江青其人，徐帅对她并不了解，平时也毫无来往，只是20多年前在延安住院和出院后暂住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毛泽东和徐向前谈话，江青很少在场。那时，江青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如今江青提议让一个身患多病的老师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实在不知什么用心。

徐向前对杨成武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泽东时，再次面陈不能担当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不准，并用手指向上点了点，幽默地说：“天塌不下来，你向前就干吧！”

1月10日，徐向前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一字一句地审阅江青刚刚派人送来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和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他知道，一切已由中央文革安排好了，自己只能走马上任了。于是，对“通知”提出了几点意见，诸如：要稳定军队，强调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

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行为等等。这些意见，显然出乎林彪、江青的意外，他们不相信一个“病号”还有这么硬的骨头，从徐向前一上任，就埋下了被打倒的祸根。

1月12日，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办公机构设在三座门。

此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由造反派控制上海党政财文大权的“一月风暴”，使全国陷入更深层次的夺权大动乱；江青、王力、关锋伙同林彪炮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带枪的刘邓路线”与上海“一月风暴”相呼应，军队内部极为混乱。徐向前坐在全军文革小组为他安排的办公室里，用四部电话同全军部队保持联络。他像当年打仗一样，在电话里指挥部队：

“你们一定要保持稳定！”

“要顶住，绝不准造反派冲入你们的机关！”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被海军的一伙“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北京。老师的威严，使“造反派”不得不照办。

林彪利用窃踞的地位，召开军委常委会议，提出要全军部队全面开展“四大”，当即遭到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老师的坚决反对。徐帅为稳定军队建议对部队提出“不准串联，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等五不准，林彪对此漠不关心。江青、陈伯达在会上不表态，致使这些规定无法作出。

徐向前解决部队稳定问题的建议和要见林彪面谈的要求，均遭到回绝。徐帅火了，决定夜闯林宅。1月24日晚上，徐向前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便急驰西城区毛家湾林彪住地。

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谈。元帅见元帅，林彪表现出惊喜的样子，伸出那只苍白无力的手，拖着长腔说：“徐——帅，你——好！坐、坐。”徐向前一屁股坐在林彪旁边的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讲了当前全军的混乱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成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林彪连连点头，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并从沙发上站起来，由他口述，秘书记录。这是林的多年习惯，遇有重要的事，总要站起来说，边说边在地上走来走去。林彪口述完“九条”后，提出请叶帅、聂帅来毛家湾研究。陈伯达告退。军委对“九条”进行了讨论，并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为了壮大力量，徐向前特意打电话给陈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

徐帅和其他三位老师先后来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在会场，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徐向前讲了发出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改为七条通过了。

此时江青满脸不悦，自言自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陈伯达走近徐帅，他一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衣袋里，一边说：“已经通过了，你快回去吧！”徐向前把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凌晨4点钟了。

林彪把“七条”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但又提议加了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先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大家讨论中认为高干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完全有必要增加这一条，“七条”遂变成了“八条”。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

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陪同林彪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双手接过毛泽东的批示，激动地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毛泽东淡然一笑，用右手在林彪面前来回摆动了几下，示意“可以走了”，又像是不同意那几个“万万岁”。

徐向前在回家的路上仍在想，林彪接受了他的建议，搞了这八条，也是有他的打算的。

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大乱特乱，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帐的。

1967年1月28日，“八条”作为中央军委命令下达全军，命令反复强调“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在动乱的年代，有了这“八条命令”，对稳定军队，反对地方不断升级的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江青一伙一心想搞掉“八条命令”，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军队的混乱局面仍然没能根除。但毛泽东和老师们始

终都在维护这“八条命令”，把它视为稳定军队的一道重要防线。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仍然在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这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中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境地。2月初，中央为了及时处理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出现的重大问题，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在2月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主持会议，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头上，他的右侧，坐着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他的左侧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这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人事先标明坐位的自然组合。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上来，就是“两军对阵”的架势。

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围绕稳定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

叶帅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帅的话音刚落，早已憋不住的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这个支柱，我就不干了！”

聂帅接着质问：“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迫害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老师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使坐在他们对面的康生等人张口结舌，怀恨在心。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来到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当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阴阳怪气，以要和群众组织商量为由，当场拒绝了谭震林的要求，一场更严重的冲突爆发了。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反复核对会议记录，风风火火地跑到钓鱼台向江青禀报，江青一听大耍泼妇淫威，恶狠狠地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总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一边说一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请他务必在16日晚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

2月18日上午，江青亲自出马，带着王力来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林彪听后摇摇头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在江青的煽动下，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至19日黎明亲自主持碰头会。会议宣布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表态，江青一伙大有翻身之感，一时得意忘形。他们把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之举诬为“二月逆流”，徐向前则成了“二月逆流”的干将之一。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

达、谢富治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大整革命老干部。他们攻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同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在会上，康生气急败坏地叫：“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谢富治也在一旁帮腔：

“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徐帅义正辞严地说：“我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徐向前被迫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检查；

批判徐向前的大标语、漫画、广播等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三次被造反派抄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徐向前被安排在“西北小组”，受到无理的围攻和批斗；夫人黄杰被诬陷为“叛徒”；

女儿徐鲁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 18 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徐向前被一号令疏散到河南开封，安排在囚徒刘个奇的同一座楼里……

一位伟大的中国的元帅，在这动乱的年月，历经风险和坎坷，他以无私、无畏、无敌的一身正气，终于战胜了邪恶，迎来了共和国的又一个春天。

夕阳映九洲，暮年志不移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她对罪恶的人是皮鞭和绞架；她对正义的人是慈母和严父。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星夜乘机出逃，机毁人亡，摔死在异国他乡，尸、首两分。

1976 年 10 月 6 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网打尽，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将他们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徐向前和千千万万个老干部一样，重新获得了新生。十年动乱中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得到彻底平反。1977 年 8 月 18 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 年 3 月 5 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82 年 9 月 12 日、13 日，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81 岁高龄的徐向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在暮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为国防战略的研究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为邓小平的助手之一，为新时期军队的建设尽心尽力，参加落实精简整编，推进年轻化进程，加强院校建设，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他为国家的安全日夜操劳，在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像当年指挥部队作战一样，日夜关注战场态势，精心研究每一份战报。徐帅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全军将士的爱戴，人们称他是“德高望重的国防部长”、“资深勤政的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在暮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接见了诸多国家的国防部长、国防大臣和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也率中国代表团出访一些友好国家，把友谊带向世界。他陪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走访大江南北；陪同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问南京；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访问上海、杭州和广州。

他亲切友好的谈话，留在许多国际友人心中。

徐向前在暮年，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对年轻一代充满希望。他在 1980 年 8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和会议后，相继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务。

1985 年 5 月 30 日，徐向前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并政治局各常委，提出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他主动让位、让贤，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年轻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在暮年，清正廉洁，联系群众，时时处处以“人民的公仆”五个大字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习惯粗食、野菜和普通劳动者生活，常说那句老话：“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他反对以权谋私，从没利用职权给家乡和亲友批过一个不正常的条子；他严禁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子女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办私事；他不让人们为他 85 岁大寿祝贺，想的是所在街道柳荫街的精神文明建设，想的是革命老区还有七口之家仅有六只饭碗的苦日子。他积极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扶贫的意见和建议。

徐向前在暮年，珍惜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认真思考总结几十年领兵作战，艰苦奋斗的经验，组织完成了《红四方面军战史》的修改再版工作；写出了一部 70 多万字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对自己的一些军事论著，讲话、文电等进行了清理，在他逝世后不久，使成千上万的读者看到了一部《徐向前军事文选》。

徐向前在暮年，念念不忘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作了大量工作。

1984 年 5 月 29 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黄埔军校校友茶话会。6 月 16 日下午，出席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当选为会长。1985 年 6 月 11 日，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1988 年 2 月 2 日，87 岁高龄的徐向前辞去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职务，改任名誉会长。2 月 8 日，他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春节联欢茶话会上发表书面贺词。3 月 31 日，为新创刊的《黄埔》杂志题词：“为黄埔同学立言，为祖国统一尽力”。1990 年 1 月 20 日，同聂荣臻一起发表春节谈话，向海内外黄埔师生致节日问候，阐述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期望两岸黄埔师生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5 月 10 日，他临终前 4 个月，还会见了台湾黄埔校友邓文仪等重要客人，寄望“两岸黄埔师生携起手来，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

1990 年 9 月 21 日凌晨 4 时 21 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笔者从睡梦中惊醒，半小时后赶到 301 医院南楼，徐向前元帅安然地躺在五楼病房那宽大的床上，他永久地睡着了。

……他永久地睡着了。

医院走廊里，没有低回的哀乐，只有一批批赶来送别人的轻盈脚步和人们强抑悲伤的抽泣声。天空没有惊雷，我们耳边却在轰轰作响；大地没有强震，我们双腿却在阵阵抖动。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又是一代英雄率领千军万马谱写的。

一代伟人，一代卓越的军事家徐向前元帅的名字和他的功勋、品德、高风亮节，永垂青史！

